

鄧小平帝國

30年

今天胡錦濤統治的中國，
依然是百分之百的鄧小平帝國。

這個在六四屠殺血泊中崛起的帝國，
目前正以經濟包裝席捲全世界；
他的政府是世界首富，
大部份人民生活卻處於世界最貧窮國家之列。
本書從中國迅速崛起的過程談起，
揭露這個帝國的本質與真相。

阮銘

著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南歐初興之時，世界上只有四十個民主國家，絕大部分屬於富裕的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二十年後，全球超過半數的國家和人口進入民主國家行列，有人從而認為人類已走向「歷史的終結」，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寫道：「我們可能正走向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並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作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型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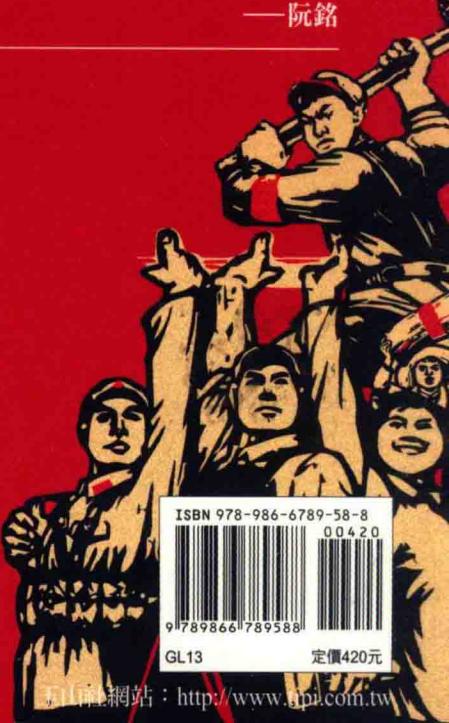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共產奴役制度挑戰自由民主浪潮的歷史沒有終結。天安門屠殺後，鄧小平的開放式共產奴役制度，在全球自由國家的資本、資源、資訊、技術、人才強力增援之下迅速「崛起」，今天正迫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退卻，而人們尚未認識到鄧小平式新奴役制度的擴張對人類自由的巨大威脅。

人類的進步，是自由戰勝奴役的歷史。但一旦自由民主力量失去警覺，奴役制度的崛起足以吞噬自由。未來二十年，中國究竟是走向自由，還是繼續保持奴役制度並向全球擴張，關係人類與地球的前途命運。

謹以此書獻給一切為自由貢獻力量的朋友們。

——阮銘

鄧小平帝國 30年



玉山社

玉山社網站：<http://www.epi.com.tw>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鄧小平帝國30年／阮銘著. -- 第一版. -- 台北市：玉山社，2009.09.
面：公分

ISBN 978-986-6789-58-8 (平裝)

1.鄧小平 2.傳記 3.政治鬥爭 4.中國史

628.76

98014441

鄧小平帝國30年

作　　者／阮　銘
發　行　人／魏淑貞
出　版　者／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6仁愛路四段145號3樓之2
電　　話／(02) 27753736
傳　　真／(02) 27753776
電子郵件地址／tipi395@ms19.hinet.net
玉山社網址／<http://www.tipi.com.tw>
郵　　撥／18599799

主　　編／蔡明雲
編　　輯／許家旗
法律顧問／魏千峰
排　　版／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印　　刷／松霖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420元
第一版第一刷：2009年9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目錄

自序 認識鄧小平，認識中國 3

第一章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第二章 從毛澤東帝國到鄧小平帝國 21

第三章 胡耀邦與專政派的根本分歧 32

第四章 經濟倒胡、政治打周雙管齊下 60

第五章 鄧小平與胡耀邦的最後決裂 89

第六章 中國人民的命運悲劇

第七章 血雨腥風中再換接班人

第八章 鄧小平與蔣經國的世紀對奕 152

第九章 鄧小平帝國的理論基礎 167

第十章 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帝國 186

第十一章 從江澤民到胡錦濤 204

第十二章 民族主義新奴役制度帝國的崛起 252

第十三章 鄧小平帝國的邊疆政策 289

第十四章 鄧小平帝國的全球戰略 319

第十五章 自由制度與奴役制度的最後一戰 340

附錄 中國天安門屠殺的歷史教訓 359

鄧小平帝國
30年

阮銘

認識鄧小平，認識中國

今年（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週年。這個名不副實的「人民共和國」，可以裁為兩截：前三十年毛澤東帝國，後三十年鄧小平帝國。毛澤東去世三十三年，鄧小平去世十二年，兩人雖蓋棺，未定論。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幽靈，仍遊蕩在中國大地。要認識今日中國，不能不認識毛澤東和鄧小平，尤其是認識鄧小平。因為今天胡錦濤統治的中國，仍然是百分之百的鄧小平帝國。從毛澤東帝國到鄧小平帝國，經過兩次歷史轉折。

第一次是和平的，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理論工作務虛會，否定毛澤東的「兩個凡是」，確立鄧小平的「四項原則」。

第二次是血腥的，從胡耀邦下台到天安門屠殺；這是鄧小平的「文化大革命」，在血泊中奠定自己的絕對權威。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兩個凡是」，標誌毛澤東帝國的結束。主導這一歷史演變的不是鄧小平，是以西單民主牆為代表的社會自由民主力量，和以胡耀邦為

代表的黨內民主改革力量。鄧小平在會上的講話，只是順應歷史潮流臨時起意的急就章。三個月後，他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才是鄧小平帝國貫徹始終的政治綱領。

從第一次歷史轉折到第二次歷史轉折，鄧小平花了十年時間，徹底清除了黨內民主改革派。為何這麼久？

因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有兩個對手，同時也是兩個助手。

一個是從政治思想文化到經濟領域的全面專政派，主要角色有陳雲、王震、薄一波、姚依林、鄧力群、胡喬木、李鵬。

一個是從政治思想文化到經濟領域的全面改革派（即民主改革派），主要角色有胡耀邦、周揚、習仲勳、趙紫陽、萬里、項南、任仲夷。

鄧小平自己，是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專政派，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派。他需要民主改革派的智慧和勇氣，為他清除全面專政派設置的重重障礙，開闢經濟領域改革開放的道路。他又需要全面專政派的頑固與殘暴，阻止民主改革派把改革開放擴展到政治思想文化領域。

鄧小平交替使用「兩手硬」對付民主派和專政派，但事實上是有區別的，如他自己所說，經濟上出問題可以讓，自由化出問題不能讓。在鄧小平看來，全球自由民主化潮流（「國際大氣候」）和社會民主運動（「國內小氣候」），是帝國主義「和平

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場無硝煙世界大戰」。因此，反自由化必須採取專政手段，民主改革派雖然在十年中立下豐功偉績，為人民所愛戴，卻注定是悲劇下場。而鄧小平最終以流血鎮壓奠定他帝國統治的基礎，是其權力意志發展的必然。

早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鄧小平廢黜胡耀邦之前，已經針對學生運動發出「不惜流血，天安門來一個抓一個」的指示。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公安部門將冒風雪來到天安門的學生，用車輛載送回校，避免了衝突。胡耀邦辭職下台後，鄧小平打算大舉清洗民主改革派，讓王震、鄧力群開名單。後來雖因趙紫陽設法緩解並中止執行，但鄧小平以專政手段對抗國內外自由民主潮流的大戰略沒有變，只有何時出手的時機選擇問題。正如他在天安門屠殺五天後（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所說：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

這就是鄧小平的大戰略。他伸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對付的不只是和平示

威的學生與市民，不只是因反對鎮壓學生運動被剝奪權力的總書記趙紫陽。他的主要目標，是滾滾而來的自由民主歷史潮流，是他想像中那場「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硝煙世界大戰」。

天安門屠殺完成了毛澤東之後的第二次歷史轉折。胡耀邦、趙紫陽時期的民主改革派，或關進監獄，或罷官回家，或流亡海外。鄧小平已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不需要再玩左右制衡的遊戲了。

第一次歷史轉折後的中國，曾經展現三種發展路徑。

第一種，全面改革：順應歷史潮流與人民意志，結束一黨專政的奴役制度，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現代憲政國家。

第二種，鄧小平的「兩手硬」：開放經濟領域，堅持一黨專政，建立向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開放的新奴役制度帝國。

第三種，全面專政：回到毛澤東式封閉的舊奴役制度帝國。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這十年，鄧力群所謂「逢雙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逢單馬克思主義揚眉吐氣」，正是全面改革派與全面專政派「十年內戰」的寫照。

決定性的是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九年的兩大戰役，鄧小平與專政派聯盟，倒胡倒趙，六四屠城，全面改革派全軍覆沒，打斷了中國走向民主憲政之路。

「六四」之後，鄧小平「韜光養晦，冷靜觀察」，他看到柏林牆倒，東歐巨變，

蘇聯瓦解，更加相信他的大戰略使中國避免了蘇聯——東歐共產帝國毀滅之路。

鄧小平的最後一招，是九二年南巡，主要對付全面專政派。民主改革派既已清除，就不能保留全面專政派這個後患了。

南巡回來，鄧小平籌劃中共十四大：廢元老院（中央顧問委員會），黜鳥籠派（姚依林、宋平退出政治局常委會），逐「左王」（鄧力群），連六十年老戰友楊尚昆也必須斷交，逼他同弟弟楊日冰一道交出軍權。從此中國唯「鄧小平理論」是從，這就是天安門之血的震撼力量。

鄧小平最後這個大工程，是為鄧二世江澤民和鄧三世胡錦濤鋪平道路。他從此無言，靜心編纂鄧選第三卷，自信可確保鄧小平帝國「長治久安」二十年（一九九二—二〇一二）。

這個在六四屠殺血泊中正在崛起的新帝國，對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自由，反民主，反平等，反人權，奴役本國人民；對外卻向全球資產階級大開自由之門，吸引跨國企業、金融資本、地產商、開發公司，源源湧進中國。國外資本與中國政府聯手，掠奪農民土地與自然資源，損害生態環境，從億萬不自由勞工（農民工）身上共同榨取超額利潤，使中國迅速成為全球製造工廠。

這是中國專制王朝「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章法。毛澤東時代是以秦始皇大一統帝國為體，蘇聯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用（毛稱之為「馬克思加秦始皇」）。

鄧小平修正為以秦始皇大一統帝國為體，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用（鄧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鄧小平的「創新」在於，他打破了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也打破了傳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應稱之為「鄧小平模式」或「鄧小平主義」，那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器控制下的資本帝國主義。

一九九二年以來，「鄧小平模式」深得全球資本和自由國家政府的賞識，使中國共產黨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中國政府成功地在全球（重點是美國）展開強大的「銀彈」與「統戰」攻勢，首先攻克了華爾街。後來成為華盛頓中國政策重要決策者，以及美國政府主導美中關係要角的佐立克（前副國務卿，現任世界銀行行長）和鮑爾森（前財政部長），均出身於在中國投資獲利的華爾街高盛公司。

今日美國的大企業、大財團，大學、研究機構的學者、專家，政府官員，主流媒體，處處聽得到肯定「中國模式」的聲音。這一點也不奇怪。中國今天採取的，正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代對人和自然粗暴掠奪的發展模式。這種反人道、反自然的財富積累方式，已經被人類進步的歷史所淘汰。今天忽然重現於一個十三億人口的東方大國，而且大開國門，讓全球自由資本湧入分一杯羹。中國政府只需同合夥者瓜分全球製造工廠的龐大利潤，把出口廉價產品獲得的巨額貿易順差負責任地買回美國國債，就一切OK！這就是佐立克稱中國是「負責任的合夥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真意。

古羅馬歷史學家波里比烏斯寫道：「五十二年間，整個世界臣服於羅馬權威之下。」我們可以設問，當鄧小平帝國進入五十三年，二〇三一年之際，世界會不會臣服在北京權威之下？

關鍵在於自由國家與自由人民今天對中國是否有真正的認識。

人類的進步，是自由戰勝奴役的歷史。但一旦自由民主力量失去警覺，奴役制度的崛起足以吞噬自由。二十世紀納粹德國和蘇聯共產奴役制度的崛起，就是由於自由國家的妥協和縱容，導致巨大的歷史災難。

今天人類又面臨新的奴役制度崛起。美國「自由之家」公佈二〇〇九年自由度報告，全球一百九十三個國家，不自由國家有四十二個，不自由國家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在中國。這個數字表明，在中國結束奴役制度，是終結全球奴役制度，讓世界走向完全自由的重要條件。未來二十年，中國究竟是走向自由，還是繼續保持奴役制度並向全球擴張，關係人類與地球的前途命運。

中國現在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奴役制度國家，GDP不到全球百分之七，碳排放量已躍居全球第一，國民收入分配極端懸殊，大多數人民生活處於世界最貧窮國家之列，其政府卻是世界首富，國家財政收入和軍事裝備開支每年以兩位數增長率激升。中國政府對內肆無忌憚地用專政手段壓迫本國各族人民，對外與專制國家聯

合，遏止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顏色革命（註1），迫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退卻。

從實力對比看，美國、歐盟、日本三大自由經濟體的GDP超過全球百分之六十，是中國的九倍。無論軍事、政治、科技、文化、軟硬實力，自由民主國家都遠遠超過奴役制度的力量。鄧小平的「多極化」戰略，目的就是分化美、歐，分化美、日，分化美日與亞洲國家，利用自由國家之間的空隙，建構各種形式的戰略聯盟，以小搏大，擴張奴役制度的力量。

自由民主國家對中國反自由、反人權戰略的妥協與縱容，並非由於中國奴役制度的強大與不可抗拒，而是由於對這個開放式新奴役制度喪失清醒的認識。

以台灣為例。這個自一九八〇到一九九〇年代完成民主制度轉型的自由之國，創造了舉世公認的政治與經濟奇蹟，被譽為全球第三波民主國家的東方典範，國家

1 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指人民群眾以和平、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斯洛伐克以和平方式實現政權變更，從共產極權制度轉型為自由民主政權，當時稱做「天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

後來，一系列發生在中亞、中東、獨立國協的國家中的政權變更，效法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绒革命」的和平、非暴力方式，被稱為「顏色革命」。如：一〇〇三年十一月，喬治亞的「玫瑰革命」；一〇〇四年十一月，烏克蘭的「橘色革命」（栗子花革命）；一〇〇五年一月，伊拉克的「紫色革命」；一〇〇五年一月，黎巴嫩的「雪松革命」；一〇〇五年三月，吉爾吉斯的「鬱金香革命」（黃色革命）等等。

顏色革命，一般是快速而和平的民主變革，旨在終結專制獨裁政權，建立自由民主體制。

競爭力居世界先進國家之列。然而今天的台灣政府，卻把這個先進的現代憲政國家的未來，納入依附奴役制度中國的錯誤軌道，不惜犧牲台灣經濟、政治、外交、文化的自主發展，幻想從中國去找「活路模式和生存空間」。

這將不但斷送台灣人民走上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生存發展之路，而且助長中國奴役制度的力量，危害中國人民掙脫奴役制度鎖鏈的鬥爭。

從台灣到美國，這種自由對奴役的妥協與縱容方興未艾。那位華爾街出身的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最近同台灣出身、中國培養的副行長林毅夫，聯名在《華盛頓郵報》撰文，鼓吹中、美兩國建立「兩國集團」(G 2)，並成為「二十國集團」(G 20)的「推動力」。

大家不妨想像：一個開放式新奴役制度的中國，一個曾經標榜「擴張自由到最黑暗的角落」、今天縱容奴役制度的美國，兩家(G 2)「共管」世界，二十年後會怎樣？

有人不是已經預言「中國必將取代美國」嗎？那麼鄧小平的政治遺囑，「南巡講話」中的「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恐怕也不是沒有發生的可能罷？

要防止奴役制度吞噬自由，關鍵是改變中國，變中國奴役制度為自由制度。改變中國的前提是認識中國，認識鄧小平。這就是寫作本書的動機。

去年二月，溫輝兄在電話中談到，認識今日中國，必須認識鄧小平，囑我就此主題為香港《爭鳴》雜誌撰稿。動筆時發現，對中國這近三十年的歷程，官方的撰述，故意抹去胡耀邦、趙紫陽等創造歷史的人物；而民間的撰述，又把鄧、胡、趙鑄為一體（「三駕馬車」論），均有違史實。為了去偽返真，不能不涉及歷史過程中必須闡明的一些具體情節。這樣寫下來，「每月一題」，不覺就寫了一年多。

台灣玉山社出版公司發行人魏淑貞女士得悉我在寫這段中國歷史，約定完稿後在玉山社出書。我們認為，認識中國，對台灣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甚至可以說，台灣的未來命運，取決於台灣人民對中國的認識。

國民黨既不認識中國，也不認識美國。蔣介石見過毛澤東，但見而不識。他未能正確記取國共內戰的歷史教訓，以為在台灣繼續國民黨一黨專政，就可以獲得美國支持，「反共抗俄」、「光復大陸」；沒有料到尼克森、季辛吉「聯毛抗俄」，卡特、布里辛斯基「聯鄧壓台」，對台「斷交、撤軍、廢約」，想把台灣逼上死路。

台灣自一九七九年到整個一九八〇和一九九〇年代的歷史表明，只是由於台灣人民不願屈服在外來政權奴役之下，蓬勃興起的台灣內部民主獨立運動與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匯合，迫使國民黨兩屆領導人蔣經國與李登輝認識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實現台灣總統和民意代表由全國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完成了在台灣終結外來政

權到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國家制度轉型，才使台灣走上新生的自由國家之路，避免了被共產中國吞併。

台灣的民主發展，是對中國奴役制度的最大挑戰，不但打破了從鄧小平到胡錦濤的「統一」夢，而且為中國人民終結奴役制度走向自由民主提供了新典範。二〇〇五年胡錦濤頒佈《反分裂國家法》，遭到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強烈反對的關鍵時刻，國民黨主席連戰到北京與胡錦濤簽署《連胡會公報》，背叛蔣經國晚年和李登輝的民主拒共戰略，替胡錦濤的《反分裂國家法》背書。連戰在北京大學演說中提出「聯共反台獨」。所謂「聯共反台獨」，就是國共聯手，試圖顛覆台灣自由民主制度，實現「終極統一」的政治綱領。

國共聯盟不敢公然宣佈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的共產奴役制度綱領，用「聯共反台獨」或「不獨不武」之類模糊概念混淆視聽，欺騙輿論。然而誰都知道，一個獨立國家，不一定是自由民主國家，也可能是一個奴役制度國家，像中國。但一個自由民主國家，一定是獨立國家，自由國家人民不可能接受外來政權的奴役統治。所以連戰和國民黨的「聯共反台獨」，就是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反國家，出賣台灣人民的降共綱領。

二〇〇八年，分裂的台灣人民讓國民黨輕易贏得立法院和總統大選。一年多來，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國家主權，都已大踏步倒退。這是全世界看到的事

實，紐約「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度報告》和國際輿論均有記錄。最近馬英九又以總統身分當選民黨主席。未來幾年，台灣人民必須清醒面對民黨政府加速實施「聯共反台獨」綱領，把民主台灣送進共產中國懷抱的嚴重威脅。

玉山社在此刻推出這本書的意義，在於讓讀者清楚認識今日鄧小平帝國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的奴役制度本質。為了防止獲得自由的台灣人民再次淪於外來政權奴役統治，必須不分省籍、族群、語言、黨派、顏色，牽起手來，團結一致，共同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國家主權不受侵犯，也不容倒退。

最後的疑問是：認識了鄧小平，認識了今日中國，中國人民能夠結束奴役制度，走向自由嗎？

為什麼不能？三十年前，中國人民認識了毛澤東帶來的歷史災難，否定了「兩個凡是」，結束了對毛澤東的迷信，就湧現出胡耀邦、周揚、習仲勳、趙紫陽、項南、任仲夷等一大批全面改革派和西單民主牆的自由戰士群，一度把中國推進到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前沿。是鄧小平的反自由化大戰略，清除了黨內民主改革派和自由民主人士，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和人民維權運動，摧毀了中國人民走向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歷史進程。

鄧小平帝國的崛起，是利用人們對鄧小平神話的迷信。江澤民、胡錦濤的「筆

桿子」，把全面改革派創造的一切歷史功績歸於鄧小平，把鄧小平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的一切罪責歸於李鵬、李錫銘、陳希同、鄧力群等幾個小人，像當年「凡是」派把毛澤東的罪責歸於「四人幫」一樣。江澤民、胡錦濤的「槍桿子」，把一切不同聲音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導致在今日中國只有一種聲音：

——認同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普世價值，主張全面改革之路，被指為「邪路」。

——否定普世價值，否定對外開放，主張全面專政之路，被指為「老路」。

——唯有對內專政，對外開放的「兩手硬」，才是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路」。

三十年來，尤其是「六四」屠殺後的二十年，這條富國強軍、殘民害天的開放式新奴役制度之路，已經給中國的人民生活、自然生態帶來巨大不幸和破壞。寫這本書，旨在重新認識中國這三十年的歷史，破除正、邪顛倒的鄧小平迷信，讓自由民主改革力量攜起手來，從三十年來改革先驅們的成功與失敗中記取歷史教訓，以更高的智慧、更大的勇氣，順應人民意志和歷史前進潮流，完成這場自由戰勝奴役制度的「無硝煙世界大戰」，把地球上最後一個奴役制度大國，改造成為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絢麗、燦爛的自由之國。

謹以此書獻給一切為自由貢獻力量的朋友們。

目錄

自序 認識鄧小平，認識中國 3

第一章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第二章 從毛澤東帝國到鄧小平帝國 21

第三章 胡耀邦與專政派的根本分歧 32

第四章 經濟倒胡、政治打周雙管齊下 60

第五章 鄧小平與胡耀邦的最後決裂 89

第六章 中國人民的命運悲劇

第七章 血雨腥風中再換接班人

第八章 鄧小平與蔣經國的世紀對奕 152

第九章 鄧小平帝國的理論基礎 167

第十章 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帝國 186

第十一章 從江澤民到胡錦濤 204

第十二章 民族主義新奴役制度帝國的崛起 252

第十三章 鄧小平帝國的邊疆政策 289

第十四章 鄧小平帝國的全球戰略 319

第十五章 自由制度與奴役制度的最後一戰 340

附錄 中國天安門屠殺的歷史教訓 359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之後，我在美國寫過一本《鄧小平帝國》，結尾一段話是：

鄧小平在六四屠殺後宣佈把他的本來不合法的最高權力又一次轉讓給他的第三個接班人江澤民。所以應該說，鄧小平帝國在歷史上已經結束了。六四以後的中國，已進入後鄧小平帝國時代。專制制度苟延殘喘，但還沒有斷氣。民主制度已孕育在母腹之中，但還沒有誕生。要使中國自由民主制度和平地誕生下來，還需要每一個中國人作出各自的獨立的貢獻。

歷史表明，這個結語是錯了。鄧小平已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去世，但他留下的鄧小平帝國沒有結束，還在繼續「崛起」；民主中國也沒有誕生。究竟如何解釋這一

鄧小平理論比毛澤東思想更具欺騙性

現在人們比較熱心批毛，而諱言批鄧；大概是以為徹底批了毛，中國走向自由的障礙即可消除。我看很難。今日中國的統治思想，是「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當然包括毛澤東思想，就是鄧小平自我標榜的「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體系」；你不批鄧，就不可能徹底批毛，此其一。其二，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確有「發展」，在當今世界比毛澤東思想更具欺騙性。

一九八九年席捲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激盪的產物，被鄧小平的屠刀毀滅在天安門下。我當時判斷，鄧小平所恐懼的全球民主浪潮的「大氣候」，和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小氣候」，豈是鄧小平的坦克和子彈消滅得了的？這「大、小氣候」終將再起，結束鄧小平的帝國，所以寫下《鄧小平帝國》的最後一章〈暴力的失效與帝國的末日〉。

歷史的進程出乎預料：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繞過血腥的天安門廣場，半年後抵達柏林牆下。東德共產黨沒有效法鄧小平下令鎮壓，讓歡呼的民眾推倒了這座分隔共產奴役制度與自由世界的監獄之牆。羅馬尼亞獨裁者西奧塞古下了鎮壓令，軍隊拒不執行，反而逮捕和槍決了這位共產暴君。整個東歐共產國家獲得了自由。

最後效法鄧小平的是發動蘇聯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的亞納耶夫。他把在黑海休假的戈巴契夫軟禁起來，宣佈自己代行總統職務，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接管全國權力，調動紅軍鎮壓莫斯科示威民眾。但當葉爾欽爬上一輛坦克演說，與民眾一道阻擋軍隊時，塔曼裝甲師的戰車調轉砲口保衛葉爾欽，存在七十四年的蘇聯帝國隨之瓦解。

共產奴役制度挑戰自由民主浪潮的歷史沒有終結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南歐初興之時，世界上只有四十個民主國家，絕大部分屬於富裕的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二十年後，全球超過半數的國家和人口進入民主國家行列，有人從而認為人類已走向「歷史的終結」，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寫道：「我們可能正走向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並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作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型態。」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共產奴役制度挑戰自由民主浪潮的歷史沒有終結。天安門屠殺後，鄧小平的開放式共產奴役制度，在全球自由國家的資本、資源、資訊、技術、人才強力增援之下迅速「崛起」，今天正迫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退卻，而人們尚未認識到鄧小平式新奴役制度的擴張對人類自由的巨大威脅。

從毛澤東帝國到鄧小平帝國

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我說過馬克思有兩個靈魂：追求「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認同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要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馬克思。毛只取其一。

秦始皇也有兩個靈魂：一個建設者的靈魂，車同軌，書同文，發展了古代中國的交通、水利、文化；一個暴虐者的靈魂，修長城，修阿房宮，修墳，焚書坑儒，以言治罪。毛也只取其一，說「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其實是「只破不立」。

毛澤東用半個馬克思加半個秦始皇，建立起他的封閉帝國。封閉秦帝國的是萬里長城，封閉毛帝國的是意識形態的萬里長城——毛澤東思想。

一個封閉的奴役制度帝國，靠高度集權奴役、壓榨本國人民，也可以「崛起」於一時，陳毅不是說「寧可當掉褲子也要發展原子弹」嗎？毛帝國正是在不但當掉褲子，而且砸掉鍋子、餓死幾千萬人之後的一九六四年，原子弹上天；接著在「打

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文化大革命中，氣彈、導彈、人造衛星上天。

但是封閉帝國的「崛起」有其限度，毛澤東「全面專政」的意識形態長城，不但窒息了政治、思想、文化的生機，而且阻塞了資本、資訊、資源、貨品、人員的流通，導致經濟從停滯到「崩潰邊緣」，於是有了鄧小平改革。

鄧小平對毛澤東，既有繼承，又有變革。繼承的是毛澤東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封閉，就是他自己概括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完全是從毛澤東那裡來的，不但「完整、準確」，甚至比毛澤東還毛澤東，他把毛澤東帝國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從憲法中勾消。變革的是對西方自由國家資本、資訊、資源、貨品、人員的開放。

鄧小平的「兩手硬」戰略

鄧小平的這「兩手硬」戰略，並不是一開始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解放思想和民主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爭論，是實踐派、民主派對凡是派、專政派之爭，是全開放對全封閉之爭。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讓胡喬木替他起草了一篇發言稿。胡喬木在稿子中寫了「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社會主義社會還有

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寫了「我們務必要使階級敵人的一切活動，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就加以消滅」等等。這是堅持毛澤東帝國全封閉路線的凡是派、專政派的典型語言。

鄧小平把胡喬木的稿子拿給胡耀邦，說：「這個不能用，喬木的思路不行了，你給我找人寫。」那時鄧小平的思路，是拒絕胡喬木代表的凡是派、專政派，而傾向胡耀邦代表的實踐派、民主派的。鄧小平廢棄了胡喬木的稿子，在胡耀邦幫助下組成臨時起草班子，按照鄧小平當時的思路，完成了那篇後來被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突出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鄧小平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那時鄧小平還明確支持「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西單民主牆，他說：「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

可以說，那時的鄧小平，是和胡耀邦一起站在實踐派、民主派的立場上，拒絕了反民主的凡是派、專政派。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匯報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情況時，還講過更鮮明的民主言論。他說：

十月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寫出一篇二、三萬字的大文章，五四發表，從世界歷史發展與人類社會的趨勢，講清楚民主的發生和發展。資產階級以民主起家，反對封建專制。它搞民主超過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剝削階級。無產階級民主應當是民主發展的更高階段，要超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好東西要大大發揚。過去無產階級沒有搞好，史達林犯錯誤，我們也犯錯誤。

我們要人民當家作主。怎樣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主人？資產階級有一套使自己成為主人的東西，選舉、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

那一天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兩天後鄧小平到了美國，回來後發動了一場「懲罰越南」戰爭，西單民主牆出現魏京生警告「防止新獨裁者」的大字報。短短兩個月中，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從傾向民主派、拒絕專政派，轉向拒絕民主派、傾向專政派，於三月三十日發表了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他兩個月前設想的「民主大文章」拋到了九霄雲外。鄧小平說：

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份子，有敵特份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份子和其他壞份子，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或者說是歷史上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於這一切反社會主義份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這種專政是國內鬥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鬥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鄧小平的兩種「思路」

這不是轉回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被鄧小平廢棄的那篇胡喬木草稿的「思路」了嗎？三個月前鄧小平說「喬木的思路不行了」，三個月後卻成了鄧小平自己的「思路」。

同一個鄧小平，兩種「思路」，三次講話。究竟何者為真？何者是假？

我看都是真的。這就是鄧小平自己講的「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的「注意力」在改變毛澤東帝國留下來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的狀況，所以

「看法」傾向胡耀邦代表的民主派「思路」。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胡喬木、鄧力群們向他報告的「社會上那股懷疑社會主義、懷疑無產階級專政、懷疑黨的領導、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潮；黨內也有人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加以某種程度支持」的傾向，所以「看法」也就轉向胡喬木代表的專政派「思路」了。

此後六、七年，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在民主派和專政派之間，轉過來、倒過去，時而主張「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從制度上保證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時而主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分立那一套」，「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標誌鄧小平與黨內民主派的最後決裂，也是鄧小平帝國「反自由化」大戰略的最後確立。之前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那場「大辯論」，專政派在鄧小平支持下擊敗民主派。然後，鄧小平和專政派利用一九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逼迫胡耀邦提出辭呈。那次事件，可以看作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的小型排練。當時學生運動雖因胡耀邦處置得當和平落幕，但仍使胡耀邦和黨內民主派遭到清算。鄧小平當時的講話已經殺氣騰騰，揚言

「不怕流血」，「天安門廣場來一個抓一個」！

鄧小平和鄧力群的對話

但事後專政派的奪權目標沒有實現，因為鄧小平確立的「反自由化」大戰略是「兩手硬」。鄧小平認為專政派只有專政一手，沒有開放一手，所以不能用專政派推薦的「左王」鄧力群取代胡耀邦。早在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那場「大辯論」前十天，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上午十時，鄧小平和鄧力群之間有一場有趣對話：

鄧小平：新的稿子（指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決議〉草案）發下來了，你看了沒有？

鄧力群：看了三遍，有四條意見。……

鄧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你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指鄧力群把他和胡喬木的意見送給陳雲等人）。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志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鄧力群：你們兩位之間有不同意見，我看出來了。陳雲的主張，我宣傳

過；你的主張，我宣傳過。宣傳你的主張比宣傳陳雲的主張多得多。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贊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講。

鄧力群在《十二個春秋》自述中說：鄧小平與我談話時，當著面是說：「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與王震他們談話時是說：「要我們往『左』的方面拉。」

這表明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前，還是想支持胡耀邦反對鄧力群的「左」。等到全會上發生那場他意料之外的大辯論，看到除了陸定一、萬里之外，楊尚昆、余秋里、王震、薄一波、陳雲、李先念、宋任窮、彭真等所有老人，都站到專政派一邊，鄧小平也就從反鄧力群的「左」轉向反胡耀邦的右了。

但鄧小平帝國的反自由化戰略，與專政派陳雲、李先念、王震、鄧力群、胡喬木們不同。鄧小平反自由化，主要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反，不能擴大到經濟領域，影響他另一手開放。而專政派一直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鄧力群主張：「自由化思潮氾濫，第一段是思想領域自由化氾濫，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經濟領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

鄧小平帝國的總綱領

第一段指胡耀邦，第二、三段指趙紫陽。鄧力群稱趙紫陽是「資產階級政治勢力的代理人」，他說：「有一次李先念問陳雲，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講黨內有個走資派，犯了錯誤；但是從這幾年看，趙紫陽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雲說，什麼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由此可見，專政派要推翻趙紫陽，讓堅持毛澤東全面專政的鄧力群取而代之，是既定方針，有沒有胡耀邦去世後的學生民主運動，都無可避免。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挑選誰來做鄧小平帝國的繼承人成了問題。鄧小平一度屬意李瑞環，拒絕了專政派的首選鄧力群。最後達成妥協，鄧小平認可了陳雲、李先念共同推薦的江澤民。

江澤民執政之初，意識形態領域聽鄧力群、胡喬木指揮，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經濟領域聽陳雲、姚依林指揮，回歸「鳥籠經濟」。結果是兩年經濟大滑坡。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警告「誰不改革誰下台」，直指江澤民。江澤民慌忙拜託鄧小平牌友丁關根求情，表示完全接受鄧小平批評，同鄧力群、陳雲「保持距離」。

鄧小平南巡講話：「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鄧小平帝國的總綱領。

鄧小平說：「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後幾代人身上。我們這些老一輩人在，有份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了，誰來保險？我出來後就注意找第三代，兩個人都失敗了，不是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那時胡耀邦已去世，趙紫陽遭軟禁，黨內民主派已徹底清除。鄧小平還放不下心，立此政治遺囑，警告鄧小平帝國的繼承人：「經濟上出問題」可以「讓」，「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跟頭」的胡耀邦、趙紫陽，絕不可「讓」。

這就叫「警惕右」。有人幻想胡錦濤將「平反」胡耀邦和趙紫陽，該重讀一遍鄧小平這段話。

「防止『左』」呢？鄧小平說：「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指的是鄧力群、胡喬木們，實際上也包括陳雲、李鵬、姚依林和江澤民前期。但是不要緊，「經濟上出問題」，可以「讓」。還是「左」比右好。

鄧小平曾批評毛澤東，「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鄧比毛更甚。毛選過劉少奇、林彪，選了又廢，最後選上華國

鋒也未站住。鄧選過胡耀邦、趙紫陽，也是選了又廢。但最後一著比毛高明，他不但選定自己的接班人江澤民，還選定接班人的接班人胡錦濤。兩個都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經過考驗：一個在上海查禁《世界經濟導報》，一個在西藏鎮壓藏民請願，均威震國際。鄧小平為防備江澤民「經濟上出問題」，還指名「懂經濟」的朱鎔基輔佐江。

所以，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後，鄧小平不需要再「出頭」。他的帝國，從政治綱領到組織架構均已完整確立，足以抵擋「國際大氣候」——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衝擊了。

胡耀邦與專政派的根本分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是民主派與專政派勝負未決的鄧小平帝國過渡階段。

民主派的主要代表是胡耀邦。粉碎「四人幫」後，胡耀邦復出工作，是一九七七年三月，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比鄧小平復出工作早四個月。

先是華國鋒找胡耀邦出來工作。胡耀邦說自己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對象之一，不停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難以工作。華國鋒試圖說服胡耀邦，說「你先出來工作，問題總要解決，急不得」。胡耀邦未被說動。

華國鋒找葉劍英勸胡耀邦。葉對胡說：「你還是出來工作好，也是幫助我啊！讓你當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華國鋒兼校長是掛名），憑你的智慧和才幹，是可以搞出點名堂來的。」胡答應了。

胡耀邦一出手就抓住關鍵

胡耀邦一到中央黨校，就選擇了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兩個「突破口」。

一個是打破思想枷鎖。胡耀邦認為，不打破兩個「凡是」，不把被顛倒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再顛倒過來，全國人民的精神得不到解放，中國的命運就無從改變起。

一個是打破組織枷鎖。胡耀邦認為，不平反冤假錯案，不把被顛倒的幹部路線糾正過來，牽涉一億人的親人還在冤獄之中，靠什麼力量改變中國命運？

胡耀邦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安排中央黨校三位教師研究、撰寫〈把被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一九七七年七月創辦《理論動態》，就是進攻這兩個突破口的戰略部署。

那時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也對兩個「凡是」提出批評。一九七七年四月，華國鋒派汪東興和李鑫找鄧小平談話，要鄧小平承認兩個「凡是」，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與鄧無關；以便「創造條件結束批鄧」、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鄧小平說：「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鄧小平認

為：「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高舉旗幟，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以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鄧小平反對兩個「凡是」，是反對以毛澤東的「片言隻語」、「割裂、歪曲、損害毛澤東思想」。

三支思想部隊

於是在「打破思想枷鎖」這一戰場，有三支思想部隊。

一支是「凡是」派，即主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主要代表是華國鋒、汪東興、李鑫、吳冷西、熊復、胡繩、張平化、鄭必堅等。當時占統治地位，實力最強。

一支是「準確、完整」派，由鄧小平個人提出，胡喬木、鄧力群、王震等支持；後來「凡是」派被「實踐」派打敗，大部分「凡是」派轉而依附「準確、完整」派，聯手攻擊「實踐」派。

一支是實踐派，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派認為，兩個「凡是」是維護毛澤東的舊權威，不准改變過去的錯誤的東西。鄧小平的「準確、完整」，是樹立新權威，即由新的領袖或理論權威來判決可以改變過去哪些「不「準確」、不「完整」的東西，這不過是打開舊枷鎖套上新枷鎖而已。實踐派不依附一

切舊的和新的個人權威，把真理交給社會的、科學的實踐來檢驗，從而徹底否定了教條主義和理論專制主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凡是」派與「準確、完整」派都來壓制。「凡是」派公開攻擊「文章犯了方向錯誤，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旗」！「準確完整」派的「第一枝筆」胡喬木打上門來，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日到胡耀邦家中說：「爭論是你在黨校挑起的，爭論下去將造成黨的分裂，要立即停止，不准《理論動態》再登可能引起爭論的文章！」

但真理的聲音已傳遍全國，誰也壓不下去。就在胡喬木威脅「爭論下去將造成黨的分裂」後四天（六月二十四日），《解放軍報》在羅瑞卿大將支持下，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再論真理標準，給胡喬木當頭一棒。接著，周揚在七月二十四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討論會講演中指出：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我看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周揚的講演，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被視為對這場爭論的定論。

針對兩個「凡是」提出兩個「不管」

在另一個「突破口」打破組織枷鎖方面，胡耀邦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後，立即對平反全國冤假錯案採取行動。他針對兩個「凡是」，提出兩個「不管」：

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那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改正過來。

當時有人問：「毛主席批的怎麼辦？」胡耀邦答：「照樣平反！」

一些毛澤東親批的要案、大案，胡耀邦都組織專人複查。不但毛澤東搞錯了的要平反，華國鋒、鄧小平搞錯了的也要平反。涉及幾十萬知識份子命運的反右派案，當時直接主持者是鄧小平和彭真，平反阻力極大。在鄧小平、彭真領導下，打了大批右派的蔣南翔等人，竭力阻止為自己打的右派平反；胡耀邦力排眾議，為絕大多數右派都平了反。只因鄧小平堅持「反右派鬥爭有必要，錯在擴大化」，最後不得不象徵性地留下幾個「頭面人物」。這個保留至今帶來後患。

三中全會——實踐派全勝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可以說是實踐派對「凡是」派和「準確、完整」派聯盟的一次勝利。

三中全會的議程本來很簡單：一是討論農業問題，二是通過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國民經濟計劃。鄧小平建議全會前開工作會議，用兩、三天時間討論一下「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鄧小平讓胡喬木起草的講話稿，是把「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納入「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胡喬木寫道：

全黨全軍經過這兩年對林彪、四人幫的揭批查鬥爭，從組織上整頓了各級領導班子，從思想上清理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歪曲竄改，恢復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全黨全軍全國各民族的安定團結現在已經有了鞏固的基礎，完全有可能實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只有這樣做才叫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才叫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

然而，工作會議的進程出乎鄧小平、胡喬木們的預料。胡耀邦選擇的兩個「突

破口」，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之爭，在分組討論中欲罷不能。各組還議論開了西單民主牆提出的許多歷史是非問題，諸如：天安門事件，彭德懷和廬山會議，陶鑄和中央宣傳部問題，右派是摘帽還是徹底平反問題，劉少奇問題等等。

「凡是」派在會上發動攻擊周揚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講演。胡繩說：「有的同志在公開講演中宣佈黨內這種分歧不僅是思想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是關於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雖然其用語不過是八股老調，但在國內、國際引起人們對安定團結局面的疑慮，其影響是不好的。」

胡繩的挑戰在會上重新燃起戰火，結果以「凡是」派失敗告終。工作會議從一月十日開始，胡喬木的稿子是十一月十九日完成給鄧小平的。會議開到了十一月三十日，鄧小平發覺不對了，才廢棄胡喬木的稿子，要胡耀邦找人重寫。

中共官方文獻把鄧小平那篇講話定為「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實在是一大諷刺。那篇講話，不如說是在當時會外西單民主牆「大氣候」和會內各小組討論「小氣候」逼迫下的急就章，是在胡耀邦選擇的兩個「突破口」突破之後的必然產物。講話肯定真理標準討論的語言，是照錄被胡喬木指責為「分裂黨」的周揚在社科院的講演。這不但是對「凡是」派的否定，也是對「準確、完整」派的否定。

華國鋒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兩個「凡是」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華國鋒說：「由於會議時間有限，這方面的問題不

可能花很多時間來解決。中央政治局意見按照葉帥（葉劍英）提議，在三中全會後專門召開一次理論務虛會，進一步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理論務虛會的鬥爭

於是，「打破思想枷鎖」的戰場，就轉移到理論務虛會。

當胡耀邦籌備理論務虛會的時候，胡喬木開始精心策劃一場新的「反右」鬥爭。他到處講話和遊說，鼓吹當時出現了所謂「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觀點」的「三股風」，「形勢比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時更嚴重」！

胡喬木的第一個遊說對象是華國鋒（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碰了釘子。華國鋒說：「無論如何不要反右派！」第二天（一月三日）又到中宣部遊說。胡喬木說：「三中全會不可避免引起對毛主席全盤否定，連帶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趨勢都出來了。」胡耀邦批評他對形勢看法錯誤，不能說有「三股風」。胡喬木還攻擊《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萬歲〉，「只歌頌人民，不歌頌領導，是企圖建立一個民主黨來改造共產黨」。

在組織上，胡喬木收編了汪東興手下的「理論組」，使「凡是」派舊教條主義

力量和「完整準確」派新教條主義力量合流，遏阻三中全會後全國蓬勃興起的自由民主潮流。

胡喬木終於在三個月後說動鄧小平，為鄧小平寫出那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在「三股風」之外，加上一股「否定無產階級專政」風，以「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來反對「自由化」。胡喬木後來把他這一勝利，得意地稱之為「三中全會後的分道揚鑣」。

胡喬木、鄧力群、吳冷西們的專政派（包括「凡是」派和「完整、準確」派），早在那時即已蓄意要除掉胡耀邦、周揚、胡績偉們代表的自由民主力量，而胡耀邦還毫不在意。

胡耀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黨中央秘書長，同時兼任中央黨校、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職務。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錯案兩個「突破口」，仍在他領導之下，但愈是深入進行下去，遇到的阻力愈大。胡耀邦感慨地說：「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各色各樣的教條主義；一個是組織枷鎖，各種錯誤的組織結論，壓得抬不起頭，無法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

胡耀邦注意力轉向經濟

三中全會後，胡耀邦的注意力轉向經濟方面。胡耀邦說，他做過軍隊工作、組織工作、宣傳工作，現在想專心研究一點經濟問題，從縣一級研究起。中國幅員廣闊，經濟條件千差萬別，解剖一個麻雀，樹立一個典型，像大慶、大寨，全國都來照搬的那個辦法，搞現代化建設看來不行。他要走遍全國省、市、自治區二千多個縣級單位，進行比較研究，思考國家的發展戰略。

胡耀邦提出進行「三場大討論」的構想：

第一場真理標準討論，思想路線沒有解決。否定了兩個「凡是」，還會有新的「凡是」；破除了舊的個人迷信，還會有新的個人迷信。

第二場生產目的討論，國家的發展戰略，究竟是為生產而生產，為完成國家計劃指標而生產，還是為滿足全國人民的需要？

第三場是人的解放。胡耀邦珍視自由、民主、人道價值，期待中國人民掙脫專制枷鎖，解放成為人。他喜歡引用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那句話：「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胡耀邦說：「這篇東西是馬克思早期寫的著作，因為當時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還是個封建社會，還是農奴制，農民還是奴隸，我們不要把自己降低成一個奴

隸。」

圍繞生產目的討論的鬥爭

胡耀邦發動生產目的討論，是一九七九年九月。他批了《人民日報情況匯編》一篇文章〈斯大林對雅羅申柯為生產而生產觀點的批判〉，要《理論動態》結合已經戰線的思想實際，寫出一篇關於生產目的的文章，開展討論。這篇題為「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的文章（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發表後，全國有二十個省市自治區的報紙發表文章和座談參與討論，反應熱烈。胡耀邦在十月九日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再次提出發展速度和生產目的問題。他說：

與速度直接關聯的是平衡問題。有人對過去幾次比例失調留下太深印象，總怕財政收支、產銷、物資供應的平衡不能保持，主張放慢速度。我們不要用靜止的、凝固的、機械論的觀點來看平衡，只要認真改進死板的財政信貸管理、物資管理等辦法，事情大有可為，要大膽吸收外資，來增加我們的建設資金，不要因為經驗不足吃了一點虧而因噎廢食。

胡耀邦談到生產目的時，引用了史達林對雅羅申柯的批評：「雅羅申柯同志忘記了，人們不是為生產而生產，而是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生產。他忘記了，跟滿足社會需要脫節的生產是會衰退和滅亡的。」胡耀邦說：「我們黨內相當多人沒有弄清生產目的，把手段當成目的了；為生產而生產，使得我們現在的經濟結構很不合理，是畸形發展的，同社會需要和人民生活需要長期脫節，缺乏活力。」

這場討論對胡耀邦來說，是為國家更好更快發展，並沒有想到觸怒了以陳雲為首的計劃經濟官僚集團。胡喬木再次得意洋洋地到胡耀邦家中制止生產目的的討論，被胡耀邦拒絕。胡耀邦說：「上回喬木來阻止真理標準討論，我有點退卻之意，這一回我告訴他：我毫無退卻之意！」

然而，胡耀邦沒有料到，這回從陳雲來的壓力，比上回從華國鋒來的壓力，強大何止百倍。何況上回在關鍵時刻支持胡耀邦的羅瑞卿大將已去世；上回實踐派主角之一、掌控《理論動態》的吳江，這回卻責怪「胡耀邦不懂經濟」！？後來吳江還給胡耀邦寫信，引用《宋史·堯俞傳》稱讚堯俞為人「厚重言寡，遇人不投城府，人自不敢欺」，批評胡耀邦「過去說自己在經濟上是打麻雀戰，現在地位變了，麻雀戰的方法怕也得變一變；這方面言寡恐怕要比言多適當一些」。

吳江根本不懂，胡耀邦在經濟領域，早已不是打麻雀戰。他雖然被迫暫時停止

生產目的的討論（胡喬木自己阻止不成，又搬出余秋里、陳雲，最後把鄧小平也搬出來），但他思考國家經濟發展重大戰略的決心與信心，始終不變。他著重研究了國家未來二十年發展的速度問題、生產與消費的互動關係、發展對外經濟關係三大領域，都提出了自己的獨立主張。

現在人們較多看到的是胡耀邦與專政派在政治領域的根本分歧，而較少注意到胡耀邦與專政派在經濟領域的根本分歧。長期以來流傳著一種虛假觀念，即類似吳江那樣的認為胡耀邦「不懂經濟」，只有陳雲和姚依林他們才「懂經濟」。他們分辨不出胡耀邦研究的是現代市場經濟，陳雲、姚依林們「懂」的是教條計劃經濟，對現代市場經濟一竅不通。

在歷史上，胡耀邦同鄧小平的分歧主要在政治領域；而同陳雲的分歧主要在經濟領域。鄧小平帝國三十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不但政治戰場上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是胡耀邦，經濟戰場上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也是胡耀邦。

下面簡要談談胡耀邦在發展速度、生產與消費、對外經濟關係三大領域，同專政派的主要分歧。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胡耀邦與趙紫陽、姚依林、房維中，到武漢向鄧小平匯報經濟發展計劃。當時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趙紫陽，主張六五計劃增長速度百分之四點五。

鄧小平問：按此速度，二十年能否翻兩番？（三人不答）

胡耀邦說：二十年翻兩番，每年平均遞增應為百分之七點二。

鄧又問：五十年翻兩番呢？

胡：每年平均遞增百分之二點五。

鄧：那太少了。

胡：經過努力，力爭百分之七是不可能的。

姚依林：明年只能保四爭五。

胡：如果現在只是保四爭五，二十年翻兩番就是一句空話，我們會把麻煩留給後代，後面的人怎麼工作？

爭論的第一次爆發

「二十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是胡耀邦在一九八〇年初向鄧小平建議的。胡耀邦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要有個戰略目標。湖北省委書記陳丕顯提出湖北農業二十年翻兩番的目標，我們能不能設想從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把我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人均達到八百美元的小康水平。」

鄧小平當時表示肯定，但在遇到分歧意見時，卻不表示明確態度，因為他知道

主張「低速度」、「捨發展」的真正后台是陳雲。這場爭論的第一次爆發，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會議。

陳雲集團為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作了精心策劃。

第一，利用波蘭團結工會事件的「國際大氣候」，在政治和經濟兩條戰線全面進攻。

波蘭團結工會事件發生於一九八〇年七月。當時胡耀邦認為：「波蘭事件的教訓是必須堅持徹底改革的方針路線，波蘭每一次改革，一遇困難和阻力，就退回老路，不敢得罪蘇聯，不敢觸動斯大林模式的根本制度，才遭致危機。」鄧小平開始與胡耀邦看法一致，在八月十八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指出歷史上所以犯重大錯誤的根源是政治制度問題，「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如果不堅決改革制度，過去出現的嚴重問題，今後有可能重新出現。」

然而，正當舉國上下熱烈討論制度改革之時，胡喬木於九月二十四日寫了一封〈關於波蘭危機〉的信，提出中國也可能「爆發」像波蘭發生的那種局勢，「必須像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發生波匈事件時那樣制定對策」。

這封信先發給胡耀邦。胡耀邦說：「中國不可能發生波蘭事件。第一，我們從來獨立自主，不屈從任何霸權；第二，三中全會以來改革路線得到人民擁護。」

胡喬木在胡耀邦這裡碰了釘子，就去找陳雲。十月九日，中央宣傳部傳達陳雲意見：「經濟搞不好要翻船，宣傳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一個宣傳方面，一個經濟方面，這兩個方面不注意，中國也會發生波蘭那樣的事件。」宣傳部長王任重說：「根據喬木同志建議討論波蘭事件教訓，我們存在與波蘭類似的問題，發展下去也會造成同樣後果。小平同志講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傳。」

第二，製造對陳雲的個人迷信。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鄧力群在中央黨校一連作了四次總題目為「學習陳雲同志的經濟思想」的演講。鄧力群提出：歷史上第一個掌握了我國民主革命階段客觀規律的是毛澤東，第一個掌握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客觀規律的是陳雲。他說：「經濟工作一遇到困難，毛主席就把他請來；困難一過去，又讓他靠邊站。」

鄧力群還佈置中央黨校全體學員學習他編印的《陳雲同志文稿選編》（一九五六—一九六二），並宣佈書記處研究室將編輯出版三卷本《陳雲文集》，供全國學習陳雲經濟思想。

鄧力群雖然提出中國歷史兩階段分別掌握客觀規律的是毛澤東和陳雲，但還不敢公然提「陳雲思想」，只提「陳雲經濟思想」。經中央黨校學員輾轉傳播，傳到鄧小平耳中已是「陳雲思想」。鄧小平還托姚依林轉告鄧力群：「鄧力群在黨校講課，說要學習陳雲思想，這不對嘛，學習仍應是毛澤東思想嘛，叫他以後再不要這

樣提了。」

第三，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批評華國鋒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雲集團把重心轉向經濟工作中的「高指標」、「高速度」和「洋躍進」。

所謂「洋躍進」，就是為了解決全國人民穿衣和出口服裝問題，從國外進口了十三套製造化學纖維的成套設備。這是當時中央討論通過的，葉劍英、鄧小平、胡耀邦都同意了的。

對此，胡耀邦在十一月十九日的發言中，曾替華國鋒緩頰。胡耀邦說：「對於高指標、洋躍進，華國鋒負有一定責任。但確定指標，進口設備，是當時中央討論過的，中央也有責任，不能把責任都算在華國鋒身上。」

第四，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的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議上，迫使鄧小平同意陳雲壓低計劃指標。

陳雲在會上說：「明年計劃要進一步退下來，有人說這樣耽誤了時間。從鴉片戰爭以來，耽誤了多少時間，再耽誤三年有什麼了不得？」鄧小平表示：「同意陳雲意見，退得不夠再退。速度百分之五保不住，百分之四也行。」

同時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根據陳雲、鄧小平的講話，一九八一年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的五百五十億元減為三百億元，比上年減少百分之四十。工農業總產值增長指標降低到百分之三點七。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是以胡耀邦為代表的改革力量，在經濟、政治戰線的全面敗退。

陳雲在會上第一個發言，題為「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主張「採取緊縮措施，遏制經濟過熱」，強調「退夠」。陳雲說：「有些議論說這樣會耽誤三幾年，不怕。」陳雲發言中，讚賞地引用了一位年輕人翁永曠給他的信中提出的「抑需求，穩物價；捨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作為經濟工作的「二十四字綱領」。

趙紫陽、李先念接著講話，表示完全同意陳雲意見。趙紫陽指出：「當前的潛在危險，可能爆發經濟危機。」

鄧小平同意陳雲反自由化

鄧小平在會議最後一天（十二月二十五日）講話，題為「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鄧小平說：

我完全同意陳雲同志的講話，這個講話正確總結了我國三十一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今後長期的指導方針。我也完全同意陳雲同志和紫陽同志的

意見，重點是要抓調整，改革要服從調整，有利於調整，不能妨礙調整。

陳雲同志說，經濟工作好不好，宣傳工作好不好，關係很大。我們的宣傳工作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想，沒有進行有力的鬥爭。要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禁止非法組織活動和非法刊物的刊行。

鄧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個春秋》裡，頗為得意地回顧了他當年如何幫鄧小平弄出這篇講話。鄧力群說：

一篇特別值得提出的重要講話稿，就是小平同志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個講話是小平同志要我幫他準備的，最後也經過喬木修改。喬木修改得最多的、最重要的是思想工作。這個講話，是鄧小平、陳雲合作最明顯、最確定的一個標誌。鄧對陳提出的方針給予全力支持。

這個講話不但在經濟領域採納了陳雲「捨發展，緩改革」綱領，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突出「反自由化」和「加強專政」。這是鄧力群、胡喬木針對改革派的主張有意安下的釘子。在此之前，胡耀邦、周揚等主張對民間團體、民辦刊物採取

立法手段登記管理。經書記處討論，決定制定《結社法》、《新聞出版法》等，這完全符合「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鄧力群、胡喬木向陳雲告狀，陳雲說：「無論如何不能立法讓他們登記，我們過去就是鑽國民黨《出版法》的空子，今天不能讓他們鑽；必須讓他們處於非法地位，予以禁止。」鄧力群、胡喬木在講話中先安下釘子，接著就進一步於一九八一年初起草了〈關於處理非法刊物與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以專政手段取締一切民間團體和民辦刊物。

胡耀邦在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那種氣氛之下，只能暫時沉默以對。

胡耀邦與陳雲的第二大分歧

胡耀邦與陳雲集團，在經濟領域的第二個重大分歧，是消費與積累的關係問題。胡耀邦認為：

過份地刺激消費或提倡高消費是不對的，我們不提高消費的口號；但是要適當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費，引導人民正確地消費，使生產出來的消費品有銷路。這不是說要吃光用光，不是說不要艱苦奮鬥精神了；但是過份地採取節衣縮食的辦法來儲蓄，對於促進生產的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合適？值

得研究。現在商業庫存有一千一百億元商品壓在那裡，商業部門有沒有惜售的思想？今後我們每年增加二百二十億元消費品是完全可能的。我們要多設商業網點，鼓勵商業人員下鄉，有些商品在城裡賣不掉，在鄉村買不到。

胡耀邦當然知道他的經濟觀與陳雲的「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綱領不相容，必須求助於馬克思。他引用馬克思的話：

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消費也媒介著生產，因為正是消費替生產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產品在消費中才得到最後完成。一條鐵路，如果沒有通車、不被磨損、不被消費，它只是可能性的鐵路，不是現實的鐵路。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沒有生產；因為這樣，生產就沒有目的。

馬克思又說：

消費從兩個方面生產著生產：（一）因為只是在消費中產品才成為現實的產品，消費是在把產品消滅的時候才使產品最後完成；（二）因為消費創造出

新的生產的需要，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作為內心的意象、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

胡耀邦在與國家計委、經委、商業部、財政部負責人和經濟學家的座談會上，提出他的經濟工作新方向。他說：「學習馬克思這些話，我們做經濟工作不要只從壓縮消費方面打主意，而要多從發展生產來滿足消費方面想辦法，這是一個根本方針。」

胡耀邦說：

當代世界無非三種模式：一種是蘇聯、東歐的高積累，壓縮群眾的消費，生產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第二種是資本主義高度競爭，追逐高額利潤；我們應以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來推動生產的發展，不是先有第一部類後有第二部類，而是第二部類反過來促進第一部類的增長，人民需要的增長總是走在前面的。這個問題提請大家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我們幾十年的實踐，使我們的經濟工作走出一條新的道路。

這充分說明胡耀邦當初提出生產目的討論，就是要走出區別於為生產而生產或為追逐高額利潤而生產之外的一條新路。生產目的討論被壓制之後，胡耀邦在發展速度、消費與積累關係、對外經濟關係、特區建設、農村建設等領域繼續調查研究，都是為了探索這條新路。

現在人們往往只看到胡耀邦在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等思想政治、組織領域的貢獻，而忽視胡耀邦在經濟領域的重大貢獻。長期以來，人們已形成一種偏見，似乎「胡耀邦不懂經濟」，「懂經濟的是陳雲」。這是歷史的顛倒。

陳雲是懂一點經濟，但懂的是「抑需求，捨發展」的舊經濟，同現代經濟格格不入。陳雲是一個半史達林主義、半經驗主義者。他學史達林主義經濟也只學到「有計劃按比例」那一半，還有一半是中國封建傳統的封閉主義，「肥水不流外人田」。陳雲也做調查研究，也「蹲點」，但只蹲一點，只解剖一個麻雀，以為天下的鳥都是一樣的麻雀。鄧力群吹得天花亂墜的「陳雲經濟思想」，只要陳雲自己的一句話就可以概括——「鳥籠經濟思想」。陳雲思想體系就是半史達林主義、半經驗主義編成的那個鳥籠。

胡耀邦探索現代經濟發展新路

胡耀邦沒有反對陳雲的言行，他是尊重陳雲的。但由於胡耀邦探索的是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新路，所以生產目的、發展速度、消費與積累、對外經濟關係、特區建設等每一個領域，都無法避免同陳雲的「鳥籠經濟思想」發生衝突。

在對外經濟關係領域，胡耀邦跨出的第一步是決定廣東、福建兩省率先對外開放，在深圳、珠海、澳門建立特區。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第五十二次會議，決定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胡耀邦說：「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目的是充分發揮廣東、福建兩省的優勢，先行一步富裕起來，成為全國四化建設的先驅和排頭兵，為全國探索道路、積累經濟、培養幹部。廣東、福建兩省要有遠大眼光，對外更加開放，面向全國，面向世界，盡快把經濟搞活，闖出一條道路，成為對外聯繫樞紐。」

對特區建設，鄧小平開頭是支持的，但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又一度退縮。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中說：「在廣東、福建兩省設置幾個特區的決定，要繼續下去。但步驟和辦法要服從調整，步子可以走慢一點。」

鄧小平當時沒有弄清楚，特區建設靠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加快國內建設；國內

有財政赤字需要調正放慢時，加快特區建設，以更多利用外資投入，彌補國內資金之不足，對全國經濟穩定發展有利無弊。胡耀邦看到了這一點，立刻批轉了中央黨校調查組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底的一份廣東深圳特區調查報告《特區建設速度應當加快》。當時在特區建設前線的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項南說：

廈門特區起步較晚，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下達，福建省委內部保守力量藉口會議要特區建設速度放慢，幾乎使廈門特區建設停頓下來；有了胡耀邦批轉的這個報告，我又可以幹了。

一九八一年四月，調查組到廈門同項南交換意見，寫了《福建廈門的特區建設問題》，提出廈門特區的發展戰略和特區建設的理論問題，主張廈門特區從當時二點一平方公里的湖里地區，擴大到廈門島一百二十三平方公里全部領域，在全島實行類似新加坡與香港對外資的開放政策和優惠待遇，把廈門島建設成國際自由港，靠引進外資和現代先進技術、現代管理方式，形成國際性經濟、文化、社會交往高度發展的世界城市，帶動福建和全國經濟發展。

胡耀邦迅速批轉了這份調查報告及所附關於特區建設的理論文章。他在給當時主管特區建設工作的谷牧批示：「此文材料較豐富，觀點也可取，對中央同志從理

論、方向上思考問題很有幫助。請你要經管這方面工作的同志都能放大膽量把這項工作促上去。」

項南當時立即回應：「材料我一口氣讀完了。對於有各種各樣議論的特區，特別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上加以探討，加以試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兩份材料比投資還重要得多。」

陳雲攻擊建設特區是賣國

正在主持特區工作會議的谷牧並無反應，他知道陳雲正在部署對特區建設興師問罪；胡喬木、鄧力群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租界」的材料，攻擊特區就是舊中國「租界」翻版，是「賣國」！還說：「中央領導同志（指陳雲）意見特區要取消！」鄧小平那時也不說話，坐觀陳雲集團對特區建設的攻擊。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陳雲在省、市委書記座談會上針對特區說：「除深圳、珠海、澳門部分地區（指二點一平方公里）試辦，不能增加；國家建設必須全國一盤棋，按計劃辦事。」他雖然沒有說出「取消特區」，但「全國一盤棋，按計劃辦事」的大帽子壓下來，廣東、福建的特殊政策和特區自主權被統統取消，還如何「試辦」下去？

胡耀邦沒有被壓倒。半個多月後，他跳出特區爭議，就他深思熟慮的對外經濟關係發展戰略發表重要講話。在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中央書記會議上，胡耀邦提出「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建設的本領和對外經濟關係的本領」等十條綱領性意見，指明了對外經濟關係的戰略地位。

胡耀邦在講話中引用唐朝陸贊的話，批評了經濟工作中「吝少失多，溺近迷遠」，缺乏戰略眼光的短視傾向。

胡耀邦的戰略遠見來自他的務實態度和創新精神。他勤跑基層，注重實地調查，胸懷全球格局，善於戰略思考。所以他的主張，總是獲得有遠見卓識的第一線領導人（如項南、任仲夷、陳丕顯、雷宇等）的共鳴，互相支持；卻始終橫遭「吝少失多，溺近迷遠」、「抑需求，捨發展」、反改革的陳雲集團的打擊、阻撓、陷害，使國家的改革與發展蒙受巨大損害。

一九八二年後，陳雲集團對全國經濟，進一步強化「全國一盤棋，按計劃辦事」的嚴密控制。項南於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反映：「最近北京有關部門的指示、規定紛至沓來，照此辦理，不說特區，連特殊政策也實際上取消了；不說同耀邦同志的十條大相逕庭，同中央前兩年指示大為走樣，連三中全會以來稍稍取得的一點進展也給沖掉了。」

從生產目的、發展速度、消費與積累到特區建設，陳雲集團同胡耀邦在對內、對外經濟發展問題上的根本分歧，是繼續改革開放，走出一條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新路，還是退回半史達林主義、半經驗主義老路的重大戰略分歧，也是導致一九八三年陳雲集團對胡耀邦第一次奪權未遂的主要原因。

第四章

經濟倒胡、政治打周雙管齊下

書記處兩個鬼煽風點火

陳雲集團策劃第一次倒胡在一九八三年三月，爆發點是經濟議題。一九八二年GDP增長百分之八點七，超出計劃指標（百分之四）一倍以上。鄧小平自己也發現了問題。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萬里、姚依林、胡啟立、張勁夫、宋平等談話。鄧小平說：

總結歷史經驗，計劃定得過高，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已經注意到了；現在要注意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計劃定低了，實際增長速度高出很多，會產生什麼影響？對這個問題，要抓緊調查研究，作出符合實際的分析。總之，制定計劃，應該是積極的、留有餘地的、經過努力才能達到的。

一月十七至十八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鄧小平提出的計劃問題。胡耀邦說：「要加快能源、交通和某些薄弱環節建設，不從今年加點碼，二十年翻兩番可能落空。不搞高指標，但要經過積極努力，在講求經營效益條件下，爭取今年增長百分之七或更多，不要拿『保四爭五』來擋駕。情況變了，歷史前進了，我們的工作也要跟著前進。」

胡耀邦還提出「放開眼界看投資，把人、財、物的潛力挖出來。」他說：「我們有相當可觀的黃金和外匯儲備，放在銀行裡不生息，還要貼保險費；能不能拋一點，現在銀行錢很多，不會用也不是好事。」

中央書記處裡面有兩個鬼：一個鄧力群，一個胡喬木。他們反對胡耀邦，在會上不講，會後到陳雲那裡挑撥，說「胡耀邦的中心意思就是搞高速度，對『保四爭五』不滿意，要在第一個十年裡翻一番，是衝你陳雲來的。弄得鄧小平也有點坐不住了」。

緊接著，胡耀邦於一月二十日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講「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講了二十八條，中心是「全面改革」。胡耀邦說：「全面而系統地改，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

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堅決而有秩序地改。改革就是破舊創新，要以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

胡耀邦的經濟思想，從「生產目的」，「消費與積累相互促進」，「藏富於民，民富才能國強」，「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打開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發展對外經濟關係」，「加快與擴大特區建設」，到「二十年翻兩番戰略目標」，是環環相扣的一個完整戰略思想體系。他提出「全面而系統地改革、破舊創新」，就是為實現這個戰略目標。

胡耀邦的經濟發展戰略，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不可避免與陳雲集團「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的半史達林主義、半經驗主義經濟思想相衝突。因此，陳雲集團對胡耀邦「必欲除之而後快」是勢所必至。

首先發難的是胡喬木。二月十六日他把《人民日報》正副總編輯找到家裡，指責胡耀邦的「全面改革」講話不符合「十二大」精神，是「對大家施加壓力」，囑《人民日報》「不要宣傳」。

姚依林隨後給鄧小平寫信，稱「胡耀邦鼓吹突破『保四爭五』是提倡高速度」。胡喬木還到鄧小平那裡告狀，說「胡耀邦對社會主義信念動搖」。一時亂雲滾滾，風暴即至。

對胡耀邦正式發難

正式發難是在三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議上，趙紫陽先講了一段話，說：「歷史經驗是，幾年順利發展，就坐不住，高指標，折騰，搞不下去了，再調整。現在有的同志頭腦發熱，又想折騰一次。」

趙紫陽沒有點名，接著李先念也附和了幾句。然後是陳雲長篇發言，指名道姓，列舉胡耀邦九條罪狀，從「高速度」、「高指標」、「高消費」、「搞亂經濟」，一直到「調查研究方法」，全盤否定胡耀邦的經濟戰略思想，和從調查研究不同地區的實際條件出發、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賣弄他那套半史達林主義、半經驗主義的「綜合平衡」論和「長期蹲一個點、解剖一個麻雀」的老套套、老方法。

會議一結束，鄧力群當天晚上就在事先安排好的《紅旗》雜誌聯絡員會上傳達了「陳雲九條」；接著又在第二天（三月十八日）新華社全國分社長會議上再次傳達，並點出「中央最近出了一點麻煩」，要全國分社向所在省、市、自治區黨委「吹吹風」。

與鄧力群公開點火相配合，胡喬木背著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等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找陳雲秘密策劃，整理出三月十七日會議記錄，打算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傳達和討論「胡耀邦問題」，實現其「倒胡」陰謀。

最有趣的一幕是，三月十八日夜晚，胡喬木與陳雲謀劃結束後，興奮地跑到胡耀邦家裡，裝出一副同情的模樣，對胡耀邦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幹別的，我們友誼長存。」弄得胡耀邦當時莫名其妙。

許多人只看到鄧力群「倒胡」是想取而代之。其實一九八三年那次「倒胡」，鄧力群還沒有那個資格。那次「倒胡」主角是陳雲和胡喬木，所以胡喬木才會情不自禁地在胡耀邦家說漏嘴。胡喬木在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已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他雖然不是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但經常列席中央常委和書記處聯席會議。而與陳雲、胡喬木一起發動「倒胡」的姚依林和鄧力群，一個（姚）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個（鄧力群）只是書記處成員之一。

鄧小平：胡、趙格局不能變

胡喬木沒有自知之明，自以為鄧小平和陳雲都喜歡他；又看到三月十七日會議上，趙紫陽、李先念、鄧小平似乎都站在陳雲一邊，沒有一個人替胡耀邦說話，而且會議完全按照陳雲主張，把經濟工作的決策主導權，由書記處轉到中央財經小組。胡喬木認為自己勝券在握，肆無忌憚地背著鄧小平幹起來了。其實，鄧小平雖然在反自由化和使用專政手段等方面支持胡喬木主張，但對胡喬木的整體政治評價

卻是「不及格」。當年胡喬木投降江青、積極批鄧，鄧小平原諒了他，說他「不是賣身投靠，是軟骨頭」。

胡喬木沒有料到，他操之過急卻壞了事。鄧力群在《紅旗》聯絡員和新華社全國分社長兩個會議上煽風點火，引發全國強烈反彈。三月十八日夜裡，廣東、上海等省、市紛紛打電話到中央查問：「究竟中央出了什麼麻煩？」「怎麼剛剛撤了華國鋒又要倒胡？」「到底還要不要同心同德搞四化？」廣東省委把鄧力群的講話記錄連夜報送中央。

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習仲勳接獲各地反應後，報告了鄧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鄧小平立即與在廣東的葉劍英通話商量；葉劍英堅決反對召開胡喬木、陳雲策劃中的「倒胡」會議。於是，鄧小平把胡喬木、鄧力群找去，要他們把整理的材料「全部封存」，告誡他們「胡、趙格局不能變」！一九八三年三月那場「倒胡」流產政變，到此結束。

鄧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個春秋》中，對此不無遺憾地回顧道：「一九八三年之前，鄧（小平）、陳之間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一九八三年這件事，鄧、陳分歧開始顯露出來。」

專政派轉向意識形態進攻

陳雲集團第一次倒胡失敗，的確暴露了鄧小平與陳雲在經濟領域的分歧。他們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有相通之處，都主張「二十年翻兩番，需要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與陳雲的「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不相通；因而改變策略，在經濟領域暫時休戰，轉向意識形態領域發動進攻。他們找到新的「突破口」，是周揚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學術報告會上發表的那篇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的學術報告。

這裡需要回顧一下胡耀邦在中央黨校時提出的〈三場大討論〉，和胡耀邦、周揚在思想文化戰線同胡喬木、鄧力群之間分歧的由來。胡耀邦說：

真理標準討論，使人們從兩個「凡是」的教條主義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只是思想解放的第一步。

第二步生產目的討論，比真理標準討論更重要，生產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人。人是生產的目的，而不是生產的奴隸，人不能成為物的奴隸，是人支配物，而不是物支配人。

第三步人的解放討論，包括物質解放與精神解放。人的物質需要與精神文

化需要，應當是統一而不是對立的。人的嘴巴與其他動物嘴巴的區別，就在於不但要吃，而且要說，要表達思想、意見的自由；要使每人都有主人翁意識，從精神受壓抑的奴隸狀態中解放出來，中國才有希望。所以經濟解放與政治解放、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要協調才能前進。

胡耀邦找過王若水，要《人民日報》發起「人的解放」討論，但《人民日報》自一九八〇年起就已成為胡喬木、鄧力群「反自由化」的重點打擊目標，使這第三場大討論胎死腹中。

那時周揚正在獨立地重新思考「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與胡耀邦關於「人的解放」的思考正相吻合。一九八〇年九月，胡耀邦請周揚來中央黨校演講。周揚講的中心思想，是通過改革，克服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異化」現象，實現人的物質和精神的全面解放。

胡耀邦欣賞周揚的看法，認為與他構想中「人的解放」討論的方向一致，要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把周揚演講的錄音整理發表。周揚起初有點猶豫，說他還在研究探索之中，這次胡耀邦請他來也未準備講稿，只是想到哪裡講到哪裡，不成系統。胡耀邦說，那就先整理出文字稿，送周揚決定。

周揚看了整理出來的稿子很滿意，稍加修飾就同意發表。但那時吳江似乎已察

覺胡喬木與周揚之間有分歧，反對在《理論動態》發表。胡耀邦讓了一步，指示「那就作為學術理論研究探討在《中央黨校校刊》發表」。就在此事過後的一九八一年一月初，胡耀邦不無感慨地說：「粉碎四人幫後辦了《理論動態》，那時不錯，敢提新問題，發表新見解，現在也不怎麼樣了。」

今天看來，周揚那篇演講發表在《中央黨校校刊》而未登在《理論動態》，倒是使胡喬木、鄧力群們向周揚發難推遲了兩年。因為他們身邊的意識形態打手，眼睛只盯著《理論動態》，而懶得去翻《中央黨校校刊》，所以沒有發現周揚早在一九八〇年九月，就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講了「異化與人道主義」問題。而吳江雖「謹慎」也無濟於事，專政派終於還是在《理論動態》挑出一篇無關緊要的〈謙虛謹慎與實幹精神〉短文，毫無根據地強加以「反陳雲同志」的莫須有罪名，先從中央黨校開刀，先打下黨校再打周揚。

周揚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就研究過「異化和人道主義」，那時他批判過「人道主義」，但認為「異化」合乎辯證法，不能簡單否定。周揚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一次講話中，批判了南斯拉夫和蘇聯在人道主義問題上的「修正主義」，同時第一次論及「異化」，肯定了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於「異化」的論點。那篇講話經毛澤東親筆修改，並加上毛自己的好幾段話；毛也肯定了周揚對「異化」的看法。

文革後，周揚又讀了好多書，經過認真反思，對「異化和人道主義」有了新見解，一九八〇年九月在中央黨校講過之後，仍在繼續研究思考；為準備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的學術報告，周揚請來王若水、王元化、顧驥三位有哲學和文學素養的學者，共同討論後，才產生出這篇〈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大文章。

經濟倒胡、政治打周雙管齊下

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在中央黨校舉行的「全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學術報告會」上，周揚的學術報告由一位播音員代唸。結束時，全場以長時間掌聲表達熱烈歡迎。那天正是胡喬木與陳雲、姚依林們緊鑼密鼓搜集胡耀邦「鼓吹高速度反對保四爭五」的材料、發動「經濟倒胡」之時，專政派出席報告會的只有王震和鄧力群兩人。王震沒有聽懂，看到全場熱烈鼓掌，走到周揚面前說：「你的報告真好，我很受教益，我想問你『Yihua』是哪兩個字？」周揚在紙上寫了「異化」二字，王震點點頭走了。

鄧力群有「特異功能」，立即嗅出「周揚講人道主義的語言同赫魯雪夫差不多」，「講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思想都會異化，同過去黨的一貫說法不一致」！當天下午，鄧力群同因策劃「經濟倒胡」而上午未到場的胡喬木商定，馬上告知王

震，讓王震下達決定，黨校報告會延長會期，各地來京出席會議人員留下，休會兩天再開，在兩天中緊急部署一批人「圍剿」周揚。

這就是當年專政派「經濟倒胡、政治打周」，雙管齊下的戰略部署。許多人至今還沒有弄清楚專政派一九八三年「倒胡」與「打周」之間的關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思想解放運動，周揚一開始就與胡耀邦站在一條戰線，也一開始就遭到專政派的敵視和嫉恨。對胡耀邦發動真理標準討論的經典評價，就是周揚首先提出，成為歷史定論。接著，周揚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後，繼續發表〈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一九七九年五月四日），直接遏阻專政派以〈四項基本原則〉（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對自由民主派的清算鬥爭。

對專政派來說，胡耀邦是他們在政治、經濟領域全面專政的主要障礙，周揚是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全面專政的主要障礙。一九八三年三月「倒胡」、「打周」同時爆發，絕非偶然，是專政派蓄謀已久的「大戰略」。鄧力群在《紅旗》聯絡員和新華社分社長兩個會議上，緊急煽風「中央最近出了一點麻煩」，兼指胡耀邦和周揚。後來，「倒胡」因葉劍英堅決反對、鄧小平叫停胡喬木、陳雲策劃中的「第一書記會議」而中止；「打周」卻獲得鄧小平支持而成功，鄧力群還假惺惺地向鄧小平表白：「我講中央出了麻煩是指周揚，下面誤會我指的是胡耀邦。」

鄧小平的思想本質

鄧小平在一九八三年「倒胡」、「打周」事件中的表演，充分暴露出他的「半毛澤東主義半實用主義」思想本質。胡耀邦、周揚主張思想解放，是關注中國的前途命運，通過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革，實現每一個中國人的物質和精神的解放。而鄧小平和專政派的「思想解放」，只為奪取和鞏固自己的權力。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胡耀邦、周揚和中國人民來說，是思想解放的起點；而對鄧小平和專政派來說，是「思想解放」的終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三個月，鄧小平和專政派就亮出了「四項基本原則」，鎮壓思想解放運動，取締民主牆，逮捕魏京生。鄧小平要的「準確、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系」，只取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一半：「四項基本原則」，而拋棄另一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哪有什麼「準確、完整」？只能稱之為「半毛澤東主義」。那另一半是「半實用主義」，對打擊政敵有利時，「群眾貼大字報是我國形勢穩定的表現」；當大字報批評到自己時，就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因素」，「不但要講，而且要用專政手段」了。

而受挫，且導致鄧、陳分歧暴露；他們對「政治打周」格外嚴密策劃，特別在取得鄧小平支持上面下功夫，必欲對周揚徹底孤立而殲滅之，採取的是極其黑暗、殘酷的陰險戰術。

陰險虛偽的胡喬木盡幹壞事

許多人至今不認識胡喬木的虛偽、陰險性格，真正深刻了解胡喬木的是歷史學家黎澍。黎澍說：「毛澤東的知識份子改造，就是製造偽君子。毛澤東把胡喬木立為標兵，稱他『改造最好，靈魂最美』。胡喬木虛偽的雙重人格，就是在毛澤東身邊塑造的。」

胡喬木嫉恨周揚、陸定一由來已久。早在文革前老中宣部，胡喬木就常在毛澤東面前挑唆周揚、陸定一的「不是」。胡喬木此種陰暗心理，第一，來自「妒」。在共產黨內，周揚和陸定一讀書多，有學問，有思想，下筆有文采，理論和思想文化方面曾獲得毛澤東讚賞。胡喬木雖也讀了些書，但他是教條主義讀法，同陳雲一樣；寫文章枯澀死板，缺乏創意。第二，胡喬木緊跟毛澤東的秘訣，是跟左不跟右；還暗中窺探周揚、陸定一的「右」，向毛告狀。毛倒並不完全聽信。

那時胡喬木與陸定一、周揚在老中宣部的重大分歧，一個是「學習蘇聯」，一

個是「雙百方針」。五十年代初，胡喬木要把蘇聯史達林教條主義那套「宣傳網」照搬到中國來，從中央到基層嚴密控制輿論，遭到陸定一、周揚反對。那次毛澤東也反對胡喬木的主張，支持陸定一和周揚，胡喬木懷恨在心。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陸定一、周揚支持。陸定一在學術領域提出「兩個萬歲」：唯物主義萬歲，唯心主義萬歲，主張大學開設唯心主義課程。胡喬木先是消極觀望，暗中壓制，讓《人民日報》不登支持「雙百方針」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陸定一、周揚主持）消息，而登反對「雙百方針」的陳其通文章。毛澤東對此提出批評時，胡喬木諉過於鄧拓（《人民日報》社長）；事實上，鄧拓支持「雙百方針」，被胡喬木壓制，還要代胡喬木受過。後來毛澤東轉向反右，胡喬木立刻緊跟，幫毛澤東擬出那「六條政治標準」，同後來幫鄧小平擬出「四項基本原則」如出一轍。

文革時，胡喬木藉口身體差，毛澤東讓他在南池子原波蘭大使館一座豪宅休養；他頻頻接受來訪揭發陸定一，誣陷陸定一同毛澤東在陝北行軍時遭敵機轟炸，是陸定一提供敵方情報，何等陰險惡毒！當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陶鑄認為是「胡說」，囑專案組不用理會。

文革後，陸定一率先在《人民日報》撰文翻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右傾的案，指出彭德懷的意見書「方式是對的，內容也是對的；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打擊是完全錯誤的」。胡喬木立刻到鄧小平處挑撥說：「中央沒有作歷史結論，陸定一擅自批

評毛澤東，已引起國外輿論視作「非毛化」的新動向。」

鄧小平聽了胡喬木的讒言，從此「彭、羅、陸、楊」一案四人，兩個專政派彭真、楊尚昆俱受重用，官至人大委員長、國家主席；兩個改革派羅瑞卿過早去世、陸定一終身被打入冷宮，何其毒也！

一九八三年，胡喬木利用周揚「異化與人道主義」一案，再次把鄧小平拉到專政派一邊，發動全國清除精神污染等一系列意識形態鬥爭，從「打周」到「二次反自由化倒胡」，終於達到了在共產黨內清除自由民主改革力量的戰略目標。

「專政派」對周揚步步進攻

選擇周揚的「人道主義與異化」理論開刀，發動全黨全國全軍「清除精神污染」，這是專政派「反自由化」大戰略的一場關鍵戰役。表面上看，「清污運動」是一場災難，全國雞飛狗跳、國際形象受損、改革開放中斷。但對鄧小平和專政派來說，不但除掉了一個「自由化祖師爺」周揚，而且給胡耀邦貼上「渙散軟弱，反自由化不力」的政治標籤，讓這個總書記從此無力推行他的「全面改革」大戰略。

專政派「反自由化」大戰略對抗胡耀邦「全面改革」大戰略的進程大致如下：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胡耀邦提出「全面改

革」。

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全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學術報告會，周揚在報告中提出「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中心思想是「以改革克服社會主義異化」。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胡喬木到周揚家中發難，但言辭閃爍。周揚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問他：「我講了異化，說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當作克服異化的重要手段，你認為怎樣？」胡喬木避不回答。

原來他只是聽了鄧力群說辭就找上門來，自己毫無準備。等回去查了一通馬克思語錄，才給中宣部郁文打電話說：「異化問題我忘記談了，我想馬克思早期說的異化和晚期說的不一定一樣，把它不加區別應用到社會主義是不妥當的。」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鄧力群組織北京大學教授黃楠森等四人，在中央黨校會議批評周揚。黃楠森說：「異化就是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不用說社會主義社會，在共產主義社會也將充滿矛盾。」但又說周揚「濫用異化概念」，自相矛盾。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議，專政派發動「經濟倒胡」。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九日，葉劍英、鄧小平阻止「經濟倒胡」，封存胡喬木、鄧力群彙整的「倒胡」材料。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日，鄧力群起草給中央的報告《中宣部關於〈人民日報〉不聽招呼發表周揚講話的情況和處理意見》，送交中央書記處。鄧力群的報告建議撤銷王若水《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職務，並建議中顧委找周揚談話，要周揚作自我批評。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書記處討論鄧力群報告。胡耀邦說，報告涉及具體事實應與本人核對，書記處不作結論。習仲勳明確反對鄧力群要周揚認錯。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胡喬木主持中宣部開會，核對鄧力群報告中的「事實」。周揚當面批評胡喬木撒謊：「你這個人講話，從來都是今天一個說法，明天又是另一個說法，我不知道究竟信你哪個？」周揚還說：「你的做法不正派，我是反對你個人，怎麼你就是中央？」周揚在中宣部會後寫信給胡耀邦，說明鄧力群報告如何歪曲事實。

四月二十日，鄧力群把修改後的報告再度送中央書記處，胡耀邦不予理會。

但專政派並不罷手。一九八三年三月「經濟倒胡」失敗，使專政派得到三點教訓：第一，「倒胡」必須取得鄧小平、陳雲兩邊支持，只靠陳雲一邊搞不倒胡；第二，為取得鄧、陳兩邊支持，光抓經濟問題也搞不倒胡，必須把重心轉向政治問

題，通過打周揚強化鄧小平的「反自由化」大戰略；第三，為防止地方反彈，還必須找幾個「自由化」的地方領導人開刀，殺雞儆猴。

一九八三年四月以後，鄧力群編製「七種研究材料」（包括〈馬恩列論異化〉、〈社會主義國家持不同政見者論異化的文章〉、〈中國已發表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文章〉等），仍從周揚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下手，把「政治打周」作為「政治倒胡」的第一步，爭取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這一步成功了。

鄧力群的「七種材料」不但送鄧小平、陳雲，還送給王震、李先念、彭真、薄一波、楊尚昆、宋任窮、王鶴壽等一批專政派老人，讓他們在鄧小平周圍製造「反自由化」空氣。

一九八三年八月，鄧小平已經胸有成竹。他既看了鄧力群的「七種材料」，聽了專政派老人的「輿論」；又收到周揚來信，周揚在信中談到毛澤東對「異化」的看法，還附上十八條「馬克思論異化」的語錄。這時他找胡喬木來聽取「匯報當前思想領域情況」，然後對胡喬木說：「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覺得思想界問題不少，有的問題相當突出。我準備在二中全會講一講，以『靈魂工程師的責任』為題。」

胡喬木建議題目要「更放大」，講「思想戰線的形勢和任務」。

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鄧小平又找鄧力群談二中全會講話稿，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鄧小平對「異化」問題開金口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鄧小平的講話稿由鄧力群起草、胡喬木修改後送給鄧小平，當天鄧小平找鄧力群講了一篇話：

早已收到周揚為他文章辯護的信和附上的馬克思講異化的十八條論述。周揚講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啊？那時候滿腦子蘇聯變質，聯繫說到我們自己也變質，提出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級領導都打。是不是異化思想導致的啊？

也怪，怎麼搬出這些東西來了。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沒有信心。既然社會主義自身要異化，還到什麼共產主義呢？在第一階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裡去？社會主義異化到哪裡去？異化到資本主義？異化到封建主義？總不是說社會主義異化到共產主義嘛！當然，也說了社會主義自身有克服異化的力量。

這些觀點，說它「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可能太重了，可以說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對

馬克思主義沒有信心。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講話。

鄧小平這篇話，使專政派如獲至寶。鄧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個春秋》裡寫道：

鄧小平這篇話講得非常好，非常重要。這一篇話使我、使喬木都有了一個提高。聽了這次談話，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大大地提高了。有了這篇談話，才能有我在二中全會西南組批評王若水錯誤的長篇發言。胡喬木看了這篇談話，他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文章才可能寫得這樣好。王若水講，後來問題發展得這麼嚴重，是胡喬木送了材料。實際上，是周揚送了十八條語錄，才使鄧小平在異化問題上發表了這麼高明的意見。

這的確是鄧小平思想的一個重大轉折。僅僅半年以前，專政派「經濟倒胡」期間，胡喬木講「胡耀邦對社會主義信念有所動搖」，鄧小平對胡喬木表示生氣，指責他「這樣講過頭了」。這回鄧小平自己講出「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雖然語氣直接指周揚，心中也包括胡耀邦，當然還有毛澤東。因為周揚點出毛澤東與鄧小平在異化問題上的分歧，打中鄧小平的要害：在思想文化領域，鄧小平比毛澤東更

「左」。

鄧小平比毛澤東更史達林主義

鄧小平與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們的分歧在經濟領域，政治思想領域他們都是專政派，都比毛澤東更史達林主義。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提出「十大關係」、「雙百方針」批史達林的「左」（教條主義），鄧小平、胡喬木都消極觀望。等到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反右，批赫魯雪夫的右（「修正主義」），鄧小平、胡喬木緊緊跟上，而且表現得比毛更「左」。

這回周揚給鄧小平的信，點出毛澤東一九六四年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鄧小平聯想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說出「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啊」？意思是周揚的異化論「導致」毛的文革。而鄧小平口中的「文革」，與我們大家認識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包括思想文化領域的全面專政」完全不同，指的是「大民主」、「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並且總是連帶將「西方民主」、「議會制」、「三權分立」等放在一起批。實際上是藉口否定「文革」來否定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人類普世價值。而對「包括思想文化領域的全面專政」，鄧小平不但不「否定」，還要「堅持」。

「清污」爲名，除周倒胡爲實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原來會議主題是討論「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準備自一九八三年冬季開始，用三年時間，對黨的思想、作風、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以適應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全面改革」使命。

但鄧小平講話（十月十二日）把會議重心轉移到「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周揚。鄧小平說：「精神污染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腐蝕人們的靈魂和意志。有一些同志熱中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都存在異化。他們還用克服這種所謂異化的觀點來解釋改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失去信心，可見理論界思想混亂到什麼程度！」這一段是針對周揚的。還有一段說：「有些同志對精神污染不聞不問，採取自由主義態度，甚至認為是生動活潑，是雙百方針的體現。」這是針對胡耀邦的。據鄧力群在《自述·十二個春秋》中所述，針對胡耀邦的這一段，是王鶴壽看了鄧力群替鄧小平起草的這篇講話後，建議加進去的。可見胡耀邦這位在延安時期「推心置腹」的老朋友，一九八三年就準備對朋友「落井下石」了。

二中全會後，鄧力群得意忘形，他和吳冷西通過他們控制的中宣部和電視廣播系統，敦促各省、市、自治區領導人和知名學者、專家、公眾人物，每天輪流三、

四個省，在全國聯播節目表態，聲討「精神污染」和「人道主義、異化」等「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從而把「清污運動」從思想、政治領域迅速擴大到全國城鄉機關、學校、科研單位、工礦企業、農村、部隊，在社會上造成種種緊張、混亂現象，嚴重衝擊全國經濟和人民生活，引起國際輿論關注，以為「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鄧小平師承毛澤東要兩面手法

鄧力群部署「清污」造成全國混亂，遭到習仲勳、萬里、方毅等人反對。萬里提出「農村不能搞清污」，方毅提出「科技部門不搞清污」。胡耀邦也聽到地方上的反彈，在出訪日本前夕（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給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打了電話，要各地注意停止推行鄧力群、吳冷西部署的「不叫運動的運動」（鄧力群語）那種做法。後來鄧力群攻擊胡耀邦「抵制清污，二十八天就剎車」，就是指十月二十五日鄧力群、吳冷西部署「清污運動」，到胡耀邦「叫停」為止的二十八天。

鄧小平則態度曖昧。他自己在二中全會點的火，鄧力群把火燒大了，他又怕影響自己的國際信譽，怕影響全國經濟，一度對胡耀邦表示「清除精神污染名譽不

好」，他那篇二中全會講話不要收進《鄧小平文選》，還想撤掉鄧力群的中宣部長。接見外賓時，鄧小平說「天塌下來胡耀邦、趙紫陽頂著」！另一方面，鄧小平又叫胡喬木逼周揚「作自我批評」。鄧小平說：「周揚寫了一、二萬字的文章登在報紙上，應該公開作書面的自我批評。」

鄧小平用兩面手法對付胡耀邦，同毛澤東在一九七五年對付鄧小平如出一轍。毛澤東既要靠「四人幫」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又要靠鄧小平「整頓」經濟，所以忽而支持鄧小平批「四人幫」的「左」，忽而支持「四人幫」批鄧小平的「右」。鄧小平師承毛澤東，忽而支持胡喬木、鄧力群那種「馬克思主義者」出來倒胡打周清污；鬧到天要塌下來時，又要胡耀邦、趙紫陽去「頂著」。

專政派看透了這一點，只要政治上不斷去挑撥胡耀邦同鄧小平的「分歧」，不怕打不倒胡耀邦。鄧小平自己心裡也很清楚，他在政治上支持專政派打擊改革派，可以無所顧忌；因為黨國元老絕大多數都站在「反自由化」，即反改革一邊。而在經濟上支持改革派，鄧小平卻顧慮重重，忽進忽退，因為以陳雲為首的一大幫黨國元老，並不站在改革開放一邊。

陳雲力阻開放沿海城市

一九八四年一月，胡耀邦剛剛平息鄧力群的清污風波，鄧小平到廣東深圳、珠海，福建廈門三個特區視察，表示支持項南把廈門島全部搞成特區。這是三年前胡耀邦送給鄧小平的調查報告中早已提出的方案，鄧小平當時未予理會。

三月，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召開進一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會議，提出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唯獨陳雲拒絕參加，陳雲還揚言他「絕不去特區」。鄧小平在會上講話，特別提到「請姚依林向陳雲報告這次會議的決策」。

那次會上，胡耀邦再度關注開放上海。早在三年前討論擴大廈門特區規模時，胡耀邦就主張開放上海，因為上海基礎好，人才充足，歷史上就有開放傳統，開放上海可以有力推動全國改革開放。這次胡耀邦找代表上海來開會的阮崇武副市長談了一上午，請他在會上講一講開放上海的構想。阮崇武中午打電話請示上海市委書記陳國棟，陳國棟說了一句話：「上海不為天下先。」阮崇武只好沉默不語。這就使上海的開放又拖後八年，到鄧小平「九二南巡」才解決。

十四城市開放會議之後，胡耀邦主持起草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

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戰略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雖然陳雲集團通過他們控制的計委、紀委百般阻撓，一九八四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十四點二，其中農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十九點五，遠遠超過陳雲、姚依林的「保四爭五」，也超過被他們批判「胡耀邦搞高指標、高速度」的百分之七。這就使陳雲集團警覺到必須剎住地方上主動改革開放的巨大衝擊力，尤其是沿海地區。陳雲決定拿支持胡耀邦改革開放最有力、被譽為「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廣東、福建兩省開刀。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陳雲親自策劃、部署中央紀委、中央計委、中央組織部，派出調查組到福建、廣東兩省調查處理「違反紀律」、「違反計劃」、「違反組織原則」的「大案、要案」。

大規模調查的結果，是查出福建晉江地區一九八四年銀耳大豐收，涵口村一些專業戶小作坊把銀耳加工成銀耳沖劑，是一種營養食品。當地診所醫生有時在給病人用藥時會附帶開給這種銀耳沖劑。這樣一樁區區小事，竟被陳雲列為「大案、要案」。就因這個「福建晉江假藥案」，不但免去對福建改革開放立了大功的項南省委書記一職，還給他一個「黨內警告」處分！

所謂「福建假藥案」，是福建晉江地區一九八四年銀耳大豐收，涵口村一些專業戶小作坊把銀耳加工成銀耳沖劑，是一種營養食品。當地診所醫生有時在給病人用藥時會附帶開給這種銀耳沖劑。這樣一樁區區小事，竟被陳雲列為「大案、要案」。就因這個「福建晉江假藥案」，不但免去對福建改革開放立了大功的項南省委書記一職，還給他一個「黨內警告」處分！

所謂「汽車走私」案，是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調他的秘書雷宇到海南島開發經濟。因為缺乏資金，獲得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准，從海南進口一批汽車出售，以籌措資金。當時中央各部都爭著伸手向海南要汽車。雷宇將資金全部用於海南建設，政績卓著，獲得海南人民普遍肯定。陳雲的調查組「上窮碧落下黃泉」，查不出雷宇一分一毫的浪費或貪污；陳雲竟將汽車走私擅行定性為「大案、要案」，免去任仲夷省委書記和雷宇海南專員的職務。陳雲及其手下專政派打手群的橫暴恣肆，由此兩案的製造可見一斑。

在此之前，鄧小平才剛到過廣東、福建，親見這兩省開放的努力和艱辛，明知陳雲謀劃除掉任仲夷、項南的用心，卻不置一辭。胡耀邦已被視為項南、任仲夷、雷宇等改革開放派的「後台」，感歎「日子難過」，下一步將輪到自己被「清算」了。

鄧小平對胡耀邦猜忌日深，逐步削權力

從周揚「人道主義與異化」一案開始，鄧小平在政治上依靠胡喬木、鄧力群發動「清除精神污染」；胡喬木、鄧力群趁機挑撥胡耀邦與鄧小平之間的政治分歧，上了不少「奏章」，指稱胡耀邦發表與鄧小平「相反」的言論，是「企圖在國內外

樹立自己的開明形象」；使胡耀邦在政治上失去鄧小平的信任。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鄧小平單獨找胡啟立談胡耀邦，指責「胡耀邦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表現軟弱；作為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鄧小平又找胡啟立和喬石兩人談話，再度責怪胡耀邦對反自由化軟弱，批評胡耀邦與香港記者陸鏗談話「不得體，完全是迎合」。鄧小平說：「陸鏗的手法就是恭維胡耀邦，打著胡耀邦的旗幟，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

鄧小平談話中雖向胡啟立表示「你同胡耀邦比較熟，可以隨時注意提出你的意見和建議」，但實際是向胡耀邦周圍的人「打招呼」，暗示對胡已失去政治上的信任。

一九八六年五月，鄧小平當面「試探」胡耀邦，他說：「我、陳雲、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當總書記，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胡耀邦信以為真，表示「由衷贊成」。鄧小平居然對萬里說：「胡耀邦為什麼讓我下？他是要取而代之！」

自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鄧小平對胡耀邦猜忌日深，總認為「胡耀邦在樹立自己的開明形象」，唯恐胡耀邦的威望在國內外超越自己。雖然鄧小平曾於一九

八三年阻止陳雲集團倒胡（主要是因為葉劍英堅持反對陳雲做法），事實上已在逐步削去胡耀邦的權力：先把經濟工作主導權從中央書記處轉移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把胡耀邦排除在外；後來又把政治體制改革交給趙紫陽的「政改辦」，也把胡耀邦這個總書記排除出來。因為鄧小平後期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喪失「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靈魂，只剩下「解決黨如何領導、中央與地方關係、精簡機構、提高效率」等一黨專政下的「政治體制」，當然不能由「反自由化軟弱」的胡耀邦插手。對於陳雲集團翦除支持胡耀邦的地方和中央部門領導人，鄧小平不是直接支持，就是間接默認，從未表示異議。所以葉劍英去世以後，胡耀邦在中央領導核心中的處境日益孤立。葉劍英認為胡耀邦為人光明磊落、品格優異，生前對鄧小平、陳雲的不正派做法，深不以為然。

鄧小平與胡耀邦的最後決裂

鄧小平與胡耀邦的最後決裂，貫穿於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決議〉的全過程。這是一場波詭雲譎、異峰迭起，交織著價值觀分歧與權力衝突的複雜鬥爭。

如前所述，從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鄧小平同胡啟立個別談話開始，已明白顯示鄧小平對胡耀邦的信任發生動搖。據胡啟立說，他把鄧小平談話「原原本本報告胡耀邦，胡耀邦聽了之後，沒有向書記處其他同志談一談，徵求同志們的批評和幫助」。這表明胡耀邦因問心無愧而不以為意，繼續做他應做之事。

胡耀邦提出各地不同的發展戰略

在鄧小平一方，雖對胡耀邦已生猜忌之心，但實際工作還不能沒有他。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文化，從內政到外交，胡耀邦工作的勤奮努力和開創精神，人所

共見。即使鄧小平、陳雲把胡耀邦排除出中央財政經濟領導核心之外，胡耀邦仍堅持走遍全國，從沿海到邊遠艱困山區，通過深入調查研究，提出符合各地不同條件的發展戰略。胡耀邦說：「過去決策上的主要失誤，就是不看各地條件，全國以糧為綱，以鋼為綱，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解放軍，不只是強人之所難，而是強人之不可能。那些深山區，高寒區，森林區，荒原區，祖祖輩輩並不是靠種糧食解決溫飽。他們的主要勞動對象是什麼？你強迫他種糧食，不讓他開礦、搞林業，不僅剝奪了他的經濟自主權，還剝奪了他的主要勞動對象。生產三要素中，一個是勞動對象。你把勞動對象都剝奪了，違背了政治經濟學的常識，他怎麼能夠溫飽？」

胡耀邦以雲南、貴州、廣西為例，他說：「第一，三省、區有豐富的黑色金屬、有色金屬和非金屬礦產資源，開發這些資源對全國經濟發展有重大意義；第二，三省、區南部低熱河谷區，是亞熱帶經濟作物帶，可以發展糖料作物、亞熱帶水果、名貴中藥材及香料作物等；第三，大面積高寒山區和草場，能常年生長林木、牧草，可以發展林、牧業，放牧牛、馬、羊。三省區應立足於本地資源，採取切實措施和靈活政策，努力引進和發展新技術，開拓新產業，把自己的優勢發揮出來。」

胡耀邦關注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堅持農村工作不能受鄧力群、胡喬木們「反

「自由化」與「清除精神污染」等干擾；辦法是規定每年一月一日，發佈中央一號文件，部署當年的農村工作及有關政策、措施。這一點與主管農村工作的萬里、杜潤生等均有共識，所以能堅持到胡耀邦下台為止。直至一九八七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才變成〈鄧小平同志關於當前學生鬧事問題的講話要點〉，也就是「倒胡一號文件」。從「農村一號文件」到「倒胡一號文件」，標誌了中國農村和農民命運的轉折點。

制定〈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胡耀邦制定的最後一個獲得鄧小平稱讚的重要文件，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中旬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那是胡耀邦在陳雲集團竭力阻撓改革開放的艱難處境下，獨力完成的。

鄧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個春秋》中，提到「胡耀邦親自組織起草」的這個文件時說：「自始至終，胡耀邦沒讓胡喬木參加，我只是參加一般討論，提提意見而已。」鄧力群對〈決定〉中「放權讓利的十條措施」所提的反對意見，也未被胡耀邦採納。但鄧小平卻對這個決定給予高度評價，他說：「這個決定，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大發明、一大創

造。」可見鄧小平雖然政治上疑忌胡耀邦，經濟上胡耀邦也被擠出決策核心；但一旦陳雲集團阻撓改革開放時，還需要胡耀邦來挽救。這就是鄧小平的自我矛盾。

一九八四年是鄧小平最風光的一年，年初巡視廣東、福建，發表擴大廈門特區和增加開放城市的講話；三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進一步開放全國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會議；十月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的變化，使鄧小平揚名國際。那年十月一日，北京舉行了建國三十五週年慶典，民眾在遊行隊伍經過天安門時，自發打開「小平您好」的橫幅標語，向全世界表明那時鄧小平的確深得人心。

鄧小平又向左轉

過去人們批評毛澤東，經濟形勢好一點，就要反右。鄧小平也一樣，一九八四年全國經濟形勢好一點了，一九八五年鄧小平又向左轉了。一九八五年，鄧小平無論是對內或對外的講話，都強調「反自由化」和「四項原則」。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會見台灣陳鼓應教授時，鄧小平說：

中國在粉碎四人幫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

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因為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颳起來。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總想搞這個「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自由化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時，鄧小平又說：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四項基本原則。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

一九八五年九月全國黨代表會議前，鄧小平找「左王」鄧力群幫他起草會議講話稿，鄧小平對鄧力群說：

關於四項原則，我有點新的意思。這個意思是：四項原則是黨中央決定內外政策的基礎，各種政策既來源於四項原則，又有利於四項原則；如果不講四項原則，糾左就會糾到社會主義，糾到馬克思主義。

鄧小平向左轉，專政派感到「揚眉吐氣」，使一九八五年九月全國黨代表大會從一九八四年十月的〈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急劇後退；陳雲親自動筆寫出的講話，重申他的一貫教條：「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幹的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就是有計劃、按比例。」

會後，專政派控制的「計劃委員會」和「紀律委員會」，按照陳雲的「有計劃按比例」鳥籠標準，派出調查組到全國各地查處「違反計劃」、「違反紀律」飛出鳥籠的地方和企業領導幹部，造成一九八五年底、一九八六年初全國一大批改革派隨著項南、任仲夷等改革派領導人「紛紛中箭落馬」。

胡耀邦用精神文明建設來「緩衝」

胡耀邦此時在想什麼？他說：「現在政治體制改革沒有研究透，上不了馬；經濟體制改革雖然通過了決議，還是受到百般抵制改不動，影響經濟發展。阻力這麼

大，我想只能緩衝一下，從觀念形態的東西著手，搞個精神文明決議。」但他又說：「老人家也不會滿意，但憑他對我的信任，可以通過。」

胡耀邦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組成起草小組，開始著手起草〈精神文明決議〉。那時他認為老人家（鄧小平）還是信任他的。其實，一九八五年六月三日陸錚發表〈胡耀邦訪問記〉後，鄧小平對胡耀邦的信任已更加動搖，認為「胡耀邦在樹立自己的形象」。但鑑於九月全國黨代表會議後，陳雲集團在經濟戰線向全國改革派大舉進攻。全國各地，計委收權，紀委抓人，在一九八五年底到一九八六年初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計委下達指令，干預包括特區在內的一切經濟活動；紀委不但任意處置黨內各級幹部，還下令逮捕、槍斃非黨人士。這些倒行逆施，使改革開放嚴重受挫，導致一九八六年上半年全國經濟發展停頓。

鄧小平又坐不住了，開始從左向右擺回。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批評了紀委和計委。鄧小平說：「紀委管黨內紀律問題，法律範圍的問題應該由國家政府管，黨的紀委去管不適。黨和政府關係，是一個政治體制問題。」又說：「你提倡放權（指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放權讓利十項措施），他（計委）那裡收權，你有什麼辦法？看來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動，因為首先遇到人為障礙。」但怎麼改？鄧小平又拿不定主意。他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義勝時說：「政治體

制改革觸及許多人的利益，太困難，太複雜，究竟從哪一點開始著手，我們還沒有拿定主意。」

在如此困難複雜的全國形勢與相對孤獨的個人處境中，胡耀邦選擇從「精神文明建設」的角度來「緩衝一下」，試圖在意識形態上重新扭轉改革開放的不利形勢，不失為一種擺脫困境的積極思路。

按照胡耀邦的思路，在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他同專政派的根本分歧當時無法解決。經濟體制改革通過了中央決議都不管用，專政派照舊抵制決議，把改革派整掉。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又拿不定主意，交給趙紫陽成立「政改辦」去「研究」了。胡耀邦能夠做的，是在精神文明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結合上有所突破。因為他始終沒有放棄思考「人的解放」問題，在胡耀邦看來，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目的都是「人的解放」。

人們有一種錯覺，以為胡喬木、鄧力群這些「秀才」、「筆桿子」，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其實他們只是抓住「四項基本原則」之類的教條當作棍子，糾集一幫打手用來打人。真正用心讀書，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倒是胡耀邦、周揚、陸定一和一些「自由化」知識份子。

胡耀邦、周揚從文革教訓中，深刻體會到專制制度迫害人、蔑視人、不把人當人的危害，使他們重視研究馬克思關於「人的解放」的思想。

在「生產目的」討論中，胡耀邦就注意到馬克思《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經濟學手稿》中的一段話：

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相比，就顯得崇高得多。根據古代的觀點，人，不管是處在怎樣狹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規定上，畢竟始終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

胡耀邦與專政派在生產目的討論中的分歧就在這裡。胡耀邦把人視為生產的目的，而專政派把人視為實現生產的工具、手段，用陳雲的話來說，叫作「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他們認為生產的目的是財富，而創造財富的生產者個人，只能拿到一點點「小頭」，以維持再生產的生命；財富的絕大部分，都被「國家」和「集體」的怪獸吞噬了。

這也就是周揚在他的論文中指出的「蔑視人的價值、人的幸福」的異化現象。

周揚認為改革就是要克服這種異化現象。周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打中了專政派的要害，故而遭到專政派的致命打擊是不可避免的。胡耀邦說：「胡喬木、鄧力群二人，一直反對周揚、夏衍、巴金，認為他們三人是搞自由化的頭頭，影響太大；我一直頂著，認為這三個人絕不能整。」結果胡耀邦還是沒頂住，因為胡喬

木、鄧力群後面還有兩個人：鄧小平和陳雲。

鄧小平和陳雲在經濟開放政策上有重大分歧，但在一黨專政理論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鄧小平一貫主張：「經濟問題上不一致可以讓，政治問題上不一致不能讓。」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兩種態度

從真理標準、生產目的，到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爭論，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內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兩種態度。

一種是胡喬木、鄧力群等自封為「馬克思主義權威理論家」的「左王」們，他們把自己說的話叫作「馬克思主義者出來說話」。他們的唯一專長，就是把「四項基本原則」同人權、人性、人的價值、人道主義、人文精神、人的解放和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對立起來，把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歸結為「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黨的領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幾條專門用來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教條主義棍子。

文化大革命時，江青曾經表揚張春橋、姚文元是「馬克思主義」的「金棍子」和「銀棍子」。在鄧小平時代，胡喬木、鄧力群也成了「馬克思主義」的「金棍子」

和「銀棍子」。也可以說，鄧小平、陳雲讓胡喬木、鄧力群扮演的角色，正是當年毛澤東讓張春橋、姚文元扮演的角色。

與胡喬木、鄧力群們不同，胡耀邦、周揚不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自居，他們只是馬克思理論的「研究」者、「探討」者。他們主張馬克思的理論與當代實踐結合，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從馬克思到毛澤東，他們都不採取全盤肯定、全盤否定的態度。胡耀邦和周揚，都曾表示要把毛澤東同他們的多次單獨談話以回憶錄的形式寫下來，因為其中有些值得重視的觀點，在發行的毛澤東著作中並未收入。周揚舉例說，從延安到北京，毛澤東同他談對人性和異化問題的看法，就同胡喬木、鄧力群們的流行說法不一樣。周揚很不認同胡喬木、鄧力群自封「馬克思主義」的裁判者，以及他們對待馬克思和毛澤東的那種選擇性的教條主義態度。他曾引用恩格斯給拉法格信中的話：

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他們屬於十年前你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事實上在馬克思那裡，無產階級專政這些東西，不過是為實現人的解放，為實現「每一個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未來社會，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例如反動勢力使用軍事暴力屠殺人民）可供選擇的工具、手段，既非目的，也非「基礎」；人的解放才是目的。

這種分歧，在馬克思時代就存在。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十分明確地把「霍布斯那種敵視人的唯物主義」與「同人道主義相吻合的唯物主義」區別開來。馬克思自己屬於「同人道主義相吻合的唯物主義」，也就是以人的解放為目的的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在胡耀邦看來，離開人的命運、人的解放的思考，就不是馬克思。

胡耀邦起草文件愛用「提神」二字

對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決議》，「馬克思主義跳蚤」們當然不會坐視。

但胡耀邦起初還頗有信心。

其一是因為鄧小平肯定過胡耀邦的一九八四年經濟體制改革決定。胡耀邦說：

「小平同志說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精神文明決議〉要寫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倫理學。首先要寫清楚精神文明的戰略地位。社會主義社會是個新社會，沒有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成熟、不鞏固的。什麼是精神文明？就是人的素質、人的知識程度、人文素養、人與人的關係，各種不同職業的人之間、各民族之間，從社會到家庭，形成空前的互助、和睦、和諧的新型關係。這一部分很重 要，要提神。」胡耀邦愛用「提神」二字，指文辭要有新意、寫出新的思想，讓人精神振奮，「唯陳言之務去」，不要用陳辭濫調。對此，鄧力群曾在鄧小平面前挑撥道：「胡耀邦的最大特點，是心思用在怎麼讓他所講的話、他的意見，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激動起來。」其實這就是胡耀邦的「提神」，是以「調查新情況，研究新問題，提出新思想」，振奮人的精神去建設新社會的新文明，鄧力群卻將此扭曲為「胡耀邦為自己贏得掌聲，要樹立自己的形象」；鄧小平也附和道：「這是胡耀邦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其二是鄧小平對胡耀邦講過兩句話：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的名譽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決議三年不做。胡耀邦認為鄧小平已經看到專政派對清除精神污染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粗暴做法，嚴重衝擊到全國改革開放和經濟成長。此時正面提出精神文明建設，應當有助於開放與發展。

胡耀邦、趙紫陽聯手對付專政派

後來事態的演變卻比胡耀邦預期的複雜、詭譎得多。

第一，對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決議〉的全過程，「馬克思主義跳蚤」們始終嚴陣以待，伺機進攻。胡喬木、鄧力群鑒於一九八三年「經濟倒胡」失敗，是由於操之過急，沒有在中央聚集充分的專政派力量，過早向下製造輿論，引起地方反彈，導致鄧小平與葉劍英聯手，迫使陳雲集團策劃中的倒胡會議流產；這回接受歷史教訓，採取步步為營、充分動員專政派老人的力量，迫使鄧小平站到專政派一邊。胡喬木、鄧力群效法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文件起草時，康生、張春橋另行起草與陳伯達對立的手段。毛澤東讓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康生、張春橋另行起草與陳伯達對立的九大報告稿，成功導致毛澤東拋棄陳伯達，採用他們的稿子。胡喬木、鄧力群以同樣手法，另行起草針對胡耀邦〈精神文明決議〉稿的〈修正稿〉，在專政派老人中廣為散發，爭取支持；還發給專政派的打手王忍之、何東昌等一群人，企圖以他們的稿子取代胡耀邦。鄧力群很快就得到了兩個政治局常委陳雲和李先念的批示，「同意」胡喬木、鄧力群的稿子。

第二，胡耀邦在起草過程中，察覺反對力量已經集結，形勢嚴重，必須同趙紫陽聯手爭取鄧小平的支持（那時葉劍英已辭去政治局常委職務，常委五人是胡耀邦

邦、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正好那時胡喬木批轉社科院秦柳方收集來的「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材料，引起趙紫陽的警惕。趙紫陽批示：「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胡耀邦也立即批示：「同意紫陽同志意見，請厚澤同志將紫陽同志批語轉告喬木同志。」這件事促成胡耀邦與趙紫陽在決議起草過程中站到了一起。

第三，胡耀邦和趙紫陽針對胡喬木、鄧力群的〈修正稿〉，聯名發出一封給中央常委的信。信中就胡喬木、鄧力群指責決議稿未沿用十二大「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作了詳盡說明。鄧小平閱後立即批示：「耀邦、紫陽的意見很好，我完全贊同。」李先念也跟著批示：「同意小平意見。」鄧小平當時已知道鄧力群把自己的〈修正稿〉發給了二、三十人，意在挑起爭論。鄧小平對胡耀邦說：「不要緊，實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採取表決方法解決問題，少數服從多數。鄧力群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實際是想把我們拉向左，這個不能聽。我們的政策還是要放，而不是收。」這一回合，胡耀邦、趙紫陽暫時擊敗胡喬木、鄧力群和他們背後的陳雲。但事情正在起變化。

毛澤東請鄧小平復出，送鄧八個字

鄧小平在一九八六年面對的形勢，很像毛澤東在一九七五年。那時鄧小平和葉劍英站在一邊，整頓經濟，整頓軍隊，使全國形勢漸趨穩定。而站在另一邊的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一夥，認定鄧小平、葉劍英這些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把鄧小平找回來工作，是對他們奪取最高權力的障礙。

這裡要順便糾正一個史實。有些歷史著作誤稱「柔中寓剛，綿裡藏針」是毛澤東找鄧小平出來工作時的肯定評語，並以此八個字概括鄧小平的個人性格。事實恰恰相反。

毛澤東把鄧小平請出來工作時，是這樣說的：

現在請來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了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
你呢（指鄧小平），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裡藏

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

毛澤東的意思很明白，要鄧小平「改一改」讓人家害怕的那種過硬性格；送給鄧小平的兩句話、八個字，正是針對鄧小平個人性格中的弱點，勸他以後對人和氣一點，做到外柔內剛。事實證明鄧小平後來也沒有做到。

鄧小平與「四人幫」的鬥爭

在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江青們的鬥爭中，毛澤東開始站在鄧小平一邊批評江青。那時毛的注意力放在「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那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已病重，毛把鄧小平請出來，召開中止十一年之久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就是要結束文化大革命，團結全黨全軍把經濟搞上去。

所以，江青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結合起來反對周恩來、鄧小平，毛澤東認為他們搞分裂，目的是要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毛澤東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還警告他們：「不要搞宗派，搞

宗派是要摔跤的。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

在毛澤東看來，江青他們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但治不了國。林彪垮台後，毛澤東把鄧小平請回來，是有意讓鄧小平接自己的班；並期待鄧小平能同江青他們合作，在繼承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路線的基礎上，治理好國家。但這是一個無法調和的矛盾。

第一個回合，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打敗了「四人幫」。一九七五年上半年，政治局會議批評了江青等人，毛澤東表示高興。毛對鄧小平說：「他們幾個人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你、反葉帥。現在政治局的風向要轉了。你要把工作幹起來。」鄧小平回答：「我有決心，但反對的人一定會有。」毛澤東笑道：「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無非是挨罵，我歷來就是挨罵的。」

一九七五年六月下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幫助工作」，江青寫了一份書面檢討，幾個月未公開露面。鄧小平從一九七五年七月開始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日常工作。

三個月後，一九七五年十月，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擔任中央政治局與毛澤東之間的聯絡員。鬥爭進入第二個回合。

鄧小平不肯違心肯定文革

毛遠新與江青一派政治上一致。江青他們見不到毛澤東，而毛遠新隨時可見。頗有心計的毛遠新，看出毛澤東最不放心鄧小平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所以就在這個要害問題上進言。毛遠新對毛澤東說：「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這股風比一九七二年批極左時還兇些。」

正好這時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給毛澤東寫信，告遲群和謝靜宜的狀。毛澤東認為劉冰寫的信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矛頭是針對他，因為謝靜宜是毛派去清華的。十一月二日，毛澤東對毛遠新說：

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你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你找小平、東興、錫聯談一下，把你的意見全講，開門見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幫助他（指鄧小平）提高。

然而，當毛遠新同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一起談的時候，鄧小平完全忘了毛澤東教他「柔中寓剛、綿裡藏針」，一下子就頂起來。鄧小平說：「你的描述中央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這話不好說。我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是什麼路線，全國形勢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實踐可以證明。」

對於這個局面，毛澤東還是希望由鄧小平來解決。他說：「討論限於文化大革命問題，由鄧小平主持，對文化大革命作個決議。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但被鄧小平拒絕。鄧小平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不了解。」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寫到這一點時說：「最根本的，他不願意違心地主持寫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不過，在鄧小平爭取復出時寫的檢討中，不但肯定文革，而且肯定文革對他的批判，表示「永不翻案」，所以才有後來毛澤東的「永不翻案，靠不住吧」一語。這是毛澤東同鄧小平最後決裂的關鍵。

毛澤東終於棄鄧小平而選擇華國鋒

毛澤東最終拋棄鄧小平時，已是風燭殘年，距離去世只剩幾個月。他對周圍的人，對中國的未來已無把握。該把政權交給誰？他找回鄧小平，原本是讓這個「鋼鐵公司」與江青們那個「鋼鐵公司」取得平衡。現在鄧小平拒絕作肯定文革的決議；不能用了。但毛澤東又很清楚，如果棄鄧而把政權交給江青們，天下必亂。於是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指定華國鋒代總理並主持中央工作，也就是成為毛的最後一個接班人。這已經是「無可選擇的選擇」，毛說：「華國鋒為人老實忠厚，辦事公道不蠢。人家說他水平低，我就選這水平低的。」

當時江青集團打算讓張春橋當總理，王洪文當全國人大委員長，江青當黨主席。毛澤東一個都不讓他們當。但對華國鋒究竟能不能站得住，毛是沒把握的，所以才有那篇可以視為政治遺囑的話：

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

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這是毛澤東對華國鋒的當面交代。毛臨終時還有一幕：當葉劍英告別他走到門口，毛又示意招回，握住葉的手盯著葉看，嘴唇微動說不出話。葉的感覺似有囑他幫華國鋒安定政權之意。

葉劍英雖然幫華國鋒粉碎了江青集團，但政權最後落到鄧小平手中。葉劍英去世前的最後歲月，對鄧小平獨斷專行深表不滿，憤而辭去政治局常委職務。

關於精神文明決議的爭論

在一九八六年胡耀邦同胡喬木、鄧力群們的鬥爭中，鄧小平開始也站在胡耀邦一邊，批評胡喬木和鄧力群。那時鄧小平的注意力在排除陳雲集團的干擾，繼續改革開放。胡耀邦的精神文明決議稿，把精神文明建設同改革開放密切聯繫在一起，獲得鄧小平的肯定。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日，胡耀邦到鄧小平在北戴河的住處，徵詢鄧小平對《精神文明決議》（第二稿）的意見。一進大門，鄧正在那裡散步，遠遠看見胡耀邦就

說：「文件不錯，可以印發大家討論了。」

八月八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精神文明決議稿》。鄧力群作了一個多小時長篇發言，指責《決議稿》「一個後退」、「三個不夠」。「一個後退」指的是《決議稿》未提「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是從中共十二大「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後退」。「三個不夠」主要是指「體現中央領導同志講話精神」不夠，也就是《決議稿》中沒有引用陳雲、鄧小平關於反「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言論。鄧力群說：「陳雲同志短短的一篇話，十六次講社會主義，說我們幹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他反覆強調堅定地保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同一切違反共產主義理想的錯誤言行進行堅決鬥爭。」

胡耀邦沒有理睬鄧力群的指責。他說：「『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這個問題不爭清楚，『左』的東西就會從這裡出來。全國人民怎麼能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天天唸經的樣子去講，那就解放不了思想。」

八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精神文明決議稿》，印發給黨內二千多人、黨外二百多人討論，廣泛徵求修改意見。

修改意見集中於兩點：一是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概念不科學，有十九個省和部、委，以及陸定一等領導人要求取消這一提法；二是堅持寫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九月七日，鄧力群把他和胡喬木的〈決議修正稿〉印發給政治局常委，和王震、薄一波、楊尚昆、彭真、何東昌、王忍之等人。

九月十日，陳雲和李先念批示「同意」胡喬木、鄧力群的稿子。

九月十四日，針對鄧力群和胡喬木的〈決議修正稿〉，胡耀邦和趙紫陽聯名發出給中央常委的信〈關於決議稿中未沿用十二大的「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的一點說明〉。當天鄧小平批示「贊同」胡耀邦、趙紫陽的意見，李先念也轉回來表示「同意小平意見」。

九月十六日，鄧小平辦公室告知胡耀邦：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耀邦、紫陽給常委的信，說「還是照他們兩位意見辦」。

兩鄧談話，鄧力群態度強硬

九月十八日，鄧小平找鄧力群談話。那時胡喬木觀察形勢，已閉口不語。鄧力群說：「看來胡喬木意見很多，但公開場合不說，私下跟我說，這個文件比十二大報告倒退很多啊！現在的釘子，就只剩下鄧力群了，別人拔不動，就讓鄧小平來拔這個釘子吧。」

這次談話鄧小平和鄧力群各說各的。

鄧小平：文件第十一頁你的修改意見幾句話（指「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在中國也有約百年的歷史，在某種條件下也並非絕對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這是中央領導同志所再三警告過的」），是誰提的？

鄧力群：喬木同志提的。

鄧小平：我圈掉了。

鄧力群：我同意喬木同志的意見，也認為有那種可能。

鄧小平：你們那個書面意見，一條一條分開看，每一條都是好的，但是匯總起來就給人一個印象：黨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政策改變了。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鄧力群：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書面意見中的每一條意見，都不是我個人發明的，都來自中央過去的決定，包括你的講話。

鄧小平：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志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鄧力群：小平同志，你們兩位之間在有些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看出來了。我一向採取的態度和方法，不是擴大分歧，而是縮小分歧或者迴避分歧。陳雲同志的主張，我宣傳過，這是事實，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張，我也宣傳過。我可以向你報告，宣傳你的主張比宣傳陳雲同志的主張多得多，多好多

倍。我自己的講話、自己的文章，我批閱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審查，可以全部拿來，看看究竟是宣傳你的主張多，還是宣傳陳雲同志的主張多。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贊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不講話可不可以？

鄧小平：當然也可以。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講。

鄧力群對李鵬、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評價

往下的話題，轉到鄧小平問鄧力群對一些人的觀察，雙方相當一致。

鄧小平：我問一下你對一些人的觀察。胡啟立怎麼樣？

鄧力群：政治上沒有把握，不穩當。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講不同意見。至於王兆國，……

鄧小平：王兆國不必提了。李鵬怎麼樣？

鄧力群：這幾年參加書記處會議，就這麼點接觸。從他的歷史來看，留過

蘇，在蘇聯那種教育制度下，受過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教育，專業學得好。回國以後從基層幹起，是一步一步上來的。據我看，他管工業是有經驗的。在書記處政治生活中間，給我的印象，他能夠提出一些不同意見。

鄧小平：喬木怎麼樣？

鄧力群：他沒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書記處會上的表態，基本上是隨聲附和。到了政法小組工作以後，有一點變化。可能是因為政法工作比較複雜，不能不謹慎。

鄧小平：這就是進步啊。

鄧力群：是。

鄧小平：你對耀邦同志和趙紫陽的看法。

鄧力群：和耀邦同志共事多年，同趙紫陽比，他學習是用功的，讀馬、列的書，讀中國的古代文學，都很用功。這方面紫陽同志不如他。據我觀察，也聽到別的同志說，趙紫陽讀馬、列的書很少。在書記處的會上，對於不同意見，耀邦同志還能夠讓人家講出來。你講完了，開完會，他自己還是幹他自己的是。耀邦同志最大的特點，心思用在怎麼讓他的講話、他的意見，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激動起來。贏得掌聲愈多，他愈高興。他的精力主要用在這方面，而沒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見符合實際。

鄧小平：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鄧力群：趙紫陽同志做經濟工作，從基層搞起，縣、地、省到中央，有經驗，對經濟工作中的問題比較敏感，也有辦法。我最擔心兩件事。一是我聽起草一九八五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同志講，趙說馬克思主義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他那個東西對我們不管用。二是他搞經濟工作，熱中於移植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這兩條對於高級幹部來說，都是大毛病。像趙這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這樣的毛病，實在讓人擔憂。

這是一次充分反映鄧小平內心思想的重要談話。鄧力群在回顧這次談話時說：「一個多小時的談話，言辭之尖銳，在我一生中是從來沒有過的。我走的時候，鄧還起來把我送到門口。這就是政治家的涵養啊！但是很明顯，這次談話給鄧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後來告訴我，在一個少數人參加的會上，鄧小平說：鄧力群要我們往左的方面拉。所以，在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過程中，胡、趙的一致，很明顯是得到鄧小平的支持。」

鄧小平雖支持胡、趙，但暗許鄧力群

鄧力群的判斷沒有錯。

第一，鄧力群拒絕鄧小平的要求，拒絕「講一句話」贊成鄧小平認可的〈決議稿〉，表明鄧力群要把黨的方針、政策「往左的方面拉」，迫使鄧小平必須與他保持距離。但鄧小平對於鄧力群「反自由化」的堅定立場是欣賞的（如毛澤東欣賞江青的左派立場，又必須與她保持距離一樣），肯定他那個書面意見「一條一條分開看，每一條都是好的」；只是圈掉胡喬木引那段「中央領導同志（即陳雲）警告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可能捲土重來」的話。

第二，當時全國改革開放受阻，計委收權、紀委整人，包括任仲夷下台、項南受處分，鄧小平明知背後是陳雲，但為避免擴大與陳雲的分歧，不願明言。然而，為了挽救經濟，又迫使鄧小平在那樣一種形勢下，支持胡耀邦、趙紫陽繼續推進改革開放。

第三，鄧小平雖然贊成通過胡耀邦的精神文明決議，但並不代表他恢復了對胡耀邦的信任。二鄧對話的下半段，鄧小平徵詢鄧力群「對一些人的觀察」，提出胡啟立、李鵬、喬石、趙紫陽，都是他心中考慮取代胡耀邦的人選。二鄧對這些人的看法相當一致。但當時鄧小平還不想立刻換掉胡耀邦，是為了一年後的十三大打

算。

九月二十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原則通過《精神文明決議草案》，提交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由於鄧小平明確支持胡耀邦、趙紫陽的聯名信，拒絕胡喬木、鄧力群的《修正稿》，原來支持過胡喬木、鄧力群《修正稿》的專政派，包括胡喬木自己，都發言表示肯定《決議稿》，唯有鄧力群一言未發（鄧力群列席政治局擴大會議，無表決權）。

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爭持不下

九月二十八日，十二屆六中全會爆發了一場出乎鄧小平意料的爭論。當時胡耀邦主持會議，工作人員讀完《決議草案》後，胡耀邦問：同志們有意見沒有？

陸定一一站起來說：「我對這個《決議》很贊成，這個《決議》寫得很好。有一點意見講一講。在起草這個《決議》過程中，今天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第十四頁第十二行有一句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這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來歷，是一九五六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蘇聯方面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到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有一個文件，題目是

兩個字：『通知』，說『二月題綱』是彭真一個人搞的，是背著康生和其他人搞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讓資產階級放，不讓無產階級放。一九六七年，《人民日報》登了一篇大文章，是反對我的，批判我資產階級自由化，證據是我在中南海懷仁堂對科學家、文藝界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講了好幾個自由：批評的自由，反批評的自由，保留意見的自由，信教的自由，不信教的自由等等，這個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經過情況就是這樣。我覺得文件去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對於這個〈決議〉絲毫沒有損害。只有一個好處，就是不同那些錯誤的東西混淆在一起。』

胡耀邦對〈決議稿〉中保留這幾個字作了解釋，說明是按照鄧小平的定義，「資產階級自由化」指「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範圍。

接著，萬里發言贊成陸定一意見，主張取消這幾個字。陸定一、萬里發言都博得會場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然後，楊尚昆、薄一波發言，反對去掉這幾個字，也博得會場另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這時鄧小平說話了。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現在群眾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第一件做了什麼事？就是人大通過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

報、大辯論。為什麼首先做這件事？就是說明現在有一股思潮，如果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是要破壞我們安定團結局面的。看來，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無關緊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寫這個。」

鄧小平講完，政治局常委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均發言主張保留。

胡耀邦說：「保留對我們當前局勢有利，以後實踐證明這個名詞不恰當，再重新考慮。」最後胡耀邦提請全會表決，一致通過。

鄧小平反自由化講話，標誌與胡耀邦決裂

鄧小平這篇反「自由化」的講話，導致中國政治氣流的大變動。鄧小平的注意力，原本放在防止鄧力群代表的思想把中國政治氣流往左拉，阻滯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陸定一的發言，使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自由化」思潮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在鄧小平看來，胡耀邦對「自由化」思潮的「軟弱」，比鄧力群的「左」更危險。

這篇講話也是鄧小平與胡耀邦最後決裂的標誌。鄧小平在他的講話中提出了一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做了什麼事？

對胡耀邦來說，這第一件事，就是真理標準討論，終結「兩個凡是」。糾正冤假錯案，糾正歷史錯誤。

而對鄧小平來說，這第一件事，已變成「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如果當初真是鄧小平說的那樣，華國鋒、葉劍英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決定取消「四大」，恐怕就沒有後來的真理標準大辯論，沒有後來的西單民主牆，沒有後來的糾正歷史錯誤，也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轉折和鄧小平復出掌權了。

一九八六年底的鄧小平，已經自己否定了自己。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就是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差別只在華國鋒搞毛的「凡是」，可以糾正；鄧搞自己的「凡是」，同毛一樣無法自己糾正。這就是鄧小平的悲劇。

胡耀邦下台後，陸定一曾對他的發言產生的後果，向胡耀邦表達歉意。胡耀邦對陸定一說：「我是由衷贊成你的主張的，只是在那個場合，不便多說。」

中國人民的命運悲劇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那場意料之外的大辯論，引發出鄧小平一篇「反自由化」的即席講話，改變了全黨、全國的政治氣流。〈精神文明決議〉剛一誕生，生命即告終結。一場比「清除精神污染」更大規模、影響更深遠的「反自由化」之戰，已蓄勢待發。

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決議〉，原來準備避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胡耀邦想出了「一個中心，三個堅定不移」的新提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

〈決議〉強調精神文明建設的開放性，指出：「拒絕接受外國的先進科學文化，任何國家、任何民族要發展進步，都是不可能的；必須下大決心，用大力氣，把當代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經濟

行政管理經驗，和有益文化學到手，並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和發展；不這樣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實現現代化；對外開放作為一項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不僅適用於物質文明建設，而且適用於精神文明建設。」這就實際否定了「清除精神污染」。

〈決議〉突出了政治民主化的主題，指出「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肯定了「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鬥爭中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強調對待學術和藝術問題，「要遵守憲法規定的原則，實行學術自由，創作自由，討論自由，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

由於〈決議〉草稿在北戴河討論時遭到王震、薄一波、鄧力群、胡喬木等專政派的圍剿，胡耀邦為聯合趙紫陽爭取鄧小平支持，不得不在第五部分加進那句引起陸定一堅決反對的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

加進這句話，是一種妥協，目的是爭取鄧小平的支持。因為只有鄧小平能封住鄧力群、胡喬木和其他專政派的嘴，讓〈決議〉在全會通過。胡耀邦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認為只要〈決議〉通過，就可以藉助整個〈決議〉的改革和開放精神，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人類普世價值，克服專制制度下人的不自由狀態（也就是周揚講的「異化」），使中國人解放成為「人」（自由的人，社會的主人，

國家的主人，自己的主人）。這是建設物質和精神文明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實現馬克思講的未來社會目標：「自由人的聯合體」。

不同結果的兩種抉擇

胡耀邦的理想主義並非沒有根據。那時正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洶湧澎湃，從南歐經過拉丁美洲、非洲，湧向亞洲之際。

就在這一年，台灣的蔣經國於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提出「政治革新」案。也在這同一年，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主進步黨在台北圓山大飯店成立，國民黨專政派要禁，蔣經國指示李登輝「採取溫和態度，以人民、國家安全為念，在不違反國策、憲法規定範圍內，研究組黨的可能性。」緊接著，十月五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十月七日，蔣經國接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薩琳·葛蘭漢（Katherine C. Graham）時說：「台灣決定解除戒嚴。」

當時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提醒蔣經國：「解除黨禁有一天國民黨要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回答：「天下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在歷史浪潮面前，順應浪潮前進，還是逆著潮流倒退？亞洲台灣海峽兩邊的黨國各自作了不同的選擇。蔣經國的國民黨黨國，選擇了順應歷史潮流前進，鄧小平的共產黨黨國，選擇了逆著歷史潮流倒退。因此，蔣經國和他的繼承者李登輝，從一九八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完成了台灣的民主制度轉型；而鄧小平拋棄了他選擇的改革派繼承者胡耀邦和趙紫陽，使中國成為抵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最後一個共產專制堡壘。這不只是胡耀邦、趙紫陽的命運悲劇，也是中國人民的命運悲劇。

鄧小平怒稱反自由化要追加五十年

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後，專政派包圍了鄧小平，在鄧小平支持下，再度發動倒胡。一九八六年十月，鄧小平指定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窮、伍修權、高揚七人小組，以徵詢十三大人事安排為名，向各地搜集胡耀邦「對四項基本原則有時講有時不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等材料。七人小組是背著胡耀邦幹的，胡耀邦完全不知情。在北京舉行的社會科學規劃會議上，胡耀邦還說：「這幾年，棍子在頭上揮舞了一下，總算沒有打下來。」

李洪林插話：「怎麼沒有打下來？有人被開除黨籍。」（指阮銘）

吳明瑜插話：「還有被撤職的哩！」（指王若水）

蘇紹智插話：「還有人被趕出北京！」（指郭羅基）

胡耀邦說：「好，你們打報告來，我來批！」

胡耀邦不知道，棍子已經在他頭上舉起，正要打到他自己了。

專政派的政治嗅覺比理想主義者胡耀邦靈敏得多。他們從九月二十八日十二屆六中全會那場爭論中，嗅出鄧小平像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時一樣，又搖擺到他們這一邊來了。他們早已把〈精神文明決議〉摔到一邊，決心再次煽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高潮。他們推舉曾被鄧小平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稱作「一門砲」的王震發難，率先在中央黨校印發鄧小平九月二十八日那篇〈反自由化〉發言，人手一份。然後在全校大會講話。

王震說：「十二屆六中全會的精神，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講話。有人故意不傳達，想隱瞞。力群、喬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同志說，我在六中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愛聽，現在再加五十年，一共七十年，反到下世紀中葉。」

王震這門砲通過來自各地的黨校學員，向全國發出倒胡信號。王震說的「有人」，就是指胡耀邦。胡耀邦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佈置傳達十二屆六中全會時，強調主要傳達全會通過的〈精神文明決議〉精神，不必將會上的爭論下達，

既不必傳達陸定一的意見，也不必傳達反對陸定一的意見，避免分歧繼續擴大，以便集中精力討論〈決議〉本身。

鄧力群、胡喬木正好利用這一點，向鄧小平「匯報」胡耀邦「故意不傳達」鄧的「反自由化重要講話」。鄧小平果然怪罪胡耀邦：你「不愛聽」我反自由化嗎？我「再追加五十年，反到二〇五六年」！

接著，上海、南京、合肥、武漢、杭州、北京等地相繼發生學生運動。開始起因是對學校領導和教學、生活方面的不滿，逐步發展到提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反腐敗等訴求。專政派看到時機來臨，蓄意將學生運動同胡耀邦和「自由化知識份子」放到一起打。

鄧小平下決心提前倒胡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鄧小平召集薄一波、楊尚昆、王震、鄧力群、胡喬木、彭真、余秋里七人到家中開會，「分析學潮」；一致認為是「胡耀邦姑息自由化思潮，領導渙散軟弱」的結果。

鄧小平原來打算到「十三大」時換下胡耀邦，此時下決心立即倒胡了。十二月三十日，鄧小平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找到家中，藉學

生上街遊行發表嚴厲講話。鄧小平說：

學生鬧事，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很重大的事件。凡是衝天安門的，要採取堅決措施。這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方勵之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要開除！上海的王若望，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有辦？上海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不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後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一段話，看來也沒有起什麼作用，聽說沒有傳達。

否定胡耀邦的疏導方針。

王震聞風而動，第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央黨校全校大會上講：「你有三百萬大學生，我有三百萬解放軍，我要砍他媽的一批腦袋！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關帝廟中那個拿大刀的周倉，不信來試試看！」王震講話中還痛罵知識份子，稱巴金是「民族敗類，社會渣滓」。

那次學運避免了流血，是由於胡耀邦採取了最後措施。那時鄧小平說：「誰敢到天安門廣場，來一個抓一個！」一九八七年元旦，公安部門抓了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當晚學生又冒大雪進入天安門廣場要求放人；公安部門迅速釋放被捕學生，把遊行的學生也用卡車送回學校，使事態得以和平結束。

胡耀邦做完這最後一件事，第二天（一月二日）寫信給鄧小平，提出辭職。

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鄧小平忘了是星期日。一早起來，催子女去上班，子女說星期天不上班。原來鄧小平要召開秘密會議，請來了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彭真，決定要胡耀邦下台。

那就是所謂「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實際上只有鄧小平、趙紫陽兩名常委出席。胡耀邦未被通知開會，陳雲、李先念未出席。事前鄧小平曾派楊尚昆坐軍機，冒著大霧飛到上海，欲接李先念回來開會；李先念拒絕，對楊尚昆說：「急急忙忙幹什麼？耀邦可是個陽人啊。」（指胡耀邦不搞陰謀，那麼誰在搞陰謀呢？）

胡耀邦的職務是中央委員會選舉的。鄧小平既不開中央全會，也不援華國鋒的先例，開政治局全體會議討論。華國鋒辭職時，中央政治局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五日，連續開九次會議討論，作出三項決議：

- (一) 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同志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
- (二) 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同志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同志為軍委主席。

(三) 在六中全會前，暫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義。

在通過三項決議時，華國鋒也舉手同意。政治局會議還決定，當需要時，仍由華國鋒以正式名義接見外賓。

非法倒胡的「生活會」

這回鄧小平卻完全不顧正當程序，只是找幾個親信老人到家裡，就決定胡耀邦下台，由他指定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組成「五人小組」，召開「生活會」，解決胡耀邦問題。

所謂「生活會」，就是對胡耀邦的批鬥會。事先由薄一波、楊尚昆安排了一幫

打手，如鄧力群、胡喬木、姚依林、余秋里、王鶴壽等，在會上作批鬥發言。

據鄧力群說，會前薄一波、楊尚昆把他找去，說學生鬧事，是胡耀邦的錯誤引起的惡果，中央要開一個「生活會」，要鄧力群準備一個揭發胡耀邦的發言。鄧力群說：「更多的事情胡喬木知道。」薄一波、楊尚昆說：「他是他，你是你，我們找你，是要你做好準備，講你知道的事。」

「生活會」就是這樣準備的。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有備而來，充當打手；而政治局委員，如習仲勳，則事先一無所知，只通知他來開會，不知道開什麼會。習仲勳一進會場，看到這麼一副架勢，就質問：「這樣的會為什麼事先不告知？」其實只是不告知習仲勳這樣的政治局委員而已；習仲勳不但是政治局委員，而且是書記處常務書記，人又在北京。開這樣的會，瞞著習仲勳似乎太荒唐了，只好通知他來。習仲勳又是個正直的人，安排打手之類的骯髒勾當不能讓他知道，所以就出現這種場面。

打手們有備而來。余秋里開頭砲，罵了胡耀邦半小時，內容空洞無物。接著鄧力群講了兩個半天，六大罪狀，洋洋數萬言，都是老一套黨八股。然後是姚依林講經濟問題的長篇發言，批判胡耀邦不懂經濟，又不好好學習陳雲經濟思想；歷數胡耀邦搞高指標、高速度、高消費的錯誤，給下面製造壓力，造成經濟混亂。王鶴壽則負有特殊使命，會後到胡耀邦家裡「摸態度」。

王鶴壽在延安時期，同胡耀邦、陶鑄關係很好，人稱「桃園三結義」。但王鶴壽沒有胡耀邦、陶鑄那種正直性格，是個小人，早在一九八三年「倒胡打周」時，就被鄧力群他們拉過去了。胡耀邦卻渾然不覺，王鶴壽來時，對他說了些心裡話，結果被王鶴壽在會上端了出來。王鶴壽說：「胡耀邦目無中央，鄧小平、陳雲說了要開除方勵之、王若望，陳雲說了要處理福建假藥案，胡耀邦都頂著不辦。我去看他時，還說沒想到要把他搞倒、搞臭，很傷心。說明胡耀邦態度不端正。」

趙紫陽發言尖銳，胡耀邦痛哭失聲

趙紫陽的發言雖不長，但最尖銳。他說：

耀邦喜歡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現在老人還在，你就這樣。將來氣候變了，你的權威更高了，可能成為大問題。我過去也想過，雖然我們現在合作得很好，將來到了這種情況能否合作得好，就很難說了。劉賓雁、王若望這些人那麼狂妄，你胡耀邦為什麼對這些人這麼寬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種可能，是你要在國內、國外維持開明的形象。反正黨的格局已經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現在如果你還不能自由行動的話，將來你

是可以自由行動的。他們將來有你這個靠山，不要緊。即使你現在還不能完全保護他們，他們寄希望於你。

趙紫陽又說到一九八四年他給鄧小平寫的一封信，希望鄧小平和陳雲健在時，認真解決黨中央一級的民主集中制問題，趙紫陽說：「當時就已感覺到，耀邦同志不遵守紀律，等到格局一變，小平、陳雲不在了，黨內老人不在了，我們兩個無法共事下去，那時就要辭職了。耀邦同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今天黨內很多老同志都在的情況下，他還這樣不遵守紀律；等以後不在了，誰也沒有辦法。現在還不能完全自由行動，對小平、陳雲，主要是小平同志這裡，不能不有所考慮。一旦情況變了，可以自由行動，不受任何約束。」

趙紫陽的話厲害在哪裡？在一般人眼中，胡耀邦為人直率，不弄權謀，照李念的說法：「耀邦可是個陽人啊。」但按趙紫陽的說法，胡耀邦對人寬容，在國內、國外維持開明形象，是在積累實力，將來老人不在了，自己可不受任何約束，自由行動。那不就是做獨裁者嗎？到時趙紫陽就只有辭職了。這種說法能打動老人猜忌之心，也最讓胡耀邦傷透了心。那天（一月十五日）開完會，胡耀邦走出會場，坐倒在台階上痛哭失聲。

第二天，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

平說：「今天的會，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會議就是通過《公報》，其他事都不談，到會的顧問委員可以舉手。」這就是說，「生活會」已批鬥結束，政治局無須再討論，政治局委員們跟著老人（如主持「生活會」的薄一波，不是政治局委員，連中央委員都不是）舉手通過胡耀邦辭職下台的《公報》就是。所謂「公報」，就是宣佈「會議一致同意胡耀邦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當天在中央電視台向全國公告。

倒胡《公報》遭強烈抗議質問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比一九七六年鄧小平下台，在國內外產生的衝擊更大。因為鄧小平下台時的中國是封閉的，胡耀邦下台時的中國已經開放。就在通過《公報》的第三天（一月十九日），留學美國的一千名學生和學者，共同簽署〈致中共中央、國務院公開信〉，在海外各大媒體發表。〈公開信〉指出：

胡耀邦為思想解放運動，平反冤假錯案，開拓改革局面，以及在思想文化領域創造寬鬆氣氛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去職將極大地損傷全國人民進行改革與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使我們感到震驚和不安。我們認為，近來事態的

發展，是與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國策背道而馳的，並使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等權利受到嚴重侵犯，發展下去會斷送我國的經濟、政治改革。我們強烈期望黨和政府堅持改革，反對倒退，堅持民主法治，反對以言治罪。出於對祖國的責任感，我們認為不能不向中央和國務院表達我們的心聲。

黨內反應同樣強烈，紛紛質問：「十三大就要召開，中央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要用這種方式倒胡？」中央無法應付，薄一波就讓胡喬木、鄧力群趕快炮製材料，把「生活會」上的批鬥發言拼湊成胡耀邦的「十個問題」，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因為內容空洞無說服力，自三月至五月又陸續發下去五個「補充材料」，仍無補於事。黨內各系統的傳達內容，口徑也不一致。楊尚昆在軍隊的傳達最出格，竟把胡耀邦說成向鄧小平「搶班奪權」，比喻成同林彪一樣。楊尚昆的講話稿曾印發給軍隊高級幹部，因毫無事實根據，影響極壞，被迫立刻收回銷毀。

毛、鄧交班結局不同

鄧小平怎麼辦？

以毛為師，毛規鄧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廢黜鄧小平，不把權力交給虎視眈

耽、等著掌權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們，卻交給了華國鋒。因為毛了解江青他們只會鬥爭別人，治不了國。

一九八七年，鄧小平廢黜胡耀邦，也不把權力交給虎視眈眈、等著掌權的胡喬木、鄧力群、王震們。那時王震赤裸裸地對鄧力群說：「我這個人就要掌權，就是要權啊！沒權你就什麼事情也辦不了！」

但鄧小平看他們，正像毛澤東看江青他們一樣，靠他們批鬥別人行，靠他們掌權治國卻不放心。對胡喬木，當年胡耀邦提名他當宣傳部長，接替張平化，鄧小平都不同意。鄧小平說：胡喬木是軟骨頭，又無行政能力，只是一枝筆。對鄧力群，鄧小平認為他只有四項原則，沒有改革開放，把國家的政策方向往「左」拉，當然不能讓他治國。至於王震，只是「一門砲」，在倒胡打周時放放砲而已。對這些幫他倒胡打周、渴望權力的「功臣們」，鄧小平並未論功行賞，卻把權力交給了趙紫陽。這是鄧小平無可選擇的選擇，是一種權宜之計，同當年毛澤東把權力交給華國鋒時差不多。因為在鄧小平當時的視野裡，胡啟立、喬石、李鵬這些「第三代」，似乎還不夠做「核心」的條件，那就只能交給趙紫陽作為過渡了。

然而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人交班的結局不同。

一九七六年，八十三歲的毛澤東廢黜了七十二歲的鄧小平。十一年後，一九八七年，八十三歲的鄧小平也廢黜了七十二歲的胡耀邦（鄧比毛小十一歲，胡比鄧也

小十一歲）。

毛在把權力交給華國鋒後，說過那樣一段話：「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毛澤東不會料到：他去世後不到一個月，「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兩年後又把權力和平交給被他兩度廢黜的鄧小平，都沒有「血雨腥風」。

而鄧小平呢？被他廢黜的中國理想主義領導人胡耀邦，兩年後先他而去。鄧小平在胡耀邦去世後掀起一場震驚世界的「血雨腥風」，一以抵擋住逼近中國的「國際大氣候」——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二以消滅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小氣候」——學生民主運動。

在這場「血雨腥風」中，鄧小平廢黜了他的第二個接班人趙紫陽，從此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同國際、國內的自由民主潮流徹底拉開，在毛澤東封閉式共產奴役制度的原有基礎之上，建構成他的開放式共產奴役制度的鄧小平帝國。

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命運悲劇。

血雨腥風中再換接班人

胡耀邦下台，趙紫陽任代理總書記後，於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與二十九日發表了兩次講話。

一月二十八日是舊曆除夕，趙紫陽在中南海召集中央各部委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共二百多名高級領導幹部，作了一次內部講話。他說：

中央在一九八四年已經察覺胡耀邦不行，想掉他，考慮到十二大開過不久，過早解決這個問題對穩定大局有影響，所以準備在十三大解決，更自然些。這次學生鬧事，胡耀邦看到了自己造成的惡果，痛哭流涕提出辭職。在京政治局常委認為，現在這種情況下再由胡耀邦出面去解決學生問題已不適當，所以必須提早讓他下來。這也不是說胡耀邦做的事都不對，他當組織部長期間平反冤假錯案是正確的，老幹部至今承認這點。但是他對反自由化態度曖昧。

胡耀邦自己承認當了壞人的保護傘，很痛心。他一月二日提出辭職，說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報》只說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失誤」，極其寬宏。這次對胡耀邦的處理，是歷史上黨內鬥爭最完美的一次。

第二天，一月二十九日，舊曆新年元旦，趙紫陽在團拜會上講話。他說：

改革、開放、搞活，講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鄧小平同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講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鄧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國實際的過程中提出這兩個基本點的。我們大家都應當好好學習小平同志關於這兩個方面的論述，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真諦，是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基本內容。

這兩篇講話，帶來了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一年多的短暫蜜月。鄧小平最欣賞的，是趙紫陽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作了重新詮釋，提出「兩個基本點」的新概念。趙紫陽說：

現在，「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引號是原有的）已經成為全國人民最親切的政治概念，但並不等於都已全面深刻地理解了它的含義。那麼，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究竟是什麼呢？中共中央認為，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就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條路線的基本點是兩條：一條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條是堅持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兩者互相聯繫，缺一不可。不講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搞活就沒有方向，沒有保證。不講改革、開放、搞活，就不可能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就談不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只講一條，不講另一條，不符合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

大家記得，胡耀邦下台之前，包括鄧小平自己，都習慣用「三中全會路線」的提法，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中國歷史的偉大轉折」。但大家也都知道，鄧小平那篇「三中全會主題講話」，是為適應當時形勢，廢棄了胡喬木為他精心起草的稿子，臨時讓胡耀邦另組班子替他草成的「急就章」，講的是思想解放和民主，既沒有「四項基本原則」，也沒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提出他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戰略，是在三個半月之後（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胡喬木稱之為「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化份子分道揚鑣的起點」。所以趙紫陽為鄧小平的「兩個基本點」路線加上（三中全會）

「以來」二字，就比較「完整、準確」了。

專政派要消滅民主改革力量

但鄧小平與趙紫陽的「蜜月」又注定只能是「短暫」的，因為「鄧胡趙」體制破裂之後，中國的政治格局與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

第一，在專政派清算胡耀邦「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過程中，中共內部以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為改革目標的民主改革派，被大量整肅與邊緣化。從中央的習仲勳、李昌、李銳、朱厚澤，到地方的項南、任仲夷，均被迫離開改革崗位，由專政派指派的特權腐敗官僚接替，導致「改革」變質為特權官僚侵吞國家資產、壓榨人民血汗的惡政。

第二，專政派並不滿足於胡耀邦下台後的權力再分配；為繼續擴張權力，專政派發動的全面清算，最終必然把矛頭集中於趙紫陽。曾經是「凡是派」主將之一的熊復說：「從理論務虛會開始，這八年來我似乎做了一個噩夢，在胡耀邦縱容下，自由化份子製造了三場混亂：第一場實踐標準討論，打著解放思想旗幟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第二場是周揚提出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對社會主義制度懷疑動搖；第三場是陸定一反對反自由化。八年來，馬列主義受壓，這股惡氣今日始出。」另一名

反對周揚人道主義與異化觀的急先鋒林默涵說：「自由化不只是一股思潮，而且是一股勢力，我們今天不消滅這股勢力，總有一天我們要被他們倒掛在電線桿上，像匈牙利事件時那樣。」

陳雲是中共黨內最頑強的史達林主義專政派。毛澤東批評他「右」，只因為他堅持史達林高度集權的「有計劃、按比例」統制經濟，不同意毛澤東不按計劃、比例的「高指標」。他反華國鋒、反胡耀邦、反趙紫陽，就是要清除專政派奪權的障礙，讓鄧力群當總書記，姚依林當總理，王震當國家主席，徹底消滅中國的民主改革力量。

第三，胡耀邦下台，標誌鄧小平的政治立場，大幅度向專政派傾斜。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六年的八年，鄧小平反覆在「兩個基本點」之間玩弄平衡術，逢雙強調改革開放，逢單強調反自由化，使鄧力群得出「逢雙自由化氾濫，逢單馬克思主義者揚眉吐氣」的公式。直到十二屆六中全會前鄧小平與鄧力群談話，要他支持胡耀邦的〈精神文明決議〉，仍是平衡術的運用。但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突然變卦，大講反自由化，會後全力支持專政派倒胡，自己向楊尚昆說出「這幾年我如果有錯誤，就是瞎了眼，看錯了胡耀邦」這樣的話，表明鄧小平從此已打破平衡。這意味著鄧力群把黨的路線向「左」拉，抵制改革開放，鄧小平可以容忍；胡耀邦堅持改革開放，對反自由化「渙散軟弱」，鄧小平絕不容忍，非去之不可。因為鄧小平認

為，前者是經濟領域發展的快慢問題，後者是共產黨專政制度的存亡問題。

中共十三大後趙紫陽陷於孤立

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趙紫陽的處境的確十分嚴峻。那時政治局常委會已停止運作。書記處會議上，姚依林、胡喬木、鄧力群的專政派聯盟處於優勢，咄咄逼人。趙紫陽只得採取先找鄧小平請示報告，獲得鄧小平支持後，再提交書記處的工作方式。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趙紫陽到鄧小平家中口頭匯報三個月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中「左」的傾向，包括鄧力群「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藉口反自由化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王忍之的「第二次撥亂反正論」，熊復的「噩夢論」等。趙紫陽說：「這樣下去，我無法搞經濟，無法繼續改革。」

鄧小平表示支持趙紫陽，要他準備一篇講話糾正「左」的思潮。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趙紫陽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講話，對專政派展開全面反擊。

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的報告，也是先草擬出〈十三大報告大綱的設想〉，交鄧

小平審閱，得到鄧小平批示「這個設計好」，才把自己的〈設想〉和鄧小平的批示同時報送書記處，使專政派難以下手阻撓。

中共十三大是鄧小平與趙紫陽短暫蜜月的高潮。趙紫陽〈十三大報告〉中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兩個基本點」的設計，深得鄧小平的讚賞，直到鄧小平與趙紫陽決裂之後，鄧小平仍多次重申，「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

十三大有一個振奮人心的插曲，是鄧力群的落選。鄧小平和陳雲原來安排鄧力群在十三大進政治局，但十三大在選舉中央委員會之前進行一次差額預選，預選的時候選人比委員名額多出百分之五，即十名。結果，鄧力群落入被差掉的十名之中，後來被安排進等額選舉的顧問委員會當常務委員，又因得票不足半數落選。

專政派因此遷怒於趙紫陽。十三大之後，王震到了珠海，住進「元首套房」，號稱「養病」，實則邀集老人們到他那裡「議政」。王震說：「鄧力群同志是我們黨內理論水平最高的，反自由化最堅決的；還有薄一波同志，是毛澤東、周恩來時期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馬列主義水平高。他們兩個，一個落選，一個少了三分之一選票，就是因為他們批判胡耀邦起了主要作用，支持趙總理，他們的選票是為趙總理丟的。」

十三大後的形勢，對趙紫陽可說是急轉直下。原來鄧小平與趙紫陽商定的政治局常委是七人：趙紫陽、萬里、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田紀雲。專政派在

最後關頭，反掉了改革開放的堅定支持者萬里和田紀雲。剩下五人，李鵬、姚依林屬於專政派；喬石、胡啟立原是胡耀邦部下，在專政派反胡耀邦鬥爭中立場搖擺，胡啟立還被鄧力群抬出來同「自由化」的朱厚澤對比，表揚他「態度轉變好」。這樣一個班子，在專政派壓力下，顯然難以把改革開放堅持下去，趙紫陽最後陷於孤立是勢所必至。

專政派對趙紫陽的鬥爭策略，在十三大後也有所改變。鄧力群發現趙紫陽在經濟領域的「自由化」主張與鄧小平相通，鄧小平又欣賞趙紫陽的「兩個基本點」，因此要批經濟領域「自由化」是批不倒趙紫陽的。鄧力群認為必須把重心轉向挑撥趙紫陽與鄧小平的關係這個「要害」。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中時，趙紫陽送他一部《河殤》拷貝，說「值得一看」。鄧力群即以此為「突破口」，他說：「趙紫陽支持的《河殤》提出了一個新觀點，趙紫陽上台的一年叫『新紀元』。趙紫陽非常欣賞『新紀元』這個說法。首先提出批評的是王震，由林默涵幫王老整理成文章。李先念有一次見到我，說你對王老文章有什麼意見啊？我說我提了一個意見，要害是『新紀元』的提法。《河殤》裡有兩個『新紀元』。一六四九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新紀元』，一九八七年趙紫陽當了總書記又是一個『新紀元』。這是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的『新紀元』，這是反對鄧小平同志代表的黨，大樹特樹趙紫陽新權威的『新紀元』。」

那時知識界有些人，似乎是各行其是地在國內外宣揚「新權威主義」。有人在紀念百日維新失敗九十週年的座談會上，以「光緒」與「慈禧」暗喻趙紫陽與鄧小平，主張中國現代化需要「乾綱獨斷」的政治強人。還有人接受美國媒體專訪，稱「中國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把黨政軍全部權力集中到一個領袖——趙紫陽的手中」。香港也出現了〈假如趙紫陽是獨裁者〉的文章。這些言論與動作，都被專政派搜集起來，送到鄧小平、陳雲和其他老人手中。

全球自由民主浪潮氣勢澎湃

國際上，一九八八年是全球自由民主浪潮氣勢澎湃、湧向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年。六月一日，美國總統雷根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在莫斯科簽訂雙方拆除和銷毀中程核導彈的《中導條約》，並就尊重人權、全面控制軍備等議題展開談判，為結束東西方冷戰揭開序幕。六月二十八日，戈巴契夫在共產黨代表會議上宣佈「對政治體制的根本性改革是摧毀中央集權的政府僵化體制及其命令壓迫機制這一官僚巨石」，「蘇聯的變革應沿著深入且持續的民主方向前進」。他宣佈「釋放全部政治犯」，並將為史達林大清洗中的遇害者建立一座紀念碑。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數十萬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五〇年代的二十年間，史達林清洗中的受害者得到

平反。三月二十六日，蘇聯舉行一九一八年以來，第一次包括非共政黨的全國性選舉，許多共產黨人被擊敗。被俄共開除的葉爾欽，在莫斯科選區贏得壓倒性的百分之八十九選票。一些蘇聯共和國開始要求獨立，在史達林故鄉第比利斯，示威者要求喬治亞脫離蘇聯。

東歐局勢比蘇聯更加激盪。一九八八年，戈巴契夫撤走部署在匈牙利的全部核武器。一九八九年一月，匈牙利議會通過法律允許反對黨成立，共產黨四十年的壟斷地位被打破；三月二十八日，共產黨以外的候選人第一次被允許參選議員，匈牙利民主聯盟的候選人擊敗共產黨候選人取得勝利，他們的政綱是「民主、融入歐洲、反對共產主義、保持匈牙利價值」；匈牙利政府開始拆除用以防止匈牙利人逃至奧地利的、長達二百一十八哩的安全圍牆。在波蘭，團結工會取得合法地位，共產黨政府與團結工會領袖華勒沙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簽訂了一項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協議。

由此可見，在胡耀邦去世和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爆發之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經滾滾而來，席捲歐洲共產國家，即將抵達中國天安門廣場了。這將是一次遠比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一九八六年學生運動更為嚴峻的挑戰，對此鄧小平已有預感。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布希時說：「中國的問題，壓

倒一切的是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鄧小平在住地同趙紫陽談話時說：「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外國人要議論，讓他們議論去。中國不能亂，這個道理要反覆講、放開講；不講，反而好像我們輸了理。要放出一個信號，中國不許亂，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威遊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遊行，什麼事也不要幹了，外國資金也不會進來了。我們在這些方面控制嚴一點，不會影響外商來投資，恰恰相反，外商會更放心。」

所以認為「八九民運折斷了共和國歷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十年改革進程，破壞了中國社會的轉型，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軌道」；或者認為「鄧小平聽信了李鵬、李錫銘、陳希同的不實匯報作出錯誤決策」等等，都是沒有弄懂鄧小平的「穩定」哲學。鄧小平的「穩定」哲學與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一樣，靠的都是專政即鎮壓手段，目的都是絕不改變中國共產黨一黨天下的發展軌道；不過一個叫「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個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已。誰偏離這個軌道，無論是胡耀邦縱容「自由化」知識份子，或者趙紫陽反對鎮壓學生，都只能下台。鄧小平對此同毛澤東一樣堅定不移，他自己在大屠殺後第一次露面接

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就說得明白：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堅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

歸根到底，鄧小平與毛澤東、陳雲、王震、鄧力群們一樣，也是專政派，區別只是鄧小平是主張「對外開放」的專政派。鄧小平認為對內專政，「控制嚴一點，外商會更放心」。一點不錯，這正是鄧小平的一黨專政帝國在他死後仍能維持至今，而且成為華爾街的「負責任合夥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 的秘密。那位在血雨腥風中說出「殺二十萬人，換取二十年穩定」的太子黨、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二十年後的今天，不是已成了與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平起平坐的大官僚了嗎？

保持鄧小平帝國的「穩定」

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這是封建主義的做法，改革制度也包括這一點。然而鄧小平自己也沿襲毛澤東的封建主義做法，離更換華國鋒僅僅八年，離更換胡耀邦僅僅兩年，鄧小平又要更換接班人了。

這一回，鄧小平仍然不選擇陳雲、王震屬意的鄧力群，也不選擇已經是政治局常委的堅定專政派李鵬、姚依林，因為他們是對外封閉的專政派。鄧小平要選擇的，是同他一樣對外開放的專政派，好把鄧小平帝國「對內專政、對外開放」的大戰略繼承下去。

這個人就是江澤民。鄧小平選中他，首先是根據政治標準。鄧小平說過：「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而江澤民，風波來臨時，在《世界經濟導報》自由化問題上同趙紫陽對著幹，表明他是夠格的專政派。他又不像李鵬、姚依林死抱陳雲的「經濟鳥籠」，不至於斷送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於是在血雨腥風中，鄧小平冊封江澤民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三代核心」，並諄諄囑咐李鵬、姚依林「注意樹立和維護」這位「江核心」，「不要不服氣」。

與毛澤東不同的是，毛澤東選擇華國鋒之後五個月就去世了，未料到華國鋒在他死後不到一個月就「粉碎四人幫」，然後自己被鄧小平、陳雲廢黜。而鄧小平觀察與扶持江澤民達八年之久，既幫他同對外封閉的專政派鄧力群們「保持距離」，

又幫他解除了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對其掌握軍權的威脅。這就使江澤民得以鞏固其「第三代核心」的權力地位，保持住對內專政、對外開放的鄧小平帝國的「穩定」。

整體而言，除了開頭三年的「經濟滑坡」，「九二南巡」之後，鄧小平對江澤民繼承其對內專政、對外開放的大戰略是滿意的，而且為江澤民之後鄧小平帝國的持續「穩定」，指定了隔代接班人胡錦濤。

鄧小平與蔣經國的世紀對奕

鄧小平一生最大的遺憾，是他對台戰略的失敗。他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會見戈巴契夫時坦承：

我這一生，已經做成的事情是，調整了與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係，確定了收回香港，已經同英國達成協議。這是對外關係的參與。對國內工作的參與，確定了黨的基本路線，確定了以四個現代化為中心，確定了改革開放政策，確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這段話是鄧小平對自己一生成敗的簡明概括。的確，對外對內，鄧小平都是極高明的政治棋手。蘇聯的赫魯雪夫、戈巴契夫，美國的卡特、雷根、布希，英國的

柴契爾夫人，日本的中曾根康弘；國內的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鄧力群，誰都未能突破他的意志。鄧小平算來算去，費盡心機，下不贏的對手只有一個，就是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弟蔣經國。

鄧小平講這個話時，蔣經國（一九一〇－一九八八）去世不久，鄧小平（一九〇四－一九九七）又活了八年。但鄧小平已不得不承認，蔣經國生前佈下的棋局，他這一生已無法破解。

蔣經國的一生，算得上是個傳奇人物，跨越三個時代：

蘇聯時代 十五－二十七歲，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十二年。

中國時代 二十七－三十九歲，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十二年。

台灣時代 三十九－七十八歲，一九四九－一九八八，三十九年。

若以他一生度過的歲月來劃分，前半生（一九一〇－一九四九）三十九年在中國和蘇聯，後半生三十九年在台灣。若扣除童年至少年的十五年成長期，對他人格形成與事業成敗構成主要影響的經歷，在蘇聯和中國各十二年，在台灣三十九年。

這就是說，蔣經國的歷史角色，他的失敗與成功，主要在台灣。特別是蔣介石死後的十三年（一九七五－一九八八），蔣經國不但在台灣歷史上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透過與鄧小平的世紀博奕，對中國與世界留下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力。這一點迄今尚未被歷史家們充分認識。

蔣經國生命的最後十三年，面對世界和中國歷史的變化，承受了內外沉重壓力：第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自南歐國家興起，以席捲全球之勢，迅速衝擊到亞洲和台灣。

第二，毛澤東去世，鄧小平掌握權力後，改變中國的全球戰略，從聯美制蘇轉為聯美壓台。

對中國的台灣戰略，現在台灣流行的說法是：「毛澤東『血洗台灣』，鄧小平『一國兩制』，江澤民『三通四流』，胡錦濤『和平發展』。」好像愈來愈輕鬆，其實是歷史的顛倒。

毛澤東沒有力量，也沒有意願「血洗台灣」；他的「大戰略」是「聯美制蘇」。他臨死前不久（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還對季辛吉說：「現在你把台灣還給我，我也不要，因為現在要不得，那裡反革命份子太多了。等到我上天堂去見上帝，我要同祂講，現在讓台灣由美國代管還比較好。一百年以後，我們就會要了，打仗也得要。」

當時美國的立場，是雙重承認。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後，一方面美、中兩國在華盛頓和北京互設大使級「聯絡處」；另一方面美國繼續保持與台灣的外交關係，駐軍和《共同防禦條約》，也就是毛澤東所謂「讓台灣由美國代管」，不讓日本、蘇聯插足，也不支持台灣獨立，美國政府均予承諾。

這個雙重承認的三角架構，是毛澤東、周恩來的選擇。一九七三年二月，季辛吉第五次訪問北京，談判美、中雙方如何在對方建立常設機構。季辛吉提出四種可供選擇的方案：

(一) 貿易使團，類似中、日建交前，分別在東京和北京設立的「廖承志辦事處」和「高崎達之助辦事處」。

(二) 利益小組 (Interests Group)，類似美國在古巴設立過的。

(三) 領事館。

(四) 聯絡處。

季辛吉把互派貿易使團作為首選向周恩來推薦，是考慮到對中國不會引起政治上的困難。出乎意料的是，周恩來毫不遲疑地選擇最高一級的聯絡處，而且是相互對等的大使級，人員享受外交特權。

周恩來的選擇讓季辛吉喜出望外，因為這等於是中國毫不計較美國在同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的狀況下，同美國互派外交使團，這是季辛吉原來不敢想像的。

原因就在毛澤東「聯美制蘇」大戰略。在那次訪問中，季辛吉與毛澤東有一百一十分鐘的談話（二月十七日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至十八日凌晨一時二十分），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出聯合美國及其盟國形成「一條線」，共同遏制蘇聯擴張。季辛吉為這次北京之行寫給尼克森的報告稱：「自從一九七一年七月以來，我們的進展遠比

任何人預期或察覺的更為快速而深入。我們現在已經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國。」

毛澤東為「聯美制蘇」，主動擱置台灣問題。季辛吉說：「在任何一次會見中，毛澤東從來沒有對台灣問題表示過不耐煩，沒有進行過任何威脅，或把它作為我們兩國關係的試金石。『台灣事小，世界事大』、『我們可以暫時不要他們，過一百年再說吧』、『為什麼這樣匆匆忙忙呢』？這就是毛澤東多次向我們說明的他關於台灣問題的思想。」

鄧小平贏得美國，贏不了台灣

一九七八年中國形勢的重大變化，是鄧小平的崛起。在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已經以國務院副總理身分分管外交工作。鄧小平把改變毛澤東的對美、對台戰略，列為他的首要目標。

鄧小平的幸運，是他遇到了美國歷史上最強的對手蔣經國。這就決定了鄧小平在台、美、中三方博奕中，贏得了美國，贏不了台灣。鄧小平聯美壓台，成功地誘惑了卡特、布里辛斯基對台「斷交、撤軍、廢約」，打破了毛澤東時代台、美、中三角的平衡；卻在蔣經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堅定意志抵抗下，改變不了台灣

與其產中國隔海對峙的「現狀」，實現不了「台灣歸回祖國」的「統一」夢。

鄧小平對台、美雙方的判斷錯誤是重美輕台。他過於看重美國對台灣的支配力量，而輕視台灣自身的力量和獨立意志。鄧小平以為，他只要迫使美國對台「斷交、撤軍、廢約」，台灣就會乖乖地聽美國擺佈，除了同他談判「和平統一」，別無選擇。

布里辛斯基於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抵達北京，同中國外交部長黃華會談，一開頭就表明「我們對推進雙方關係正常化已經下定決心」，他將代表卡特總統「盡其所能地加速其進程」。

第二天（五月二十一日）鄧小平接見布里辛斯基時佯作不知，對他說：「現在的問題是有沒有下定決心？」福特總統於一九七五年說，如果他連任的話，會毫不保留根據這三個條件（對台斷交、撤軍、廢約）來完成雙方關係正常化。後來福特總統沒有連任。當然新政府有權重新考慮，我們非常期待有一天卡特總統能夠下定決心。現在我們換個話題吧。」

布里辛斯基急忙表明：「我已經說過，卡特總統已下定決心。」

鄧小平接著說：「卡特總統下了決心，事情就好辦，我們雙方隨時可以簽訂關係正常化的文件。就是三個條件：斷交、撤軍、廢約，都涉及台灣，我們不能有別的考慮，因為這關係到主權。你們要表示你們的希望，這可以；但我們也要表示我

們的立場，即中國人民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解放台灣，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指不放棄使用武力）。

研究中國談判策略的《索樂文報告》（Chinese political negotiating behavior: a briefing analysis）指出：鄧小平使用的是故意質疑對話人，刺激他急於接受中方條件的一種手法。卡特總統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記道：「布里辛斯基已由中國回華盛頓，他被中國人壓倒了；我告訴他，他被誘惑了。」

然而，卡特沒有糾正布里辛斯基，他跟著布里辛斯基被中國人「誘惑」、被中國人「壓倒」了。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華盛頓和北京同時發表的《美中建交公報》，完全遵循鄧小平提出的條件，美國完全被「壓倒」。

在美國宣佈同台灣「斷交、撤軍、廢約」前七個小時，美國駐台北大使安克志請求會見蔣經國總統。安克志讀了《美中建交公報》和卡特致蔣經國的訊息：美中建交的同日，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將終止；《共同防禦條約》一年後終止。安克志還說：「這些是極重要、有高度機密性的訊息，務請保密。」

蔣經國答覆：「如此重大決定，美國竟然在七個小時前才通知我國，此實為對我國重大打擊，對我個人係一大侮辱，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此事的後果極為惡劣。美國以為如此仍可以保持台灣的內部安全及繼續發展，事實亦斷不可能。美國在此侷促時間內決定此一重大問題，其方式及決策本身，不僅失信於我國政府及人

民，亦失信於整個自由世界人民。對於今後可能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應由美國政府負其全部責任。」

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國與共產中國建交當天，樂得忘乎所以地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座談會上宣佈「台灣歸回祖國已提到日程上來」。他說：「今天是一九七九年的元旦，這是不平凡的日子。說它不平凡，不同於過去的元旦，有三個特點：第一、今天是我們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第二、今天是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第三、今天把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到具體日程上來了。」

同日，以國防部長徐向前名義發表的關於「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砲擊的聲明」，特別強調：「中、美建交是一件歷史性大事，為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創造了有利條件。」

緊接著，一月二日至五日，鄧小平頻繁會見美國國會議員和美國記者，宣佈：「我們將採取多種方法同台灣當局，特別是蔣經國先生商談祖國統一的問題。就我個人來說，我希望今年就實現這個願望。就我的健康狀況來說，至少還可以活十年，但那就太久了。」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鄧小平在〈關於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報告中，又把「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定為「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

然而，「願望」沒有實現，「任務」沒有完成。等到一九八九年，鄧小平終於放棄，承認他「看不到了」，也就是承認他在這場博奕中已被蔣經國擊敗。可惜這場世紀對奕至今未被正確解讀，台灣今天的執政者，作出了完全違背歷史真相的荒謬解讀。

蔣、鄧對奕的歷史真相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八日，江丙坤在台灣「投資新中國」高峰論壇上說：

八十年代兩岸關鍵人物在關鍵時刻作出正確決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中國大陸在過去十五年，經濟成長率平均百分之十點五，為世界第一名，並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第三貿易大國；至於蔣經國的政策，讓台商在台幣升值、自由化過程中，大舉到大陸投資，利用大陸作為台灣出口到美國的平台，對台灣經濟有莫大貢獻。

去年關鍵人物再度出現，馬英九主張兩岸和平穩定發展，在過去八個月所呈現的發展，得到全世界肯定。現在是關鍵時刻，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與內需市場，對台灣帶來良好機會，因此馬英九競選政見兩大主軸，為兩岸經貿關係

正常化、兩岸經貿合作協議。

顯然江丙坤是為了表白今日馬英九與胡錦濤的「合作」雙贏，不惜偽造出昔日蔣經國與鄧小平「合作」雙贏的歷史。蔣經國同他

第一，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鄧小平的確千方百計「誘惑」蔣經國同他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談判「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他始終把自己的願望寄託在學弟蔣經國身上。最後一次是一九八五年九月，鄧小平得悉蔣經國健康狀況不佳，拜託李光耀去找蔣經國做說客。因為李光耀是雙方都信得過的朋友。鄧小平對李光耀說：

蔣經國不在了，台灣出現獨立怎麼辦？確實存在台灣獨立的可能性。如果蔣經國先生從中華民族利益著眼，同我們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將會有很多好處。事情只能由他來決定。你下次見到他時，請代為問候，希望同學之間合作一下。

「商業共產主義」統治下，「仍可保持它自由經營的、成功的社會經濟制度」。卡特競選連任失敗後，鄧小平把希望寄託於雷根總統，他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會見雷根時說：

中國準備在不放棄主權原則的前提下，允許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中國統一後，台灣可以繼續實行資本主義，而且台灣還可以繼續維持對外關係，主要是對美國、日本的關係不變。但是，這要取決於美國政府的政策。美國有許多事情可以做，並非無所作為，就是不要做使蔣經國翹尾巴的事情。這樣，海峽兩岸可以從逐步增加接觸到談判統一。

雷根未為所動，鄧小平再接再厲，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會見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時，托她傳遞訊息給雷根，希望美國能像英國同意把「一國兩制」用於解決香港問題那樣，同意把「一國兩制」用於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說：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請柴契爾夫人再過幾天見到美國總統雷根時，介紹一下中、英兩國合作解決香港問題的情況，並祝賀雷根先生連任總統。雷根總統認為「一個國家，兩

種制度」的方式是可取的話，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特別是雷根總統本人。

鄧小平想用雷根和柴契爾包圍蔣經國的這兩步棋，均未見效。柴契爾在華盛頓會見雷根時，一字未提鄧小平請她轉達的重大建議。等柴契爾一離開華盛頓，中國駐華盛頓官員就向美國官員探聽，雷根對鄧小平的建議有何反應？美國官員被問得莫名其妙，後來在英國人協助下才弄清楚是怎麼回事。

李光耀倒是很認真，專程到台灣與蔣經國在日月潭會面，轉達鄧小平對蔣經國的問候與國共和談建議，但被蔣經國拒絕。蔣經國委託李光耀訪美時，帶信給美國總統雷根。信中指出：共產中國以各種手法在國際上孤立台灣，對於美國，則指稱台灣是美、中關係絆腳石，企圖迫使美國對台「廢法」（廢除《台灣關係法》）、「停售」（停止對台軍售）、「逼和」（逼迫台灣接受和平統一談判）。蔣經國表達了他堅持不與共產中國談判的立場。

第二，面對美國對台「斷交、撤軍、廢約」，和鄧小平進一步迫使美國「廢法、停售、逼和」的凌厲攻勢，蔣經國的中國戰略是從專制反共轉變到民主拒統。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說：「這是本黨歷

史上最艱險的一年。」也就是比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更艱險。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犯，還可以退到大後方堅持抗戰。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打敗，還可以流亡台灣。一九七九年遭美國背叛與鄧小平「促統」雙重壓力，台灣已無路可退。

蔣經國從專制反共到民主拒統

那一天是世界人權日，當晚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標誌台灣自由民主運動的新高潮的來臨。一九八〇年二月的「美麗島大審」，是蔣經國對台灣自由民主運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鎮壓，幾乎把著名的反對人士一網打盡，然而台灣人民卻站在蔣經國的對立面——被審判者一邊。當年年底，台灣民意代表選舉，「美麗島大審」的受難者家屬和辯護律師，獲得空前勝利，使蔣經國看到戒嚴恐怖統治的威懾力量，已經阻擋不住自由民主的歷史潮流，民眾不再畏懼支持挑戰國民黨黨國專制制度的政治反對派了。

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蔣經國可以有三種選擇：

一是屈服於美國「斷交、撤軍、廢約」與鄧小平「統一時間表」的壓力，滿足他的學長「同學之間合作一下」的願望，實現國共和談；或者如江丙坤所言，迎合鄧小平改革開放，「大舉到大陸投資，利用大陸作為台灣出口到美國的平台，從經

貿合作逐步增加接觸到談判統一」。

二是繼承蔣介石的哲學，「以不變應萬變」。國民黨流亡政權在台灣已經維持了三十多年，而蔣經國晚年已疾病纏身，他可以繼續拖延殘局，留給台灣一個不確定的未來。

三是順應歷史潮流前進，跟著台灣人民告別過去，同黨國獨裁政權決裂，走上自由民主新路。

蔣經國只要走錯一步，今天的民主台灣就不存在了。在這場博奕中，鄧小平轉勝為敗，蔣經國轉敗為勝，就在一九八〇年代他們各自走出的最後幾步棋。

蔣經國晚年走出的關鍵一步，就是從專制反共到民主拒統。

四十五歲時的蔣經國（一九五五年），曾對訪問他的美國學者艾倫·懷丁說：「在亞洲，一黨專政是唯一統治的辦法。政工、特務、青年救國團被攻擊得最厲害，美國誤會也最深。但唯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們就永遠沒有民主。」

三十多年專制反共的結果，反而被中共逼到了絕境。蔣經國終於看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台灣的國民黨黨國戒嚴體制，已無法照舊統治下去，不能不變了。他提出「革新保台」，解除戒嚴，解除黨禁、報禁，準備開放全國民意代表直接選舉，這就是終結把台灣當作反攻大陸基地的國民黨外來政權體

制，跨向以台灣為主體、依靠台灣人民，把台灣建設成為自由民主現代國家之路的第一步。這是台灣在中國促統、國際孤立環境中唯一的生存、發展戰略，也就是民主拒統戰略。

鄧小平「統一」夢碎

當歷史機會來臨時，歷史人物在轉瞬即逝的關鍵時刻作出的選擇，能夠決定國家的命運。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歷史機遇，比他的學弟蔣經國好得多。中國於一九七〇年代末起步的開放進程，在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領導人主持下，擁有廣泛的國內外支持。然而，鄧小平本人始終在改革力量與反改革力量之間舉棋不定。愈到晚期，愈偏向反改革力量一邊。當台灣解除戒嚴，解除黨禁、報禁，允許反對黨成立之際，鄧小平在中國先後廢黜了兩任改革派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把黨國權力交到反改革勢力的掌握之中。

他的學弟蔣經國的最後歲月，結束了國民黨一黨專政，把台灣的命運從國民黨手中交還給台灣人民，從而使鄧小平的「統一」夢碎。在蔣經國死後一年，鄧小平終於承認了他同蔣經國的博奕以失敗告終，說出「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鄧小平帝國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的「政治遺囑」

毛澤東臨終前不久，曾召見華國鋒、毛遠新、汪東興等人，說了一段話：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

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這段話可以視為毛澤東的政治遺囑。

毛澤東挑選兩名接班人劉少奇、林彪失敗之後，雖已到風燭殘年，卻不再明確指定新的接班人，而是在左、右兩派之間玩平衡遊戲，時而支持鄧小平批評「四人幫」（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時而支持「四人幫」批評鄧小平。毛對「四人幫」，是利用而非信任；毛認為他們能「亂天下」，不能「治天下」。毛認為鄧小平能「治天下」（「人才難得」），但對鄧的治法（「路線」）沒有把握。特別是鄧對「兩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毛最不放心。

當初毛讓鄧復出的條件，是鄧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表示「永不翻案」。後來毛又發動批鄧，也是由於看到鄧小平的「永不翻案」靠不住。

鄧小平拒絕文革遺產，「四人幫」不能治國，這筆「遺產」怎麼交，成了毛澤東臨終的難題。毛澤東的政治遺囑所透露的，正是那種難以釋懷的無奈與悲涼。

毛澤東最後決定，讓「公道不蠹」、「人家說他水平低，我就選這個水平低的」華國鋒出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已是無可選擇的選擇。究竟這筆遺產交得成交不成？將帶來和平還是「血雨腥風」？毛已經沒有把握，只得聽天由命（「只有天知道」）了。

華國鋒與四人幫爭奪毛「正統」

華國鋒的思路比較簡單，以為依靠葉劍英、汪東興抓了「四人幫」，鞏固了權力，他就能以毛澤東的「正統接班人」地位「抓綱治國」了。

但鄧小平認為：「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

這話不錯。華國鋒和「四人幫」都沒有「獨立的東西」，雙方打的是一場爭奪毛澤東「正統」的宮廷內戰。爭戰的主題非常可笑：華國鋒以毛澤東親筆寫的「照過去的方針辦」七個字，打敗了被四人幫「竄改」的「按既定方針辦」六個字。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二十五天後的十月四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長文，把「按既定方針辦」定性為「毛主席的臨終囑咐」。這六個字也被寫進外交部長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稿，華國鋒在喬冠華的發言稿上批示：「毛主席原文『照過去的方針辦』，七個字錯了四個！」華國鋒和汪東興判斷這是「四人幫」將有所行動的預兆，決定「先下手為強」；於是十月六日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和毛遠新等人逮捕。汪東興手下的「理論組」成員鄭必堅，寫了一篇被評為「氣勢磅礴」的聲討文章〈覆滅前的猖狂一跳〉，指稱十月四日《光明日報》文章把毛澤東的「照過去的方針辦」竄

改為「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發動反革命政變的信號」！然而人們難以理解，究竟「照過去的方針辦」與「按既定方針辦」的差別在哪裡？不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針辦」嗎？

胡耀邦建議增加黨內民主改革派參加會議

之後華國鋒又提出「兩個凡是」，所以鄧小平說他「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可見鄧小平自己是有「獨立的東西」的。但鄧小平的「獨立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在很長時間內沒有人弄得清楚。外國人說他是不講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者」，鄧小平也自稱「不爭論」是他的「一大發明」。有人寫過一本小冊子《鄧小平的哲學思想》，概括為「貓論」和「摸論」，根據的是鄧小平的兩句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和「摸著石頭過河」，也還是實用主義、經驗主義的意思，說不上「獨立的東西」。

事實上，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中共十三大那些年，鄧小平的思路是不穩定的；尤其是一九七八年冬天和一九八〇年春夏之際，他的確曾試圖跳出專政派的思路，向民主派的思路傾斜，但為時都很短暫。

中共黨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龔育之，把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

中央工作會議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和《鄧小平文選》最後一篇〈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稱為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和「解放思想的宣言書」，恐怕並不符合「完整、準確」的鄧小平思想體系和歷史的真相。

我說過鄧小平那篇後來被定為「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講話，「是在當時會外西單民主牆『大氣候』和會內各小組討論『小氣候』逼迫下的急就章」。也就是說，它是鄧小平追隨當時「大、小氣候」的應變產物，不是他深思熟慮的理論產物；鄧小平不但並未堅守，而且很快以他堅守的東西否定了它。由於有人對這段歷史所作種種歪曲與偽造，有必要再作點說明。被稱作「中國歷史重大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關鍵作用的是胡耀邦，不是鄧小平。胡耀邦不但為這個歷史轉折進行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真理標準討論、分清歷史功過是非、平反冤假錯案），而且為實現這個轉折，運用了社會自由民主力量（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標誌，遍及全國）與黨內民主改革力量（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黨內民主改革派）的暫時聯盟。沒有胡耀邦創造的這兩個條件，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凡是」派，是不可能如此輕易認輸的。

增加黨內民主改革派參加會議，是胡耀邦向華國鋒建議的，主要是吸收理論界、新聞界、文藝界知識份子領導人周揚、胡績偉、秦川、楊西光等參加，他們在

會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胡耀邦還讓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收集西單民主牆提出的重大問題，由馮文彬帶到會上，以便「啟發思想」。

鄧小平那時在做什麼呢？

中央決定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份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農業問題和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這兩年的國民經濟計劃；那時鄧小平在日本訪問。十月二十九日，鄧小平訪日結束回國，曾建議工作會議開始時增加討論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問題，並找了胡喬木為他起草會議講話稿。

鄧小平當時的主要注意力在外交方面。同美國的外交談判已到最後關鍵時刻，鄧小平要求「加快步伐」。另外，他在訪日之後，緊接著在十一月上半月正式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十一月十四日晚才經緬甸回國。那時中央工作會議已經開了五天，當時的形勢，是中央工作會議與西單民主牆相互呼應，對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門事件、歷史上的冤假錯案，以及黨的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當馮文彬把西單民主牆要求為一切冤假錯案平反、撤銷汪東興的中央專案組等大字報內容在會上傳播時，獲得與會大多數人的響應。另外，凡是派代表人物胡繩在會上對周揚的攻擊，引發了實踐派對凡是派的回擊。

胡耀邦對此會議的進程充分掌握、成竹在胸。由於他就任中央組織部長後，早已對會上提出的案件進行過認真調查，因此能在會議期間即時向中央提供相關資料，使中央能夠迅速回應人民的呼聲，作出決定，包括「全國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決定」，「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決定，「六十一年人叛徒集團」、「二月逆流」和彭德懷、陶鑄等冤案的平反決定等。照胡耀邦的說法，這是「把歷史的顛倒再顛倒過來」，也就是歷史的偉大轉折。

鄧小平看到這種形勢，於十一月十六日再約胡喬木談修改他的講話稿。胡喬木於十一月十九日完成修改稿，交給了鄧小平。胡喬木的修改稿在鄧小平手裡壓了十二天，他在繼續觀察形勢。

十一月二十五日，鄧小平與華國鋒、葉劍英等聽取北京市委和團中央匯報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群眾的反應，以及西單民主牆大字報的情況。那時大字報已有批評毛澤東的歷史錯誤，貴陽市啟蒙社提出「毛澤東的功過三七開」。鄧小平聽取匯報時說：

有些歷史問題要解決，有些歷史問題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不能勉強去解決。有些事件我們這代人解決不了，讓下一代人去解決。外國人問我，對毛主席的評價，可不可以像對史達林評價那樣三七開彙。我肯定地回答，不能這樣

講。黨中央、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幹赫魯雪夫那樣的事。

但那時鄧小平還沒有否定民主牆和大字報。他在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會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時說：「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

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

到了十一月三十日晚上，鄧小平才把讓胡喬木起草並經過修改的稿子拿給胡耀邦，對他說：「這個稿子不能用，喬木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寫。」兩天後（十二月二日），鄧小平又提出了一些想法，重點是解放思想和民主。這篇重新起草的「急就章」完成後，鄧小平卻又讓胡喬木參加「修改」，去破壞自己提出的「解放思想」和「民主」兩個重點。舉例說，「解放思想」的主題下有段話，原來是這樣的：

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

況來看，愈看愈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評價真理標準爭論之意義的這段話，本來是周揚的發明。胡喬木當時就站在反對一方；這次工作會議上，胡繩再次拿來攻擊周揚。但鄧小平在十二月二日談到思想解放時，對周揚這段話予以肯定，並重複講了一遍，因此寫進了「急就章」。胡喬木不敢貿然去掉，他採取的破壞手段，是把這段話從中間一刀切斷，在「就要亡黨亡國」之後塞進他的東西：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覆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

然後再接上鄧小平肯定的周揚原話。這樣一來，對真理標準爭論的評價變成了毛澤東早在延安整風中「反覆講過」的老調子了。

對「急就章」中民主這個主題，胡喬木塞進去的是：「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我們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這麼一來，民主的價值就被降低為「集中制」和「專政」的「手段」了。

但無論胡喬木怎樣玩他的戲法，這篇「急就章」中既無「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連「改革開放」的明確概念也未出現；而僅僅三個月後，鄧小平就發表了那篇胡喬木起草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走向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和民主兩大主題的反面，那才是鄧小平帝國的政治綱領。

鄧小平帝國的理論基礎

所以龔育之把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急就章」，與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並列為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和「解放思想的宣言書」，恐怕更多出自他個人情感的好意，而非歷史的真實。且看鄧小平自己怎麼說？

——粉碎「四人幫」後，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是取消憲法中關於「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一條。

——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的方針，第一條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二條是搞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

——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我在那個會上講了話。當時我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現在要講，而且要講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的对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鬥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說來，總是弱於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

——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

域，這些就是「左」。

這幾段話，前四段，是鄧小平的原話，雖然不準確、不完整，卻是他的心裡話。憲法中取消「四大」，是一九八〇年，當然算不得粉碎四人幫後「第一件事」，況且三中全會時鄧小平自己還公開講話肯定過大字報。那時大字報支持鄧小平，鄧小平在那種特定「氣候」下肯定大字報，如同他廢棄胡喬木的「思路」一樣。後來大字報貼出「警惕新的獨裁者」，矛頭對準自己，取消「四大」才成為鄧小平心中「第一件事」。

後兩段，是經過龔育之、鄭必堅整理，鄧小平審定的文字，較有「理論色彩」，可以說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也可以說是鄧小平帝國的理論基礎。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那一段，是繼承毛澤東帝國的。這本來也是三中全會時被鄧小平暫時收起的胡喬木「思路」（其實也是鄧小平自己的「思路」）。那個被廢棄的稿子裡，就有「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目的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但王、張、江、姚是走資派，河南省委的王維群、駐馬店地委的蘇華，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資派，我們一定要經常保持清醒頭腦，隨時採取必要的措施，務必要使階級敵人的一切活動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就加以消滅，不要等問題成了堆再

去處理」。

鄧小平後來不再使用毛澤東那根「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棍子，因為那根棍子打倒過他自己。鄧小平改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拿來打別人，理論上完全一致。

鄧小平與胡耀邦的根本分歧

關於反右防「左」那一段，是「鄧小平理論」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或者「發展」。政治思想領域反右、反和平演變，鄧小平與毛澤東是一致的。差別就在「經濟領域」，毛澤東在「一切領域」實行「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而鄧小平認為反和平演變反到「經濟領域」就是「左」。

所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在「經濟領域」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和平演變」。

這就是鄧小平的半毛澤東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半實用主義（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是鄧小平與胡耀邦的根本分歧所在。

胡耀邦的「思路」，從「真理標準」、「生產目的」、「人的解放」三大討論，到〈精神文明決議〉，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人類普世價值。當然，他也從馬克思經

典中找理論根據，馬克思並沒有否定人類普世價值。胡耀邦主張「全面改革」，經濟領域改革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人的自由與幸福。而鄧小平卻視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小平在廢黜胡耀邦後選擇趙紫陽，也是從鄧小平帝國的理論基礎出發的。趙紫陽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後來寫進十三大報告），符合鄧小平的警惕右（胡耀邦的「全面改革」、「普世價值」論）、防止「左」（鄧力群的「和平演變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論）。

趙紫陽說過，他與胡耀邦不同，如果他不反對戒嚴、不反對派軍隊鎮壓學生，他的總書記是可以做下去的。鄧、趙分歧主要在趙反對鎮壓學生運動，所以鄧一面恨趙、反趙，一面又不得不說趙的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許動」。

龔育之如果不從個人感情出發，而從歷史進程來研究「鄧小平理論」，他理應把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那篇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作為首篇才「準確」、「完整」。因為那才是鄧小平理論貫徹始終的「精髓」，不是那篇鄧小平講完即丟的三中急就章。

為了「完整、準確」地說明鄧小平帝國理論基礎奠定的歷史進程，還需要再提一下一九八〇年與一九八四年的兩段插曲。

關於「興無滅資」的插曲

一九八〇年四月，胡喬木和韋國清在黨內、軍內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喬木四月一日在中央宣傳部會議上提出：「現在的問題是要對自由主義的思想、方針發動進攻，宣傳部要當警察。」四月十八日，韋國清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重提「興無滅資」。

「興無滅資」（即「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的簡稱）是鄧小平一九五六年在同青年團幹部談話中提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後，成為「思想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主要口號之一。這是對鄧小平的「凡是」，韋國清拿來寫進了華國鋒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經鄧小平同意公開發表。

這件事引起了李維漢的注意。五月二十四日，李維漢到鄧小平家中拜訪，表示不贊成重提「興無滅資」，他認為思想戰線最重要的任務，不是批判資產階級思想，而是肅清封建主義影響。

李維漢這個看法，過去也有人提出過，包括葉劍英、胡耀邦和學術界的黎澍等。胡耀邦早在一九七七年分析「四人幫」的思想社會根源時，就指出其根源是封建法西斯主義和流氓無產者。李維漢此行的重要性，在於說動了鄧小平，使他同意收回「興無滅資」口號，並於五月三十一日發表了一篇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講話。

鄧小平說：

李維漢同志的意見很好，很值得重視。黨內生活，社會生活，都要肅清封建主義影響。各種制度，都要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角度去考慮，逐步加以改革。李維漢同志建議我在十二大講話專門講一下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問題。我看，這個意思首先要體現在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這就是一九八〇年春夏之際，鄧小平試圖跳出專政派思路，向民主派思路傾斜的最後一躍。八月十八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主旨就是「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角度」進行制度改革。鄧小平說：

黨和國家現行制度中的弊端，同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肅清封建主義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中央將向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要使我們的憲法能夠切實保障人民真正享有

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的權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等等。

這篇講話經政治局討論，在八月三十一日通過。接著舉行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選舉了「憲法改革委員會」，準備修憲，使之符合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要求。

鄧小平在陳雲集團進攻下退卻

鄧小平五月、八月的兩次講話，打亂了專政派「對自由主義思想、方針發動進攻」的部署。他們利用七月發生的波蘭團結工會事件進行抵制。胡喬木於九月二十四日寫了一封信給胡耀邦，提出「中國也可能爆發像波蘭那種局勢，必須像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發生波、匈事件時那樣制定對策」。胡耀邦未予回應。胡喬木就通知中央書記處，把他的信印發給黨、政部門和群眾團體。

中央宣傳部討論胡喬木的信時，傳達了陳雲的意見：「一個宣傳方面，一個經濟方面，這兩方面不注意，中國也會發生波蘭那樣的事件。」會後，中宣部發出通知：「小平同志講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傳。」

然後，在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在陳雲集團進攻下全線退卻，不但在政治領域放棄「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角度」進行黨和國家制度改革，而且在經濟領域也接受了「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的陳雲路線。鄧小平還在講話中首次明確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就是退回他一度自我否定的「興無滅資」綱領。

第二段插曲在經濟倒胡、政治打周之後的一九八四年。鄧小平後悔一九八〇年中央工作會議對陳雲「讓步太多」，於是讓胡耀邦起草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鄧小平玩弄左右平衡的手段，比毛澤東厲害：他決定對陳雲讓步時，要鄧力群替他起草那個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退卻的講話。他想挽救經濟，收回對陳雲的讓步時，又要胡耀邦起草〈經濟體制改革決定〉；而之前胡耀邦已被排除出經濟工作的中央決策核心。

胡耀邦是在陳雲集團的極大壓力下，獨力完成這個〈決定〉的。不是都說胡耀邦「不懂經濟」嗎？這回鄧小平卻稱讚胡耀邦起草的這個決定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大發明、一大創造」。這也是鄧小平最後一次利用胡耀邦的智慧來挽救經濟，實現其收回對陳雲讓步之需要。這兩段插曲表明：

第一，在政治思想領域，鄧小平認同李維漢，放棄自己的「興無滅資」，正如十一屆三中全會那篇「急就章」一樣，是一時的。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興無滅

資，反自由化，是鄧小平帝國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

第二，在經濟領域，鄧小平認同「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的陳雲路線，也是一時的。而堅持對外開放，引進國外資本、資源、資訊、科學技術、管理人才，建構和平發展的新國際聯盟，是鄧小平的全球戰略，也是鄧小平帝國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

把這「兩手硬」合起來，就是利用資本主義，鞏固和發展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中國特色新奴役制度，這才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

第十章

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帝國

毛澤東去世兩年之後，毛一生的兩件大事之一——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毛澤東時代的冤假錯案被平反，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被批判，除了他的遺體還靜靜地躺在天安門前的「毛主席紀念堂」裡，他所建立的那個毛澤東帝國，無聲地消失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他的主題演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用對他自己的「凡是」，取代對毛澤東的「凡是」，跨出了締造鄧小平帝國的第一步。

難道不是嗎？胡耀邦、趙紫陽兩屆總書記被整肅，罪名都是不聽鄧小平的話，違背鄧小平教導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小平接受毛澤東的歷史教訓，在生前對鄧小平帝國未來的鞏固和發展，作了周密部署。

鄧小平的「三代核心」論

第一，兩代接班人的指定。

一九八〇年，鄧小平一度同意李維漢建議，在政治局會議提出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角度進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時，接受義大利記者法拉奇專訪，批評毛澤東「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他說的是真心話，後來是忘記或者變卦了，還是原來就言不由衷，且不去追究，只要看鄧小平自己的做法，就知道他比毛澤東更封建專制主義。

毛澤東拋棄劉少奇、林彪兩個接班人之後，並未明確他打算「交班」給誰？一度選擇過鄧小平，因鄧小平不願繼承「文化大革命」這筆「遺產」而發動「批鄧」。直到最後，也未明確「交班」給華國鋒，還說出「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那樣對未來毫無把握的話。

鄧小平比毛澤東深謀遠慮，他選擇在「血雨腥風」中確立自己的接班人江澤民時，說得十分明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個集體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問題。雖然兩個接班人都沒有站住，但在當時，按鬥爭的經

驗、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來說，也只能作出那樣的選擇。

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一點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同意的江澤民同志。開宗明義，就是新的常委會從開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樹立和維護這個集體和這個集體中的核心。這是最關鍵的問題，是我的政治交代。

這就是鄧小平獨創的「核心」理論。為什麼胡耀邦、趙紫陽「都沒有站住」？因為「第二代實際上我（鄧小平）是核心」。即使胡、趙有「鬥爭經驗」、有「工作成就」、有「政治思想水平」，是全國黨代表大會選出的總書記，黨章上的第一把手，又有人民支持；只要「實際上的核心」不高興，鄧「核心」隨時可以弄個「生活會」、「八老碰頭會」，一句話廢掉。

後來喬石任人大委員長時，曾經主張「法治」，爆發過一場「法治」與「核治」之爭。江澤民的「核治」，就是以鄧小平的「核心」理論，打敗了喬石的「法治」，在中共十五大逼退喬石。

江澤民當上「第三代核心」之時，民間流傳一則小故事「毛澤東的一顆核桃」。故事說：

毛澤東臨終前，把政治局委員召來，一一握手告別。葉劍英告別後走到門口，毛示意讓葉回來，握住他的手長時間不放，嘴唇微動，似乎在說些什麼。等到葉點頭表示領會，毛才鬆手讓葉離去。

原來毛暗暗把一顆核桃放到葉的手裡。葉劍英後來說，毛曾同他論及漢朝故事，稱周勃「厚重少文」，「能安劉氏者，勃也」。意思是知識份子靠不住，將來安定天下，還要借助葉這樣的重臣。臨終把這顆核桃交到葉手裡，是託付後事。

毛死後，葉劍英幫助華國鋒除掉了「四人幫」，準備把核桃交給華，鄧小平說：「慢，再看看。」接著，鄧小平與陳雲聯手廢掉華國鋒。十一屆六中全會選出胡耀邦當黨主席兼總書記，葉劍英又準備把核桃交給胡耀邦。鄧小平還是說：「慢，再看看。」

直到葉去世，核桃未能交出。

天安門屠殺前，鄧小平在北京西山召見從上海趕來的江澤民。鄧告訴江，趙紫陽不聽話，反對戒嚴，已撤銷其總書記職務，由江接任。江大驚道：「我

不適任，在黨內我只有小學生水準。」鄧小平說：「稍安勿躁，我先給你看樣東西（拿出核桃），這顆核桃，是第一代核心毛澤東傳下來的，他臨終交給葉帥，託葉傳給第二代核心。葉帥想交給華國鋒、胡耀邦，我都擋住了。葉帥死後，到我手中，我算第二代。今天我交給你，你就是第三代核心。你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

江澤民接過核桃，轉憂為喜。

這是一九八九年的故事。三年後，鄧小平對未來還是不放心，怕江澤民到時候不交權，或交到不適當的人手裡，於是又指定當時四十九歲的胡錦濤為「第四代」，將來接江澤民的班。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第二，確立「永不改變」的鄧小平帝國「基本路線」和「戰略佈局」。

鄧小平廢黜胡耀邦，心中最大隱憂是怕胡耀邦「樹立自己的開明形象」，將來會改變他的路線與戰略。

因此，他選擇趙紫陽取代胡耀邦之後關注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黨的十三大上制

定未來的「基本路線」和「長遠戰略」。

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鄧小平把趙紫陽、楊尚昆、萬里、薄一波找到家裡，談十三大報告。鄧小平說：「十三大報告應該是一篇好的著作，要在理論上講清楚我們的改革是不是社會主義；要申明四個堅持的必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必要，改革開放的必要。在理論上講得更加明白。」

三月三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國務卿舒茲（George P. Shultz）時說：「四個現代化，我們要搞五十年至七十年。在整個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我們堅定不移的原則，是要有穩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證有秩序地進行四個現代化。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遵循鄧小平的思路，趙紫陽提出了一份〈關於草擬十三大報告大綱的設想〉，於三月二十一日報給鄧小平。

趙紫陽的設想，是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立論根據，把黨的基本路線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一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二是「堅持改革開放」。

鄧小平三月二十五日批示：「這個設計好。」

趙紫陽在十三大的報告，就是按照這個設計完成的。即使在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廢黜了趙紫陽之後，仍然堅持「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對此，鄧小平曾再三強調：

——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十三大確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戰略佈局。我們十年前就是這樣提出的，十三大用這個語言把它概括起來。這個戰略佈局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永遠不改變。（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政治交代——《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第三，審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作為對未來的「政治交代」。

毛澤東傳世的，只有一部四卷本《毛澤東選集》，收集的是他在一九四九年建國前的著作。毛去世後，華國鋒一度宣佈將出版《毛澤東全集》，但只出過一本《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很快就停止發行，再無下文。當時對《毛選》出版有一場

爭論：康生、李鑫主張以原著本來面目出版，胡喬木、鄧力群主張按現實需要對原文作修正。後來胡喬木按照鄧小平「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體系」的指示，創造出一個辦法：凡毛澤東原著中不符合「完整、準確」標準的，就從「毛澤東思想體系」中剔出來；凡中央領導集體（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思想中符合「完整、準確」標準的，可放進「毛澤東思想體系」。因為「毛澤東思想體系」，是胡喬木所謂「集體智慧的結晶」。至於從「毛澤東思想體系」剔出來的毛澤東著作，則叫作「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以區別「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體系」。那麼，由誰來決定「完整、準確」的標準呢？當然是胡喬木、鄧力群，或者鄧小平自己了。

胡喬木的這個偉大發明，經鄧小平肯定，作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論斷「毛澤東思想體系」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的準繩。但〈決議〉好寫，以此標準來編毛的遺著，卻直到胡喬木去世也未編出。中央文獻出版社「內部發行」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十三卷，收入的是些殘章斷簡，唯獨不見毛澤東在關鍵時刻的關鍵言論。

鑑於毛澤東的教訓，鄧小平晚年甚為關注自己的「理論遺產」。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後，鄧小平已很少過問日常政務，把注意力集中於出版自己的論著，特別是編輯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八日，鄧小平辦公室通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同意編輯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鄧小平親自點名鄭必堅、龔育之、逢先知三人為主編。

一九九三年五月四日，編輯組報送《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一批文稿。鄧小平開始逐篇審閱，並向編輯組下達指示：「內容不少，可以編一本好書出來，但要加工，仔細推敲。現在有些東西沒有理清楚，看起來費勁，文字上要下工夫。不成熟的東西，連貫得不好的東西，解釋得不清楚的東西，寧可不要。」

七月七日，鄧小平審閱文稿時再度下指示：「這本書有針對性，教育人民，現在正用得著。不管對現在還是未來，我講的東西都不是從小角度講的，而是從大局講的。希望編輯人員要加加班，速度快點，爭取早點出。」

八月十七日，審閱完一批文稿時又說：「這是一本比較好的書，沒有空話，要快出。」

八月二十四日，審閱文稿時指示：「文選印成清樣後，發一、二十位同志看，請他們提意見。實際上，這是個政治交代的東西。」

九月三日，審閱完最後一批文稿後說：「大功告成！」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選編的是鄧小平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九二年二月的言論，也就是鄧小平一生活動中關鍵十年（七十八歲到八十八歲）的代表作。一九九二年以後，鄧小平又生活了五年，但他已無言，表示他「不管對現在還是對未來」

的話，都已經在這本第三卷中講完，這本第三卷已經完成了他的「政治交代」。

只要把第三卷和第二卷作點比較，就可以明白為什麼鄧小平獨鍾第三卷了。現在以第二卷中四篇主要講話為例，略作說明：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急就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三、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

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這四篇文章的兩種思路，幾乎可以視為出自兩個鄧小平。第一篇和第三篇是接近民主改革派的思路，第二篇和第四篇幾乎是「全面專政」派的思路。可見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〇年這兩年，鄧小平還沒有完全把握住自己的思維方向，容易受到外界（包括人和事）的影響。

第一篇我們已經知道，是受當時中央工作會議以胡耀邦為代表的民主改革派，以及會外民主牆上社會輿論的影響，使鄧小平一時傾向於自由民主價值，拋棄胡喬

木為他起草的稿子，另擬出這篇「思想解放」的急就章。但僅僅三個多月，經歷訪問美國和對越南的那場打得很不漂亮的仗，再加上民主牆出現矛頭指向自己的大字報，鄧小平回到了他原來拋棄的思路，請胡喬木替他起草了那篇殺氣騰騰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說：

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建設。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沒有鐵一般的和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沒有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列寧所說的這個真理，現在仍然有效。這不是危言聾聽，而是大量實踐所證明了的客觀真理。

請看，把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擴展到「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難道不是回到毛澤東「文革」時代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論了嗎？

第三篇我們也知道，是當時接受李維漢建議，放棄「興無滅資」，提出從肅清

封建主義影響角度改革政治制度。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之後，反對派陳雲、胡喬木利用波蘭事件抵制，並在三個多月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政治上反自由化、經濟上「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的調整方針。鄧小平讓鄧力群為他起草了那第四篇在政治、經濟兩條戰線全面退卻的講話，十幾年後鄧力群還得意洋洋地表功：「這個講話，是鄧小平、陳雲合作最明顯、最確定的一個標誌，鄧小平對陳雲提出の方針給予全力支持。」但鄧小平不久就後悔，表示「那次會議讓步太多了」。此後，鄧小平只在反自由化，廢黜胡耀邦、趙紫陽時，與陳雲有「明顯確定」的合作。至於經濟領域，鄧不再讓步了。

經過鄧小平親自逐篇審定的第三卷，已沒有第二卷中這類前後不一致，甚至衝突的問題了。鄧小平所說「從大局講的」，「對未來是個政治交代的東西」，可大致概括如下：

-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兩手硬」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
- 「搞資產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自由化問題上不能讓」。
-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用專政手段鞏固政權」。
- 「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
- 「防止和平演變」。「西方國家在打一場無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要社

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三代核心」論。

——「警惕右，主要防止『左』」。「自由化，動亂是右，認為和平演變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是『左』」。

這八條，可以說是鄧小平帝國的綱領。鄧小平曾經在會見尼克森等外國人時反覆強調：「不管我在不在，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絕對不會改變，我相信我的同事們會這樣做。」

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帝國

鄧小平去世已十二年，的確如他所言，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鄧小平的路線、政策、方針都沒有變。今天的中國，依然是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帝國。

在八條中，鄧小平前後變化最大的，是政治改革這一條，今天在中國爭議最大的，也是這一條，因此有必要作點補充。

第二卷中，鄧小平提出的政治改革目的是：「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

民主更更切實的民主。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

鄧小平還提出：「需要認真調查研究，比較各國的經驗、集思廣益，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去解決現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問題。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鄧小平在第三卷中大談政治改革時，這些思想不見了，他完全改變了自己過去對政治改革的看法。鄧小平說：

——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而調動人民積極性的最中心環節，還是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的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

——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過去我們那種領導體制

也有一些好處，決定問題快。如果過分強調搞互相制約的體制，可能也有問題。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這種辦法我們不能用。

這種鄧小平式的「政治改革」，其內容只限於「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精簡機構」等行政改革的範圍；而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下的社會主義民主」，實際是從根本上取消民主。

鄧小平這一變化絕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

國共十年內戰時期，鄧小平是毛派（「鄧、毛、謝、古」，指鄧小平、毛澤覃、謝維駿、古柏），在共產國際路線統治時期算右派。一九五六年，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在八大當選總書記、政治局常委。毛、劉、周、朱、陳、鄧，他雖排在最後，但深得毛澤東倚重。國內、國際大事，毛均委以重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鄧小平在第一線主持。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毛澤東宣佈自己是「主帥」，鄧小平是「副帥」。（那時黨內有議論：「置劉、周於何地」？）中、蘇論戰，毛指定鄧小平掛帥同赫魯雪夫辯論，並由鄧小平主持撰寫九篇反修文章（〈一評〉至〈九評蘇共公開信〉）。

那時鄧小平是左派，反右派時他比毛澤東更左，「興無滅資」也是鄧小平率先

提出。一九六二年鄧小平雖講過「黃貓、黑貓」，主張包產到戶合法化，但當天（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晚上聽了毛澤東的意見後，立即自行修正。

鄧小平與毛澤東的主要分歧在「文革」。毛澤東視「文革」為一生兩件大事之一，是他的重要「遺產」。鄧小平主張「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對「文革」還有其獨特看法，認為「文革」就是「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第三卷中，凡談到反自由化、反「西方民主」時，鄧小平必會拿出「文革」相提並論。他從「全盤否定文革」導致全盤否定民主。

看得準，動作快，下手狠

現在有人惋惜「鄧胡趙三駕馬車」、「十年改革黃金時期」的消逝，認為鄧小平聽信左派謠報軍情，把學生的民主要求誤判為「動亂」，造成六四屠殺的悲劇。

這顯然是低估了鄧小平。讀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就明白，鄧小平廢黜胡、趙和鎮壓學運，是他對付國際民主浪潮「大氣候」（他叫「和平演變」）和國內民主浪潮「小氣候」（他叫「自由化」、「動亂」）的大戰略；事後不但毫無悔意或檢討，而且一再重申他的「判斷是準確的」，「平息暴亂」「實在是好事情」，「一個很大的勝利」；「你鬧資產階級自由化，用資產階級人權、民主那一套搞動亂，我就堅決

制止」。

「鄧胡趙三駕馬車」，不過是鄧小平利用胡、趙，制衡陳雲集團的權宜之計。實際上也不是「三駕」，是鄧、陳、胡、趙共治。

對胡耀邦，鄧小平已經同胡啟立打過招呼，指稱「胡耀邦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表現軟弱，作為黨的總書記是根本性的缺點」；也就是對胡耀邦政治上失去信任之後，仍需要胡耀邦起草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因為那時只有被認為「不懂經濟」的胡耀邦的新經濟思維，才能制衡被認為「最懂經濟」的陳雲的舊經濟思維。

對趙紫陽也是一樣，胡耀邦下台前，鄧小平已經同鄧力群議論過「趙紫陽熱中於移植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但胡耀邦下台後，鄧小平還需要趙紫陽來制衡陳雲、姚依林、鄧力群們把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變反進經濟領域。這就叫作「天坍下來有胡、趙頂著」。

六四槍響，大局既定，天坍不下來了。胡、趙的利用價值已經用完，鄧小平就把「天下」交給「第三代核心」江澤民了。

你想，假如鄧小平真心幫助、支持胡、趙，怎麼還要用胡喬木、鄧力群去監察，聽他們對胡、趙的「小報告」？何況他明知胡喬木、鄧力群在把他往「左」邊拉。

鄧小平對江澤民則完全不同。江澤民執政頭三年（一九八九－一九九一），放棄改革，同鄧力群一起搞「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受到許多人，包括楊尚昆、楊白冰兄弟的抵制。一九九二年鄧小平舉家南巡，楊尚昆「保駕護航」，結果鄧小平反而撤「楊家將」的職，幫江澤民掃除獨掌軍權的障礙，還委婉地提醒江「同鄧力群保持距離」。

奇怪嗎？從個人能力和領袖素質來說，江澤民根本無法同胡耀邦或趙紫陽相比。怎麼鄧小平從來沒有思考過讓胡、趙兩人中任何一人當「第三代核心」，而只讓他們當「實際上第二代核心」的工具呢？

原因很簡單，鄧小平只是在開創改革大業時，才需要胡耀邦、趙紫陽這樣有新思維的開創型人才。等到天下大定，鄧小平擔心的正是開創型新領袖的新思維，會改變他鄧小平帝國的舊路線，特別是他「絕不能讓」的政治思想領域。它需要的正是另一個「華國鋒」，遵循他鄧小平的「凡是」永遠不變。但鑑於毛澤東的歷史教訓，他必須替這另一個「華國鋒」除掉周圍可能存在的另一個「鄧小平」，而那就是鄧小平為何必須同他最密切的戰友楊尚昆分手的原因。

「看得準，動作快，下手狠」，這是鄧小平勝過毛澤東的地方，也是鄧小平帝國得以延續至今的秘密。

從江澤民到胡錦濤

江澤民被鄧小平封為「第三代核心」的頭三年，面對的政治局常委班子，是血雨腥風中拼湊起來的妥協產物。

左派、中間派，加上兩個半太上皇

十三大選出的五個常委，去掉了趙紫陽、胡啟立。

剩下三個：李鵬、喬石、姚依林。

補進三個：江澤民、宋平、李瑞環。

江澤民，是陳雲、李先念提出，鄧小平支持，確立為「第三代核心」。

宋平，是陳雲派的大將。長期以來，陳雲是中共內部史達林主義派別的主角，在黨史上的資格比毛澤東、鄧小平還老，因為他是工人出身，也更得共產國際的器

重，與王明、康生同為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他從史達林那裡學得了極權制度的兩種權力基礎：一是對經濟計劃的壟斷，一是對黨組織的壟斷。史達林就是靠這兩條，打敗了軍事統帥托洛斯基與理論天才布哈林。自延安整風王明失勢後，陳雲轉向毛澤東營壘，即致力於經營經濟、黨務這兩個部門。而宋平，是陳雲派中唯一兼具計劃經濟和黨務組織兩方面經驗的幹將，比光懂計劃經濟的姚依林更受陳雲器重。所以，鄧小平選擇宋平進政治局常委，陳雲喜出望外，認為是對他幫助鄧小平廢黜趙紫陽、平息暴亂、解決接班危機的回報。

李瑞環，也是鄧小平提議進常委的，陳雲本來不贊成，但因鄧小平讓宋平進了常委，陳雲只好妥協，讓李瑞環進常委。

這樣六個常委中，三個「左派」：李鵬、姚依林、宋平。他們政治上是專政派，經濟上是烏籠派。

另外三個算中間派：江澤民、喬石、李瑞環。在鄧小平眼裡，他們經濟上是「改革派」或「開放派」，政治上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守派」，符合他的「兩個基本點」。

這個政治局常委會上面，還有兩個半「太上皇」：鄧小平一個，陳雲一個。李先念算半個，因為他沒有自己獨立的堅持，只是在鄧小平、陳雲之間搖擺。

政治、思想文化全面向「左」轉

江澤民頭三年（一九八九／一九九一）採取的策略，是疏遠中間派喬石、李瑞環，靠攏「左」派。在經濟領域，他依靠姚依林、宋平，執行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搞「治理整頓」，打擊地方、鄉鎮經濟。江澤民自己也揚言，「要把個體戶打得傾家蕩產」。在思想文化領域，架空李瑞環，依靠鄧力群、胡喬木的「左」派隊伍。江澤民不但重用鄧力群網羅的文革「左」派，而且把早期反胡風、反胡適、反右派歷次運動中的老「左」派，如林默涵、許立群、魏巍等，都請出來組建「反自由化」思想文化戰線。

中國天安門屠殺後那場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全面向「左」轉的危機，在一九九一年蘇聯共產黨八月政變前後達到高峰。江澤民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七十週年大會上，發表了引人矚目的、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演說。接著在中央黨校舉辦高級幹部「反和平演變」學習班。鄧力群們的「反和平演變」宣傳，迅速擴展到經濟領域，「特區租界論」、「鳥籠經濟論」、「姓資姓社辯」等爭論，統統搬了出來。這股洶湧的「反和平演變」浪潮，導致連續兩年的經濟大滑坡。一九八九年GDP增長率從上年度的百分之十一點三降至百分之四點八，一九九〇年再降至百分之三點八。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二日，鄧力群在北京發表〈學習毛澤東，做堅定革命者〉，文中寫道：

老一輩革命家王震說得好，戰場上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對方也困難，甚至比我們還困難，只要我們堅持下去，就是勝利。

鄧力群還強調，陳雲提出重新學習毛澤東哲學著作，加強黨的建設。

鄧小平：誰不改革誰下台！

這時，在北京「韜光養晦」的鄧小平，坐不住了。一月十七日下午，他乘專車南下，開始那次著名的「一九九二南巡」。有人把鄧小平「一九九二南巡」與毛澤東的「一九七一南巡」遊說地方和軍隊注意林彪相提並論，以為他又要廢黜接班人了。

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消息傳到北京時，其中有一句：「誰不改革誰下台！」連喬石和田紀雲都會錯意。當時任中央黨校校長的喬石，請田紀雲到中央黨校作反「左」報告，有些話是針對江澤民在黨校辦那個高級幹部「反和平演變」學習班的。喬石

還質問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薛駒：「辦反和平演變學習班，為什麼我這個校長不知道？」喬石當然知道薛駒是奉命辦事，他明批薛駒，暗攻江澤民。

與鄧小平相交、共事六十年（一九三三—一九九二）的戰友楊尚昆，也未弄明白鄧小平的真意，趕忙緊跟著南下，為老戰友「保駕護航」，助長聲勢。美國《紐約時報》有位偏好揣摩中共高層內鬥秘辛的駐京記者Patrick Tylor，憑自己的臆測，寫了一篇專稿〈誰將拿到鄧小平的斗篷？〉斷言鄧小平將把最高權力交給楊尚昆，致使美國輿論界關注中國的目光再度轉向鄧小平：這個八十八歲的老人究竟又要幹什麼？

鄧小平在「南巡」最後一站上海，講了一段後來整理文稿時被刪去的話：

有人問我：難道今天還要全面批鄧小平路線？我說這個問題問得好。那個高狄（六四屠殺後派去的《人民日報》社長）想幹什麼？看來《人民日報》不在我們手裡。他們不發表改革開放文章，你們可以多發，廣東也可以講話。總之，現在不是四人幫當道的時代了，誰也別想封住我們的口。

鄧小平南巡——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鄧小平心目中的「沛公」，是「今天還要全面批鄧小平路線」、「不發表改革開放文章」、「想封我們的口」的陳雲集團，不是江澤民。鄧小平知道江澤民沒有這個膽量和能耐。

鄧小平對江澤民，與鄧小平對待胡耀邦、趙紫陽不一樣。

鄧小平需要利用胡耀邦、趙紫陽的才幹幫他開天闢地，但不放心胡、趙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怕他們「樹立自己的形象」，脫離他的「鄧小平路線」，所以雖然重用，名義上讓當「第一把手」，卻並不交出權力，還小心設防，讓鄧力群、胡喬木們去監察，讓陳雲去制約，最終與陳雲集團聯手罷黜，把他們的名字從歷史上抹掉。

對江澤民，鄧小平相信他不會主動背叛「鄧小平路線」，但擔心他頂不住壓力，被動追隨陳雲集團。

一是政治局常委有一半（李鵬、姚依林、宋平）是陳雲派，中間派的喬石、李瑞環，也不會跟江澤民合作。

二是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這幾年，「國際大氣候」是全球民主化高潮，整個蘇聯、東歐共產帝國被吞沒；中國邊緣的蒙古也自由化了。鄧小平自己也常講「和平

演變」是「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

鄧小平在這幾年，也未如外界所言「垂簾聽政」，而是「韜光養晦，冷靜觀察」。他觀察到陳雲集團控制了中央的施政方向，在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全面背離他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提出「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取代了他的「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力群、高狄掌握下的《人民日報》「不發表改革開放文章」。若不反擊，不但中共十三大確定的「翻兩番」戰略目標將落空，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制度能否在世界上生存下去，都成問題。

鄧小平選擇一九九二年春節前後作為反擊的時機，一是因為下半年要開中共十四大，他必須在十四大之前解決路線問題。鄧小平說過：「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這個我徵求了李先念、陳雲的意見，他們都贊成。」現在陳雲「動」了，講過贊成也不算數；那鄧小平就不客氣了。

二是各省、市，尤其沿海地區，對陳雲、姚依林、宋平們那套中央干預地方的「禁令」已忍無可忍。鄧小平選擇廣東、上海，依靠地方「砲打中央」，勝券在握。

鄧小平南巡，並沒有同政治局常委們通氣，所以南巡講話的消息斷斷續續傳到北京，大家都不明白鄧小平的意圖。有的話說得很重，如「誰不改革誰下台」！那個「誰」，是指哪一個？誰也猜不透。

最敏感的是楊尚昆。鄧小平於一月十九日抵達廣東深圳，兩天後，一月二十一

日，楊尚昆就趕到了。鄧小平帶著家人，楊尚昆也帶著家人。一月二十二日上午，鄧小平和楊尚昆兩家三代人，在深圳仙湖植物園相逢，有一段談話。

鄧小平：「我們在一起幾十年了囉。」

楊尚昆：「我們是一九三二年認識的，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二，六十年了！」

（這時，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身背三部照相機走來。）

楊紹明：「鄧伯伯，新年好。」

鄧榕（鄧小平之女）：「他是全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呀！」

鄧小平：「你們楊家有兩個主席了！」

（兩家人還在植物園各種下一棵常青樹——高山榕。）

當天下午，鄧小平和楊尚昆，在深圳市迎賓館一起接見了深圳市領導人。由於那時楊尚昆還掌握著軍權，所以那回緊跟鄧小平南下，稱作「保駕護航」。楊尚昆大概不會想到，就在這下半年，中共十四大召開，他同鄧小平兩家的友情即告終結，不再「常青」。

江澤民鞏固第三代核心地位

江澤民當時也猜不透鄧小平南巡真意何在？心情頗為不安，同曾慶紅商量之後，決定找鄧小平的牌友丁關根和鄧小平的兒子鄧質方「通氣」，表白自己對鄧小平的忠誠，也訴說中央工作的難處。

鄧小平表示理解，帶給江澤民的話是：「注意同鄧力群保持距離。」那意思很明白——南巡中那句畫龍點睛的話：「警惕右，主要防止『左』。」「左」指的是鄧力群們。鄧小平囑咐江澤民同「左」派保持距離，意味著他砲打的是「左」派，不是江「核心」。

二月二十一日，鄧小平結束「南巡」回到北京。二月二十八日，江澤民將鄧小平「南巡」講話要點作為一九九二年中央二號文件下發，要求「盡快逐級傳達到全體黨員幹部」，而江澤民自己則重返中央黨校，宣講鄧小平南巡講話。

接著，江澤民提出「中共十四大報告要以鄧小平南巡講話作為貫穿全篇的主線」，「著重闡明為什麼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就是要一百年不動搖」！

江澤民說：

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有這麼幾種提法：（一）建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二）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個人的看法，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

鄧小平對江澤民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寫進十四大報告稿表示讚賞，說「報告有份量」。

中共十四大，是鄧小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路線擊退陳雲「鳥籠經濟」路線的一次大會，也是江澤民鞏固「第三代核心」地位的一次大會。鄧小平為十四大挑選的政治局常委會，有幾個特點：

第一，原來三個陳雲派常委，姚依林、宋平出局。剩下一個李鵬，名義上仍是國務院總理，但已無法主導經濟政策。

第二，朱鎔基進入政治局常委，雖然職務上只是個副總理，但實際掌握經濟大權，號稱「經濟沙皇」。鄧小平在推薦朱鎔基時說：「我自己不懂經濟，但聽得懂；我現在推薦朱鎔基，他懂經濟。」鄧小平還批評了反對市場經濟的人是「沒有常識」。

的分水嶺。十四大後的「江、李、朱」體制，實際上是「江、朱體制」，李鵬的影響力已式微。

第三，七十六歲的老將軍劉華清進入政治局常委，並非如當時評論家所言增強了軍隊在中央決策的影響力，而是鄧小平為江澤民鞏固軍權。

鄧小平在「南巡」時楊尚昆的「保駕護航」中，察覺江澤民在軍隊中無威望；讓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掌控軍隊，對江澤民的軍事統帥權將構成威脅。所以他寧可同相交六十年的老戰友「割袍斷義」，也要在中共十四大削掉「楊家將」的兵權，以劉華清取代「楊家將」，因劉華清沒有個人政治野心，可以幫江澤民讓軍隊「從黨的絕對領導」。

鄧小平廢胡耀邦，廢趙紫陽，棄楊尚昆，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忌諱他們對外「樹立自己形象」。陸鏗的〈胡耀邦訪問記〉，張五常的〈陪同弗里特曼會晤趙紫陽〉，《紐約時報》的〈誰將拿到鄧小平的斗篷〉，這三篇海外評價胡、趙、楊的文章，刺激了鄧小平對三人的反感。

第四，四十九歲的胡錦濤進入政治局常委，比鄧小平自己進入常委時（一九五六年，五十二歲）還年輕，那是對「江澤民之後」繼續推行「鄧小平路線一百年不變」的長期佈局。

這三個新人，朱鎔基、劉華清、胡錦濤，是鄧小平精心挑選：兩個是過渡，一

文一武，幫「第三代核心」江澤民鞏固權力，朱鎔基幫江澤民統帥經濟，劉華清幫江澤民統帥軍隊；胡錦濤則是未來接江澤民班的隔代「儲君」。鄧小平下好這三步棋，自我感覺良好，他可以高枕無憂了。至於同江澤民、李鵬一起留下的老人喬石、李瑞環，在鄧小平看來，已是無足輕重的保留席了。

鄧小平在十四大作出的另一重要「改革」，就是取消設置了十年之久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也就是取消了「退休」老人的干政權。當時有人主張保留一個七、八個人的「顧問小組」，讓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薄一波、萬里、王震、宋任窮等七、八個人保留干政權，也被鄧小平否決。

在十四大結束後五個月召開的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鄧小平把楊尚昆的最後一個位置——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也給了江澤民。這就為他的「第三代核心」全面掌權掃清了道路。所以江澤民說，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是他「個人的歷史轉折點」。

反右防「左」大洗牌，風派、海派勝出

十四大以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左」派，如「左」王鄧力群手下的高狄、何東昌、王忍之、賀敬之等，紛紛離開他們的主管部門，讓江澤民安排自己的人馬。

這已是十年來反右防「左」的第三次大洗牌。

第一次是反胡耀邦的「自由化」。從中央黨校開始，到《人民日報》、中央宣傳部、各意識形態部門，清洗認同自由、民主、人道主義普世價值的改革派。第二次是六四屠殺後的大逮捕、大清黨，把胡耀邦下台後、趙紫陽時期留下的，以及新任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一網打盡。經過這兩次反右大清洗，體制內自由派知識份子已經絕跡；意識形態各部門由「左」王鄧力群全面掌控，思想文化陣地全部落入「左」派之手。

十四大後的第三次洗牌，江澤民洗掉了「左」王鄧力群手下的一批人，如被鄧小平點名的高狄，以示「同鄧力群保持距離」。江澤民啟用的，一部分是原來鄧力群「左」派營壘中「見風轉舵」的「風派」，一部分是上海調來的「海派」。前者如鄭必堅、滕文生，後者如周吉、王滬寧。「風派」和「海派」，都是意識形態「左」派，但表現形式略有不同。「風派」是老「左」派，原來言必稱馬、列、毛，十四大後，在馬、列、毛後加上鄧、江，變成言必稱馬、列、毛、鄧、江，政治上就「絕對正確」了。「海派」是新「左」派，就是多了一點「西方理論色彩」和「西方商業色彩」；如王滬寧到美國轉了一圈，回來就寫出一本《美國人反對美國》，這在美國沒有什麼新奇，但在中國一出版，就奇貨可居了。江澤民喜用這兩派人毫不奇怪，因為他自己就是政治上「風派」兼「海派」的雙料人物。

鄧小平帝國政治與組織路線的確立

從十三大到十四大（一九八七／一九九二），是鄧小平帝國最終確立其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五年，可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除右防「左」

第一階段，從十三大到十三屆四中全會，鄧小平的重點是除右防「左」。一手利用陳雲集團在胡耀邦辭職後發動的反自由化攻勢，清除了思想文化部門的民主改革派。另一手利用趙紫陽，頂住陳雲集團把「反自由化」擴展到經濟領域，在十三大確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鄧小平路線」。

在十三大的政治局常委班子裡，鄧小平仍在玩弄他的政治平衡術。但由於支持胡耀邦的民主改革派被清除，這「平衡」就只能是向「左」傾斜的假平衡。五個常委除趙紫陽外，兩個極「左」：李鵬、姚依林；兩個中間偏右：胡啟立、喬石。

趙紫陽看到了這一點，所以面對「左」派的「反自由化」強大攻勢，他有意在政策上和處理上作出嚴格限制。如把「反自由化」限於思想文化領域，不得擴大到經濟領域；又提出「思想文化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有點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點過頭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教條

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自由化份子，都屬於認識上的片面性，都是要教育團結的人」。在討論「左」派提出的處理「自由化份子」名單時，趙紫陽採取了保護和拖延戰略，使一批被鄧力群列入清洗名單的人得以倖免。

趙紫陽的這些措施，得罪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王震、鄧力群、胡喬木等本想趁胡耀邦下台之機，擴大「左」派權勢的黨國大老。他們很快就把原來指向胡耀邦的矛頭，轉向了趙紫陽，攻擊「趙紫陽比胡耀邦更胡耀邦」！

「左」派在胡耀邦下台時未能實現的權力擴張，在鄧小平「六四」屠殺、廢黜趙紫陽之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再度獲得實現的機會。經過「六四」屠殺後的大逮捕、大追查、大清洗，鄧小平心目中的「自由化」份子已被追殺殆盡，連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鮑彤，都一遭軟禁，一囚獄中，鄧小平的「警惕右」，已可高枕無憂，堪憂的是「防止『左』」了。「左」王鄧力群雖未能晉身總書記之位，但他的「左」派大軍，已控制全國思想文化戰線；總書記又是陳雲、李先念聯手提名、獲鄧小平支持的江澤民，而政治局常委中，「左」派也占優勢（李鵬、姚依林、宋平），不怕江澤民不跟著向「左」走。

這局面是鄧小平一手造成的，可見其「除右務盡」的決心之大；這同他至死堅持「反右派鬥爭」之「必要」一脈相承，足以反證毛澤東視鄧小平為「走資派」之判斷錯誤。歷史已經證明，鄧小平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實踐的堅持

者，他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罪名，打倒胡耀邦、趙紫陽，企圖把這兩位改革元勳從中國歷史上除名，其手段與毛澤東在「文革」中把開國元勳打成「走資派」，從中國歷史上除名如出一轍。

第二階段：讓「左」派不戰而降

第二階段，從第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四大。鄧小平在「韜光養晦，冷靜觀察」中，終於發現，在中國這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中，「除右務盡」易，「防『左』再起」難。除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元勳易，除「左」王、「左」老「全面批鄧小平路線」難。但再難，也難不倒鄧小平。

過去鄧小平的注意力，主要在「警惕右」，警惕胡耀邦、趙紫陽，因為胡、趙堅持改革、開放是毋容置疑的；「天坍下來由胡趙頂著」，這是鄧小平自己講的，講給反改革開放的陳雲聽的。但對胡、趙會不會離開他的「四項基本原則」、「樹立自己的開明形象」，鄧是多疑的。趙紫陽說「六四前鄧一直支持我」，恐怕未必。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十三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對趙紫陽的信任開始動搖，起因也同對胡耀邦一樣，疑忌趙紫陽「樹立自己的開明形象」。幾件小事——趙紫陽會見美國自由派經濟學家弗里特曼受到讚揚，手下智囊提出「新權威主義」主張，紀念戊戌百週年有人鼓吹「乾綱獨斷」，以及向李光耀推薦《河殤》等，都觸動鄧小平

那根敏感神經。趙紫陽雖然沒有感覺到，但他身邊的「左」派李鵬、姚依林們已經感覺到了。所以早在胡耀邦去世、學運開始之前，常委會中對趙紫陽的反叛已經出現。鄧小平要利用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去趙，如同他利用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去胡一樣，是他對付「國際大氣候」（全球民主浪潮）和「國內小氣候」（中國民主運動）的大戰略，是必然的選擇。

事後再來看鄧小平在這五年的動作，就可以明白，為了鞏固他的「鄧小平帝國」，鄧小平的確比毛澤東高明。他「除右務盡」的大動作，是學毛澤東的，把自由民主力量從黨外（民主牆、民主運動）到黨內（胡、趙民主改革力量）一網打盡。鄧與毛不同的是，毛只有反右一手，沒有反「左」，連反林彪也不反「左」，只反右，所以反不下去。鄧小平卻準備了兩手，一九九二年要開中共十四大，鄧小平的反「左」一手已「蓄勢待發」了。

鄧小平深知在北京，中央、經濟大權控制在烏籠派手中，完全沒有反「左」空間，要掃除北京「左」派，只有舉家南巡，靠地方砲打中央。而地方，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多年來受中央烏籠派無理打壓，正在伺機而動。經鄧小平南來一引爆，果然威震全國。

當時人們看不懂鄧小平南巡意圖；他把分歧提升到「全面批鄧小平路線」的高

度，加上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渲染軍隊為鄧小平「保駕護航」，容易使人聯想一場全國全面的路線鬥爭又將開始。

其實鄧小平的目標：一是打擊「左」派。鄧小平清除了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自由派改革力量之後，自然突出了經濟領域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和鄧小平開放路線的衝突，使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在中央占了上風。鄧小平要繼續他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路線，必須及時把經濟「左」派清除出權力核心。十四大正是這樣的時機，所以鄧小平必須在十四大前出擊。

二是警告江澤民，必須同「左」派和陳雲路線劃清界限。

鄧小平這兩個目標，在十四大都達到了。「左」派不戰而降，陳雲人馬退出中央權力核心，陳雲本人從此不再干預中央工作。江澤民衷心感激鄧小平對自己的支持，尤其是除掉「楊家將」勢力，為江澤民掌握軍權清除了障礙。

十四大後，汪道涵曾問江澤民：「今後有何打算？」江答：「主要是掌握好軍隊和思想領域，一手槍桿子，一手筆桿子。」

當時頗遭人譏諷，以為江澤民還是毛澤東的老一套，缺乏「新思維」。

江澤民自有他的道理。在經濟領域，鄧小平既然信任朱鎔基，朱又是獨裁性格，就放手讓「朱沙皇」去管，出了差錯也由他負責，像毛澤東對待周恩來一般。江只要保留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的位置，略加控制即可。對江澤民來說，最重要

是控制軍隊和意識形態。毛澤東和鄧小平鞏固權力，都靠這兩手。鄧小平清除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右派和「左」派，又清除了軍隊中有影響力的楊家兄弟，就是為江掌握這兩桿子創造條件，江澤民當然心領神會。

十四大後，鄧小平的開放式專政路線，已徹底戰勝陳雲的鳥籠式專政路線。江澤民不再需要看兩個婆婆（鄧小平和陳雲）臉色行事，只要看鄧小平一人即可。鄧小平也看出江澤民已定下心追隨鄧小平路線「一百年不動搖」，不再說三道四了。

江澤民十四大後執政的十年（一九九二—二〇〇二），以鄧小平去世（一九九七）為界，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鄧小平在世最後五年，江澤民避免樹立自己形象

(一) 鄧小平在世的五年（一九九二—一九九七），江澤民奉行鄧小平「南巡」講話規定的路線，避免「樹立自己的形象」，在軍隊、外交、兩岸、意識形態領域，逐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他自任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外交事務、台灣事務三個「領導小組」的組長，並讓鄧小平信任的橋牌搭檔丁關根當中央宣傳部長，協助他掌控思想文化部門。

抓槍桿子：從對內防禦轉向對外擴展

第一，抓槍桿子，建立忠於「第三代核心」的現代化黨軍。

江澤民鞏固軍權，著重抓兩條。一條是強調「黨指揮槍」、「軍隊服從黨的絕對領導」。江澤民說：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它以黨的宗旨為宗旨，以黨的目標為目標，就是用槍桿子鞏固政權。軍隊工作最根本的是保證黨的絕對領導，一定要在全軍樹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觀念，任何時候都要聽黨中央的話，保證槍桿子永遠掌握在忠於黨的可靠的人手裡。西方敵對勢力為實現其「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正在伺機對我軍進行滲透和破壞，他們鼓吹的「軍隊非黨化」和「軍隊非政治化」那一套，就是妄圖改變我軍的性質，使我軍脫離黨的領導。

江澤民採取的另一措施是強化和擴大武裝警察部隊，建立國防軍——武警部隊的「流水制」，即從國防軍轉為武警部隊。江澤民提出「把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建成維護社會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他說：

必須時刻警惕某些滲透進我國搞顛覆活動的外國勢力。必須把任何危及社會穩定的跡象消滅在萌芽狀態中。這是人民武裝警察的職責。

這是江澤民接受一九八九年學生民主運動教訓的一項新措施。那時學生「人民軍隊愛人民，人民軍隊人民愛」的口號，使軍人在執行鎮壓學生意命令時產生困惑。現在改為「武裝警察部隊鎮壓顛覆活動」的使命，執行「消滅危及社會穩定的跡象於萌芽狀態」的命令，就「師出有名」了。

江澤民抓槍桿子的另一條是強調「科技強軍」，準備打「高科技條件下的現代戰爭」。

毛澤東時代的軍事戰略是防禦戰略，所謂「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要準備打仗」，是防禦蘇聯進攻。

鄧小平時代國際形勢變化，中美建交後蘇聯威脅減弱。一九七九年中國入侵越南，蘇聯袖手旁觀。鄧小平從此放心裁減軍隊，緊縮軍事預算，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

江澤民在國無外敵威脅的和平環境中，每年軍費支出兩位數增長，遠遠超過經濟增長率，花費大量外匯向俄羅斯、烏克蘭購買先進軍事設備，引進現代軍事技術，加快發展大規模進攻性武器。江澤民主張「科技強軍」、「把解放軍建設為強

大的現代化正軌化革命軍隊」、「重視國防科技研究和國防工業，改善武器裝備，全面增強戰鬥力，適應打高科技現代化戰爭的需要」，江澤民說：

什麼叫現代戰爭？海灣戰爭（即波斯灣戰爭）可以說給我們上了一課。如果我們不掌握現代科技知識、軍事知識，怎麼能懂得高科技條件下的現代戰爭？

江澤民在軍事戰略上，從對內防禦轉向對外擴展。軍方提出的「外向型軍事戰略」、「第一個踏腳板是台灣，如果不把台灣拿過來，中國就永遠難以外向，永遠困守在中原大陸」。

抓筆桿子：逐步提出自己的「理論創新」

第二，抓筆桿子，從號召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開始，到逐步提出江澤民自己的「理論創新」。

一九九三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江澤民立即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決定〉，組織全國全黨學習。他親自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理論討論班」上作〈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的講話。

江澤民說：

新一卷《鄧小平文選》是這十年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豐富經驗的理論結晶，是引導我們繼續勝利前進的科學指南，博大精深，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燦爛光輝。

鄧小平同志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立足中國大地而又面向世界，高瞻遠矚地構思和設計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整套發展戰略，進行艱辛的鍥而不捨的理論探索，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代中國進入了新境界，達到了新高度。

江澤民推崇鄧小平理論的「新境界、新高度」論，可與當年林彪推崇毛澤東思想的「里程碑、頂峰」論「試比高」。

至於江澤民推出「自己的東西」，均未達到他預想中的效果。在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江澤民有兩篇「重要講話」：一篇是在全會召集人會議上講的〈領導幹部一定要講政治〉（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一篇是在全會閉幕時講的〈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據說江澤民講得津津有味，與會者卻聽得昏昏欲睡。江澤民在第一篇中說：

我們搞現代化建設，中心任務是發展經濟，但必須有政治保證，不講政治、不講政治紀律不行。這一點對高級幹部尤其重要。西方敵對勢力要「西化」、「分化」我們，要把他們那套「民主」、「自由」強加給我們，李登輝要搞「台獨」，我們不講政治行嗎？不警惕不鬥爭行嗎？

江澤民在這裡樹立了兩個敵人：一個是「西方敵對勢力」、「要把自由、民主強加給我們」；一個是「李登輝搞台獨」，使台灣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向民主國家轉型，自由的台灣人民不可能接受共產專制國家的吞併。

這兩個敵人其實只是一個，即「民主自由」。江澤民害怕民主自由，故意把中國人民內在的自由民主要求予以「外化」，化為西方和台灣的「敵對勢力」。誰要自由民主，就是與西方和台灣的敵對勢力站在一起，就該被消滅於萌芽狀態！

第二篇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十二大關係，則是模仿毛澤東一九五六年的一論十大關係。因內容空洞，了無新意，發表後反應冷淡。一年後，江澤民從上海帶來的「筆桿子」劉吉，動員一批人，專門寫了一本書《與總書記談心》。劉吉在〈序〉中說：

江澤民總書記〈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一文發表已快一年了。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的標誌性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十分深遠的歷史意義。隨著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必將進一步證明這一點。

結果如一箭之射大海，未能激起一絲浪花。這個劉吉也不再受江澤民青睞了。

親自主導對台政策，比鄧小平更為狡猾

第三，主導對台政策，提出「八項」主張。

十四大前，中共對台事務領導小組由楊尚昆主持。自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一年底，楊尚昆已有密使楊斯德，與李登輝的代表蘇志誠，多次在香港秘密會見，屬於雙方相互摸底性質。江澤民當時被鄧小平封為「第三代核心」，有心涉足對台事務，但又不好直接插手楊尚昆的領域，就另闢蹊徑，邀約參與起草《國家統一綱領》，在台灣頗有名望的「四大公子」之一沈君山（其他三人為連戰、陳履安、錢復；沈君山在四人中最有才氣），作了三次長談，在當時也是秘密的。沈君山每次都作詳細記錄，向李登輝報告。

一九九二年起，江澤民直接掌控密使，由汪道涵與蘇志誠會談，確定了一九九

三年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

在一九九二年密使會談中，汪道涵提出國共兩黨談判討論和平統一問題。這本來是鄧小平的一貫主張，蔣經國時代鄧小平就想同蔣談，被蔣拒絕。

蘇志誠認為行不通，因為台灣有政府存在，只能由政府領導人出面才能解決問題。蘇志誠說：目前不可能一步走到李登輝與江澤民見面，是否可由汪道涵與辜振甫見面作為開始。

汪道涵回應：「這是個好主意，但是談什麼呢？」

蘇志誠說：「不談政治問題，不談統一問題，可以廣泛交換意見，先建立政府授權的高層對話機制，雙方溝通觀念。」

然後討論地點，汪道涵表示香港不宜，易有外部干擾，實際是暗指南懷瑾，江澤民對楊尚昆通過南懷瑾安排密使會面並不認同。蘇志誠建議地點可以在新加坡，由李光耀去安排；李光耀是雙方共同朋友，蔣經國時期就曾來往兩邊。

這就是一九九三年新加坡辜汪會的由來。

辜汪會後，江澤民改派曾慶紅與蘇志誠見面，地點不在香港。一九九四年四月和十一月、一九九五年四月三次會面，都在珠海。雙方交換的主要訊息，包括曾慶紅告知蘇志誠，江澤民將有重要對台政策宣示（即「江八點」），期待李登輝正面回應。蘇志誠告知曾慶紅，李登輝將訪問中東與美國，希望江澤民理解。

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日，「江八點」發表。江澤民的對台政策，原則上繼承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和「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新內容」主要有兩點：一點是從鄧小平的一步到位談「和平統一」，改為分兩步走，第一步先進行「正式結束敵對狀態談判」，把「統一談判」放到第二步。另一點是從鄧小平的國共兩黨談判改為「政治談判的名義、地點、方式可協商，歡迎台灣當局領導人以適當身分訪問大陸，大陸方面也願意接受邀請到台灣訪問，藉以共商國是」，也就是可以接受政府對政府的談判。

這兩點變化，是江澤民通過密使來往的「心得」；事實上「江八點」也是汪道涵主導起草的。

李登輝通過密使往來，也摸清了江澤民的底細：江澤民的對台政策並不比鄧小平寬鬆，是更狡猾，「引君上鉤」，再吃掉你。這一點在沈君山同江澤民三次談話中已十分清楚。沈君山苦口婆心對江澤民提出種種建議，如「一而不統」、「一國兩治」、「對等政府，兩個治權」等等，被江澤民一概否定。江澤民對沈君山說：

你是想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這個結給繞過去，把主權問題繞過去，這個結是繞不過去的。我們反對兩個中央，還有邦聯、國協等等，中國自來不興這一套！只要我坐在這個位子上一天，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中央政

府。別的人坐上這個位子，也是一樣！任何外交空間與統一背道而馳的一定排除。要是搞分裂，那對不住，共產黨不會手軟的。

江澤民還給沈君山引了《左傳》中的〈子產論政寬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寃難。」

這就表明，從鄧小平到江澤民，以至將來「別的人」，對台灣的長遠戰略是不變的，和平方式與非和平方式兩手都在加緊準備，台灣必須制定相應的長遠戰略。李登輝的戰略是：

——政治民主化。通過憲政改革，實現公民直接選舉總統，完成主權在民的國家制度轉型。

——軍事現代化。終止動員戡亂，放棄「反攻大陸」，建立台灣自主防禦能力，保衛台灣人民的生存與自由。

——經濟國際化。實現台灣產業的現代化轉型，提升台灣經濟在全球的國家競爭力。

——外交務實化。加強與非邦交國的交往，擴展台灣的國際空間。

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台灣在政治與外交方面有兩大戰役，一是一九九五年李登輝打破中國封鎖，成功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二是一九九六年台灣人民以選票戰勝中國飛彈威脅，選出自己的國家總統。

江澤民在這兩大戰役中都失敗了。

確立中國特色的開放式奴役經濟新典範

第四，靠朱鎔基「拼經濟」，確立中國特色的開放式奴役經濟新典範。

朱鎔基遵循鄧小平「南巡講話」，大開國門，港、台和西方資金、技術源源流進中國，同「取之不竭」的廉價「農民工」結合，促進GDP年年兩位數字增長。一九九二年增長百分之十四點二，一九九三年增長百分之十三點五，一九九四年增長百分之十二點七。因發展過快，造成一九九四年通貨膨脹，朱鎔基實行「宏觀調控」，使一九九五年增長率降至百分之十點五，一九九六年再降至百分之九點六，稱為「經濟成功軟著陸」，然後又恢復兩位數字增長，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製造工廠」，中國特色的開放式奴役制度經濟模式，在西方自由資本灌溉下開始「崛起」。關於這一主題，將在下文〈民族主義新奴役制度帝國的崛起〉中詳加論述。

鄧小平去世後，江澤民開始走自己的路

(二) 鄧小平去世後的五年（一九九七—二〇〇二），江澤民開始走自己的路，主要是在理論和外交兩個領域，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走向國際，樹立「世界領袖」形象。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鄧小平去世，江澤民當時講了被形容為「擲地有聲」的三句話：

——「鄧小平理論是我們的主心骨。」

——「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我自歸然不動。」

那一年中共要開十五大，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江澤民說：「十五大報告的靈魂，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結束語要講準備迎接風險。」江澤民還回顧一九八九年的往事：「當我接任總書記時，我想一定還有比我能力更強、資歷更深的幹部……」此時曾任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的王瑞林打斷他：「總書記，您自謙了，

我們都知道這是小平同志作出的安排。」

另外，自二月十九日起，到二月二十五日追悼大會上，電台反覆播放鄧小平的一段錄音：「確定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我們全黨作出的正確選擇。」在二月二十五日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追悼大會上，江澤民宣讀五十分鐘的悼辭過程中，五次停下來以手帕拭淚。

一九九七年九月舉行中共十五大，江澤民作了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報告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兩次歷史性飛躍」突出了「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江澤民說：

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鄧小平理論。在當代中國，只有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

十五大還修改了黨章，把鄧小平理論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

新教條：三個代表

十五大以後，江澤民已不滿足於自己在這個帝國的最高權力地位，他打算在意

識形態領域提出自己的新教條，確立自己在這個帝國的最高理論權威。江澤民的新教條就是「三個代表」。

二〇〇〇年二月，江澤民到了廣東的一個小城高州，對六百名城鎮幹部講了一番話，首次提出他的「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說：「江主席關於『三個代表』的講話，就像鄧小平同志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一樣，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量。」

到了二〇〇〇年五月，江澤民再次宣講他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已經上綱到「這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了。

胡錦濤也在一次會議中指出，「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思想，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

一些國際評論家看不懂江澤民語意中的奧妙，以為這「三個代表」，將擴大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吸收資本家和文化人入黨，共產黨就「和平演變」了。「三個代表」在理論上是不通的。

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代表一個時代引領生產力前進的人類智慧和創造力的科學思想高峰，如牛頓代表的機械化時代，愛因斯坦代表的電子、資訊、數位化的時代。中國共產黨靠專制制度榨取不自由的廉價勞工積聚財富，豈能冒充先進生產

力？

誰是先進文化的代表？是開創每一個歷史時代人類思想文化的蘇格拉底、但丁、莎士比亞、孔子、莊子、李白、曹雪芹、魯迅。箝制思想、踐踏文化的中國共產黨豈能冒充先進文化？

誰是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只能是廣大人民自由意志選出的代表，中國共產黨豈能強姦人民意志自封代表？

江澤民創造出如此荒唐「理論」，自封「三個代表」，其目的就是鞏固一黨一己壟斷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專政。照當時一位御用理論家康曉光的闡釋：中國共產黨代表「先進生產力」，包括國內外兩個聯盟：國內是所謂「政治菁英」、「經濟菁英」、「知識菁英」的「三角聯盟」；國外是同全球跨國資本的聯盟。通過這兩個聯盟，剝奪中國廣大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的自由自主權利，榨取他們生產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換取本國權貴菁英與國際資本對中國專制奴役制度的支持。而所謂「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給大多數老百姓留口飯吃，繼續過日子」的「穩定」。康曉光寫道：

中國未來的首要任務是確立「三個代表」的霸權地位，並根據「三個代表」的精神從事制度建設。只要菁英們還讓絕大多數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奪瓜分之

餘還給他們留下一口飯吃，他們就會接受現實，忍氣吞聲繼續過日子。這意味著，大眾中絕大多數還是擁護穩定的。

康曉光的結論是：「專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適應能力，不僅可以適應農業經濟，也可以適應工業經濟；不僅可以適應計劃機制，也可以適應市場機制，甚至還可以適應全球化。」

從這位御用理論家的闡述中，可以看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雖然在理論上荒唐，在實踐上卻是有效的。它代表中國特色的反自由、反民主、反平等的發展觀，是適應市場經濟「全球化」需要的現代奴役制度新論述。

塑造自己的國際形象

江澤民在鄧小平去世後，除了致力於「發展」鄧小平理論之外，就是用心塑造自己的「國際形象」。

一九九七年十月，江澤民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為了推銷自己，他在臨行前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要求記者事先交上提問單子，為這場表演作了充分準備。

在回答西藏和台灣問題時，江澤民拿出他最拿手的林肯蓋茨堡演說，對記者說：「林肯是美國卓越的領導人，他解放了奴隸，中國除了西藏外早已廢除奴隸制

度，直到達賴離開西藏，我們才消滅了那裡的奴隸制，你們為什麼還要支持達賴？」

江澤民又說：「林肯領導美國內戰除了解放奴隸，目的是統一美國。為什麼你們有人卻支持台灣分裂、反對統一中國呢？」

這就是江澤民欺騙美國人的詭辯術。林肯演說的中心是自由民主，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江澤民迴避中國反自由反民主的奴役制度，對西藏宗教、文化的壓迫，和對台灣自由民主的威脅，隨意拿林肯消遣一番，就封了美國人的口。

當問到中國迫害人權的六四屠殺時，江澤民端出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可以運用到人權問題上，民主與人權是相對的概念，並不是絕對而普遍的。」

這不僅是對相對論的無知，而且是對愛因斯坦這位人權戰士的褻瀆。愛因斯坦對他的「相對論」說過這樣一句話：

現在談「相對論」一詞。我承認這是不幸的，它給哲學上的誤解以機會。

——致奇默（E. Zschimmer）的信，一九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當初愛因斯坦提出自己的理論時，並沒有使用「相對論」這個名詞。「相對論」

是普朗克為愛因斯坦的理論命名的，愛因斯坦不喜歡這個名稱，他寧可稱作「不變量理論」。從愛因斯坦致奇默信中流露的憂慮來看，他似乎預料到將會有江澤民這樣的人利用「相對論」這個名稱，來製造「哲學上的誤解」。另外，當年坎特伯里大主教戴維森（Randall Thomas Davidson）問到「相對論」對宗教有什麼影響時，愛因斯坦回答：「相對論純粹是科學問題，與宗教毫不相干。」

十月二十六日，江澤民抵達訪美的第一站夏威夷，在威基基海灘游泳一小時，游程一公里。中國領導人喜歡藉游泳顯示個人權力，毛澤東暢游長江，鄧小平游到內海，現在江澤民游進遠離中國的東太平洋，這是有象徵意義的。

二十八日晚間，柯林頓邀請江澤民到白宮進行「親密的、個人的、非官方的會談」（美國用語），柯林頓投其所好，向江澤民展示了林肯親筆繕寫的蓋茨堡演說，江澤民果然情不自禁地高聲朗讀起來。兩人一直談到深夜，柯林頓後來在他的回憶錄《我的人生》中寫道：

我對他（指江）的政治手腕、推動中國進入國際社會的渴望，以及在他及總理朱鎔基的領導下經濟的加速成長，都感到印象深刻，但我仍然關注中國持續壓制基本自由的問題。我們繼續討論中國可以接受在自由上有多少大改變，而不會導致中國內部的混亂。我們沒有化解歧見，但是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我

想，中國已接受現代社會潮流洗禮，變得更為開放；而在新世紀裡，美中兩國更有可能成為夥伴，而非敵人。

這正是江澤民的目標。他不僅需要美國對他個人權力地位的支持，而且需要美國對他從鄧小平手中接過來的龐大帝國的發展的支持，他需要美國成為他的帝國走向新世紀的戰略夥伴。為了實現其戰略目標，江澤民身上還帶著採購單，包括三十億美元的波音飛機，和六百億美元的核能發電設備的訂單。江澤民還跑到紐約華爾街去敲響證券交易所的開市鐘。共產黨向來宣稱他們「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鐘」，江澤民去敲響資本主義生命之鐘，的確是不同凡響，表明他不但不會「埋葬資本主義」，還歡迎美國資本主義去同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存共榮。華爾街的鐘聲感動了美國大商人，誰不想去嚐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甜頭？

柯林頓在一九九二年競選總統時再三聲明，提倡民主是他的「第一優先要務」；他批評布希的中國政策「軟弱」，他要認真對付「從巴格達到北京的暴君」。然而柯林頓一見江澤民，就忘記了歷史和現實，忘記了天安門屠殺和北京暴君。他只看到江澤民手中滴著中國人民血和淚的錢、錢、錢！這就是江澤民能夠成功地同柯林頓締結「中美兩國走向二十一世紀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物質基礎。

江澤民此行的最後一場餘興是哈佛演講。十一月一日上午江澤民抵達時，五千

餘人已在Cambridge街頭，表達對拒不認錯的天安門屠殺者的憤怒譴責。江澤民演講的主題是「從歷史文化認識中國」，告誡人們不要從西方文化視角看中國，要從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理解中國，也就是繼續發揮他那自由、民主、人權「相對論」哲學。演講結束後有十五分鐘提問，五個問題是事先挑選好的，由會議主持人傅高義（Ezra Vogel）宣讀。其中一個問題是：

——「江澤民要求西方國家不要搞對抗而是進行對話，但為什麼拒絕跟自己的人民對話？」

這個提問顯然是針對「六四」的，因為當時鄧小平拒絕了趙紫陽與學生對話的主張，下令軍事鎮壓。

江澤民故意裝糊塗，不予以正面回答。他說：「中國是個具有多樣性的國家，要治理這樣一個國家很難，但在中國有各種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我自己就到處聽取人民的意見，使政府得到人民的支持。」接著又說：「政府工作中也難免有缺失，會努力改善。」

天真的美國學者、媒體都會錯意，誤以為這是江澤民對「六四」屠殺認錯。主持人傅高義說：「江澤民親身體會了美國民主，承認天安門事件有錯誤，意義重大。過去沒有中國領導人這樣說過。」第二天美國各報均顯著報導這一消息。

隨行的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立即會見記者予以更正，指出「江主席沒有這個意

思」！

奇怪的是，幾年後出版的柯林頓回憶錄上仍然寫著：「江澤民在哈佛大學進行的演說中承認，中國對付天安門示威群眾的行動是錯誤的。雖然中國的步調常慢得令西方世界心急如焚，但中國並不是不可能改變的。」

獲柯林頓背書，卻輸給辜振甫和李登輝

第二年（一九九八年），柯林頓專程回訪中國九天（比江澤民訪美多一天），是江澤民的又一外交勝利。當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威廉·薩費爾（William Safire）寫過一篇評論〈八個是和三個不是〉（The Eight Yeses, The Three Noes），列舉江澤民白得八加三等於十一分，柯林頓零分。

1. 對天安門鎮壓說「是」：柯林頓出現在天安門軍禮上，幫助江澤民無須改正就抹掉對屠殺的記憶。

2. 對中國堅持柯林頓訪問行程必須專一說「是」：排除了順道訪問日本和韓國的計劃。

3. 對中國否決美國總統的陪同訪問團隊說「是」：三個自由亞洲電視台記者因中國反對，被排除出訪問團隊。

4. 對中國要求降低加入WTO標準說「是」：柯林頓在上海電台稱「中國經濟尚不發達」，迫使WTO調降入會標準。

5. 對中國迫害異議人士說「是」：柯林頓稱江澤民放逐魏京生、王丹是「自由的進步」。

6. 對江澤民需要美國對他個人權力的支持說「是」：柯林頓以極度讚揚的語言「絕頂聰明」(extraordinary intellect)、活力充沛(a lot of vigor)、想像力豐富(good imagination)，有遠見、有理想、能遇見未來(he has vision, can visualize, can image a future)等等，表達美國對這位共產帝國專制統治者的政治背書。

7. 對中國拖延加入「飛彈技術控制體系」說「是」：江澤民需要更多時間出售的飛彈技術，柯林頓表示首肯。

8. 對中國強調的「中美戰略夥伴關係」說「是」：從而壓抑了美國的亞洲盟國。

以上是「八個是」，而「三個不」則是指柯林頓在上海圖書館與八名各界人士座談時，說出「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我們不相信(don't believe) 口頭將是主權國家組織的成員」。

對江澤民來說，重點是這「三個不」，因為他三個月後就要會見台灣的談判代表辜振甫了。江澤民期待這次「辜汪會」和「辜江會」，能把政治談判提上議事日

程。屆時，國家主權爭議難以避免，因此在台灣問題上獲得柯林頓的背書，格外重要。不幸的是，江澤民贏了柯林頓，三個月後卻輸給了辜振甫和李登輝。

一九九八年十月的辜汪會和辜江會，辜振甫打出了兩張王牌，一張是突顯「主權對等」，一張是宣示「台灣民主」。突破了對方按「江八點」、「一個中國」設計的政治談判。這一戰略在台灣內部曾引發爭議，對海基會「打民主牌」的設計，台灣的外交部和陸委會均不表贊同，怕被對方認為挑釁。但李登輝主張，「台灣民主和主權對等，這兩個法寶缺一不可」，並決定讓台灣反對黨代表人物康寧祥擔任見證台灣民主的發言人。

結果，台灣的民主與對等戰略大為成功，唐樹備原來設計的「一中政治談判」徹底破功。辜汪會第一天晚上，唐樹備氣急敗壞，在記者會上大批台灣「違背一中原則」，但只是虛張聲勢。等到辜江會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的對話，辜振甫照樣笑談台灣民主，江澤民被動應對。

江澤民對辜振甫說：「你看我像是一個暴君嗎？我還是很開明的。」接著說：「我們的民主和其他國家不一樣，像村民選舉。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可以從村到鄉，到縣，到省，一直到全國？我跟外國元首說，那不可能，毫無實現的可能，十二億人去選一個國家主席，怎麼個選法？」

辜振甫說：「民主的真諦是政黨政治，要放棄一黨專制，人民有自由選擇權。」

台灣可以提供這方面的經驗。」

江澤民說：「我們也有八個民主黨派，其中有中國國民黨，都是參政意義的政黨。這是中國歷史形成的。十二億人，沒有一個堅強的 leadership 是不成的。像這次洪水來，只要一個電話給我，海軍陸戰隊馬上飄上去！」

辜振甫一行既堅持了主權對等和民主優勢，又達成「四項協議」，回國後到立法院接受質詢，不分朝野均給予肯定。江澤民從柯林頓那裡得到的「三個不」，一個也未用上。

一九九九年，發生了兩樁江澤民意料之外的「突發事件」：一是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一件是七月九日李登輝發表「兩國論」。江澤民視之為對他個人權威的挑戰。

法輪功讓江澤民成了「天大的笑話」！

「法輪功」早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就與其他各種流派的氣功，分別在中國各地流傳，並未引起江澤民注意。四月二十五日那天，約一萬名法輪功練功者在中南海周邊集合，起因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在雜誌上發表批判法輪功的文章，天津

市的四十五名練功者，到雜誌社抗議被警方拘捕，導致全國各地練功者來到北京向中央請願。當時朱鎔基接見了請願代表，答應依法處理，請願者也已解散。朱鎔基認為事件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性質。

當天晚上，江澤民給政治局委員們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

今天的事件，值得我們深思。人不知、鬼不曉，突然在黨和國家權力中心的大門口周圍聚集了一萬多人，圍了整整一天。其組織紀律之嚴密，資訊傳遞之迅速，實屬罕見。可是，我們的有關部門事先竟毫無察覺，而從互聯網上就能迅速找到法輪功在各地的組織聯絡系統，這還不發人深省嗎？資訊技術的迅速發展，給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我們各個機關配置的電腦不在少數，是否有人注意到這些重要的社會動向呢？如果注意了，為何又沒有任何反映呢？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加以研究。此事發生後，西方媒體立即作了報導，並加以煽動性渲染。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無聯繫，幕後有無「高手」在策劃指揮？這是一個新的信號，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敏感期已經來臨，必須盡快採取得力措施，嚴防類似事件的發生。這次事件是一九八九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在北京地區發生的群體事件中，人數最多的一次。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

東西嗎？果真是那樣，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這封信的效果，法輪功被打成「邪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專門立法予以取締，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專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唯物論和無神論》，舉國上下展開對法輪功的大批判、大清查、大搜捕、大鎮壓。然而十年過去了，似乎江澤民的「唯物論」、「無神論」沒有消滅得了法輪功，讓江澤民自己「成了天大的笑話」！

李登輝的兩國論，打亂了江澤民「聯美制台」的戰略部署

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廣播公司專訪。當記者問到中國視台灣為叛離的一省，台灣如何因應時，李登輝回答：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未統治過台、澎、金、馬。我國在一九九一年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將憲法的地域效力限縮在台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增修條文第四條明訂立法院與國民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從台灣人民中選出。一九九二年的憲改更進一步於增修條文第

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台灣人民直接選舉，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人民，國家權力的正當性也只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無關。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北京政府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也由於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因此沒有再宣佈台灣獨立的必要。

李登輝這一宣佈，打亂了江澤民「聯美制台」的戰略部署，江澤民本想利用柯林頓在上海送給他的禮物——對台灣「三不支持」，等十月汪道涵訪台時，再次推動「一個中國原則」前提下的政治談判。李登輝的「兩國論」等於取消了這個前提，使江澤民對台戰略胎死腹中。

江澤民受此打擊，一面宣佈中止汪道涵訪台，一面趕緊接上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斷掉的柯、江「熱線」，在電話中要柯林頓對台灣施壓。柯林頓因「誤炸」事件理虧，只得恭恭敬敬地同江澤民在紐西蘭登台合演了那齣最後的雙簧。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一日，柯林頓與江澤民在紐西蘭奧克蘭舉行高峰會後，一同

面對記者。江澤民說：「我們與李登輝的鬥爭，是維護還是分裂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鬥爭，我們從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柯林頓附和：「李登輝的兩國論給中國和美國都製造了許多麻煩，我今天願重申執行一個中國政策。」

江澤民還把一本《批判邪教法輪功》的書贈給柯林頓，柯林頓也恭敬收下。

江澤民退場，胡錦濤上場

當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時，江澤民對中國的統治已接近尾聲。如果算一筆總帳，他統治中國十三年之久（一九八九／一〇〇一），僅次於毛澤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比鄧小平還長（鄧小平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取代華國鋒任軍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卸任給江澤民，不過九年）。收回香港、收回澳門，引進資本技術發展經濟，提升綜合國力，都是鄧小平佈的局。同時他也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的惡政，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強化一黨專政機器。他著重經營的對台戰略，從文攻武嚇到聯美制台，都被李登輝一一破局，終究一無所獲。

江澤民留下的屬於他個人特色的遺產，只有兩筆，一筆叫「三個代表」，已被中共十六大寫進黨章修正案，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並列為

黨的指導思想，只是少了江澤民的名字。另一筆是鎮壓法輪功，大概也可以同毛澤東的「文革」、鄧小平的「六四」一道，並列於中國暴政史上。

二〇〇二年，輪到江澤民退場了。他雖已幹了十三年，似乎還在興頭上。大家都在懷疑，胡錦濤能不能接上班？那時中國民間又流傳著一個故事——

鄧小平去世前不久，曾單獨召見胡錦濤，同他談了一個舊夢，給了他一口密封的箱子。鄧小平說：

六四之後，我夢見一個夜裡，與李鵬、胡耀邦同車趕路，途中遇一毛驥擋道。無論怎麼按喇叭，毛驥都不動。李鵬喊再不讓開，我戒嚴了？仍不動。我喊「要開槍了！」還是不動。這時胡耀邦下車對驥輕聲耳語，驥即驚走。我問胡耀邦說了什麼？胡答：「我說你不走，就讓你當總書記。」我忽然驚醒，心想胡耀邦不是已經去世了嗎？

鄧小平接著說：「這個夢讓我想起，歷來沒有一個總書記有好下場。毛澤東就是不當總書記，他當書記處主席、政治局主席。我當了十年總書記（一九五六／一九六六），也被打倒。江澤民當初也不想當，我給了他毛澤東那顆核

桃，讓他當第三代核心，他才接受。我給你講這個夢，是想到我不在了，到時候江澤民不肯讓位，你就打開這口箱子。」

十六大前，江澤民果然不想讓位。胡錦濤打開箱子，裡面一張驢皮，一個驢頭，恍然大悟。

一個夜晚，江澤民回家途中，經西郊一條僻靜小道，見一毛驢擋道，猛按喇叭也不讓開。江澤民忽然想起鄧小平那個夢，下車在毛驢耳邊輕聲說：「你不走，我讓你當總書記了。」驢答：「好！你下我上，一言為定。」說罷，脫下驢頭、驢皮，站在江澤民前面的是他最不想見到的胡錦濤。

江澤民知道這是鄧小平生前排好的戲，只得在十六大把總書記交給胡錦濤，自己還賴著軍委主席不交。

民族主義新奴役制度帝國的崛起

美國人很難認識中國。聰明如克魯曼（Paul Krugman），也在他的名著《面對失靈的年代》（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中，認為「鄧小平一九七八年推動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台灣人對中國，即使認識了，也不願面對真相。呂秀蓮在中國天安門六四屠殺二十週年時說：「不能再把中國當作六四天安門的共產黨！民進黨必須重新調整跟中國的關係，更不能停留在美麗島時代的思維。」

不錯，中國的確不再是「六四天安門的共產黨」！「六四」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中國共產黨的反人權戰略，已經「與時俱進」，從對內防禦轉向對外擴張。

二十年前，中國的反人權戰略是受到國際譴責和制裁的。那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正席捲全球，從東歐經蘇聯到蒙古的共產國家，紅旗紛紛落地。鄧小平只得採取防禦戰略，他的反人權專政手段只敢對內，關起來鎮壓本國人民的自由民主運動；

對外則宣稱「不當頭」、「韜光養晦」，「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

鄧小平帝國的第一個接班人江澤民，是個喜歡耀武揚威的演員，也只敢在台灣選舉總統時試射幾枚飛彈，妄圖嚇倒台灣人民。當台灣人民無所畏懼，以選票壓倒他的飛彈時，江澤民只得敗興收場。

胡錦濤把中國反人權戰略從防禦推向擴張

把中國反人權戰略從防禦推向擴張，是鄧小平帝國的第二個接班人胡錦濤。在六四屠殺二十週年的今天，鄧小平開放式新奴役制度帝國的崛起及其反人權戰略的成功，已經使愈來愈多的西方人士認為，「中國已經打破了自由、民主、人權和經濟成長之間的連結，使世界各地的專制政體大受鼓舞，表明這是一黨政府能在全球化和大眾傳播下好好生存的年代」。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鄧小平的繼承人胡錦濤們，是如何讓這個民族主義新奴役制度帝國崛起的？

當二〇〇二年中共十六大結束，胡錦濤剛從江澤民手中拿到總書記的職務，江澤民自己還把持著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不放時，不少人曾以同情和期待的眼光看著胡錦濤。當時胡錦濤似乎也有意博取人們的認同。

第一，發表「樹立憲法權威」的主題演說

胡錦濤當選總書記後發表的首次公開演說，打出了「憲法牌」。他在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四日紀念一九八二年憲法二十週年大會上，強調「憲法高於一切」。他說：「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凌駕於憲法權威之上。」他還說：「要抓緊研究和健全憲法監督機制，進一步明確憲法監督程序，使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能及時地糾正。」

胡錦濤的演說，引起黨內外正面回應。中共內部民主派元老李銳接受《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雜誌採訪時說：「中央領導談憲法，這是一個可喜的訊號。」

接著，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民主協商會」。胡錦濤在回答民主黨派人士提問時說：

政治改革，長期以來是黨內、黨外和社會各界的主流意見。政治改革是本屆中央政治局的一項重要工作。政治改革首先要在黨內、社會上確立憲法至高無上的權威，貫徹依法治國。在法律面前，黨組織、政府和政黨領導人，沒有任何特權。特權就是違法、踐踏法律。要建立對共產黨和領導幹部的有效監督機制，要確立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法定地位。

胡錦濤還說：「新聞解禁、開放人民輿論陣地，是社會的主流意見和訴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決。」「共產黨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會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自二〇〇三年初至七月，中國知識界（包括中共內部、民主黨派和專家學者），提出大量涉及憲政體制根本改革的建言。包括：

——通過修憲討論形成憲法共識，啟動憲法大修，把這部非憲政架構的憲法，通過修改建立起憲政體制。

——修憲重點放在制度安排、人權保障、權力制衡與運作程序；細化憲法中的制度安排，使之在執行中具有可操作性。

——憲法序言把共產黨合法性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等聯繫在一起，是個大錯誤，應去掉。

——人民民主專政與人權相對立，應改為人民民主憲政，增加基本人權內容。

——無罪推定原則入憲。

——軍隊國家化，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由國家元首兼任。

——司法獨立、法院和檢察院行使職權不受任何組織和個人干涉。等等。

這些建言驚動了中央。中共中央宣傳部於二〇〇三年八月，向大學、研究機構、新聞媒體下達文件規定「三不提」：「不提修憲」、「不提政改」、「不提六四」。二〇〇三年十月十四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決定向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出席全會的三百四十二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一致認為，在憲法中確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把黨的十六大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方針政策寫入憲法，有利於憲法更好地發揮根本大法的作用。修改憲法，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做到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有利於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結果不過讓這部非憲政架構的鄧小平帝國憲法，添上一筆江澤民油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而已。

第二，提出「執政為民」和「科學發展觀」

胡錦濤、溫家寶執政之初，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五大要點的科學發展觀。胡、溫強調這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還提出「權

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被稱為「新三民主義」。

這些提法，當時人民認為是針對江澤民十三年惡政的「胡、溫新政」。江澤民的十三年，在經濟領域，特權與資本結合，盲目追求GDP增長指標，資源、能源極度浪費，損害社會公平與人民福祉，以少數樣板大城市的畸形繁榮，掩蓋城鄉大面积災難性衰敗。那是造成當今城鄉、工農、貧富懸殊，生態環境嚴重惡化，官員貪瀆腐敗成風，治安日益敗壞的反科學發展觀。已故的經濟學家楊小凱曾指出，這種「中國發展奇蹟」是「後發劣勢」。他援引沃森提出的英文概念“Curse to the Late Comer”，也可譯作「對後來者的詛咒」或「上帝降禍於後來者」，認為「後發展國家若只模仿先進國家的技術，拒絕改革其政治制度，則只能獲取一時的發展，而最終帶來災禍，因為自由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憲政制度的基礎之上，才能保持穩定發展」；這就是楊小凱的「憲政經濟學」。（Yang Xiaokai,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Conference on Constitutionalism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Sydney, Australia, January, 2003.）

楊小凱到北京時，曾經與北京大學的林毅夫對陣，展開過一場「後發劣勢vs.後發優勢」的辯論。當時不少人認為，胡、溫的「科學發展觀」與「憲法權威論」，比較接近楊小凱的「憲政經濟學」；對「胡、溫新政」可能糾正江澤民時期反科學發展觀產生的「後發劣勢」，抱有厚望。

第三，以「和平崛起」消解「中國威脅」論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曾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主編的鄭必堅，以「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的身分，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的演說，首次提出「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

接著，二〇〇三年十二月，溫家寶訪問美國，在哈佛大學演說中提到，中國選擇的是「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生一百一十週年座談會上，也提到要「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四日，溫家寶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閉幕記者會上，闡述了「和平崛起」的四點涵意：

1. 和平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時機，發展和壯大自己，同時又以自己的發展維護世界和平。

2. 和平崛起應把基點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勞動資源和資金儲備，以及改革開放帶來的機制創新。

3. 和平崛起離不開世界，必須堅持對外開放政策，同一切友好國家發展經貿關係。

4. 和平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中國即使強大了也永遠不會稱霸。

由於江澤民執政十三年（一九八九—二〇〇二），中國軍事預算每年兩位數增長，一九九四年高達百分之二十七點三一，二〇〇一年和二〇〇二年也達百分之十七點八三和十七點六（實際支出更遠高於此）。胡、溫執政第一年（二〇〇三年），軍事預算降至一位數百分之九點六，同時提出「和平崛起」，給人們一種印象，似乎將改變江澤民時期的軍事優先路線。

但那時軍權還在江澤民手裡。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日，即溫家寶在人大闡述「和平崛起」後三個月，江澤民在「上將軍銜頒獎儀式」上頒授了十五名上將之後說，「一場現代化戰爭離我們不遠」。自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四年，十年間，江澤民共頒授了七十九名上將。毛澤東終其一生，只頒授了五十七名上將，加上大將、元帥各十名，總共也只有七十七名。江澤民最後一次頒授這十五名上將，高出毛澤東一頭之心畢露無遺。再過三個月，二〇〇四年九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交出了他的軍委主席職務。

四中全會，胡錦濤露出廬山真面目

然而，人們對「胡、溫新政」的期待，很快就破滅了。就在二〇〇四年九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從江澤民手中剛剛拿到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的胡錦濤，發表了一篇殺氣騰騰的講話。胡錦濤說：

一段時間以來，境外敵對勢力、媒體大肆攻擊我們國家領導人和政治制度。而國內媒體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和政權。針對這種錯誤，絕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管理，不要給錯誤思想觀點提供渠道。蘇聯就是在戈巴契夫提倡公開化、多元化，造成黨和人民思想混亂中解體的。政治問題一旦出現，要嚴厲打擊，不要熱炒，不要授人以柄。宣傳上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不要讓人猜測。敵對勢力總是從輿論入手，占領宣傳陣地。

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於九月二十九日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下達關於加強管理意識形態、打擊自由化思潮的中央文件。胡錦濤在文件上批示：

「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

對胡錦濤在四中全會的大動作，當時有各種評論。有的認為胡錦濤「要用毛澤東思想糾鄧小平的偏，走回毛澤東之路」，有的認為只是胡錦濤為鞏固個人權力，討好「左」派的策略運用。胡錦濤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將把中國帶向何方？

第一，胡錦濤四中全會講話不是策略運用，是露出廬山真面目。

回過頭看，他的「憲法高於一切」、「執政為民」、「新三民主義」，倒是欺騙民眾的策略運用。因為那時權力尚未鞏固，胡錦濤需要輿論支持，從江澤民手中拿到軍權。現在軍權到手，可以大顯威風了。胡錦濤提到的那些「宣傳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等等，不正是當初人們響應他的「修憲」號召，提出的種種建言嗎？今天一棍子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還要「嚴厲打擊」、「絕不能手軟」！這足以表明他前一階段的「放」，不但是「騙」，還不無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味道呢！

第二，胡錦濤不是「走回毛澤東」，也不是「用毛澤東思想糾鄧小平的偏」，而是「十足鄧小平」的「兩手硬」。

鄧小平的「兩手硬」，一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打擊資產階級自由化」硬；另一手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硬。胡錦濤的四中全會講話，正是「左」右開弓，兩手都「硬」！所以是「十足鄧小平」。胡錦濤那些話，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裡都可以找到根據。胡錦濤比江澤民更鄧小平，不會回到毛澤東。江澤民倒是一度離開過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差點「回到毛澤東」，被鄧小平的「九二南巡」糾正。

第三，胡錦濤的目標，就是把開放式奴役制度的鄧小平帝國推銷全球。

今年（二〇〇九年）是中國「六四」天安門屠殺二十週年。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海外和香港媒體，都在競相歌頌當年下令開槍的鄧小平和今日鄧小平帝國的統治者。《亞洲周刊》一篇題為「鄧小平自我平反六四：南巡執行趙紫陽路線」的文章寫道：

研究六四歷史的學者，都不會不同意：六四當天最後下達開槍命令的是鄧小平。這也使他在晚年中背負了歷史的罵名，但也恰恰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中，作出了巧妙的安排，實質上自我平反六四，讓「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落實，也讓和胡耀邦關係密切的胡錦濤接上了班，當了黨的最高領導人，

也讓當年和趙紫陽一道的溫家寶接任總理，成為政府的最高領導人。

文章最後的結語是：

今日的中國，是否可以出現一個沒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線，完成二十多年
前中國未完成的政治改革？被視為師承胡耀邦的胡錦濤，是否可以展現「二胡」
的魅力，尋回飄遠了的時代共鳴？

有趣嗎？按照作者的邏輯，在鄧小平「生命的最後歲月」，落實了趙紫陽的經
濟改革路線；在胡錦濤統治下的今日中國，落實胡耀邦的政治改革路線也是可以期
待的了。

可惜這是神話，或者叫「迷思」(Myth)吧？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首先，「鄧小平自我平反六四，讓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落實」不是事實，
也絕不可能。六四屠殺「換來穩定和發展」，成了鄧小平晚年得意之舉。愈到「生
命的最後歲月」，他愈自我肯定，而非「自我平反」，這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
處處可見，如一九九一年蘇聯發生八月政變（八月十九日）的第二天（一九九一年
八月二十日），鄧小平把江澤民、楊尚昆、李鵬、錢其琛找到家中談話。鄧小平

說：

中國局勢穩定，一個是處理一九八九年那場動亂時一點也不動搖，再一個是堅持改革開放。我們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

鄧小平始終把六四屠殺提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不但要講，還要用」的原則高度，一再予以肯定；而且對外宣佈，「以後遇到動亂的事，我們還要戒嚴。這不會損害別人，不會損害任何國家，這是中國的內政」。這才是鄧小平的真面目，他怎麼可能「自我平反」六四？

趙紫陽可能也未能消除對鄧小平的幻想，以為他同鄧小平的分歧，沒有鄧小平同胡耀邦的分歧大，只有「反對戒嚴」一事。事實可能如此，但鄧小平卻不這樣看。鄧小平反覆強調，「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的对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他們沒有執行。」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最後一篇一九九二南巡講話：「在武昌、深圳、珠海、

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是這樣講的：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託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出來後，就注意這個問題。我們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於是我們推薦別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失敗了（指胡耀邦和趙紫陽），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鄧小平的立場一清二楚，「經濟上出問題」，反對改革開放，提倡鳥籠計劃，都能讓，唯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出了問題不能讓！因為這是「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和鄧小平帝國「長治久安」的大問題。所以對陳雲，對姚依林，對鄧力群能讓，唯獨對胡耀邦，對趙紫陽不能讓！對第三代不能讓，對「以後的幾代」也不能讓。這是鄧小平的「政治交代」，怎麼可能出現「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沒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線」呢？胡耀邦和趙紫陽，是鄧小平帝國永遠的禁忌，必須在歷史上抹得一乾二淨。

胡錦濤與胡耀邦的關係並不「密切」

其次，胡錦濤與胡耀邦的關係並不「密切」，更不會「師承胡耀邦」。

一九八〇年代初，胡耀邦物色接替團中央書記韓英的人選時，選中的是清華大學的羅征啟。胡耀邦親自對羅征啟進行考察，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中，清華大學造反派去抓羅征啟，羅不在家沒有抓到，抓了羅征啟的弟弟當「人質」。他弟弟有點弱智，被裝在一個麻袋裡，天氣熱，在途中悶死了。粉碎四人幫後追查兇手，追到了那幾個綁架者。羅征啟看到他們只是普通學生，當時要抓的是他本人而不是他弟弟，考慮到這幾個年輕學生在那種大環境下犯的錯誤，主張不要過分追究。胡耀邦很欣賞羅征啟思考問題的這種大格局，加上羅的思想文化水準和工作能力都很強，就選中他到中央黨校培訓後，安排先擔任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等共青團換屆時接任團中央書記。

羅征啟在黨校培訓期間，發生了一件事。陳雲的女兒利用特權侵佔出國留學名額，社會影響很壞。羅征啟出於好意，給陳雲寫了一封懇切的信，希望他勸女兒放棄以示大公無私，足以挽回影響；沒想到陳雲下達指示，「這種人不可重用」。學期結束，所有學員都走光了，羅征啟獨自一人留在黨校宿舍等候處理。胡耀邦無可奈何，最後讓他遠離北京，任深圳大學校長。

後來接替韓英的團中央書記，就是鄧小平看中的王兆國。胡錦濤是王兆國任書記時，宋平從甘肅推薦到團中央的，曾經接替王兆國做過短時間的團中央書記，因與團中央的「太子黨」陳昊蘇、李源潮們處不好關係，去了貴州，又去了西藏。最後提拔到中央政治局，是鄧小平拍的板。鄧小平選他接江澤民的班，看中他的當然是能「師承鄧小平」，而非「師承胡耀邦」。

過去曾有人稱胡耀邦、胡啟立為「二胡」，也是誤解，胡耀邦被廢黜後還向李銳澄清過。胡啟立雖然很長時間在團中央工作，與胡耀邦共事甚久，也只是工作關係。胡啟立被提拔到黨中央，是一九八〇年代初他在天津工作時被鄧小平看中決定的。社會上流傳的所謂胡耀邦的「團派」如何如何，這樣的「派系」根本不存在。胡耀邦的確在共青團培養了一些思想開放，喜讀書，勤思考的人才，項南就是一個，羅征啟也是清華大學團委的優秀人才。但這樣的人才，總是被陳雲專政派打擊誣害，胡耀邦想用也不可得。

胡錦濤師承鄧小平的政治交代

胡錦濤初登政壇時，曾被稱作「謎樣的人物」。如今他已執政七年（二〇〇二／二〇〇九），只剩下三年任期了，似乎人們還沒有猜到謎底。有人說他「聰

明」，有人說他「平庸」；有人說他「開明」，有人說他「保守」；有人說他「師承胡耀邦」，有人說他「回到毛澤東」。其實此謎毫不難解，只需要翻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對照胡錦濤的所作所為，就明白胡錦濤走過的路，不過是遵循鄧小平的「政治交代」，讓鄧小平所創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開放的民族主義新奴役制度帝國，「崛起」於世界的東方，並將此「中國模式」推銷全球。

最近，歐洲外交關係協會執行長馬克·里歐納德（Mark Leonard）在他的新著《中國怎麼想？》（What Does China Think?）中說：

世界上一百九十二個國家中，有半數的領導人在二〇〇六年造訪中國，向這個崛起中的巨人致敬。中國的崛起業已改變經濟和軍事勢力的平衡，此刻又在改變世界對政治、經濟和秩序的想法。中國將成為世界秩序的塑造者，挑戰西方對非洲、亞洲、中東、拉丁美洲和前蘇聯的影響力。

我們究竟如何看待中國崛起這一現象，及其對世界未來的影響？這是極具爭議的全球議題之一。各種不同論述，大致可歸納為四類。

(一) 盛世論。認為中國處於「歷史上最好的年代」，從國內看是漢唐以來未有的盛世，從國際看是「全球發展的火車頭」。這不只是「共產黨宣傳」，從日本到美

國，對中國盛世讚譽之聲不絕。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一稱中國是「名副其實的世界資本主義天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黃靖認為「中國的發展帶動了整個亞洲，包括日本，甚至帶動美國的發展，鞏固和加速了全球化」。

(一) **末世論**。學者徐賁在〈中國的「新極權主義」及其末世景象〉一文中認為，中國今天的極權主義政治結構，「是一個權力與物質慾極強烈而道德和價值觀極麻木的退化型特權寡頭專制」，「以低能而專橫，虛張聲勢、色厲內荏為特徵」，與其原型相比，已明顯呈現「末世景象」。美國學者章家敦則認為，「中國即將崩潰」。

(二) **轉型論**。認為中國正處於自由市場經濟向自由民主政治的轉型過程。這是美國政、學、商界的主流論述。美國前國務卿萊斯表示「確信中國經濟開放會給中國帶來民主改革」。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認為，「今天的中國絕非前蘇聯可比」，「隨著經濟繼續增長，生活得到改善的中國人希望對自己的未來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胡主席和溫總理也談到中國加強法治和發展民主機制的重要性」；他因此把中國定義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也有譯為「負責任的合夥人」)。

(三) **新制度論**。美國芝加哥「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方紹偉(Frank S. Fang)在《中國熱：令人迷醉又生畏的下一個全球超強》(China fever : fascination, fear, and the

world's next superpower)」一書中，認為中國特色的黨國專制制度比西方式民主制度更有優勢。他說：

黨像是一個大家庭，競爭是比德才。現在回過頭看，堅決平息一九八九年的動亂是很有道理的。有條不紊的德才繼承，成為中國一個歷史里程碑；決策效率提高了，領導人能積累經驗，有才幹的人可以較久保留在工作崗位上，這些方面都比西方競選式民主制度有優勢。最重要的是，黨的菁英現在可以對中國自己的制度更有信心，在抵制西方式民主制度時也可以比較理直氣壯。

里歐納德雖然不認同中國制度模式，但也認為：「主張中國會因財富增長而變得愈來愈像西方的人已經證實是錯的。冷戰之後，歐洲和美國第一次面臨一個可敬的另類選擇，那就是中國模式。」

鄧小平帝國——開放式民族主義新奴役制度

鄧小平帝國的三十年，已經不能用「先經濟、後政治」的階段論，或「經濟向前提、政治滯後」的跛腳論來概括了，從理論到實踐走過了三十年，的確形成了新的

制度，新的「模式」。

鄧小平帝國，是蘇聯、東歐的史達林共產帝國崩潰之後，在全球化的歷史條件下，從毛澤東帝國演變而成的一種新典範，可以定義為「開放式民族主義新奴役制度」。這種新奴役制度，不是傳統共產奴役制度的終結或斷裂，而是傳統共產奴役制度的繼承與轉型。

繼承的是傳統共產奴役制度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即鄧小平概括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再加上林彪概括的「兩桿子」：「一個槍桿子，一個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

靠兩桿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共產中國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的核心，從毛澤東到胡錦濤堅持不變。對中國共產奴役制度歷代統治者來說，這是命根子，好比掛在賈寶玉脖子上的那塊通靈寶玉，絕對不可以須臾離開。

轉型的部分，是適應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環境，吸取中國天安門事件和蘇聯東歐共產帝國崩潰的教訓，鄧小平制定了向全球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戰略。這個新戰略的特色是：

第一，黨國經濟體系從封閉到開放，從計劃鳥籠向全球市場的制度轉型。

傳統共產主義黨國奴役制度的經濟體系是封閉的。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蘇聯東歐共產帝國，採取同西方國家自由市場經濟體系隔絕的鐵幕戰略。史達林在他最後一部著作《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確立了「兩個平行市場」理論：一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市場，即以盧布為貨幣結算單位的盧布市場；與以美元為貨幣結算單位的資本主義市場，是兩條永不相會的平行線。

毛澤東帝國雖然從意識形態到國家利益都同蘇聯發生尖銳衝突，但在經濟體制與經濟戰略的封閉方面，與蘇聯東歐共產國家並無二致。一九六〇年代以前，中國是盧布市場的一員。一九六〇年代初，還清韓戰期間欠蘇聯的軍火債後，中國自稱進入「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自力更生」時代。共產帝國在封閉狀態下，利用高度集中的黨國權力，極度壓縮人民消費，把國家資源和人力集中投入特定的重點發展目標，獲得過短期的「輝煌成就」。如蘇聯先於美國「衛星上天」，中國在餓死了三千萬人的「大躍進」年代和「文化大革命」中，也把核彈、飛彈、人造衛星送上了天。然而，隨著現代信息技術推動的「全球化」浪潮興起，封閉的共產國家，在經濟力和綜合國力的競爭中都失敗了。蘇聯、東歐共產帝國因此崩潰。

唯獨共產中國奴役制度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之後，不但沒有同蘇聯、東歐帝國一起崩潰，反而崛起為對抗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最後堡壘。其根本原因，是鄧小

平採取了鞏固和擴張共產奴役制度的新戰略：從封閉的傳統共產奴役制度，轉型為開放的新共產奴役制度。這是一種適應全球化時代跨國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貪婪慾望的現代開放型共產奴役制度。《福布斯》雜誌報導稱：「中國無論在主要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中，都屬於最開放的國家。」

中國現代共產奴役制度的新戰略是打開國門，向全球自由國家開放，引進自由國家的資本、資源、資訊、科技、人才、經營管理，同共產奴役制度下廉價的不由勞工和廉價的「國有」土地結合，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生產廉價商品行銷全球市場，迅速擴張其奴役制度的經濟、科技、軍事、外交實力。但對「西方」的自由思想、民主制度、人權觀念，不但不予開放，還明令「把一切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

第二，共產黨從共地主、資本家的產，轉向共農民、工人的產。

「中國共產黨現在不共產了。」有人如是說。特別是江澤民提出所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共產黨對資本家打開大門，不少資本家被定義為「代表先進生產力」被吸收入黨，使更多人相信「中國共產黨已經改變性質」，「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中國共產黨無論過去自稱「代表無產階級，貧、下中農」，或今天自稱「三個

代表」，都是十足的謊言。從過去到今天，共產黨在中國，建立的都是一黨專政的黨國共產奴役制度。過去共產黨利用農民、工人替他「打天下」，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今天利用資本主義挽救其黨國共產奴役制度的滅亡。過去共產黨共地主、資本家的產，今天共產黨共農民、工人的產。其貪婪、殘酷、野蠻的本性，一點也沒有改變。

共產黨統治中國六十年（一九四九—二〇〇九），實行的是城鄉分裂的二元國家結構。鄉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制」，即名義上歸農民所有。城市的工廠，是「全民所有制」，名義上歸全國人民所有。但這只是「理論」，實際的支配權力，無論鄉村的土地、城市的工廠，都在黨國的統治者手中。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工人固定在工廠裡，從生產到生活，完全受黨國統治者的支配，沒有個人的選擇自由，這是一種黨國奴役制度。但只要服從黨國統治者的支配，你的奴隸地位是穩定的。照魯迅的說法，這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在這種「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農民和工人付出畢生的勞動，為黨國累積了財富，自己獲得的只是奴隸的平等，在貧窮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大躍進」年代，當三千萬人面對因飢餓而死亡的威脅時，誰也無法作出其他選擇，只有靜靜等待平等的死亡來臨。

今日中國的農民和工人獲得自由了嗎？不錯，他們的確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

「自由」，那就是被共產黨從固定的土地上和固定的工廠趕出來的「自由」。

中國共產黨變了嗎？不錯，傳統的黨國奴役制度，也的確發生了變化。過去封閉的奴役制度統治下，每一個人就是一顆「螺絲釘」，黨國把你擰在哪裡，你就被固定在哪裡。生、老、病、死，把你的一輩子以至你的後代，交給黨國這架機器支配，但你這顆「螺絲釘」的地位是穩定的。現在不同了，這架黨國機器「改革開放」了，每一顆「螺絲釘」都鬆動了，不知道哪一天會被擰下來。什麼時候來了一位黨國權貴，帶進國外的什麼企業主或房地產開發商，看中你這顆「螺絲釘」所在的這家廠、這塊地，你住家的這個地段，你就得被「下崗」，土地被「徵收」，住家被「拆遷」，這就是到了「想做穩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現代中國的所謂「群體事件」，正是繼承中國「做奴隸而不得時代」的產物。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I C F T U）的報告〈誰的奇蹟？中國勞工為迅速發展付出代價〉指出：「中國的經濟成就以犧牲廣大工人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經濟成就掩飾了中國受虐勞工的悲慘生活。人口全世界第一的中國，勞工人權每下愈況，中國新增的失業人口，可能與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一樣多。」該組織的秘書長賴德說：「中國政府正在享受國際上對其經濟成果的讚美；而對廣大工人來說，不公平的現實是個惡夢，而不是美夢。大部分的人都因中國的經濟成果而失去判斷力，以至於無視其黑暗面。」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勞動法》，規定企業加班每天不得超過一小時，特殊情況不得超過三小時，一個月累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每週至少有一天休息。但沒有任何地方的政府、企業、「工會」（代表黨國利益的「工人組織」）把它當一回事。據廣東省官方的「總工會」調查，珠三角地區百分之七十六點三的工人，月工資在一千元人民幣以下，因為工資低微，百分之五十二點四的工人必須「自願」加班才能維持生活。廣東東莞的十家玩具有廠，大多數每天工作超過十一小時，每天工作十五小時、每週七天也非特例，很多工人每週工作九十九小時，甚至更多。

超負荷工作的結果，是發生大量工傷事故。鳳凰衛視的「社會能見度」節目作過「四萬根斷落的指頭」專題報導，根據廣東商學院教授謝澤憲、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黃巧燕與曾飛揚，對珠三角地區三十八家醫院，一家職業病防治醫院的工殞者所作的課題調查，造成斷落指頭的原因是因為過度疲勞。斷指者的加班時間，最長的八小時，即一天做兩天的工時，超過七成被調查者沒有任何休息日。

過去陳雲在中國封閉的共產奴役制度下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創造了一個公式，叫作「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今日中國在開放的新共產奴役制度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不過是陳雲那個舊公式的變形，即：「國家和外資共享大頭，貪腐官員和中資權貴共享中頭，國家財富的創造者、

億萬被奴役勞工拿小頭。」

第三，建構中國奴役制度的國際聯盟。

鄧小平提出「多極化」戰略，就是著眼於跨國資本追逐高額利潤的貪婪性格，發揮中國奴役制度下，低成本勞工和國家壟斷土地資源的優勢，在自由國家的彼此競爭中，利用矛盾、統戰分化，各個擊破，以最有利的條件，「磁吸」國際資本和現代技術，強化共產奴役制度的經濟、科技、軍事實力。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胡錦濤的歐洲之行，就是一輪精心設計的銀彈攻勢。德國《金融日報》的醒目標題是「中國主席讓德國公司充滿幸福感」，報導說：「胡在德國簽下了總金額約十四億歐元的六個合同，其中西門子獲得的六十輛高速列車的訂單，價值七億歐元，西門子公司的興奮不言而喻。當中國國家主席這幾天和政界及商界要人見面時，胡被捧為一個強而有力、經濟正在蓬勃發展的國家的領袖。」

二〇〇六年四月胡錦濤訪問美國，布希總統不給胡錦濤設晚宴，胡錦濤就弄出兩場晚宴給布希看。一場西雅圖商業領袖雲集於比爾·蓋茲豪宅的晚宴，另一場由沃爾瑪、通用汽車、花旗銀行、迪士尼集團發起的美中商會舉辦的華盛頓晚宴。兩場晚宴囊括了美國主要的跨國企業。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財經王牌主持
人盧·道布斯（Lou Dobbs）看出其中奧妙，他說：「中國領導人訪美的頭兩天，參

觀了波音和微軟。白宮的布胡會，只是在胡錦濤訪問了波音與微軟，比爾·蓋茲為其舉行的『國宴』之後進行的。這意味著，中國現在已經打進了美國。胡錦濤訪美首先與商界領袖打成一片，顯然他深知誰在真正主宰這個國家，當然不是白宮那些笨蛋。」

美國的跨國公司同中國政府合作，幫助中國政府利用美國新科技，強化侵犯人民自由的機制，如微軟、雅虎、思科、谷歌等公司，都向中國政府提供加強檢查、監控電子通訊網路的現代先進技術。尤其是雅虎，幾年來連續把電子郵件用戶個人資料交給中國政府，導致多名中國公民因網路通訊被逮捕，並判處重刑。美國國會議員藍托斯，在有關此事的國會聽證會上指出：「這些公司對我們說，他們將改變中國；但事實卻是，中國改變了這些美國公司。」

《亞洲周刊》的一則報導，披露了中國如何改變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有趣故事。

中國共產黨派了一名「智囊」、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對美統戰，鄭曾去白宮會見當時任國家安全顧問的萊斯，問道：「你覺得中國共產黨和前蘇聯共產黨有何區別？」萊斯答：「中國有鄧小平的『貓論』（不管黃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和『摸論』（摸著石頭過河），蘇聯沒有。」鄭必堅給她打分「不及格」。鄭說：「中國和蘇聯的最大區別，是前蘇聯輸出意識形態，輸出革命，輸出

暴力；而中國只輸出電腦，輸出日用品，不會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接著，鄭必堅又發明了「和平崛起」論，在北京和華盛頓同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兩次長談，終於讓美國軟化了對華政策，由佐立克提出“Responsible Stakeholder”論調，回應鄭必堅的「和平崛起」論。

你只要稍稍注意佐立克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演說〈中國往何處去？——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中，關於「今天的中國絕非一九四〇年代後期的蘇聯可比」一段，幾乎是複述鄭必堅的說辭，就足以看出的確是中國改變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而「絕非」美國「將改變中國」。

自由國家對中國奴役制度的節節退讓，已經使一度陷於全球民主化浪潮中掙扎的專制政權零星孤島聯合起來，北韓、緬甸、辛巴威等「失敗國家」，在中國政府「無條件」援助下起死回生，上海合作組織有效地遏制了專制國家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顏色革命」。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在二〇〇五年鎮壓安疆（Andjian）民主示威運動，屠殺了數百名抗議人士，中國和俄羅斯都提供了支持。卡里莫夫訪問北京，獲得紅地毯的禮遇，和六億美元的石油交易。中國還為上海合作組織國家的中亞國家，進行反暴亂訓練。

第四，以奴役制度下的假民主政治，挑戰自由民主普世價值。

在民主政治問題上，鄧小平、江澤民採取守勢，藉口「中國經濟不發達」、「還有二億文盲」、「為了發展經濟、穩定壓倒一切」等等，拒絕民主政治。似乎等到經濟發達了，文盲也識字了，中國將來還可以有民主政治。

胡錦濤的新戰略轉守為攻，宣稱：我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比你的資本主義更民主！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國政府第一次發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這本長達三萬多字的白皮書，是一本以中國共產奴役制度下的假民主政治，對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挑戰書，標誌中國胡錦濤政權面對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衝擊，從防禦到進攻的戰略轉變。

這本白皮書開宗明義，在第一章〈符合國情的選擇〉中，就展開了以「中國特色」的假民主政治，向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進攻。白皮書把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以來廢除君主專制，實行民主憲政的嘗試，貶之為「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在中國，是一條走不通的路」；而把一九四九年開始共產黨一黨專政，譽之為「近代以來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敗嘗試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偉大跨越」。

白皮書接著指出：「中國的社會民主政治建設，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本原則為指導，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包括：

——中國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人民民主。

——中國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可靠保障的民主。
——中國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的民主。

這幾條概括起來，「中國的民主」，就是共產黨「領導」，共產黨「專政」，一切權力「集中」於共產黨的黨國專制奴役制度。白皮書接著的九章，對此發揮得淋漓盡致。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明確載入了《憲法》。

——當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是中國發展和進步的客觀要求，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是維護國家統一、社會和諧穩定的需要，是人民之福，也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

——中國政黨制度的特徵，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參政是參加協商，不是反對黨或在野黨。中國共產黨領導是合作的

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證。

——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代表大會政體制度，確立為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到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

——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使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這個東方大國的人民，在自己的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當家作主，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這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重大貢獻。

胡錦濤公佈《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其戰略意義在於向全世界宣告：共產黨一黨專制的中國現代奴役制度，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是「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偉大跨越」，是中國共產黨「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重大貢獻」。

這就是說，國際社會不必再指望中國將向普世價值的民主制度「和平演變」。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字典裡，那叫作「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在中國，是一條走不通的路」。

第五，民族霸權主義的擴張戰略。

鄧小平帝國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傾向，是民族霸權主義意識的擴張。毛澤東強調「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出於當時毛澤東帝國與蘇聯共產帝國的力量對比，綜合國力與軍事實力均不如蘇聯。鄧小平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是同美國建交與打越南戰爭，同時把「統一」台灣「提上日程」，這是從防禦轉向擴張的第一個動作。後來由於越南之戰打得很差，鄧小平發現中國軍隊和軍事裝備十分落後，沒有擴張的實力；把重心轉向經濟發展，實行開放戰略，引進先進國家的資本、技術，包括購買蘇聯軍事裝備、引進軍事科技，同時提升經濟與軍事實力。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國一度遭西方國家制裁。接著，蘇聯、東歐共產帝國崩潰。當時中共元老中以王震為代表的冒險家，主張中國取代蘇聯當殘存共產國家的頭，同西方資本主義對抗。鄧小平以「韜光養晦，永不當頭」予以阻止。

鄧小平的眼光，仍看中美國與其他先進國家的資本、資源、資訊、技術和市場優勢，以恢復和發展中美關係為第一優先。他頻繁接見美國政、商、學界人士，包括老朋友尼克森、季辛吉，老布希派來的特使斯考羅夫特等，迅速恢復了與美國和西方的交往。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大大加快了「向全球開放，利用資本主義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鄧小平帝國發展戰略。

西方的一種流行看法，認為一九九二年後，中國已經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隨著經濟自由，將自然帶來政治自由。這是對鄧小平帝國發展戰略的誤判。鄧小平的政治遺囑（〈南巡講話〉）已表達得十分清楚。

「警惕右」，就是警惕「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警惕「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說：「我堅信，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他強調除掉胡耀邦、趙紫陽，「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跟頭」，所以「不能讓」！鄧小平除掉胡、趙，同毛澤東批鄧一樣，都是「興無滅資」！

「防止『左』」，指「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有人概括為「政治反右，經濟防『左』」，就是鄧小平的「兩手硬」。

經濟防「左」，靠開放，政治反右靠什麼？

一靠軍隊、專政機構，「用專政手段鞏固政權」。就是槍桿子。

二靠意識形態，靠筆桿子。靠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但現在年輕人不相信「老祖宗」了，怎麼辦？就靠馬克思主義民族化、中國化，靠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反對「西化」，反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反對民主、人權。鄧小平說：「人們支持人權，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真正說起來，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他們那一套人權、自

由，是維護恃強凌弱的強國、富國的利益，我們從來不聽那一套！」

民族主義是暴政與戰爭的意識形態的根源，列寧寫過《論大俄羅斯民族的自豪感》。史達林是喬治亞人，但列寧說他「少數族人搞起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來，比俄羅斯人更厲害」！希特勒也靠民族主義對內實行暴政、對外發動戰爭。毛澤東靠「馬克思主義民族化」、「馬克思加秦始皇」，奪取與鞏固政權。鄧小平帝國宣揚「國權至上」、「中華民族復興」、「儒家社會主義」，在全球廣建「孔子學院」，利用民族主義對抗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

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中華民族」，中國政府自己也說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講「中華民族」，就是「一個民族」統治其他五十五個民族，毛澤東叫作「大漢族主義」。其實，「一個民族」也沒有統治，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統治五十六個民族。但「黨」和「主義」這些東西，在中國年輕人中已失去「吸引力」、「凝聚力」，所以需要製造民族主義來吸引，製造「一個民族」來凝聚。

一九九九年和二〇〇八年，江澤民和胡錦濤兩度利用民族主義浪潮對抗自由民主浪潮，獲得成功。

一九九九年，美國和歐洲盟國在科索沃之戰中，誤炸了中國駐貝爾格勒使館，當時，中國支持在科索沃進行種族滅絕的南斯拉夫獨裁者米洛舍維奇。在中國政府保護之下，打著民族主義旗幟的憤怒青年，用石塊砸了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迫使美

國總統柯林頓在台灣和人權問題上支持江澤民（柯林頓在紐西蘭與江澤民合見記者，譴責李登輝和接受江澤民贈書《邪教法輪功》）。

二〇〇八年，歐洲人抗議中國政府踐踏西藏人權，和支持在達爾富爾進行種族滅絕的蘇丹獨裁政權。中國民族主義者，認為抗議者使中國奧運火炬傳遞受阻，挑中法國進行報復。照《中國不高興》一書作者宋曉軍、宋強的說法，「鬧得最厲害的法國，中國年輕人馬上以行動跟西方對抗，目標選得很準，在各個城市抵制了具有商業象徵意義的家樂福，非常直接，誰搞我厲害我收拾誰。如果沒有這次行動，很難說會有中國政府在二〇〇九達沃斯論壇上採取的冷落法國的舉動。把二〇〇八年四月風起雲湧的新愛國主義，納入到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大歷史來看待，完全有理由載入現代中國精神歷史的史冊，以及中華民族復興歷史的史冊。」

《中國不高興》是二〇〇八年民族主義浪潮中分娩出的一部代表作，作者的口氣吹得比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還大，好像他們這幾個人就代表了五十六個民族的十三億中國人，在同整個西方對話：

——要是你們從澳洲、南北美洲、非洲、亞洲全捲了鋪蓋，我們也就從西藏捲鋪蓋。

——中國下一步的現代化進程，決定了中國必然要與西方進行一種以軍戰

支撐的商戰，「持劍經商」，在西方人眼裡就是「商場爭霸」。這是難以避免的。既然難以避免，就要早早設計。中國是有能力設計大目標的。

——我們必須盡快發展強化軍事實力的產業。消除過剩產能和人口，最終手段就是戰爭。然後工業機械又可以為自己毀掉的東西再運轉起來。

——十七大上終於說了：「在機械化基礎上的信息戰」，這也是一種威懾，關鍵是要把美國人那套「信息戰是不可以戰勝」的謊言打破。

——中國將來的目標是什麼？中國當然要管理世界上更大的資源和面積，我相信我們會比美國人和其他西方人管理得更好。我們需要這樣一個英雄集團，帶領我們這個民族，完成在這個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資源，並且除暴安良的任務。我們要有制度建設，也要有文化建設，包括我說的尚武精神。制度要解決效能問題，民主制確實不是效能最高的。有治國效能、管理效能的一定是菁英主義制度，菁英治國。

——宣傳環保，都是扯淡。我們省下來的能源不是被西方人消耗掉了嗎？在今天這樣的世局之下，誰先省誰先死！誰想節約能源消費的話，肯定先從地球上被淘汰掉。

這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自畫像，也是今日中國發展戰略的真實寫照，只是說得

比胡錦濤用「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虛假字彙包裝起來的十七大報告更為露骨。鄧小平帝國三十年的歷史表明：它包括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對外開放與擴張不可逆轉；另一個是反自由民主、反人權的專制奴役制度同樣不可逆轉。這是鄧小平帝國的一體兩面，而且對外愈開放、愈擴張，對內愈嚴控、嚴禁、嚴打。

鄧小平帝國的三十年，卻是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在中國之外戰勝舊奴役制度的偉大的三十年。全世界超過六十個國家，結束奴役制度，進入全球自由民主國家行列。但是鄧小平帝國三十週年的今天，這個全球自由民主化的趨勢已經停滯（freedom stagnation），甚至逆轉（push back）。表明鄧小平的開放式奴役制度帝國這種專制與發展並存，而且長期並進的新典範（new paradigm），已經構成對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重大挑戰。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正在走向新一輪的自由與奴役制度的全球對決。

鄧小平帝國的邊疆政策

從自信寬容到自大殘暴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國的邊疆政策，都經歷過從自信寬容的民族平等，到自大殘暴的大漢族主義的反覆過程。

一九五四年，毛澤東邀請達賴和班禪到北京。那時達賴十九歲，班禪十七歲。一天晚上，毛澤東來到達賴喇嘛的住處。交談中，毛澤東問達賴：「我聽說你們有一面國旗，是嗎？他們不讓你帶著，是嗎？」

當時擔任翻譯的平措旺杰翻譯給達賴時，達賴問平措，毛澤東說的「他們」指誰？平措問毛。

毛答：「就是派去你們那裡的張經武、張國華、范明啊。」

達賴：「我們是有的一面軍旗（他避免了「國旗」這個敏感的詞）。」

毛：「沒有問題。你們可以保持你們的國旗。將來，我們可以讓新疆有自己的國旗，讓內蒙有自己的國旗。在這些國旗之外，再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這樣好嗎？」

達賴喇嘛點頭稱是。

平措旺杰見證中國邊疆政策的反覆

平措旺杰是個傳奇人物。他的一生，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兩個帝國邊疆政策反覆過程的一面鏡子。

平措於一九二三年生於四川西部的巴塘，屬於藏族聚居的三個地區之一的「康」區（國民黨時期的「西康省」）。在重慶上學時，他寫了一篇作文，描述貧富差別，得到老師賞識，介紹他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一九三九年，平措在重慶的藏人裡組織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西藏共產主義革命小組」，那時他十七歲。

一九四〇年代末，平措回巴塘建立中共康藏邊區工委和藏東青年團，準備配合解放軍在康區組織起義，推翻國民黨省長劉文輝的統治。結果，劉文輝自己先投降了共產黨。

一九五〇年，平措接到朱德打來的電報，要他到重慶向鄧小平、劉伯承報到，準備「解放西藏」。平措是共產黨內掌握漢、藏兩種語言的最高級幹部。鄧小平給他的任務是：隨第十八軍進軍西藏，一是搞好藏族上層人士的關係，二是讓解放軍了解西藏風俗文化。

平措也向鄧小平提出：藏區糧食有限，部隊必須帶糧進藏。鄧小平交給他負責，組織十多萬頭犛牛的龐大運輸隊，為昌都戰役運輸糧草。

十八軍攻下昌都後，平措建議善待被俘的藏軍官員，特別是總司令阿沛·阿旺晉美。平措說：「爭取上層，不把他們當俘虜，當作準備與之談判的人。」平措與阿沛長談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民族平等與宗教自由，幫助阿沛寫信給拉薩政府，促進談判。

一九五一年四月，談判在北京舉行，阿沛·阿旺晉美是西藏政府首席代表，中共中央政府首席談判代表是李維漢。平措旺杰任雙方的翻譯。談判到最後，在成立軍政委員會問題上發生爭執。李維漢雖事先向阿沛打了招呼，但阿沛並沒有同西藏代表們商量好。談判時，李維漢一提出，就遭到西藏代表反對，認為軍政委員會是以解放軍取代西藏政府，將使自治條件化為烏有。李維漢一生氣就說：「你們反對，就捲鋪蓋回家！」

平措一聽不妙，故意翻譯成要他們「回旅館」。然後去對他們解釋，軍政委員

會是臨時機構，頭頭又是達賴，不影響西藏自治。終於雙方回到談判桌，達成《十七條協議》。在十七條簽署後的慶祝酒會上，李維漢高興地舉杯祝賀：「為平措同志對十七條作出的重要貢獻乾杯！」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解放軍進入拉薩。平措旺杰身穿解放軍服裝，走在隊伍前列。那時駐軍的最高官員是張國華將軍，按照禮儀，要正式拜會達賴喇嘛。李維漢曾告訴平措旺杰，毛澤東關照了張國華，第一次見面時，要行三次磕長頭禮。張國華不樂意，對毛說：「行個軍禮不就行了嗎？」毛批評他：「張國華，你能為革命流血流汗，對達賴喇嘛磕三個頭又有什麼關係嘛！」

臨見到達賴前，張國華對平措說：「你是藏族幹部，你來做代表磕頭好嗎？」平措說：「這對我一點都沒有問題，因為這是我們藏族文化的一部分。」平措就代表張國華，身穿藏人服裝，戴著皮帽，對達賴行了三次正式的磕長頭禮。

後來達賴問平措：「你為什麼不穿毛式服裝？」平措說：「不要以為革命只是衣著的革命，革命是思想的革命。」

一九五四年，達賴在北京會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習仲勳等，都是平措當翻譯，兩人相處久了，成了好朋友。就在他倆與毛三人交談的那個晚上，達賴對平措說：「毛主席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和別人不一樣。」

毛澤東對達賴說：西藏可以掛兩面旗

毛澤東是騙人嗎？不是。那時黨內也有傳達，毛對達賴講「西藏可以掛兩面旗，一面五星紅旗，一面雪山獅子旗」。那是一個初掌政權，有自信心的毛。不但對西藏，對新疆也一樣主張民族平等。

那時王震和鄧力群在新疆搞「大漢族主義」，欺侮少數民族，打壓維吾爾族幹部，製造冤假錯案抓人、殺人。毛澤東得到訊息，立即撤了王震新疆軍區司令的職，讓他解甲歸田，當了農墾部長。毛澤東派習仲勳到新疆，糾正王震的「大漢族主義」錯誤，還要習仲勳開除鄧力群的黨籍。毛認為王震是大老粗，在新疆亂搞是鄧力群出主意挑唆的。

習仲勳在新疆糾正了王震、鄧力群的錯誤，新疆的局勢穩定下來。但習仲勳沒有開除鄧力群，還幫他在毛澤東面前說了好話，把他調回北京。三十年後，鄧力群又挑唆王震反胡耀邦，習仲勳說：「悔不當初開除了他，留下鄧力群這個禍害！」

毛澤東的邊疆政策開始收緊，平措旺杰開始遭難

一九五五年，達賴回到西藏後，向張國華建議，請求中央派平措旺杰來西藏當

黨委書記。張國華曾向達賴表示中央原則上已同意，但後來沒有下文。

原來形勢起了變化。一九五六年開始，全國合作化運動在四川康巴地區、青海安多地區引發藏人反抗。而國際上則發生波蘭、匈牙利事件，蘇聯坦克開進布達佩斯。一九五七年，毛澤東收起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發動反右派鬥爭。毛澤東的邊疆政策開始收緊，平措旺杰也開始遭難了。

全國人大少數民族代表於一九五七年開過一個青島會議，會上有代表提出把四川的德格劃給昌都，平措表示「不可能」。後來傳說是平措提的，平措還專門為此向周恩來解釋，他當時是反對的。周恩來說：「是記錄記錯了，別當回事。」但還是整到他頭上。

另一條罪狀是由張國華揭發：「你進軍西藏時隨身帶了很多書，其中有一本是列寧論民族自決，你可得好好想想。」

這是事實。這本書是啟蒙他的共產黨員推薦他讀的，是對他走上共產主義道路影響很深的一本書，使他認識到共產主義是主張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的。為什麼會成為一種罪狀呢？

平措被留在北京，不准回西藏。在拉薩，則展開了對平措的「地方民族主義」的批判。

一九六〇年八月，平措被隔離（二十多年後平措得知，他被隔離時，曾有報告

給毛澤東，毛批示要查清楚問題，同時「盡一切努力把他爭取過來」，接著被送進秦城監獄。

一九六〇（一九七八年，平措坐了十八年牢，從三十八歲坐到五十六歲。一九七八年釋放後，被送到四川自貢安置，遭到監視，不准自由外出，尤其禁止去北京。

平措反抗，一九七九年二月擅自到北京，向中央申訴。

鄧小平：中國沒有辦法決定給西藏獨立

這時，全國形勢又起了變化。中國共產黨剛開過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完成同美國建交後，去了一趟美國，想解決西藏問題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鄧小平會見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那時的鄧小平，同一九五四年會見青年達賴時的毛澤東一樣，信心十足，寬容豁達。會見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嘉樂頓珠：我是以私人身分到北京的，達賴喇嘛沒有委託我來談判。

鄧小平：你就談吧，西藏獨立問題，不要說我，就是未來其他中國領導

人，都沒有辦法決定給西藏獨立。除了獨立以外什麼都可以談，今天就可以談。

嘉樂頓珠：二十年來流亡的大部分西藏人與家人失去聯絡，希望開放印度、西藏邊境，讓海外藏民可以回去探親。

鄧小平：一點問題都沒有，非常歡迎藏族人民回來探親，來去自由。西藏自治區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遊、或者去朝聖，一點不阻擋，我今天就下命令。

嘉樂頓珠：這些年班禪受了很多委屈，希望能恢復班禪的自由。

鄧小平：我馬上派人去處理，恢復班禪的職位，我們委任他做政協副主席。

嘉樂頓珠：達賴喇嘛利用印度政府的支持，辦了很多的學校，教育了學生，也培養了很多教員。聽說西藏很多學校缺少藏語教師，是否可以讓那裡的教師到西藏自治區做教育工作？

鄧小平：這好啊。可以來多少人？

嘉樂頓珠：初次先派三、四十人，以後每年增加。

鄧小平：不行，你要派一千人來，因為我們非常需要教語言的教師，西藏自治區需要，北京的民族學院都需要藏文先生。你們的教員藏、英文都懂，可

以來教。他們來了也可以看看我們的大字報，你們的青年人來，也可以貼大字報，發表他們的意見和看法。（鄧小平後來卻說：粉碎四人幫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取消憲法中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鄧小平繼續說：過去受迫害的不只藏區一個區域，很多人受迫害，包括我。（向在座的烏蘭夫）你關了多少年？

烏蘭夫：坐了九年牢。

鄧小平：我們大家往前看嘛。你（指嘉樂頓珠）轉告達賴喇嘛，希望他早日回來。回來後，過去的位子不會變動。

一九七九年秋，鄧小平邀請達賴派團訪問西藏，統戰部長楊靜仁請平措旺杰出席宴請達賴代表團的宴會。當時，統戰部擔心西藏翻身農奴，會出於對達賴的仇恨，而羞辱代表團，於是動員基層說服藏人，不要對達賴代表擲石頭、吐口水。

平措旺杰認為政府對藏人判斷錯誤，結果是代表所到之處，藏人狂熱歡迎，甚至有人哭喊：「達賴喇嘛萬歲！」

胡耀邦的「西藏六條」

消息傳到北京，震動了中央，也讓胡耀邦決心去西藏實地考察。胡耀邦為他的西藏之行作了充分準備。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十五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的西藏工作座談會，聽取西藏自治區的情況匯報，對西藏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兩天討論，形成第一個〈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胡耀邦在會上說：

加快西藏建設，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落實政策，深入批判極左路線，堅決肅清其流毒。經濟政策方面，要糾正各種「左」的錯誤。要積極培養藏族幹部，大膽提拔，放手使用，熱情幫助，具體指導，逐步做到全區縣級以上黨政群機關以藏族幹部為主體。在宗教政策方面，對在西藏人民群眾中有深遠影響的喇嘛教，必須慎重對待。要尊重信教群眾，妥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科學文化教育。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如平叛擴大化、錯劃富農成分等，要加緊處理。

胡耀邦知道，中央批轉一個座談會紀要解決不了問題，這不過是為他去西藏實

地考察「暖身」的準備。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一日，胡耀邦和萬里、阿沛·阿旺晉美、楊靜仁一行出發前往西藏。在飛機上，胡耀邦對隨行人員和新華社記者說：

我們不是去參觀，是去工作，是要實地看一看，同那裡的同志研究發展西藏經濟、使西藏人民生活盡快改善的大計。這是我們此行的主題。

西藏人民是勤勞的、勇敢的、智慧的人民，但是他們現在還很窮，生活很困難。我們黨中央的政策，就是要治一個「窮」字，建設一個富裕的、文明的、團結的新西藏。

中央為發展西藏經濟，準備採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起來是六個字：免徵，放開，走人。

免徵，就是全部免去全自治區的農牧業稅，至少兩年，還不准隨便無償徵用勞動力。

放開，就是在所有的經濟活動領域都要放寬政策，怎樣對生產有利就怎樣做，不要亂加限制。自留地、自留畜，群眾自己能搞多少就讓他們搞多少。房前屋後人家愛種什麼就種什麼。群眾手裡的東西允許人家自由交換。

走人，就是要逐步地把歷年進藏的漢族幹部大部分調回內地安排工作和生

活，只留下少數工作上確實很必要的，要求他們全心全意為西藏人民服務。

胡耀邦在拉薩，到工廠、學校、藏民家中實地考察，與各方人士接觸交談，聽取對西藏發展的各種意見。五月二十九日，在西藏自治區黨政幹部大會講話，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條」。胡耀邦說：當前西藏工作的總目標，是使西藏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比較快地提高起來，建設一個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為此要做好六件大事：

（一）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

西藏自治區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大自治區。在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沒有民族區域自治，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大團結。所謂自治，就是自主權。要在統一領導下，實行充分的、獨立的自主權。

要根據自己的特點制定法規和條例，保護民族的自治權和民族的特殊利益。

（二）堅決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大大減輕群眾的負擔。要確定在幾年之內免除西藏人民的徵購任務。徵，肯定要免去；購，也不分配任務，取消一切

形式的攤派任務。對農牧民的產品可以實行議購、換購，互相調劑，免除分配任務。這個政策可以促進農牧業發展。

（三）在所有經濟領域，實行特殊的、適合西藏的靈活政策。

西藏沒有什麼純農業區，一個是農牧區，一個是林牧區，一個是純牧區。單單搞農業沒有出路。要多種經營，農牧結合，林牧結合，搞手工業，政策要放寬。充分調動農牧民積極性，農民願種什麼就種什麼，不要干涉。一戶養幾十隻羊、幾條牛，發展副業，困難的國家可貸款。不要怕富，人民富了，國家才能富。政策要放寬、放寬、再放寬。

（四）把國家支援的經費，用到發展農牧業和藏族人民迫切需要上來。

國家給西藏的經費，比給其他省、區都要多。過去由於經驗不足，錢用得不得當，浪費很大。對國家支援的經費、物資、設備，要用得恰當，主要要在「一個發展，兩個提高」上，在發展西藏經濟的基礎上，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每年一定要為西藏人民辦幾件好事。

（五）大力恢復和發展藏族的文化、教育、科學事業。

西藏有世界聞名的藏族文化，有很好的佛教經學，優美的音樂、舞蹈，還有藏醫、藏戲等，值得研究和發展。現在西藏的教育事業發展不好，要考慮西藏的特點，辦大學、中學和小學教育。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尊重藏族人民的歷史文化。

(六) 正確執行黨的民族幹部政策，加強藏、漢幹部親密團結。

兩、三年內，要使國家脫產幹部中的藏族幹部占三分之二以上。醫師、教師、科研人員不受此限制，愈多愈好。在西藏工作的漢族幹部完成了歷史任務，走是光榮的。回去時，組織上絕對負責安排。

胡耀邦說：「提出這六件大事，目的是為了在兩、三年內扭轉西藏貧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超過歷史最好的生活水平，十年使西藏有比較大的發展，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期待在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藏、漢人民進一步加強團結，情同骨肉，永不分離。」

胡耀邦從西藏回來，六月的一天，邀請平措旺杰談話。胡耀邦的第一句話是：「你還活著，是一個大勝利。」這次談話的目的，胡耀邦提議派平措旺杰去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這正是二十五年前（一九五五年），年輕的達賴喇嘛向黨中央提出的建議。假如當時實現了，達賴會逃亡嗎？西藏的歷史會不同嗎？二十五年過去了，那時三十三歲的平措旺杰，已經五十八歲。平措在他的自傳裡說，他聽了胡耀邦的建議，「憑著強烈的直覺，謝絕了這個建議。」他對胡耀邦說：「繫獄多年，如今不熟悉西藏情況，此時不是一個合適的西藏領導人選。」

平措的「直覺」，其實出自他的經歷和對西藏現狀的觀察。西藏已經有了一個龐大而嚴密的權力結構，而且有通中央的人脈。這個結構裡，漢、藏兩族的幹部，未必願意平措旺杰這樣的人物去改變現狀。

王震、鄧力群與胡耀邦在新疆的角力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胡耀邦主持書記處會議，討論新疆問題，提出對新疆工作的六條。胡耀邦認為，新疆不像西藏那樣複雜，沒有流亡宗教領袖和流亡政府。那時也還沒有外國支持的疆獨運動。新疆的經濟、文化、交通等條件也比西藏好，問題的解決似乎不難。

胡耀邦未料到的是，以王震、鄧力群為代表的大漢族主義舊勢力在中央發難，不但攻擊中央對西藏、新疆的新政策，還想翻他們一九五〇年代在新疆搞大漢族主

義的案。鄧力群說：「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民族地區民族分裂主義的危險，他沒有認識。對一百多年的歷史，英國、印度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俄國要把新疆弄走，他完全忽視。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

在王震、鄧力群們的策動下，西藏和新疆的幹部思想陷於混亂。在新疆因有王震舊幹部在那裡遙相呼應，鬧得更兇。一九八一年秋，胡耀邦要我多下去做調查研究，我從北疆到南疆待了兩個月，可以說走遍了整個新疆。那時執行「新疆六條」的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汪鋒，已因王震在鄧小平面前「告狀」，被調出新疆。鄧小平派了軍隊幹部谷景生去，實際上執行王震當年在新疆的大漢族主義路線。我們（我和中央黨校的兩位同事）到新疆時，那裡的漢族幹部已經公開攻擊胡耀邦，而民族幹部卻支持「新疆六條」，擔心「實行不了」。

我們調查研究的主題，是新疆的經濟開發。但很快發現，新疆的經濟開發離不開民族自治與門戶開放。新疆有良好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當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當開放。為什麼新疆還那麼窮呢？尤其是南疆，我們到居民家拜訪，真是「家徒四壁」。

根本原因，一個是長期封閉，連漢、唐以來就打通的國際貿易要道也關閉了；

一個是新疆當地民族受到壓抑，得不到自由發展。所以當《新疆六條》傳到新疆時，新疆人民和民族幹部無不熱烈擁護。漢族幹部的反應並不一致；一部分政治文化素質較高，思想比較開放的漢族幹部，贊同新疆實行充分民族自治，對自己調回內地也易於接受。另一部分在新疆已獲得超過自己能力、水平的特權與利益的漢族幹部，則不那麼想得通。但如果沒有上面的後台策動，他們也只能被動接受中央政策。

王震、鄧力群與胡耀邦在邊疆政策上的重大分歧，當時在北京還不為人知，在新疆就非常公開化。我們一到喀什，一位維吾爾族幹部找到我們住所，非常激動地說：「胡耀邦的六條我們擁護，現在為什麼停止執行？漢族幹部說撤又不撤了。聽說反倒要把買買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維族領導人）調出新疆，這是怎麼回事？」他還說：「王震有一回來新疆講，他死後要葬到新疆的天山上。我們可不允許這個殺新疆人的異教徒骨頭弄髒天山的淨土。他要葬，我們就刨掉他！」

另一位維族幹部要我們向胡耀邦反應，派習仲勳來新疆。他說：「王震、鄧力群老早就鎮壓新疆民族幹部，是習仲勳來糾正的。習仲勳了解新疆人，他來才能把新疆搞好。」就我們所接觸到的最激進的新疆民族幹部，在當時也不反對漢人和漢族幹部，不主張從中國獨立出去。他們只是要求實現真正的自治，成為他們生存的這塊土地上的主人。他們反對的，是欺壓他們的王震、鄧力群那樣的大漢族主義份

子。他們歡迎幫助他們的，像胡耀邦、習仲勳這樣的漢族朋友。我們遇到的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等各族幹部和民眾，都對我們誠懇坦率，毫不戒備。有的不會講漢語的（在南疆），我們帶著翻譯，一樣交談得融洽。我們發現，凡是懂得新疆民族語言的漢族幹部，為我們當翻譯的，大都與新疆民族幹部、民眾相處較好，也較少大漢族主義偏見。但他們比民族幹部較多顧慮，不大敢反映意見，怕被領導知道，於自己不利。

我們在喀什接觸到一位長期在南疆工作的漢族老幹部，肆無忌憚地對我們大罵胡耀邦，連帶罵到當年的毛澤東。他說：「當年毛澤東把王震、鄧力群調回內地犯了大錯誤，助長新疆的地方民族主義。這回胡耀邦又來個六條，弄到西藏和新疆不可收拾，我們都快被趕走了。胡耀邦懂個屁，什麼充分自治？你把權給了他們，他們就要搞他們的東土耳其斯坦」。胡耀邦還要把漢族幹部撤回內地，那不就把新疆給了蘇聯、土耳其？這是賣國賊才做得出的事！」

胡耀邦對於西藏政策沒有讓步

西藏的狀況稍有不同。自治區黨委書記陰法唐一開始就抵制《西藏六條》。最初是陽奉陰違，暗中支持堅持「左」傾路線的幹部，阻撓《六條》的執行。後來看

到新疆已經停止執行《新疆六條》，開始反右，於是化暗為明，在西藏也搞起了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陰法唐給中央寫了兩次報告，強調西藏「思想戰線和宗教工作有渙散軟弱、放任自流傾向」、「宗教勢力抬頭，有的黨員參加唸經、求神、朝佛、轉經，宗教政策上必須反右」。

胡耀邦在西藏問題上沒有退卻。一九八四年二月，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召開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胡耀邦指出：「西藏近四年來農牧業生產徘徊不前，經濟文化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從領導工作看，主要問題是對西藏的特殊性認識不夠深刻，思想不夠解放，對搞活經濟的措施不夠有力，『左』的思想還很嚴重。這次會議，就是中央書記處同志和你們（西藏領導幹部）一起，對西藏工作的方針、政策，來一次再認識。」這實際上是針對陰法唐四年來抵制《西藏六條》而發。

接著，胡耀邦指出西藏的「特殊性」：(1)處於世界屋脊，地理環境隔絕，(2)長期封建農奴制，(3)單一藏族聚居的自我團聚力，(4)政教合一的喇嘛教，(5)世界輿論高度關注。

胡耀邦認為西藏領導幹部對這五點特殊性沒有深刻認識，在工作上存在四個害怕：怕不是在搞社會主義，怕黨的領導削弱，怕宗教影響愈來愈大，怕會出現大叛亂。

胡耀邦說，丟掉四個害怕，做好三方面的工作，西藏工作就能大進一步。

第一，把西藏經濟因地制宜地搞上去。

第二，做好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和宗教工作。

第三，保持發揚西藏固有文化。

胡耀邦還提出許多具體建議：

(一) **能源建設**。應發揮西藏自然資源優勢，開發水電、地熱、太陽能、風能。請沿海和內地各省支援包建，農牧業才能有所興革，擺脫落後狀態，不再燒林木、草、牛糞，保持生態平衡。

(二) **交通建設**。同內地的交通，要靠空運，搞大飛機，把機場建設好。區內交通，多修一點骨幹公路，發展運輸專業戶，讓老百姓自己買汽車、用汽車。

(三) **讓廣大農牧民富起來**。西藏二百萬人口，一百六十多萬是農牧民。西藏經濟建設的著眼點就是使農牧民富起來。農林木結合，以牧為主，多種經營，發展商品生產，讓農牧民自己放手生產和經營。

(四) **對喇嘛教**。西藏人普遍信教，地廣人稀，居住分散，為方便信教群眾，可以恢復一部分寺廟、經堂。宗教中妨礙生產和人民生活的東西，是精神枷鎖，應逐步加以適當改革，引進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幫助發展生產，改善生活。先改革滅害蟲即「殺生」、傾家蕩產佈施、頭破血流朝拜這三個問題，依靠藏族幹部帶頭，

黨政幹部帶頭，改革陳規陋習。

(五) 做好上層愛國人士的統戰工作。真正交朋友，多接觸、多談心，使他們了解全國形勢、全區形勢，重要問題徵求他們的意見。

(六) 培養藏族自己的專家幹部。西藏的繁榮發展，要靠西藏人民自己的努力奮鬥，要培養出一批自己的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教育家、法學家、醫學家、藝術家，一批西藏自己的農業、牧業、電力、交通、航空、地質等方面的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幹部。這種人才如果能在八十年代培養出二萬人，就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西藏的面貌就會很不相同。這是個帶有戰略性質的重大問題，應該細緻安排，認真抓好。一要努力提高現有三萬民族幹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學文化水平，二是要努力辦好西藏的小學、中學和大學，把西藏的教育文化事業搞上去，這是西藏人民徹底翻身的基本措施之一。

會議開了八天（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六日），胡耀邦七次講話。但陰法唐回到西藏仍拒不執行，因在中央有後台（王震、鄧力群）支持他。一九八四年八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派胡啟立（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田紀雲（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到西藏督促陰法唐執行中央政策，仍無效。終於在一九八五年六月派去新的自治區黨委書記伍精華，撤了陰法唐的職。

但那時西藏的形勢，正如平措所擔憂的，那個直通中央人脈的龐大而嚴密的權

力結構，經過陰法唐這幾年的經營，更加有恃無恐。他們連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都不買帳，何況一個彝族小兄弟伍精華？

伍精華為了深入藏民做工作，有時穿藏袍參與一些群眾宗教活動，被大漢族主義者譏為「喇嘛書記」。平措旺杰雖未接受胡耀邦建議去西藏工作，也遭大漢族主義者散佈流言攻擊。他們說：「現在世界上有三個最壞的、主張藏獨的藏人，一個在國外，達賴喇嘛；一個在國內，班禪喇嘛；一個在黨內，平措旺杰。」

平措旺杰雖未聽胡耀邦的話去西藏，但他給胡耀邦提過不少建議，如：

——一九五八年在西藏等地展開批判地方民族主義的做法是錯誤的，從此就沒有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平等。

——少數民族幹部必須真正有權，不能只給一個好聽的頭銜，卻沒有實權。

——少數民族地區人少地多，漢族地區人多地少，移民是必然的，但應有計劃、有步驟進行，不能危及少數民族經濟和文化上的生存利益。

——拉薩永遠不應變。拉薩在藏語裡是「聖城」的意思，就像麥加對穆斯林一樣。如果布達拉宮被大群高樓簇擁，周圍全是講漢語的漢人，中國政府就犯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中央應重新評估導致達賴出走的一九五九年西藏暴亂。不能動用軍隊鎮壓少數民族地區，不能用軍隊來做警察應做的工作。

平措旺杰的故事，已經由美國藏學家Melvyn C. Goldstein根據本人口述，寫成自傳體的《一個西藏革命家》。平措在〈後記〉中表達了自己的主張：「國家應該統一，少數民族不該分裂出去，但應該得到高度自治。」

平措還說：「達賴喇嘛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沒有理由懷疑達賴喇嘛的動機，沒有理由歪曲達賴喇嘛的真誠無私，沒有理由攻擊達賴喇嘛的人格。康區、衛藏、安多三區的藏人，都從心底想念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他們相信他，依靠他，祈求他的祝福。」

假如那時平措旺杰接受了胡耀邦的建議去西藏當自治區黨委書記，西藏的命運會不同嗎？西藏會實現他的主張「在國家統一下的高度自治」嗎？

恐怕會比陰法唐、伍精華在那裡的狀況好，但不會長久。從全國形勢看，最多到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平措旺杰不可能再在西藏待下去。平措遵循胡耀邦的《西藏六條》所做的一切，也會被新來者胡錦濤毀於一日。

這是從毛澤東帝國到鄧小平帝國的統治邏輯所決定的，不是平措旺杰和胡耀邦這些理想家的努力和犧牲能夠改變的。

一個帝國興起的時候，需要胡耀邦、平措旺杰這樣有理想主義和創新精神的先鋒去掃除障礙，開闢歷史前進的道路。但到了舊帝國殘留的障礙已經掃除，新帝國生長出自己的障礙時，這樣具有理想主義和創新精神的先鋒，就成了新的權力者鞏固個人統治的禁忌，非除掉不可了。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天安門「六四」屠殺之後，我在紐約見到達賴喇嘛，那是我第二次見到他了。

第一次是一九五四年，在原燕京大學臨湖軒前的草坪上。我那時在清華大學教哲學。在燕大我學的是工科，但清華校長蔣南翔成立了哲學教研室，他自己當主任，找我當講師，讓我在建築系開了一門哲學課，我就到北京大學聽蘇聯哲學家薩道維奇為北大哲學系開的哲學課，作為自己教學的參考。那時燕京大學已被撤銷，北京大學搬來了燕園。那天我聽完課，走到臨湖軒前草坪時，剛好遇到達賴和班禪從原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居住的臨湖軒中出來，碰了一個照面。我的印象只是兩個天真可愛的少年，絲毫沒有「活佛」的神秘感。他們是來這美麗的燕園參觀遊覽的。

三十五年後在紐約再見達賴喇嘛時，他已經五十四歲，容顏雖改，言談性格仍不失少年時的天真可愛，還是絲毫沒有「活佛」的神秘感。他對胡耀邦表示出真誠

的認同，他也了解一九八〇年的《西藏六條》。他說他就是受到《六條》影響，決定放棄獨立主張，改為爭取充分自治的，那第一條不就是「充分自治」嗎？他在史特拉斯堡的演說，就是爭取與中共談判實現自治，避免暴力與分裂。然而，由於一九八九年三月西藏的戒嚴和鎮壓，接著胡耀邦的去世和天安門的屠殺，達賴對談判雖有期待，卻不樂觀。

假如十年前西藏和新疆在充分自治的基礎上向世界開放，發展民族經濟文化，經過這十年建設，局面早已改觀，暴力與分裂完全可以避免。然而這十年，中共對西藏和新疆的統治，與兩個《六條》背道而馳。新疆在先，西藏在後，執行的是王震、鄧力群一九五〇年代初被毛澤東批判的大漢族主義路線，從而在新疆和西藏激起了比十年前更強烈的反抗意識，由於不相信中共的「自治」諾言而日益走上同中國分離之路。

中國邊疆政策已採同達賴喇嘛全面對抗的進攻戰略

現在又過了二十年，鄧小平帝國已經進入第三十個年頭。今年（二〇〇九年）三月，是西藏平叛五十週年，也是達賴喇嘛流亡五十週年。中國的邊疆政策，已經採取同達賴喇嘛全面對抗的進攻戰略。

第一，現任西藏黨委書記張慶黎，宣稱「達賴是一隻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我們同達賴集團進行著一場血與火的尖銳鬥爭，進行著一場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

這個張慶黎，來西藏前是新疆建設兵團司令員，他曾吹噓自己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不是軍人出身的司令員」。他出身於山東省地方幹部，到新疆後開始發揮他的特殊才幹。他當兵團司令員時，有一段名言：「我們兵團的使命是四個字：『屯墾戍邊』。戍邊就是穩定新疆，鞏固邊防，對民族分裂勢力、極端宗教勢力、恐怖勢力和西方敵對勢力，要狠狠地打！一露頭就打！」

胡錦濤選這樣的人到西藏，其用意十分清楚。張慶黎到任前先放話：「對那些藏人，該抓的要抓，該殺的要殺！」完全是王震當新疆軍區司令時對少數民族的口氣。來西藏後他又講：「西藏人民對共產黨非常熱愛，把共產黨看成佛祖一樣。」藏民極為反感。

第二，法定三月二十八日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日」，舉行「紀念百萬農奴解放五十週年」座談會。

座談會上出現了一位十九歲的十一世班禪喇嘛確吉傑布，在講話中不點名攻擊達賴喇嘛。他說：「西藏的穩定，面臨一個無恥的人（指達賴）的攻擊。我想真誠地感謝共產黨給了我一雙明亮的眼睛，讓我能夠明辨是非。我可以清楚識別誰是真

正熱愛和保護西藏人民，誰是出乎個人動機破壞西藏的平靜和穩定。」

有趣的是，這個在十世班禪喇嘛去世後由共產黨精心挑選和教育出來的年輕喇嘛，如此誠實地坦言他的「一雙明亮的眼睛」是「共產黨給的」，他是在用「共產黨給的眼睛」去「明辨是非」。所以他對達賴的攻擊，也只是代表共產黨的「是非」罷了。

第三，外交部長楊潔篪在人大、政協記者會上宣稱，禁止達賴到訪應成為國際準則。

德國記者提問：「是否歐洲國家領導人，只要接見達賴，即使只是隨便交談或喝杯茶，都會威脅到中、歐間的合作？」

楊潔篪答：「達賴是一個政治流亡者，中國同他之間的矛盾不是宗教問題、人權問題、民族問題、文化問題，而是要不要保持中國的統一，要不要允許把西藏從中國的版圖上分裂出去的問題。世界上任何國家在處理對華關係中，不允許達賴竄訪，不允許達賴利用他們這些國家的國土從事分裂活動，這是國際關係準則的應有之義。」

第四，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書，宣揚西藏建設成就，把西藏內部的緊張、衝突，完全歸之於西方煽動、破壞。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西藏問題專家本奈特（Robert Barnett）指出：「中國在西藏

實施的經濟建設，主要在觀光客最常去的城鎮中，目的只是為了吸引觀光客，這是中國對西藏經濟政策的基本結構矛盾。」

關於白皮書中對「西方煽動西藏內部緊張」的指控，本奈特說：「任何西方政府都不會蓄意煽動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他們需要中國一同對抗經濟危機。」

對新疆的統治，比西藏更殘暴

鄧小平帝國對新疆的統治，比西藏更殘暴。

第一，王震的「大漢族主義」陰魂在新疆始終不散。一九五〇年代毛澤東派習仲勳到新疆糾正王震、鄧力群的暴政，為時太短。王震雖然走了，他在新疆的「大漢族主義」勢力，早在王恩茂任區黨委書記時即已死灰復燃。一九八〇年代初，汪鋒在新疆剛開始執行胡耀邦的《新疆六條》，就因王震向鄧小平告狀而被調出新疆，恢復王恩茂、谷景生的高壓統治。

第二，二十一世紀初，全球進入反恐怖主義戰爭年代，江澤民和胡錦濤成功地把新疆維吾爾族的組織打成「恐怖主義」；並聯合新疆周邊的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建立「上海合作組織」，以「反恐」之名，暴力鎮壓新疆維吾爾族的民族自決運動。

第三，新疆沒有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對西藏產生雙重作用：一是對內，遵循理

性、和平的「中間路線」，凝聚西藏的團結力量，使民族自治運動能夠長期堅持；二是對外，達賴的國際威望，使西藏人權狀況獲得全球關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國在行使暴力上尚不得不有所節制。新疆缺少這兩方面制約，致使新疆內部的抗爭力量分散，方式激烈；外部缺乏國際對新疆人權狀況的關注，讓中國政府肆無忌憚，為所欲為。

從胡耀邦的《六條》，退回王震、鄧力群的「大漢族主義」

邊疆政策不可能離開一個國家對內、對外的全盤戰略。一九五〇年代初，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新國家誕生與興起的年代；一九八〇年代初，是這個國家從動亂衰敗中重新奮起的年代。那兩個年代，不僅邊疆政策，對內、對外的全盤戰略，都是自信的，開放的，無所畏懼的，鄧小平不是要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讓流亡印度的藏族青年「回來看大字報、貼大字報，發表他們的意見和看法」嗎？鄧小平不是還說過「天塌下來也不怕，有胡耀邦、趙紫陽頂著」嗎？

那是對全國人民開放的年代，對世界人民開放的年代。但曾幾何時，鄧小平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憲法，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從憲法中去掉。他害怕了，害怕自由，害怕民主，害怕人權，害怕大字報；他當然也害怕民族區域

自治，害怕給藏人、新疆人自由、自主權。一旦給了西藏人、新疆人自由、自主權，全國人民跟著要起來，不就是全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演變」了嗎？

所以，從胡耀邦的《六條》，退回王震、鄧力群的「大漢族主義」邊疆政策，是鄧小平帝國歷史發展的必然。他所反映的是鄧小平與胡耀邦、平措旺杰這些改革先鋒們在世界觀上的根本分歧。

胡耀邦的世界觀很清楚：權力不是目的，生產不是目的，國家也不是目的；人民，每一個個人的自由、自主和幸福，才是生產的目的，國家的目的，領導人行使權力的目的。對西藏，對新疆是這樣，對全國，對全世界、全人類都這樣。

一九八八年五月，胡耀邦罷官為民已一年多，在一位農民企業家霍宗義的陪同下，到了河北涿州，看了小學、圖書館、幼兒園和幾家農戶。離開時，聞訊而來的民眾三千七百多人給他送別。胡耀邦應霍宗義之請，寫了四個字：「強國富民」。他倒過來唸給霍宗義聽：「民——富——國——強」。民是目的，有民才有國，國為民而存在，這就是胡耀邦的哲學。愛因斯坦也講過類似的話：「國家是為人而建立的，但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的。這就是說，國家應該是我們的僕從，而我們不應該是國家的奴隸。」

這不是同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針鋒相對嗎？

鄧小平帝國的全球戰略

從「三個世界」轉向「一條線」，以聯美制蘇爲核心

毛澤東晚年的全球戰略，基本上是防禦性的，主要防蘇聯，他概括成「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九個字。

這並非「杞人憂天」。蘇聯確曾有意與美國聯手，消滅中國核武，被美國拒絕。而毛澤東在「文革」導致經濟瀕臨崩潰的關鍵時刻，聯美制蘇，請尼克森、季辛吉到中國，卻是全球戰略的一步高棋。正當季辛吉在北京「為尼克森訪華做基本安排」結束返回美國那一天（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通過決議驅蔣（介石）迎毛（澤東），使中國從此擺脫國際孤立境地。毛澤東晚年的全球戰略，已從「三個世界」轉向「一條線」——聯合美國、日本、西歐，遏制蘇聯霸權擴張的

國際統一戰線，其核心是聯美制蘇。

鄧小平恢復權力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他後來自稱的「在憲法中取消四大」，而是同美國談判建交，延續毛的聯美制蘇戰略；而且比毛更進一步，從防禦轉向進攻。鄧小平說：「蘇聯是大霸，越南是小霸。」打越南，是打給美國看，也是打給蘇聯看。鄧小平的戰略估算是，他先訪美國，後打越南，算定蘇聯不敢對中國動手，因為蘇聯怕美國。當時，中國駐新疆部隊怕蘇聯在北邊動手，部隊家屬紛紛撤離新疆，被鄧小平批評。結果，鄧小平的越南之戰雖然在軍事上打得難看，但聯美制蘇戰略跨進一步的目標是達到了。

胡耀邦對「聯美制蘇」戰略的挑戰

那時對聯美制蘇或聯美反蘇戰略提出挑戰的是胡耀邦。

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第九十次會議討論外事工作。胡耀邦針對當時「聯美反蘇」的戰略方針，提出不同看法，講了對蘇政策必須分清的三個界限，以及獨立自主外交戰略的三條原則。

對蘇政策的三個界限是：

第一，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但不反他的國內政策，不干涉他國內的問題，不

要提「聯美反蘇」。

第二，不要把政治鬥爭、反霸權主義，同平等互利的經濟往來混為一談。胡耀邦提到：「新疆那個地方，如果是邊境貿易開放一點，就可以進口蘇聯的長筒馬靴；新疆可以拿哈密瓜等東西出口。只要對我們有利，小額貿易可以，中額貿易也可以。」

第三，不要使人誤解中國同蘇聯整個國家相對立。相反，要同蘇聯廣大人民，同蘇聯社會知名人士，盡量保持友好關係。邊境部隊要提高警惕，但千萬不能不通情達理，不近人情地形成兩國部隊戰士的高度仇恨。

胡耀邦說，「區分三個界限，就是要去掉『左』的幼稚行為。我們做得正常，能使世界上相信我們；做得過頭，人民反而反對我們。」

獨立自主外交戰略的三條原則是：

- (一) 任何時候不依附任何外國，不跟任何一個國家的指揮棒轉。
- (二) 不受任何一種國際上的臨時事件所支配。胡耀邦說：「國際上出現一些臨時事件，好像很嚴重。我們要冷靜考慮、冷靜分析臨時事件對我國的根本利益有什麼關係，但不受臨時事件所支配、所左右。」
- (三) 不為國內外某種一時的情緒所蒙蔽，所激怒。不要一觸就跳，不要被來

勢洶洶的環境和情緒所蒙蔽，所支配。要考慮國內外廣大人民的呼聲，但不受其蒙蔽和支配。

胡耀邦說：「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不容易的，需要堅定的原則立場和冷靜的政治頭腦，需要在不斷的實踐中堅定我們的主張，豐富我們的經驗。」

胡耀邦把他的講話印成書記處會議紀要，送政治局常委。葉劍英表示讚賞。趙紫陽對胡耀邦說：「你太大膽了，敢印出來！」胡耀邦後來對李銳說，當時「上面」傳來很厲害的一句話：「你要樹立自己的形象！」

胡耀邦與鄧小平帝國的分歧

胡耀邦本來就有鮮明的形象，不需要蓄意去「樹立」。在中國共產黨內，胡耀邦是罕見的具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異數」。他的性格是自由的，獨立的。他喜歡無拘無束地與朋友、同事、下屬、普通百姓、年輕後輩平等地議論天下大事，從農民生活到全球戰略，海闊天空，無所畏懼，他叫作「醞釀思想」。胡耀邦的許多戰略思考，就是這樣形成的。

胡耀邦的這種性格，在他當中央黨校副校長時，還是被肯定的。他敢於主持平反冤、假、錯案，他敢於發動真理標準討論，他敢於挑戰兩個「凡是」，不就是出

自他的自由、獨立性格，為人所不敢為嗎？然而，當了總書記，就遭人非議。連關心他的人都勸他：「你每天在那麼多文件上批這麼辦，那麼辦，可招人忌哪！」胡耀邦回答：「每天那麼多問題等著解決，每個人都畫個圈圈，推出去；我不批、不辦，誰辦？這可都與人民的命運相關的哪！」

吳江還向胡耀邦推薦《晉書·堯俞傳》，勸他「厚重言寡，遇人不投城府，人自不敢欺」這套儒、法之道的帝王統治術。胡耀邦通讀二十四史，豈會不知？

胡耀邦不屑此道，他要創立一種光明磊落，真誠無偽，真正為人民，為未來，為真理的新時代的新政治。於是就被指為「你要樹立自己的形象」，也就是不符合鄧小平、陳雲的「凡是」。

鄧小平、陳雲這兩個婆婆，從經濟思想到全球戰略，全都不南轅北轍。一個要市場經濟，一個要計劃烏籠。一個講「發展是硬道理」，主張「向全球開放」；一個講「捨發展，抑需求，緩改革」，主張「肥水不流外人田」；一個聯美反蘇，一個親蘇恐美。兩個婆婆意見分歧，還不願開常委會一起討論。鄧小平對胡耀邦說：「談不攏，會不要開了。」胡耀邦因此在組織原則上格外謹慎。

第一，一切決策與執行程序，均拿到每週兩次的書記處會議討論；會後印成書記處會議紀要，呈交政治局常委。全球戰略也好，邊疆政策也好，都是書記處會議討論決定，上報政治局常委的。胡喬木、鄧力群在書記處會議上不說，會後跑到鄧

小平、陳雲那裡去「告狀」。

第二，常委會開不成，胡耀邦逐個拜訪。

胡耀邦下台時，胡喬木精心設計了一條罪狀，叫作「違背鄧小平代表的政治局常委領導集體」。然而，不開常委會不是胡耀邦不開，正是「政治局常委領導集體」的「代表」鄧小平不讓開。胡耀邦說：「我尊重老人，又獨立思考，盡力在兩位老人之間溝通協調，遇大事必逐個常委拜訪請示。」

最後，還是兩個婆婆聯起手來，藉反自由化廢掉了胡耀邦。這不是胡耀邦個人的悲劇，這個悲劇不但影響到中國的命運，而且影響到世界的命運，人類的命運。胡耀邦與兩個婆婆的分歧，是兩種世界觀、兩種全球戰略、兩條中國發展道路的深刻分歧。

胡耀邦的世界觀、全球戰略、發展道路，出發點和目的都是人。從人出發，人是目的；黨和國家為人民而存在，人民不是為黨和國家而存在；人民是主人，不是黨和國家的奴隸。這是胡耀邦的一貫主張。他走遍天涯海角、高山叢林，想的是讓人民富裕起來，要藏富於民，民富才能國強，發展是為了每一個人的自由與幸福。胡耀邦說：

我們共產黨時時刻刻為人民著想，使人民盡快富裕起來。只要人民富裕起

來，我們就有辦法。絕不能把人民利益同國家利益對立起來。國家的利益離開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沒有意義的。試想，離開了人民，還有什麼國家？

鄧小平的世界觀、全球戰略、發展道路，正好顛倒過來：「國權高於人權」、「國格高於人格」。出發點和目的都是黨和國家，黨性高於人民性，人民是黨和國家的馴服工具、齒輪和螺絲釘。鄧小平否認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視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顛覆黨國的動亂因素。

至於陳雲，更不必說，向來是「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人民永遠是「小頭」。所謂「國家」和「集體」，正如胡耀邦所說，離開了人民就是抽象的，沒有意義的。但對陳雲、鄧小平卻是具體的，大有意義的，他們拿了「大頭」，拿了「中頭」，才能滿足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需要，才能滿足獨裁者權力的需要。

這樣一個高於人民的國家是什麼國家？這樣一個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思想」，「二百年不變」的國家是什麼國家？這樣一個以專政手段消滅自由、民主、人權思想於萌芽狀態的國家是什麼國家？當然只能是鄧小平帝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鄧小平帝國崛起之路。

中國的兩種不同選擇

一九八〇年代的中國，的確存在過兩種不同的選擇。胡耀邦曾經力排眾議，主張選擇一條通向中國人民自由、平等、幸福的新路。他指出當代世界發展戰略的不同模式：

一種是蘇聯、東歐的高積累模式，加重人民負擔，壓縮人民消費，強制發展軍事、重工業生產，而不是滿足人民的需要。這種模式不能調動人民的主動性和創造力。

另一種是資本主義模式，高度競爭，目的是追逐高額利潤，但同時導致社會的不平等。

胡耀邦認為中國應創造一種新的模式，即以滿足人民物質和文化需要作為目標的發展模式。因此，需要處理好「生產與消費」、「發展速度」、「對外經濟戰略」、「關注第三產業」、「保護生態環境」等一系列新問題。胡耀邦對這些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獨立主張，結果卻使自己陷於孤立，被扣上「高消費」、「高速度」、「反對保四爭五」等好幾頂帽子。先是被排除出經濟決策班子，然後在逼他下台的「生活會」上，再度遭到圍攻。

一九八〇年代，這場經濟發展戰略的爭論，事實上是「反自由化」爭論的一部

分。表面看來，經濟發展戰略爭論主要發生在胡耀邦與陳雲之間。趙紫陽說，鄧小平和胡耀邦都主張高速度（百分之七），他和姚依林主張留有餘地，「保四爭五」。但本質上這不只是速度之爭，是發展戰略目標之爭，是為人民自由幸福，還是為帝國霸權之爭。因為速度問題事實已作了結論：一九八二年增長百分之八點七，一九八三年百分之十三，一九八四年百分之十四點二，一九八五年百分之十六點四，不但超過陳雲、趙紫陽、姚依林的「保四爭五」，也超過鄧小平、胡耀邦的百分之七，毋庸爭辯。

分歧在於發展道路與戰略目標。所謂胡耀邦「樹立自己的形象」，就是另一條不同於鄧小平帝國之路的選擇。胡耀邦的經濟發展戰略與政治民主化的選擇，在方向上是一致的。那時從南歐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經向全球擴展，中國的自由民主力量也在興起，成為全球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一九八〇年的人民代表競選運動，一九八六年的學生民主運動是兩次高潮，都被鄧小平、陳雲聯手的反自由化撲滅，拿胡耀邦做了給鄧小平帝國祭旗的第一個犧牲。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引燃的學生民主運動和全民民主運動，是第三個高潮，又被鄧小平、陳雲聯手撲滅，拿示威民眾的鮮血和趙紫陽的自由，再度給鄧小平帝國祭旗。大致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這場經濟戰略與發展道路之爭即已經結束，抽象的國家利益占了絕對上風，人民的自由、幸福已被徹底犧牲。胡耀邦去世後的人民民主運動，一定意義

上可以代表這場人民權利 vs. 帝國霸權之爭的廣場效應，最後由坦克和子彈決定了勝負。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的歷史證明，胡耀邦以人的自由、平等、幸福和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為目的的發展戰略，是完全正確的。鄧小平帝國的崛起，正是選擇了胡耀邦力圖避免的高積累和追逐高額利潤的兩種舊發展模式的綜合。對內片面追求國家財政收入增長指標，壓低人工工資，抑制人民消費，製造貧富懸殊。對外以高額利潤指標與國家優惠政策磁吸跨國財團，在中國生產廉價商品，霸占全球市場。在GDP高速度成長的同時，犧牲了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犧牲了大地和天空、青山和綠水，製造了各種社會災難（礦難，愛滋村，癌症村，黑磚窯，黑煤窯，黑社會，毒品氾濫，販賣婦女、兒童等），為子孫後代留下沉重的自然環境惡化和社會道德敗壞的負擔。

鄧小平「兩個基本點」路線的延伸

鄧小平帝國的全球戰略，是鄧小平「兩個基本點」路線的延伸。一手向全球開放，利用全球資本、資源提升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全球影響力；一手抵制自由民主人

權普世價值，鞏固和強化專制帝國的霸權統治。

第一，向全球開放的重點，是對西方發達國家開放。

鄧小平說：「我們吸引外資、引進技術等，主要從西方發達國家那裡來。」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屠殺後，G 7 對中國政府實行制裁時，鄧小平說：「儘管七國制裁我們，我們堅持一個方針，同美國繼續打交道，搞好關係；同日本、歐洲國家繼續打交道，搞好關係。這一方針，一天都沒有動搖過。」

為同美國「搞好關係」，鄧小平帝國特別看重做華盛頓、華爾街政、商、學界「有份量人士」的統戰工作。如華爾街高盛公司的佐立克、鮑爾森，就是中國政府統戰的重點人物。後來兩人都到了華盛頓，佐立克擔任副國務卿，鮑爾森任財政部長，參與對中國政府有利的決策。

第二，向全球開放的同時，堅決抵制全球民主化浪潮，拒絕自由、平等、人權普世價值和政治制度改革。

鄧小平說：「有人說中國開放政策會導致資本主義。如果真的導致資本主義，我們這個政策就失敗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

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

他還說：

要求全世界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世界上那麼多伊斯蘭國家根本不可能實行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的五分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向美國學習資本主義，中國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還有非洲。這是世界局勢的一個大背景。

許多西方學者預期中國的開放和經濟發展會導致政治自由，像蘇聯、東歐國家一樣，放棄共產主義。這是不了解中國，不了解鄧小平的帝國戰略。鄧小平正是鑒於蘇聯、東歐共產帝國崩潰的歷史教訓，格外重視強化國家機器「消滅一切自由化動亂因素」的能力，防止「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他說：「問題不是蘇聯的旗幟倒不倒，而是中國的旗幟倒不倒？中國的旗幟不但不會倒，而且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

第三，以「多極化」戰略聯合奴役制度國家，統戰分化自由民主國家，迫使全球第二波民主化退潮。

蘇聯、東歐共產帝國崩潰之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在經濟領域需要依賴美國的資本、技術與市場，需要同美國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但又必須在思想、政治領域抵擋住美國在全球擴展自由民主的「國際大氣候」，杜絕「和平演變」的可能性。

鄧小平帝國的「多極化」戰略，包括幾個方面：

一是扶植奴役制度瀕臨崩潰的「失敗國家」，使之起死回生，成為中國抵制全球化浪潮的同盟軍。如緬甸、北韓、蘇丹這些反人權軍事獨裁政權遭國際制裁瀕臨崩潰時，都是中國出手支持扶植，或供給武器，助其鎮壓國內反抗；或供給糧食、能源，助其免於經濟崩潰。這些國家在中國扶植下，鞏固了軍事獨裁統治，自然樂於充當中國抗衡全球自由民主力量的夥伴。

二是建立各種區域性國際合作組織，擴大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如上海合作組織（中、俄、中亞國家，吸收伊朗為觀察員）、東盟十加三（中、日、韓）、中國－非洲論壇、拉美國家組織（中國參與）、金磚四國（中、俄、印度、巴西）等等，這些形形色色的國際組織的共同點，就是排除美國和歐洲自由先進國家，擴張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影響力，以國際統一戰線，挑戰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

三是統戰分化自由民主國家，利用自由國家之間的分歧和競爭，縱橫捭闔，各個擊破，分化美國與歐、亞盟國之間的關係。這是中國傳統「以夷制夷」戰略的古

為今用。主要是以一時的經濟利益為誘餌，迫使西方自由國家放棄其價值堅持，順從中國的政治目的。

第四，通過對外投資和對外援助，擴大對全球資源的支配權，並影響資源國家的政治、經濟走向。

中國倚仗其二兆美元的外匯存底，對資源的投資已遍佈亞、非、歐、拉美、澳大洲。

在非洲的擴張尤其迅速。中非貿易從一九九八年的一千萬美元，增長到二〇〇八年的一千億美元，十年增長一萬倍。中國在海盜出沒的索馬利亞海域尋找石油。中國在非洲投資的礦產，有尚比亞的銅礦，南非的錳礦，尼日的鈾礦，剛果的鈷礦，蘇丹、安哥拉的石油，還有幾內亞、辛巴威的其他貴金屬。

在澳大利亞，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的一年間，中國對礦產投資已達四百億美元（包括鉻、鋅、鐵等）。

在俄羅斯和巴西，中國在二〇〇九年提供各二百五十億美元和一百億美元的貸款，在未來二十年用原油歸還。

在歐洲，中國商務部長歐洲之旅，在德國、瑞士、英國、西班牙撒下三百億美元的收購合同。

在拉美，習近平於二〇〇九年到了美國後院拉丁美洲，增加投資委內瑞拉查維茲總統基金，從六十億美元增至一百二十億美元，增加一倍。查維茲的報答是委內瑞拉提供給中國石油，從每日四十萬桶增至一百萬桶，增加一倍半。

習近平在巴西和阿根廷投下各一百億美元，厄瓜多十億美元。

在東盟，二〇〇九年中國為東盟設立一百億美元基礎建設及網路建設基金，並為東盟各國提供一百五十億美元的信貸。

中國政府的確有錢，一個經營海外投資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就擁有一千億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供對外投資之需。

中國的投資一舉兩得：自己獲得了全球資源的開採和支配權，又鞏固了不發達地區，如蘇丹、辛巴威等資源國的專制奴役制度。因為自由國家的投資、外援有人權要求，中國的所謂「無條件」、「無勞工權益保障」、「無環境標準要求」、「不干涉內政」，實質上就是維護不發達國家的奴役制度不變。尚比亞商會負責人沃納尼（Wilfred Collins Wonani）說：「我們又回到了原來的起點，把原料送出去，把中國廉價的製成品帶進來，這不是進步，是殖民主義。中國是代替西方的非洲殖民者。」幾內亞的礦工抱怨他們下礦勞動兩個月，還沒有從中國工頭那裡拿到工資。

他們說：「我們像奴隸一樣幹活，然後像奴隸一樣沒有報酬，中國沒有給幾內亞帶來什麼好處。」看來，中國工頭已把壓榨中國農民工的手段帶到了非洲。

第五，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合群的自大」，對抗自由國家對中國政府藐視人權的批評，造成西方政府怕「中國不高興」，不敢批評中國暴政的國際環境。

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國的暴政一度遭到自由國家的批評和制裁。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遭到中國人民質疑。接著蘇聯、東歐、共產帝國崩潰，中國共產黨內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喪失殆盡。中國為對抗這股鄧小平稱之為「沒有硝煙的世界大戰」，舉起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旗幟。

鄧小平說：「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要制裁中國，馬上就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七國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國再加上沙俄和奧地利，就是當年組織聯軍的八個國家。」「西方世界確實希望中國動亂，美國還有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過去拿武器，用原子彈、氫彈，現在搞和平演變。別國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中國的事情我們就得管。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哪裡能有現在的中國？中國人要振作起來，我們還有幾千萬愛國同胞在海外，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對我們的國家要愛，愛黨，愛國家，愛社會主義，讓我們的國家發達起來。」

天安門屠殺以後的二十年，是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意識形態極度膨脹的二

十年，產生了一支拉「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大旗做虎皮的「憤青」隊伍，把中國特色的「合群的自大」表演得淋漓盡致。他們比滿清末年的義和團瀟灑得多，面對的不是一九〇〇年帝國主義的洋槍洋砲，而是二十一世紀戰戰兢兢的法國「家樂福」商人，何況背後還有鄧小平帝國龐大的武警部隊和「人民解放軍」做後盾。法國商人除了表示歉意，拿出鈔票捐獻消災之外，還有什麼別的選擇？

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憤青」們「合群的自大」，的確比中國共產黨政府自己出面的抗議聲明有效得多。從此，西方政府不敢對中國政府的暴政說三道四，西方媒體即使有所報導，也都自動壓低聲調。不用說希拉蕊·柯林頓國務卿訪問中國，不敢對中國政府踐踏自由人權置一辭，連以「人權鬥士」聞名於世，曾經在天安門廣場拉開橫幅標語抗議中國政府的美國國會議長裴洛西，都放低聲調，在北京只談「環境人權」了。

自由國家在中國暴政前噤聲的根源，當然不只是害怕「合群的自大」的「憤青」，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政府現在有錢了。

全世界人民最窮的大國，是全世界人民最富的大國的最大債主

中國靠反人權的勞動制度（低工資、高工時、高失業率、無人權保障的農民工

血汗制度）成為全球製造工廠，靠超大量廉價商品在全球市場獲取巨額貿易順差和外匯存底，大量購買美國國債，使中國這個世界上人民最窮的大國政府，成為美國這個世界上人民最富的大國的最大債主。

這個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奇跡，讓自由國家的知識菁英們看花了眼，顛倒了傳統的普世價值，對中國這個「崛起」的奴役制度帝國，唱起了迷人的讚歌，不再關切奴役制度下被壓榨、被剝奪基本人權的奴隸，反而張開雙臂，擁抱這個奴役制度帝國，邀他領導世界呢！

第六，中國並不急於領導世界，而是首先鞏固和擴展鄧小平帝國開放式共產奴役制度在全球的實力地位。

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產生的一個有趣現象，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人物和知識菁英，競相主張讓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秩序的領導和國際經濟規範的制定，而中國政府卻欲迎還拒。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二日，布里辛斯基在中美建交三十週年紀念會上提出「中美兩強（G2）高峰會」的建議。季辛吉也撰文主張建立美中「命運共同體」（a common destiny）。季辛吉說：「當初基於各自需要，為牽制共同敵人而設計的戰略關係，今天已經演進到支撐國際體系的支柱作用。美中命運共同體結構，將把兩國

關係提升到類似二次大戰後大西洋兩岸關係的高度。美中在未來國際政治、經濟結構中共同扮演關鍵角色，使兩國成為世界進步與繁榮、和平與穩定的兩大支柱。這也就是希拉蕊·柯林頓國務卿於二〇〇九年二月訪華時提出美中「同舟共濟」的具體設計。

美中G2共治，去年（二〇〇八年）開始成為美國政、學界的熱門話題。美國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在第四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 E D）中認為：「中國定位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是不夠的，必須讓中國成為『真正的共同領導者』。」

伯格斯登是最早提出美中G2共治的，早在二〇〇四年，但那時還沒有人響應。去年（二〇〇八年），他強調：「除了G2，沒有什麼更能充分吸引中國和美國共同創造更有效的、世界亟需的領導。中國經濟實力雖不及美國和歐盟，但中國有龐大的對美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是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美國應成全中國成為國際經濟秩序的合法建築師和管理者。」

伯格斯登說：「一個富饒的發達國家和一個貧窮發展中國家的這種關係，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正如中國作為一個貧窮的經濟超級大國，也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何漢理（Harry Harding）也認同美中G2共治的主張，他在二〇〇八年五月國

會（參議院）聽證會上說：「美國要讓中國首先成為規範的起草者，把中國作為管理世界經濟的主要搭檔。」

但中國政府並不急於同美國聯手領導世界。中國全球戰略的重心，在鞏固和擴展中國典範（China paradigm）在區域和世界的實力地位，同美國打那場鄧小平稱之為「沒有硝煙的世界大戰」，解決「誰演變誰」的歷史課題。

胡錦濤在二〇〇九年東盟論壇（ARF）時強調：「中國和東南亞國家應超越已經過時的、老舊的美國硬實力聯盟的構思，邁向經濟、政治合作的新時代。」

美國國防與戰爭學院教授奧特在傳統基金會的演說中，對胡錦濤的主張有以下評論：

胡錦濤的構思代表軟實力和硬實力結合的概念，這是根據中國作為在東南亞地區傳統大國的地位和實力迅速擴展的觀點做出的。中國通過外交、經貿，以及包括發展航空母艦的海軍力量等軟、硬實力的手段，有系統、有計劃地擴張在東南亞地區的勢力和影響力。例如中國在湄公河上修建水壩，控制下游湄公河流域的國家用水，是中國在東南亞地區擴張的典型例子，手中握取了對東南亞半島國家施加影響力的新工具。

中國的多邊主義戰略，吸引了像俄羅斯、印度、伊朗這樣的地區大國。俄羅斯學者季塔連科在《遠東的地緣政治意義》一書的結論是：「俄國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國，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俄國。俄中聯手是反霸力量合作的基礎。」

自由制度與奴役制度的最後一戰

鄧小平帝國的三十年，按其歷史發展，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

(一) 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從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到天安門屠殺，是鄧、陳、胡、趙共治，到鄧、陳與胡、趙決裂的十年，也是鄧小平帝國的形成期。

中共御用史家把十一屆三中全會描繪成鄧小平開創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偉大轉折」，這是歷史的偽造。本書已根據歷史資料指出，後來被稱為「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的講話稿，是一篇「急就章」。事實是當時會內會外的形勢，迫使鄧小平跟上「歷史的轉折」，廢棄了胡喬木給他起草的舊稿子；而不是鄧小平開創了「歷史的轉折」。三個月後，鄧小平的那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正好是對三中全會講話兩大主題「解放思想」與「民主」的自我否定。

那才是貫穿鄧小平帝國三十年的靈魂。

有人把鄧小平帝國初期的歷史，寫成頗具浪漫色彩的「鄧胡趙體制黃金十年」，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第一，這十年中，無論在政治上反自由化，在經濟領域反市場化，以至倒胡廢趙，陳雲和他的幫派（王震、鄧力群、胡喬木、姚依林等）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所以要說「共治」，也是鄧、陳、胡、趙共治，並非「三駕馬車」。四個人中，從意識形態、戰略方向、政策選擇到工作方式，均有重大分歧，因此最後決裂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內罕見的具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異數」。他喜歡無拘無束地與朋友、同事、下屬、普通百姓、年輕後輩平等地議論天下大事，從農村生活到全球戰略，海闊天空，無所顧忌，他叫作「醞釀思想」。胡耀邦的許多戰略思考，就是這樣形成的。有一回議論五四運動的遺產，當時有人否定五四，認為是「全盤西化」。胡耀邦說，五四主要是請來了「德先生」（Mr. Democracy）和「賽先生」（Mr. Science）；民主與科學是普世價值，是人類文明，怎麼叫「西化」？現在看來，我們還要請一位馬先生（Mr. Market），市場經濟也是普世價值，是人類文明。中國現代化，離不開這三位先生。所以胡耀邦主張全面改

革，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決策科學化。

鄧小平與胡耀邦在政治改革上有重大分歧。鄧小平在經濟上是「改革派」，在政治上是反自由化的「保守派」，這是他自己說的。那麼為什麼他要把胡耀邦推上台？

當胡耀邦被推舉為黨主席時，胡耀邦「不下十次堅決推辭，始終沒有贊成過」。他說：「無論從資望來說，從政治能力來說，從目前領導格局來說，從常委班子實際狀況來說，自己都是難以勝任中央主席這個職務的，應當由鄧小平擔任為好。」

但鄧小平執意不幹，要胡耀邦「當仁不讓」。葉劍英剛開始主張讓華國鋒再過渡一段時間。事實上，華國鋒在三中全會承擔提出「兩個凡是」的責任，作了檢討之後，表現是好的，抵制了胡喬木、鄧力群的反右挑撥，明確表示「不能再反右」！胡耀邦也同意葉劍英的主張。但陳雲、鄧小平堅持要華國鋒下，陳雲還說了句：「你們兩個矮子（指鄧小平和胡耀邦）裡出一個吧！」

葉劍英沒有堅持，還檢討自己想保華國鋒，有不負毛澤東遺願的封建思想殘餘。葉也認同「胡耀邦人才難得，能當此重任」。

一九八一年六月，胡耀邦被選為黨主席時，說了這樣一句話：「我是在我們黨的一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被推上現在這個崗位的。」

什麼「特定的歷史條件」呢？

就是毛澤東帝國已經終結，新的政治力量已經誕生，代表舊帝國的舊勢力還沒有死去的方生未死之間。在這樣一個需要排除舊勢力、舊思維、舊方法的阻撓，開創歷史前進新局面的特定歷史時期，靠老資格、老本領、老權謀，都沒有用；需要新思維、新方法，需要遠見卓識，去明確前進的方向目標，需要非凡的意志力和勇氣排除艱難險阻，去實現目標的社會新生力量的代表和領袖。而在共產黨領導人中，符合這種特定歷史時期需要的，胡耀邦是獨一無二的人選，歷史需要他扮演一個新時代的開創者。

你看，當中國需要思想理論上的改變，拋棄對毛澤東教條的迷信時，胡耀邦到了中央黨校；當需要組織上的改變，糾正毛澤東帝國製造的大量冤假錯案時，胡耀邦去兼任中央組織部長；當宣傳文化系統思想僵化，無法適應時代的前進時，胡耀邦兼上了中央宣傳部長；當三中全會改革到毛澤東帝國的黨機器時，胡耀邦成了新設置的黨中央秘書長，五中全會又成為黨總書記。胡耀邦的秘書高勇說：「當時耀邦同志在很短時間內把黨的重要職務全都當了。那段時間好像哪裡都需要耀邦同志，而且他到哪兒，哪兒的局面就能很快打開。」

第三，中共十二大後，胡耀邦頭上壓著鄧小平和陳雲兩個婆婆。胡耀邦說：

「我尊重老人，又獨立思考；盡力在兩位老人之間溝通協調，遇大事必逐個拜訪常委請示。」

兩個婆婆在經濟領域彼此有重大分歧，又不願在一起溝通，鄧小平連常委會都不讓開。在思想政治領域，兩個婆婆倒相當一致，都反自由化，都不能容忍胡耀邦「獨立思考」，認為胡耀邦的「獨立思考」就是「要樹立自己的形象」。

陳雲是毛澤東帝國的遺老，言必稱「毛主席的哲學著作」。陳雲的「經濟思想」，是三個死抱：死抱史達林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死抱「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抑制人民消費，擴大國家積累；死抱中國封建專制時代「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小農經濟思想，抵制對外開放。

胡耀邦雖然「尊重老人」，但他要做事。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百廢待舉，不能不「獨立思考」，探索一條新路。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屆五中全會當選總書記後，胡耀邦的工作重心就轉到調查研究全國經濟發展問題。他說：過去做過軍隊工作，地方工作，宣傳工作，組織工作，對經濟工作還不大熟悉；現在全國工作重心轉移，自己也要把重心轉移到經濟領域。但只要接觸到經濟問題，胡耀邦的「獨立思考」同陳雲發生衝突是必然的，他想避免也避免不了。

第一次衝突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陳雲提出「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重調整」，主張「低增長」甚至「零增長」。陳雲未點胡耀邦的名，他的打

擊對象是華國鋒，打華國鋒的「洋躍進」。

所謂「洋躍進」，指華國鋒主政時從國外進口十三套製造化學纖維的成套設備——這是中國跨出對外開放的一大步，解決了「解放」三十年以來老百姓穿衣的需求問題，開啟了中國紡織品出口的契機，是同時滿足內需與出口的一次成功嘗試，但違背陳雲「抑需求」和「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土、洋教條。

鄧小平主張對外開放，也曾支持華國鋒的開放政策。但在陳雲以土、洋教條攻擊華國鋒時，卻發表了一篇由鄧力群替他起草的講話〈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肯定陳雲「在一系列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我國三十一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後長期的指導方針」。

鄧小平真是這樣想嗎？還是為聯手打倒華國鋒，故意借鄧力群之筆取悅陳雲？這就是鄧小平的性格。

鄧小平在這篇講話中還強調「特區建設步驟、方法要服從調整，步子可以走慢一點」。那時胡耀邦批發了中央黨校關於特區建設的調查報告，主張「特區建設速度應當加快」。

胡耀邦在會上沒有發言。

第二次衝突是一九八三年三月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陳雲發難點名攻擊胡耀邦。就是那次會議後，胡喬木與陳雲秘密商議開省市第一書記會議倒胡。那一回倒

胡被葉劍英、鄧小平阻止後，陳雲集團才認識到從經濟問題下手打不倒胡耀邦，只有從政治問題下手，才能陳、鄧聯手倒胡。

第四，在經濟領域鄧小平與陳雲之爭中，趙紫陽在實際工作中持中間偏鄧立場，但會上發言往往偏陳，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三年兩次會上都是那樣。所以鄧、陳、胡、趙共治七年（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屆五中全會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胡耀邦始終是陳雲集團主將（陳雲、王震、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主攻的目標。他事情做得最多，遭明槍暗箭攻擊也最多，雖事事委曲求全，最終還是被逼辭職。

胡耀邦在經濟問題上受攻擊時，鄧小平有時會伸出援手，趙紫陽也曾表示「同舟共濟」。但當陳雲集團改變策略，從政治上（自由化）攻胡時，葉劍英死後已無人能救援，胡耀邦陷於徹底孤立。政治局中僅習仲勳一人仗義執言，也無濟於事。

至於趙紫陽說胡、趙分歧在速度vs.效益，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胡耀邦走遍中國，主要從全國各地不同的自然與人文條件出發，調查研究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戰略問題。胡耀邦博覽群書，主要也是研究國外發展的經驗教訓，吸取對中國有用的東西。人們應當糾正胡耀邦不懂經濟的流行偏見。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特區建設到沿海十四城市開放，從內陸到邊疆，從山區、平原到草

原、荒漠地帶的開發和環境保護，胡耀邦不畏艱險，深入進行實地考察，與當地人民和幹部商討，如何因地制宜，依據當地自然資源和社會人文條件，充分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制定出務實的發展規劃，滿足人民的物質與文化需要。

陳雲批評胡耀邦走遍全國各縣的調查研究方法，標榜他自己「長期蹲點，解剖一個麻雀」。胡耀邦認為歷史已經證明那種舊思維、舊方法的害處：「全國學大寨」、「全國學大慶」，全國實際狀況千差萬別，怎能照搬大寨、大慶？世上鳥類品種特性各異，怎能都和麻雀一樣對待？中國的經濟發展，西藏不同於北京，新疆不同於上海，雲南不同於浙江，寧夏不同於福建……「一刀切」行嗎？

最根本的，是出發點與目的不同。從生產目的討論開始，胡耀邦明確指出，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手段是發揮人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這也是後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瑪蒂爾·森的主張：經濟發展的目的和手段都是人的自由，自由人的需要和自由人的創造力。

至於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武昌那場爭論，胡耀邦提出年增長百分之七，十年翻一番，是經過調查研究，與地方反覆討論計算，的確有把握才向鄧小平建議的。當時陳雲、趙紫陽主張百分之四。鄧小平的態度搖擺不定，胡耀邦的百分之七他不反對，陳雲、趙紫陽的百分之四他也贊成。最後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表示「完全同意」陳雲的百分之四，甚至更低（陳雲口頭上提過「零」速

度）。但歷史已經作了結論，只要改革開放一鬆綁，發展的勢頭不可阻擋，人民的創造力不可阻擋，胡耀邦正是從這點出發制定他的發展目標，把胡耀邦的速度目標貶抑為「盲目的群眾運動做法」，是不公正的。

第五，鄧、陳、胡、趙共治的七年，陳雲集團攻擊的目標集中於胡耀邦。胡耀邦下台後，目標必然集中到趙紫陽身上，除非趙完全站到陳雲一邊。但趙紫陽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可能那樣做，他只得依靠鄧小平一個人的支持。遇到難辦的事，必先徵得鄧的同意之後，才拿到會上討論，使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們欲反對而不敢造次。

但趙紫陽錯估了鄧小平，正如鄧小平錯估了毛澤東一樣。鄧小平和毛澤東都在「左」、右之間玩弄平衡，但都信奉「左」比右好的教條。在毛、鄧看來，「左」派治國無能，影響共產黨執政好、壞之別；而右傾容忍「自由化」，是共產黨執政的存亡問題。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經濟上犯錯誤可以讓，自由化問題上栽跟頭不能讓」的「道理」。

鄧小平在最後時刻許諾趙紫陽「當兩任總書記，陳雲、李先念均已同意」的話，恐不可當真；正如鄧對胡耀邦說「我全退，你半退」不可當真一樣。胡耀邦信以為真，高高興興表示贊成，認為是「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作出榜樣」。鄧小平

卻轉身去問萬里：「胡耀邦為什麼贊成我退？是否想取而代之？」兩次都是在對方的信任產生動搖時的試探。如果對方表示忠誠不二，或者還可挽回信任；如果對方還要「獨立思考」，勢必「禍從天降」。趙紫陽和胡耀邦的命運一樣，問題都出在婆婆不准媳婦「獨立思考」，媳婦偏要「獨立思考」。

事實上，鄧小平對趙紫陽的支持，主要在經濟領域，尤其是趙紫陽把鄧小平路線概括成「兩個基本點」、「兩個堅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絕不容忍反自由化反到他的經濟領域，這是鄧小平與趙紫陽最大的一致，也是鄧小平與他喜愛的「左」王鄧力群最後分道揚鑣的唯一原因。其餘鄧力群做的一切壞事（包括延安、新疆），鄧小平都容忍了。

鄧力群最後懂得，要挽回鄧小平對自己的信任已不可得，但挑撥鄧小平倒趙還有可為。於是教唆王震反《河殤》，造出趙紫陽支持《河殤》的要害，是在把趙紫陽任總書記作為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的又一個「新紀元」。這下擊中了鄧小平敏感的政治神經。至於陳雲和李先念，則早已同鄧力群一道議論趙紫陽是「走資派」了。他們的倒趙佈局早已擺好，只等趙紫陽的「獨立思考」觸怒鄧小平了。

假如鄧小平在最後時刻還想挽回趙紫陽，為什麼不把趙紫陽請到家中好好談談？甚至連趙紫陽拜託楊尚昆轉達求見之意都予以拒絕？可見，鄧、陳聯手倒趙和天安門屠殺，是鄧小平根據他自己對「國際大氣候」、「國內小氣候」的判斷，做

出的「重大戰略決策」，絕非偏聽李鵬、陳希同之言的一時衝動所致。這也是鄧小平帝國歷屆領導人均拒絕重新評價胡、趙和天安門悲劇的「道理」。

第六，有人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中國改革開放。這是對鄧小平的個人迷信，不符合歷史事實。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鄧小平恢復工作之前早已起步；那是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農村包產到戶，進口國外成套設備加快經濟建設，知識青年上大學，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人民爭取表達意見的自由……這是遍佈全國農村和城市，廣大人民自下而上，自主自發的要求與行動。胡耀邦只是順應歷史潮流，在他所處的各個崗位上實現了人民的意志。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這股歷史潮流的產物。鄧小平只是急就了一下，發表了那篇順應潮流的講話，三個月後就轉向，以他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阻擋人民意志和歷史潮流的前進。所以，封鄧小平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或教父，都名不符實，鄧小平自己也只說「摸著石頭過河」而已。

假如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嗎？

當然不是。假如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是鄧、陳、胡、趙共治，而是華、胡、趙共治，鄧小平處於他出來工作時承諾的「輔助」位置，不以「婆婆」或「核心」自

居，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比今天好得多。以華國鋒的開明務實性格，他會繼續順應歷史潮流與人民意志，與胡、趙竭誠合作，支持胡、趙的改革理念與政策措施，絕不會倒胡、倒趙，更不會有天安門屠殺，中國完全可能在全球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真正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現代憲政國家。

從鄧、陳、胡、趙共治，到鄧、陳與胡、趙決裂，標誌鄧小平決心徹底清除黨內一切可能傾向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進步力量，把黨國權力全部控制到專政派手中，以確保對外開放、對內專政的黨國奴役制度「長治久安」。

(二) 一九八九(一九九一)，鄧小平帝國盛世繁榮與末世敗象同時並存的發展時期。

天安門屠殺後的前三年（一九八九(一九九一），由於陳雲勢力全面掌控經濟（李鵬、姚依林）和意識形態（鄧力群、胡喬木）領域，鄧小平帝國的經濟、政治全面倒退，導致鄧小平發表那篇政治反右（警惕右）、經濟反「左」（主要防止「左」）的南巡講話，迫使陳雲勢力退出經濟領域。從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開始，進入鄧小平帝國的「兩手硬」時期。

江澤民是一個愛表演的演員，但沒有自己「獨立的東西」。他主政十三年，除了前三年被陳雲集團控制，後十年主要是表演鄧小平的「兩手硬」。

第一，提出「三個代表」，鞏固黨的權力。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都由共產黨「代表」了。這種「黨天下」思維，是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一貫的舊思維，無非堅持黨的權力和利益高於人民、高於一切。這算不得什麼新東西，載入黨章、憲法，是一種諷刺。

第二，消滅一切自由化動亂因素於萌芽狀態。

江澤民運用專政手段，鎮壓法輪功、家庭教會、民主運動、維權人士以及少數民族地區的自治運動，壓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控制、封鎖網路傳播，擴充武警部隊鎮壓群體事件，目的是實現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消滅自由、民主、人權、環保等人民訴求於萌芽狀態。

第三，經濟上強化所謂國家吸収能力，吸乾中國勞工身上最後一滴血。

創議者是遊學美國的「知識菁英」（王紹光、胡鞍鋼）。他們玩弄一套數據嚇唬江澤民和朱鎔基，說中國改革開放後，國家財政吸収能力下降，比南斯拉夫還低；而一個國家的財政吸収能力下降，國家就會瓦解，南斯拉夫就是因為國家財政吸収能力低而瓦解的。江澤民、朱鎔基採納了他們的主張，從此每年GDP增長在百分

之十上下，而每年國家財政收入增長幅度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國家拿了「大頭」，三角聯盟（政治菁英、經濟菁英、知識菁英）的「菁英」拿了「中頭」。最後的負擔就壓到生產者百姓、勞工頭上，造成國富民窮、貧富懸殊、盛世末世並存的中國特色。

第四，在對外開放方面，江澤民發展了與美國華爾街的夥伴關係，與跨國財團、企業聯手攫取利益，使中國加速成為全球製造工廠，靠壓榨農民工生產大量廉價商品出口，賺取貿易順差，使人民窮困的中國成為人民富裕的美國的債主。

總體來說，鄧小平帝國的第二時期，江澤民在戰略上以防禦為主，以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制統治、防止國內動亂為主。江澤民對法輪功的一次和平請願如此恐懼，如此大力鎮壓，正是內心虛弱的反應。要等到二〇〇四年，鄧小平帝國的第三代胡錦濤權力鞏固之後，才對外擴張，向全球打出「中國崛起」的大旗。

（三）二〇〇一～二〇〇九，鄧小平帝國進入對外全面擴張時期。

胡錦濤二〇〇一年從江澤民手中拿到總書記的職務，二〇〇四年又拿到軍委主席，成了鄧小平帝國的第三代傳人。他繼承和擴展了鄧小平的戰略，從防禦性的「韬光養晦，永不當頭」，推進到「中國崛起，有所作為」的全面擴張戰略。

胡錦濤時期的擴張是全面性的，軟實力與硬實力，在軍事、經濟、政治、外交、文化、統戰各個領域，從陸地、海洋、天空到外太空，迅速向全球擴張。

這是二十一世紀恐怖主義攻擊美國之後出現的另一種奇觀，開放的新奴役制度進軍全球。一個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龐大帝國，以高速度發展了三十年，其GDP也只有全球的百分之七，美國的四分之一；其人均GDP只有美國的十四分之一。然而，他卻成了美國的最大債主，在全球大手筆收購礦產和跨國企業。光是二〇〇九年六月，就有下列部分記錄：

中國企業近期海外收購動作

日期	企業名稱	收購標的
6／04	中石化	全資收購瑞士石油開採商Addax
6／18	蘇寧電器	收購日本電子產品零售商Laox的二七·三六%股權，成為最大股東。
6月中下旬	北京汽車工業控股有限公司	競購通用汽車旗下歐寶，及福特旗下的富豪汽車。
6／22	中國石油	收購新加坡石油四五·五一%股權
	中國五礦集團	買下澳洲OZ企業
	四川騰中重工	買下通用旗下悍馬（Hummer）品牌

這裡還不包括最近（二〇〇九年七月）中石油集團計劃出資一百七十億美元，購買西班牙石油公司 Repsol YPF 位於阿根廷的資產的百分之七十五股權；中海油集團出資五十六億美元，購買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股權。如果成功，將成為中國石油行業近期最大的海外競購案，共計二百二十六億美元。美國華爾街的高盛、摩根史坦利和摩根大通都參與這筆買賣：高盛公司擔任 YPF 顧問，摩根史坦利公司擔任中石油集團顧問，摩根大通公司擔任中海油顧問。

胡錦濤嘴上講得好聽的「科學發展」、「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事實證明純屬假話。這個開放帝國迅速膨脹起來的「綜合國力」，完全建築在剝奪廣大人民的自由、幸福、生命權的基礎之上。看看那些黑煤窯、黑磚窯、愛滋村，看看那些生活在鄧小平帝國地獄裡，被迫飲毒水、呼吸毒空氣，生下兒童無法健康成長的悲慘人們吧！這就是胡錦濤的「以人為本」？！原來，胡錦濤是以剝奪廣大人民的自由、幸福、生命「為本」，構築了開放式新奴役制度「崛起」的鄧小平帝國大廈。

胡錦濤手裡的武器，就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黨國主義。正如胡耀邦所說，以抽象的民族、國家、黨的名義，抹殺每一個活生生的人！這是奴役制度的本質，即少數奴役者以民族、國家的名義奴役廣大人民。

鄧小平帝國的開放式奴役制度，奴役人民、踐踏人權，同時掠奪自然、毒化人類生存環境、戕害人的生命、貽害子孫後代和地球的未來。環境權也是人權。胡耀

邦的「人是目的」，這個目的包括人的生存環境、人類永續發展的自然環境，以及人類生存的這個地球。

胡錦濤的眼中，沒有人，也沒有地球。或者說，胡錦濤眼中的「人」，只是供他在「世界工廠」裡造錢的工具；胡錦濤眼中的「地球」，不過是填進「世界工廠」機器裡造錢的原料，供他提升吸取國家財政能力，在全球「崛起」。至於人類和地球將因此遭受災難甚至毀滅，「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

這個擴張中的開放式新共產奴役制度帝國，已經在世界的東方「崛起」。它已經擺脫天安門屠殺後的孤立，與其他奴役制度國家建構起多種形式的地區和全球聯盟。它運用其「軟實力」和「硬實力」，滲透進美國、歐洲和全球自由國家，進行統戰、分化，製造矛盾，各個擊破，利用自由民主國家的資本、資源、資訊、人才，強化自身的奴役制度力量，削弱自由民主國家和自由民主力量的聯合，以實現鄧小平「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終極目標。

有人喜歡以拿破崙對中國的比喻來形容今天的「崛起」：「睡獅醒來」，卻看不懂醒來的是一頭塗上西方資本主義油彩的東方奴役制度吃人野獸；牠是靠喝西方資本主義的奶水和中國人民的血汗長大的。

危險的是，當牠長大起來的時候，周圍的自由國家和自由力量卻睡得迷迷糊糊，以為哺育起來的是一頭和藹可親的大花貓，是一種比傳統的自由民主制度更有

效率的「中國模式」，對其奴役制度的吃人本性失去警覺。

現在不是有著名的國際戰略家在鼓吹「G2」，主張美中聯手「共管」世界嗎？不少美國政客、學者也樂此不疲，甚至建議放棄美日同盟，建立美中同盟。反倒是胡錦濤、溫家寶顯得謙虛，自稱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不夠格。

在這樣一種迷迷糊糊的夢境中，看不見這頭野獸在咬嚼本國的人民，看不見這頭野獸在踩毀地球的生機。鄧小平帝國對內對外的一切倒行逆施，自由國家似乎都已失去感覺，無動於衷。法國人民稍稍抗議一下中國在西藏的暴政，中國可以立即發動民族主義「憤青」包圍法國超商「家樂福」，迫使法國噤聲。

今天中國已經與其他奴役制度國家聯手，擊退全球自由民主浪潮的擴展，而全球自由民主國家對中國奴役制度的全球擴張，卻欲拒還迎。

這種狀況，與一九三〇年代慕尼黑以及一九四〇年代雅爾達，對希特勒的納粹奴役制度和史達林的傳統共產奴役制度的欲拒還迎，如出一轍。

歷史錯誤的教訓，真是那麼難以記取嗎？

這頭「醒獅」今天的實力，與全球自由民主力量相比，是渺小的，同初起的納粹與戰後創傷的蘇聯一樣。自由民主力量完全可以聯合起來，阻止他奴役人民、危害地球。假如今天不警覺，繼續哺育他再翻兩番，從百分之七翻到百分之二十八（全球GDP），超過美國，到時候恐怕要阻止也來不及了。那時人類和地球付出的

代價，將遠遠超過對慕尼黑和雅爾達付出的代價。

要避免鄧小平帝國給人類和地球帶來的災難，全球自由民主力量必須聯合起來，全球自由民主力量必須聯合起來，迫使中國政府終止其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危害人類生存環境的奴役制度發展模式，在中國實現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維護人權和自然生態環境，走人類文明永續發展的共同道路。這將是決定人類與地球命運的全球自由制度與奴役制度的最後一戰。

中國天安門屠殺的歷史教訓

天安門屠殺作為一個已完成的歷史事實，它的意義當下即已確實無疑：這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余英時

一、對悲劇的「反思」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悲劇——天安門屠殺。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

這一事件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動用國家的軍隊，在天安門一帶以坦

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一幕慘劇，這一殘酷事實的本身已清清楚楚地以鮮血大書於活的歷史上面，再也沒有改變的可能，更不發生任何解釋的問題。所以天安門屠殺作為一個已完成的事實，它的意義當下即已確實無疑：這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Crime against humanity*）。

我並不是用西方現代的人權語言來妖魔化中國共產黨，因為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公認的道理，孟子早就說：「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讓我舉一個具體的史例說明我的論點。明朝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蘇州市民因為太監以重稅榨逼商販激起一場數千人的集體抗議行動，並且打死了太監的一個手下。當時地方當局有人主張用軍隊鎮壓。獨太守朱燮元說：「不可，兵所以禦外寇者也，吾不能鋤奸，以致招全亂。若又擊之，是重其毒也。」四百年前的蘇州太守朱燮元，已認清軍隊的功能是防禦外敵入侵，絕不能用來殘毒老百姓，這豈不足夠說明：天安門屠殺即使在專制王朝下的中國，也是一種絕不可恕的罪行？（註1）

¹ 余英時，〈序〉，《陳小雅主編，《沉重的回首：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十五週年紀念文集》，香港：開放雜誌社，二〇〇四年。

然而，這樣一個全世界人親眼目睹的已完成的歷史事實，這樣一個無論用西方現代人權語言或中國文化傳統都是「絕不可恕的罪行」，隨著時光的流逝，隨著各色人物出於不同動機的「反思」，隨著中國在開放式新共產奴役制度下的「崛起」，使得原來「清清楚楚以鮮血大書於活的歷史上面」的「已完成的歷史」，日益模糊暗淡下去。

對於十九年前發生的這場悲劇，中國官方的論調始終不變，那就是鄧小平在屠殺之後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定的調：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堅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

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後來事態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也是必然的。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他們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其核心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美國罵我們鎮壓學生。他們處理國內學潮和騷亂，還不是出動了警察和軍

隊，還不是抓人、流血？他們是鎮壓學生和人民，而我們則是平息反革命暴亂。（註2）

我相信只要共產黨的一黨天下在中國存在一天，這個調子就不會變。有人說已經變了，不是改稱「六四」「風波」了嗎？我引鄧小平這段話，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記，「風波」是鄧的原話，就是指「動亂」，指「後來發展到反革命暴亂」的「這場風波」。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捲入這場悲劇，在其中扮演過一定角色的某些演員，事過境遷，借「反思」為名，對當年「已完成的事實」重加剪裁，塑造出另樣的「歷史」。

第一種，從根本上否定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正義性，把那場運動塑造為「無理性」、「非民主」、「一次滿帆而無錨的航行（甚至沒有舵）」，在情緒的風暴裏挾下盲目地疾駛，直到覆滅」。他們指責參與運動的民眾「除了發洩情緒，很難看出有什麼理性因素」；而學生「與其說是由於憂國憂民投入運動，莫如說更多地出於浪漫、遊戲慾；天安門廣場野遊式的露營、月下歌舞、不勞而獲的募捐和分配未來政

² 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三〇二—三〇七。

權職位的說夢，學生領袖們則在相當程度上陷在拉山頭、打派仗、搶鋒頭之中，彼此封鎖資源、相互猜忌、各搞一套，如果不是最終的屠殺創造了另一種形象，天安門廣場很可能落得個鬧劇結局」。（註3）

第二種，把造成六四屠殺的歷史責任，從屠殺者轉嫁到「激進學生蓄意激怒政府殺人」，而「自己逃生」的「秘密策略」。其「根據」是學生領袖柴玲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美國自由撰稿人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的錄影講話片段：

柴玲：「同學們一直在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心裡覺得很悲哀，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們才能團結起來。」

金培力：「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

柴玲：「我想我不會的。」

金培力：「為什麼呢？」

柴玲：「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即將離開

³ 保密，〈中國的夢〉，《民主中國》，一九九一年四月，總第九期。

北京轉入地下。」（註4）

這個錄影在六四屠殺後曾在美國ABC廣播公司「夜線」節目中播出，但未引起注意。因為當時類似言論並不特別，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名譽校長嚴家其就在開學典禮上講過「用鮮血和生命鋪平通往民主的道路」，卻遠不如他的「五一七宣言」提出「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那麼引人注目。而在六年之後，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Patrick Tyler從卡瑪（Carma Hinton）、高富貴（Richard Gordon）的影片《天安門》中專門摘出此節，以激進學生的「秘密策略」挑動政府殺人作出報導時，正好被一群「反思」者用作圍剿所謂「民主激進主義」、「民主浪漫主義」的子彈。

第三種「反思」者，把一九八九年這場運動視為「中斷中國改革進程」的「歷史大倒退」，中國的農民、工人、學生都成了「改革的阻力」：「八億農民三億文盲，農業社會的政治特點主要表現為君權政治」；「工人在改革中強烈地感受到了失落，對進一步的經濟自由化抱持著疑懼的態度」；「學生的行動方式最終成為改

⁴ 卡瑪、高富貴，《天安門》，香港：明鏡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三月，頁一七六／一七七。

革被清算的根據」。其結論是民主制度不符合「中國特殊國情」，東亞與東歐發生的民主化進程在中國「走不通」：

中國的特殊國情，既是與孕育社會現代化的基督教文化不同的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又是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一個大國。這是一個傳統社會，但是又是一個經過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社會。這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但是又是一個古老東方的共產主義國家。在非共產主義的東方國家，實現了的經濟現代化，和在這個基礎上正在逐步推進的政治民主化，中國走不通；在並非東方的共產主義國家發生的突破共產黨一黨專制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民主化，和在這個前提下可能實現的經濟現代化，中國也走不通。（註5）

第四種，無限拔高「八九民運的歷史意義」，如嚴家其說：「『六四』是二十世紀歷史的轉捩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六四』後五個月倒塌。『六四衝擊波』形成了二十世紀末的一場『大旋風』。『六四』後三個月，匈牙利開放西部邊界，兩天中就有一萬多名東德人經匈牙利、奧地利逃亡西德。『柏

林牆』一倒塌，兩天內又有七十五萬東德人湧進西德。『六四』引發的全球性巨變，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在蘇聯東歐導致了『一黨專政』的崩潰。在中國，導致了共產黨政權主動放棄計劃經濟，並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經濟的發展敞開大門。在西歐與北歐，導致了社會民主主義勢力的一度減弱。二十世紀的全部歷史表明，用國家政權力量強制推行『全社會公有化』並實施『計劃經濟』，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在這一歷史巨變中，可以看到兩種模式，一種是由『非共政權』推動『非共化』，一是由共產黨政權推動『非共化』。在『六四』衝擊波從蘇聯、東歐傳回中國後，中國形成了第二種模式的代表。」（註6）

最後一種，把天安門屠殺視為既老又病的鄧小平，被「大劑量」施以藥物後出現「非理性暴力思維傾向」導致的悲劇：

鄧小平作為一個前列腺癌症患者，一個年屆八十五歲的帕金森氏病症晚期的病人，一個被醫療技術科學最高成果的權威統治和控制著的人，他的「沒有退路」的感覺，有多少是他本人生命狀態的描述？有多少是他的黨和改革事業

或政局控制能力的描述？他對於局勢所採取的施「猛劑」以攻「毒症」的手段，有多少是醫生施之于其病情的「急就章」的一種「摹寫」？在《王牌出盡的中南海橋局》一書中，作者江之楓指出：為出席重大國事活動，鄧小平曾大劑量地被施以藥物。如果江之楓的言論確有其事實根據的話，我們確鑿無誤地看到，兩次「大劑量」用藥後，鄧小平出現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維傾向」：第一次，四月二十二日出席完胡耀邦追悼會後，發出那個終身難以挽回的四二五講話；第二次，五月十六日會見戈巴契夫以後，五月十八日便作出了可以葬送他終身榮譽的「戒嚴」的決定！以後的事態，均是這些意外事件在已經形成的對立格局中順勢推進、互相激盪、合理演化的結果！（註7）

這五種「反思」，前三種從不同角度否定一九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第四種則相反，不但肯定而且把那種運動提升至「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轉折點」。前者認為民主運動導致的屠殺悲劇「中斷」了中國改革進程，後者則認為悲劇「推動」了世界和中國的歷史進程。但無論肯定者或否定者，均傾向認同所謂「由共產黨政權推動非共化」的「中國模式」。至於最後一種，所「根據」的《王牌出盡的中南海牌

⁷ 陳小雅，〈鄧小平八九用兵探秘〉，《沉重的回首：一九八九天安門運動十五週年紀念文集》，頁一九〇／一九一。

局》，是一本虛擬的欺世之作，可以不論。（註8）

二、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

鄧小平做出天安門屠殺的決策，絕非服用「大劑量」藥物後出現的「非理性暴力思維傾向」所導致，亦非被激進學生「期待流血的秘密策略」所激怒，而是他長期觀察「國際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深思熟慮的反自由化大戰略。他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看，對我們比較有利。」

為什麼？因為有鄧小平在，「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即使從現在回頭看，鄧小平比前述五種「反思」者清醒，他「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鄧小平說的「國際大氣候」，就是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從南歐（葡萄牙、西班牙）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逐步擴展到拉丁美洲、非洲，正在推向歐亞大陸的共產主義國家。鄧小平說的「中國小氣候」，就是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響下的中國民主化浪潮，也就是他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

⁸ 《王牌出盡的中南海牌局》作者為原中共中央黨校的一名工農兵大學生，自稱胡耀邦秘書，於取得美國政治庇護期間寫此虛擬小說，台灣國民黨《中央日報》社以「中共高級幹部江之楓」之名出版。

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逐步形成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讓胡喬木替他起草了一篇發言稿，胡喬木在稿子中寫了「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寫了「我們務必要使階級敵人的一切活動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就加以消滅」等等。（註9）

鄧小平把胡喬木的稿子拿給胡耀邦，說：「這個不能用，喬木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寫。」（註10）那時鄧小平的思路，是拒絕胡喬木而傾向胡耀邦的。他廢棄了胡喬木的稿子，發表了後來被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強調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他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他批評了黨內「一聽到群眾有一點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要追查所謂『政治背景』、所謂『政治謠言』，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指出「這種惡劣作風必須堅決制止」。（註11）

9 引自胡喬木起草的鄧小平講話稿。胡喬木的草稿在胡耀邦找我參加起草鄧小平講話時交給我保存。

10 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一九九七年初版第九刷。

11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一二五、一三六。

可以說，那時的鄧小平，是和胡耀邦一起站在民主派的立場上，拒絕了反民主的專政派。那時鄧小平還講過更激進的民主派言論，如：

十月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寫出一篇二、三萬字的大文章，五四發表，從世界歷史發展與人類社會的趨勢，講清楚民主的發生和發展。資產階級以民主起家，反對封建專制。他搞民主超過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剝削階級。無產階級民主應當是民主發展的更高階段，要超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好東西要大大發揚，過去無產階級沒有搞好，史達林犯錯誤，我們也犯錯誤。

我們要人民當家作主。怎樣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主人？資產階級有一套使自己成為主人的東西，選舉、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今天我講不清楚，組織二、三十人專門寫這篇文章。

(註12)

這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胡耀邦向鄧小平匯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

會討論情況時，鄧小平的發言。兩天後，鄧小平到了美國，回來後發動了一場所謂「懲罰越南」的戰爭，北京西單的民主牆上出現了魏京生警告「防止新的獨裁者」的大字報。在短短兩個月中，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從傾向民主派，拒絕專政派，轉移到拒絕民主派，傾向專政派，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發表了胡喬木為他起草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把他兩個月前設想的「民主大文章」拋到了九霄雲外。鄧小平說：

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份子，有敵特份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份子和其他壞份子，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於這一切反社會主義的份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這種專政是國內鬥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鬥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註13）

13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鄧小平文選》（一九七八—一九八二），頁一五五。

這不是轉回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被鄧小平自己廢棄的那篇胡喬木草稿的「思路」了嗎？三個月前鄧小平說「喬木的思路不行」，三個月後卻成了鄧小平自己的「思路」。那麼，同一個鄧小平，兩種「思路」，三次講話，究竟何者為真？何者是假？以何為準呢？

我看都是真的。這就是鄧小平自己講的「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的「注意力」在轉變毛澤東時代留下來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的狀況（註¹⁴），所以「看法」傾向胡耀邦代表的民主派「思路」。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胡喬木們向他報告的社會上那般「懷疑社會主義，懷疑無產階級專政，懷疑黨的領導，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潮」；「黨內也有人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加以某種程度支持」的傾向，（註¹⁵）所以「看法」也就跟著轉向胡喬木代表的專政派「思路」了。

自此以後六、七年，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在民主派和專政派之間轉過來、轉過去，時而主張「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

¹⁴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頁一三四／一二五。
¹⁵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頁一四八／一五一。

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從制度上保證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註16）；時而主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註17）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標誌鄧小平與黨內民主派的最後決裂，也是鄧小平「反自由化」大戰略的最後確立。之前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一九八六年九月）上那場「大辯論」，專政派在鄧小平支持下擊敗民主派。（註18）然後，鄧小平和專政派利用一九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逼迫胡耀邦提出辭呈。那次事件，可以看作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的小型排練。當時學生運動雖因胡耀邦處置得當而和平落幕，但

16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頁二一八二、二九六。

17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一九六。

18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該文件突出了民主化主題，指出「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等等。專政派反對該文件，由鄧力群提出「修正稿」送給鄧小平和陳雲。陳雲支持「修正稿」，鄧小平起初否定「修正稿」，支持胡耀邦。大會表決前，陸定一、萬里主張刪去胡耀邦為妥協加上的「反自由化」一辭，引發專政派群起攻擊，接著鄧小平發表措辭強烈的「反自由化」講話，支持專政派。

仍使胡耀邦和黨內民主派遭到「清算」。鄧小平當時的講話殺氣騰騰，揚言「不怕流血」，「來一個抓一個」！（註19）

但事後專政派的奪權目標並沒有實現，因為鄧小平確立的「反自由化」大戰略是「兩手硬」：一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包括堅持用專政手段對付自由民主人權運動）要硬；另一手堅持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放，引進資本、技術發展經濟也要硬。鄧小平認為專政派只有專政一手，沒有開放一手，所以不能用專政派推薦的「左王」鄧力群取代胡耀邦，而選擇了趙紫陽。

趙紫陽接任總書記時，講過一篇話：

改革、開放、搞活，講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鄧小平同志。堅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講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鄧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國實際的過程中提出這兩個基本點的。我們大家都應當好好學習小平同志關於這兩個方面的論述。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真諦。（註20）

19 鄧小平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講話傳達稿。在《鄧小平文選》中修改為：「抓人要盡量少。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後退了麻煩會更多。」

這篇話奠定了趙紫陽和鄧小平之間一段短暫的蜜月期（一九八七年初至一九八八年上半年）。但專政派不願看到他們打敗胡耀邦的「勝利果實」落到趙紫陽手裡。一九八八年春節，王震先到珠海，住進珠海賓館的「元首套房」，號稱「養病」，邀集薄一波等大老商討「倒趙」大計。這年五月，鄧小平提出物價改革，講得很兇，他說：

中國不是有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關公故事嗎？我們可能比關公還要過更多的「關」，斬更多的「將」。過這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風險。但是物價改革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註21）

趙紫陽在鄧小平的「闖關」令下，召集經濟學家設計出幾套物價改革方案。人們沒有料到，當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體會議（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至十七日）在北戴河討論這些方案的消息傳出，在全國範圍激起民眾搶購物資、用品、擠兌銀

20 趙紫陽，〈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新華網，網路資料：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5/content_2550940.htm。這篇講話中「兩個基本點」的提法，後來寫進了趙紫陽的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即使在六四屠殺和趙紫陽被廢黜之後，鄧小平仍堅持趙的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

21 鄧小平，〈理順物價，加速改革〉（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二六二—二六三。

行存款的風潮，致使物價改革一關未闖，就不戰而退，給了專政派對趙紫陽發動攻擊的機會。這就是說，即使沒有胡耀邦去世和學生民主運動，專政派同趙紫陽的權力鬥爭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專政派明知物價改革是鄧小平的創議，所以他們攻擊趙紫陽的重心，很快從經濟問題轉移到挑撥趙紫陽同鄧小平的關係這個「要害」。

專政派攻擊趙紫陽的第一個「要害」，是電視片《河殤》。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一九八八年九月訪華時，趙紫陽送他一部拷片，說「值得一看」。王震、鄧力群、李先念等借此大作文章。鄧力群說：

趙紫陽支持《河殤》，提出了一個新觀點，趙紫陽上台的那一年叫「新紀元」。趙紫陽非常欣賞「新紀元」這個說法。首先提出批評的是王震，由林默涵等人幫助王老整理成文章。李先念有一次見到我，說你對王老文章有什麼意見啊？我說我提了一個意見，要害是「新紀元」的提法。先念說：喲，過去還不知道這個看法。（註22）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趙紫陽「支持動亂」、

「分裂黨」，鄧力群即以此主題，幫王震弄了個書面發言：

《河殤》的要害，是所謂「新紀元」。《河殤》裡有兩個「新紀元」。一六四九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新紀元，一九八七年趙紫陽當了總書記又是一個「新紀元」。這是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的「新紀元」。這是反對鄧小平同志代表的黨，大樹特樹趙紫陽「新權威主義」的「新紀元」。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殘餘勢力和社會渣滓紛紛出籠，這是他們「新紀元」的一次大暴露。趙紫陽是一個想開闢「新紀元」的野心家，還是一個善於耍弄政治權術的陰謀家。（註23）

鄧力群在王震書面發言中描繪的趙紫陽，其實是他自己的心理寫照。他依附專政派老人，利用鄧小平和陳雲之間的「分歧和矛盾」，要弄政治權術，結集「反自由化」勢力，打擊、陷害自由民主力量；目的是推翻改革派領導人，實現其奪取權力的野心和陰謀。

鄧小平對此早有察覺，早在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前，鄧小

平和鄧力群之間有一次有趣的對話，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上午十時，鄧小平把鄧力群找去。

鄧小平：新的稿子（指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決議〉草案）發下來了，你看了沒有？

鄧力群：看了三遍，有四條意見。……

鄧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你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指鄧力群把他和胡喬木的意見送給陳雲等人）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志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鄧力群：你們兩位之間有不同意見，我看出來了。陳雲的主張，我宣傳過；你的主張，我宣傳過。宣傳你的主張比宣傳陳雲的主張多得多。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贊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講。（註24）

鄧力群在《自述》中說：鄧小平與我談話時，當著面是說：「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與王震他們談話時是說：「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面拉。」（註25）

這表明鄧小平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前，是支持胡耀邦而反對鄧力群的「左」。等到全會上發生了那場鄧小平意料之外的大辯論，看到除了陸定一、萬里之外，楊尚昆、余秋里、王震、薄一波、陳雲、李先念、宋任窮、彭真等所有老人，都站到「反自由化」一邊，鄧小平也就從反鄧力群的「左」，轉向反胡耀邦的右了。

但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與專政派陳雲、李先念、鄧力群、胡喬木們不同。鄧小平反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反，不能擴大到經濟領域，影響他的另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而專政派在胡耀邦下台後，一直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鄧力群主張：「自由化思潮氾濫，第一段是思想領域自由化氾濫，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經濟領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

（註26）

第一段指胡耀邦，第二段指趙紫陽。鄧力群稱趙紫陽是「資產階級政治勢力的代理人」，他說：「有一次李先念問陳雲，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講黨內有個走資

25 同前註，頁六二〇。

26 同前註，頁八二二。

派，犯了錯誤；但是從這幾年看，趙紫陽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雲說，什麼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註27）

由此可見，專政派要推翻趙紫陽，讓堅持毛澤東全面專政理論的鄧力群取而代之，是既定方針；有沒有胡耀邦去世和學生民主運動，都無可避免。一九八七年一月他們推翻胡耀邦，本來就是要鄧力群上台，結果卻讓鄧小平把「勝利果實」給了趙紫陽。所以自一九八八年夏季開始，專政派就抓住物價改革、《河殤》電視片和新權威主義三個題目作文章批趙。

專政派發現趙紫陽在經濟領域的「自由化」主張與鄧小平相通，光批「自由化」批不倒趙，因此按照鄧力群的主意，把批趙重心轉向《河殤》的「新紀元」和「新權威主義」，提升到趙紫陽同鄧小平競爭「誰是新權威」，在黨內形成分庭抗禮的「兩個司令部」。

這時趙紫陽手下的部分幕僚，似乎是各行其是地在國內外鼓吹「新權威主義」。有人在紀念百日維新失敗九十週年座談會上，以「光緒」與「慈禧」暗喻趙紫陽與鄧小平，主張中國現代化需要「乾綱獨斷」的政治強人。還有人接受美國媒

體專訪，稱「中國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把黨政軍全部權力集中到一個領袖——趙紫陽的手中」。香港也出現了「假如趙紫陽是獨裁者」的文章。這些動作被專政派利用為倒趙的砲彈，「光緒」要結束「慈禧干政」的流言廣為傳播。（註28）

國際上，一九八八年是全球自由民主浪潮氣勢澎湃、湧向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年。六月一日，美國總統雷根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在莫斯科簽訂雙方拆除和銷毀中程核導彈的《中導條約》，並就尊重人權、全面控制軍備等議題展開談判，為結束東西方冷戰揭開序幕。六月二十八日，戈巴契夫在共產黨代表會議上宣佈「對政治體制的根本性改革是摧毀中央集權的政府僵化體制及其命令壓迫機制這一官僚巨石」，「蘇聯的變革應沿著深入且持續的民主方向前進」。他宣佈「釋放全部政治犯」，並許諾將為史達林大清洗中的遇害者建立一座紀念碑。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數十萬在一九三〇—一九五〇年代的二十年「史達林清洗」中的受害者得到平反。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四日，最後一批蘇聯軍隊撤離阿富汗。三月二十六日，蘇聯舉行一九一八年以來第一次包括非共產黨政黨的全國性選舉，許多共產黨人被擊敗。被俄共中央政治局開除的激進派領導人葉爾欽，在莫斯科選區贏得壓倒性的

28 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戴晴，〈從林則徐到蔣經國〉；陳一諮、王小強、李峻，〈建立「硬政府、軟經濟」的發展模式〉，及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專訪吳國光〉，台北：唐山，一九九一年。

百分之八十九選票，一些蘇聯共和國開始要求獨立，在史達林故鄉第比利斯，示威者要求喬治亞脫離蘇聯。（註29）

東歐局勢比蘇聯更加激盪。一九八八年，戈巴契夫撤走部署在匈牙利的全部核武器。一九八九年一月，匈牙利議會通過法律允許反對黨成立，共產黨四十年的壟斷地位被打破。三月二十八日，共產黨以外的候選人第一次被允許參選議員，匈牙利民主聯盟的候選人擊敗共產黨候選人取得勝利，他們的政綱是「民主、融入歐洲、反對共產主義、保持匈牙利價值」。匈牙利政府開始拆除用以防止匈牙利人逃至奧地利的長達二百一十八哩的安全圍牆。在波蘭，團結工會取得合法地位。共產黨政府與團結工會領袖華勒沙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簽訂了一項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協議。（註30）

由此可見，早在胡耀邦去世之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經不可阻擋地洶湧而上，衝過歐洲共產黨國家，即將來到中國天安門廣場了。鄧小平對此已有預感。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布希時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如

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註31）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鄧小平在住地同趙紫陽談話時說：「我們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外國人要議論，讓他們議論去。中國不能亂，這個道理要反覆講、放開講。不講，反而好像輸了理。要放出一個信號，中國不許亂。告訴同志們，遇事要沉著。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威遊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遊行，什麼事也不要幹了，外國資金也不會進來了。我們在這些方面控制嚴一點，不會影響外商來投資，恰恰相反，外商會更放心。」（註32）

所以，認為「六四悲劇破壞了中國社會的轉型，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軌道」，（註33）「八九民運折斷了共和國歷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十年改革進程」（註34）；或者認為「六四衝擊波從蘇聯、東歐傳回中國後，中國形成了由共產黨政權推動非共化的週年紀念文集》，香港：開放雜誌，二〇〇四年，頁九五。

31 鄧小平，〈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布希時談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一八四—一八五。

32 中央文獻出版社，《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一一六八。

33 戴晴觀點，轉引自王鵬令，〈八九民運與「中國模式」〉，陳小雅主編，《沉重的回首：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十五週年紀念文集》，香港：開放雜誌，二〇〇四年，頁九一。

代表」（註35），等等說法，都是對歷史的扭曲。

中國天安門屠殺的發生，是由於鄧小平看到了「國際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即席捲全球的民主化浪潮「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鄧小平「對付」這場風波「一不能亂、二不能退、不讓步、不遷就、不怕流血，不怕外國人議論」的大戰略，是早就確定了的。胡耀邦去世（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只是使這場風波來得早了一點。鄧小平的大動作慢了一點，只是為躲過同戈巴契夫會面。至於戈巴契夫一走，鄧小平立即出手，宣佈戒嚴後，軍隊一度被阻，到不了天安門，鄧小平只能把罪責推給趙紫陽「分裂黨」、「支持動亂」。

這一切對鄧小平來說，都是理所當然的「四個堅持」。他既不允許中國出現「非共政權推動非共化」，也不允許「共產黨政權推動非共化」。在共產黨一黨壟斷政權這個「基本原則上」，鄧小平和他的共產黨一步也不能退的。因此，對鄧小平來說，這場悲劇和他的決策，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

35 嚴家其，〈八九民運的世界歷史意義〉，陳小雅主編，《沉重的回首：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十五週年紀念文集》。

香港：開放雜誌，二〇〇四年，頁九十三。

三、全球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挫折

六四屠殺的結局，是中國學生民主運動的失敗，是北京市民支持學生運動的失敗，是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失敗。從世界歷史的高度看，六四屠殺是席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被鄧小平的坦克、機槍阻擋在天安門下。

我曾在《鄧小平帝國》一書中，把六四屠殺比喻為鄧小平的「新淮海戰役」：

鄧小平對趙紫陽與學生都忍無可忍，他彷彿墜入四十年前「淮海戰役」的舊夢，決心再嘗試一次調動幾十萬大軍圍殲「動亂」的「新淮海戰役」。他兩年多前早想一試，一九八六年末學生運動時，他就提出實行軍管，稱讚雅羅澤爾斯基對付波蘭團結工會實行軍管的辦法好。這一次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不能錯過了。

於是一聲令下，幾十萬大軍浩浩蕩蕩直指天安門廣場。別看廣場上幾萬學生，手無寸鐵，疲憊不堪，哪裡抵得上四十年前淮海戰場上武器精銳的國民黨主力部隊？然而這支手無寸鐵的、疲憊的力量，卻代表了「世界大氣候」與「中國小氣候」，代表了世界與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主流。（註36）

36 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一九九一年，頁二五六／二五七。

對鄧小平來說，六四屠殺是他的「反自由化」題中應有之義，是他抵擋「世界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抵擋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戰略部署，豈能是老人家服藥後的衝動？也絕非一個女學生的「秘密策略」足以挑起，或趙紫陽們的好心勸說所阻止得了的。鄧小平要對付的大敵，是這股自由化、民主化的世界歷史主流。

至於李鵬、陳希同們的挑撥，學生們堅持在天安門廣場不撤，知識菁英們自以為能幫助趙紫陽的愚蠢策略，可能對鄧小平起一點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鄧小平要打這場「新淮海戰役」，是決心早定，完全出自主動而非被迫的。（註³⁷）

當時要阻止這一場悲劇，只有一個可能，就是趙紫陽運用他在體制內的影響力，與體制外自由民主力量聯合，堅定地站在學生與民眾一邊，親臨前線阻擋軍隊，如同葉爾欽兩年後在蘇聯八月政變時做的那樣。我在《鄧小平帝國》一書中也會

³⁷ 一些知識菁英在「反思」文章中掩蓋真相，把屠殺責任歸於學生堅持不撤。歷史資料卻證明事實正好相反。中共公安部的報告中記載：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柴玲、王丹在天安門廣場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五月三十日舉行集會遊行，將四月十五日開始的行動推向高潮，然後撤出廣場，外地學生返回原地，等到六月二十日人大會議召開時再組織遊行。當天，「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作出「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第八點是：「如果近期內不召開人大緊急會議，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和平請願活動將至少堅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會議召開。」（「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當時為知識菁英所控制）

寫到了這一點：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就民眾顯示的力量來看，絕不弱於一九九一年的莫斯科。北京民眾在李鵬宣佈戒嚴令後，阻擋軍隊開進天安門廣場達半個月之久。不同的是在長安街上勇敢爬上坦克車的是一名普通青年王偉林，而不是「中國的葉爾欽」。我們不妨設想，假如趙紫陽爬上一輛坦克演說，表明他反對戒嚴，呼籲軍隊拒絕向民眾開槍返回軍營，由他採取憲法步驟，在民主與法制基礎上和平解決，那麼歷史的結局可能完全不同。趙紫陽那時還掌握著三個方面的主動權。第一，他掌握著傳播媒介的主動權。主管宣傳輿論的是趙的盟友胡啟立與芮杏文，當時新聞界從上到下堅定地站在民主力量一邊。而且電視、廣播在中國的覆蓋面很大。趙紫陽只要掌握這個主動權號令全國，取得民眾支持，鄧小平即使掌握軍隊也無可奈何，因為軍人也有頭腦，會接受民眾和輿論的影響。第二，他掌握著影響國家合法權力機構的主動權。趙紫陽是黨的總書記，黨內合法的第一把手，有權指揮國家權力機構的黨員領導人。人大委員長萬里、常務副委員長習仲勳都是民主改革派。萬里當時在國外明確表示支持民主，隨時準備回國。趙紫陽假如掌握這個主動權，請萬里、習仲勳召開緊急人大討論國內局勢，與街頭民主運動內外配合，完全可以挫敗李鵬政府內的強硬

派。第三，他掌握著對話的主動權。假如趙紫陽親自出來同學生對話，達成妥協，並通過傳播媒介進行宣傳，平息民怨民怒，把社會穩定下來，僅憑這一點，也可以剝奪強硬派行使暴力的藉口。然而趙紫陽什麼也沒有做。猶豫再三之後，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說幾句「我老了，無所謂了」之類的空話，卻把赤手空拳的學生與民眾留在強硬派槍口之下。（註38）

為什麼鄧小平要動用如此龐大的軍隊來對付天安門廣場赤手空拳的學生和民眾？

鄧小平動用軍隊的確切數字，官方從未公佈。官方只報導過鄧小平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一百餘人。另外據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進軍路線》等著作披露的信息，執行進軍任務的，至少有北京、瀋陽、濟南三個軍區的二七、三八、三九、六三共四個集團軍的部隊，包括一五、二〇、二四、二六、二七、二八、三八、三九、四〇、五四、六三、六五、六七共十三個軍，大約十五至二十五萬軍隊。（註39）

38 阮銘，《鄧小平帝國》，頁二八二。

39 陳小雅，《鄧小平八九用兵探秘》，《一九八九天安門運動十五週年紀念文集》。

鄧小平調動這麼多軍隊，不是僅僅對付學生和民眾。他認為世界和中國的「大氣候」，已經深刻影響到他的黨國和黨軍內部。他要以黨制黨，以軍制軍，防止趙紫陽這個「新權威」另立「司令部」，分裂黨和軍隊，同他對抗。

事實上，趙紫陽並沒有同鄧小平對抗的另一個「司令部」，他只是保留個人意見，反對鄧小平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然而，那些打著趙紫陽旗號在學生中活動的知識菁英，的確做了不少禍害學生也禍害趙紫陽的蠢事，像那篇莫名其妙的〈五·一七聲明〉：

清王朝已滅亡七十六年了，但是，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佈，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位獨裁者說話，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佈，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佈，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問題在於趙紫陽五月十六日會見戈巴契夫時的「宣佈」，根本沒有把鄧小平「推出去」的意圖。這個〈五·一七聲明〉卻給專政派提供了向鄧小平證明趙紫陽「操縱、利用學潮」推翻他的證據，趙紫陽自己是這樣說的：

關於我同戈巴契夫的談話。十三大以來，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主要決策者的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知道小平同志在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巴契夫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為什麼昨天講了這個事呢？我從朝鮮回來後，聽說小平同志四月二十五日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廣泛傳達後，在社會上引起很多議論，說常委向小平同志匯報不符合組織原則。還有一些更難聽的話。我覺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說明。在戈巴契夫來訪的前兩天，我與工人和工會幹部座談對話時，會上也有人提出這類問題。我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作了說明，效果良好。在此之前，陳希同就針對人們有關「垂簾聽政」的錯誤議論向大專院校負責人作過解釋，說明十三屆一中全會有

關決定的情況，效果也是好的。陳希同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常委會上還匯報過這個情況。因此，我就考慮，如果通過公開報導，把這一情況讓群眾知道，對減少議論可能有幫助。我向戈巴契夫通報的內容是，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有意識地沒有講，可以召集會議和由他拍板的話）。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由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會傷害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註41）

趙紫陽的確沒有想到要傷害鄧小平，但嚴家其們的〈五·一七聲明〉，卻愚蠢地把趙紫陽同戈巴契夫的談話，當作了「打倒鄧小平個人獨裁」的動員令。

然而，當獨裁者的軍隊和坦克滾滾開向天安門時，他們卻丟下趙紫陽和學生出國流亡，在國外宣佈他們的「勝利」：「正是『六四事件』影響了全球。『六四』也是當代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捩點，『六四』後的中國發生了巨變。」（註42）

41 張良編著，《中國「六四」真相》，上冊，趙紫陽在五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頁四四一～四四二。

42 嚴家其，〈八九民運的世界歷史意義〉，陳小雅主編，《沉重的回首：一九八九天安門運動十五週年紀念文集》，頁九三。

錯了。「六四」不是歷史進步的轉捩點，「六四」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挫折。中國「六四」天安門屠殺的歷史教訓是：

第一，學生與民眾低估了「專政派」鎮壓自由民主運動的決心與能力。北京民眾阻擋軍隊開進天安門廣場時，裹在頭上的布條寫著：「你有十一億軍隊嗎？」有人甚至在子彈打進胸膛、流血倒下前，還以為自己中的是「橡皮子彈」。

雖然鄧小平不斷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不但要講，而且要用」，人們還是不相信鄧小平敢於命令「人民子弟兵」如此殘酷地屠殺人民。但對於「專政派」來說，這個用鮮血換來的黨國專制政權的生命，必須繼續以人民的生命和鮮血來保衛。正如陳雲所說：

退，就是承認他們那些所謂民主選舉的非法組織，承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承認和平演變，等於否定中國共產黨，把我們幾十年戰爭、成千上萬革命烈士的鮮血換來的成果統統毀於一旦！（註43）

鄧小平的「六四」屠殺，江澤民鎮壓法輪功，胡錦濤西藏「平暴」，共產黨這

43 張良編著，《中國「六四」真相》，上冊，陳雲在五月十八日鄧小平家中召開的中共元老會議上的發言，頁四八。

個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屠殺人民的決心和能力，絕不可低估。

第二，學生與民眾高估了共產黨內部改革派的力量和勇氣。學生與民眾在天安門廣場欲退又留，一個重要因素是等待改革派出來「在民主與法制基礎上」解決問題，比如等待六月二十日人大會議召開。事實上，共產黨內改革派在面對專政派強大壓力時，並無勇氣同對手決一勝負。

在當時特定形勢下（世界民主化浪潮大氣候和中國民主運動小氣候），趙紫陽如果有勇氣面對專政派，放手一搏，並非沒有扭轉局勢的可能。據陳一諮評估：

在這次八九民運中，黨政部門司局以下幹部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運的。在正、副部長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運的。最明顯的是在五月十五日到十八日這幾天，各界名人都出來表示態度，希望政府承認學生是愛國的，不希望政府用強硬辦法。首先提出不贊成動用軍隊的，是人大常委會三個軍隊副委員長。離休的八百多名將軍，都明確表示反對動用軍隊鎮壓。

(註 44)

如前文提到，假如趙紫陽像兩年後的葉爾欽那樣爬上一輛坦克演說，讓軍隊返回軍營，局勢可能改觀，這是上策。但趙紫陽錯失這一轉瞬即逝的成功機會。

趙紫陽的第二種選擇是同專政派妥協，即鄧小平和元老們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作出戒嚴決定後，趙紫陽不再堅持反對戒嚴的主張，服從鄧小平，由趙自己執行戒嚴決定，並親自與學生對話，讓學生看清形勢，勸導學生離開廣場。這樣做，專政派自然不會善罷甘休，趙紫陽和廣場學生仍難免被「秋後算帳」，但「六四」屠城悲劇或可避免。

這是中策，也是一九八六年底到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的選擇，他在鄧小平和專政派壓力下，作了違心檢討，自己出來和平結束學生運動後提出辭呈下台。事後他承認自己軟弱，一是為保護學生，二是避免牽連家屬受害。

結果趙紫陽選擇了下策，保留個人意見，退下歷史舞台。

第三，自命不凡的知識菁英，未能成為民主運動與體制內改革派之間的「橋樑」，反而替專政派製造出一舉擊敗民主運動與改革派的武器。

例如北京社會研究所知識菁英的「三線計劃」。他們把學生運動推到「一線」；由知識界知名人士組成「二線」，「指導和制約學生」；「三線」由該所所長主持，「利用一線、二線造成壓力，專司與政府談判」。（註45）

他們自居學生運動（體制外）與政府（體制內）之間的「橋樑」，其實是一座根本不通的斷橋。

還有那份〈五·一七聲明〉，自作聰明地宣佈趙紫陽與戈巴契夫談話是決心對鄧小平攤牌，根本是子虛烏有，卻給專政派提供了一枚「趙紫陽分裂黨、支持動亂」的重磅炸彈。

第四，自由國家特別是美國政府，在自由與共產黨奴役制度的歷史性角鬥中，站到了歷史的錯誤一邊。

「六四」屠殺通過美國CNN電視實況報導，震驚了世界。美國政治領袖當時採取兩面手法：一面向公眾表示譴責屠夫、制裁暴政；一面暗通款曲，向屠夫示好，尋求與其「合作」，助其「穩定」，以維持自由大國與共產奴役制度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美國眾議院以四百一十八票對零票，通過《制裁中國修正案》；第二天（六月三十日），布希總統就派遣特使史考克羅夫特（Brent

45 封從德，〈八九民運組織結構研究〉，陳小雅，《沉重的回首：一九八九天安門運動十五週年紀念文集》，頁二七九。

Scowcroft）和伊戈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秘密訪問北京，向鄧小平示好。結果他們遭到鄧小平一頓痛斥，無功而返。鄧小平說：

中國沒有觸犯美國，任何一個小問題都沒有觸犯。問題出在美國。美國在很大範圍內直接觸犯了中國的利益和尊嚴。我明確告訴閣下，中國的內政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後果如何，中國都不會讓步。中國內政要由中國來管，什麼災難到來，中國都可以承受，絕不會讓步。（註46）

鄧小平敢於如此蠻橫地對待老布希的特使，因為他看透了美國軟弱可欺。早在密使派出一週之前（六月二十三日），鄧小平就收到老布希的密信。信中說：

對於閣下對貴國人民的貢獻及引導貴國進步，本人極為敬重，有鑑於此，敝人提筆寫這封信，請求閣下協助維繫這層貴我雙方都認為至為重要的關係。敝人已經竭盡所能，不干預中國內政，敝人尊重貴我兩國社會、制度之歧異。敝人只是要向閣下保證，我們希望這個難題能獲得解決，既能令閣下滿意，又

不違我們對基本原則的主張。朋友之間有歧見必須設法消弭。（註47）

這封信讓鄧小平一眼看穿，美國政府的所謂制裁，不過是應付國會和公眾輿論的姿態，因而採取寸步不讓的強硬態度，逼老布希全線退卻。同時在北京、上海等地繼續擴大搜捕和公開處決參加民主運動的中國青年。

兩名密使在北京碰壁回來，布希在七月九日的日記中寫道：「我真的很希望中國採取行動解決目前關係緊繃的問題，可惜未能如願。」他再次藉口通報七國高峰會，寫信給鄧小平，說「美國和日本曾把一些非常令人激怒的措辭從指責中國的公報中刪去」等等。（註48）

鄧小平回信繼續指責美國「深深地捲入了中國的內政，對中國進行制裁，觸犯了中國的利益和尊嚴，由此引起中美關係的困難，責任完全在美國方面，應由美國來改變」。（註49）

布希見鄧小平態度強硬，於十月、十一月連續請尼克森和季辛吉訪問北京，充當說客。鄧小平面對這兩位中國的「老朋友」，嘴裡還是說硬話，態度上開始緩和

47 Patrick Tyler, 《中美交鋒》，台北：聯經，一九九九年，頁四四二～四四三。

48 同前註，頁四四五。

49 中央文獻出版社，《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頁一二八五。

下來。他一面對尼克森說：「北京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首先是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潮煽動起來的。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捲入太深，美國之音太不像話，一批撒謊的人在幹事。如果美國領導人根據美國之音制定國策，要吃虧的。」一面又說：「你是中美關係非常嚴峻的時刻到中國訪問的，我們同美國也應該結束這幾個月的過去，開闢未來。請你告訴布希總統，結束過去，美國可以採取一些主動行動。美國利用中國市場還有很多事情能夠做，我們歡迎美國商人繼續進行對華商業活動，這恐怕也是結束過去的一個重要內容。」（註50）

尼克森從鄧小平那裡回來，在美國《時代》雜誌發表的文章〈中美關係的危機〉中說：

東亞安全問題上，日本已經是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而且有能力成為一個軍事和政治超級大國。與此同時，蘇聯在這一地區仍具有相當影響力。在此種情況下，如果有一個強大的、穩定的、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國家，對於美國平衡亞洲力量，特別是平衡日本和蘇聯在遠東的力量，就是必不可少的。美國維護同中國的合作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可利用中國的力量來平衡其他的力

量，以在太平洋地區取得有利於美國的大國均衡。（註51）

這就是尼克森、季辛吉主張的聯中制日、聯中制俄大戰略。老布希看來接受了她的主張。鄧小平在十一月六日接到老布希來信，信中表示：「當初尼克森訪華的地緣政治原因依然存在，今天，美中兩國在許多重要領域有著相似的利益。」來信建議，在老布希同戈巴契夫會晤後，美國將派特使訪華，向鄧小平通報會晤情況，探討如何使美中關係正常化。（註52）

十二月九日，老布希的特使史考克羅夫一行再度訪問北京。這一回是公開的。美國終於接受了鄧小平的「一攬子方案」，包括：「美國取消制裁」，「落實幾項較大的中美經濟合作項目」；鄧小平的報答是：「同意方勵之夫婦離開美國駐華使館到美國或某第三國去。」（註53）

老布希如此急切地幫鄧小平從「六四」屠殺的內外困境中走出，受到了美國輿論的強烈批評。

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米契爾（George Mitchell）在國會抨擊這是「美國總統以

51 Nixon, "Crisi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imes*, Nov. 20, 1989, pp. 44 ~ 49.

52 中央文獻出版社，《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頁一二九五。

53 錢其琛，《外交十記》，香港：三聯書店，一〇〇四年，頁一五一～一五四。

最不恰當、最令人尷尬的方式向中國政府屈服，是對高壓的共產中國政權表裡不一的磕頭外交」。（註54）

《華盛頓郵報》批評老布希的決定是「對一個實行鎮壓和沾滿鮮血的政府做出的安撫性讓步」。（註55）

誰說「六四」屠殺沒有勝利者？

勝利者是鄧小平。鄧小平通過清洗趙紫陽，達成了他同專政派的聯盟，打退了世界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阻擋了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六四」屠殺的血泊上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開始了他的開放式新共產奴役制度中國在全球的「崛起」。

四、奴役制度挑戰自由的歷史沒有終結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被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和坦克、機槍，阻擋在中國天安門下，但並沒有從全球退卻。它繞過血腥的天安門廣場，半年後抵達柏林牆下。東德

54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一九九九年，頁六〇八。

55 同前註。

共產黨沒有效法鄧小平下令鎮壓，讓歡呼的民眾推倒了這座分隔共產奴役制度與自由世界的監獄之牆。羅馬尼亞獨裁者西奧塞古下了鎮壓令，軍隊拒不執行，反而逮捕和槍決了這位共產暴君。整個東歐共產國家的人民獲得了自由。

最後效法鄧小平的是發動蘇聯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的亞納耶夫。他把在黑海休假的戈巴契夫軟禁起來，宣佈自己代行總統職務，並成立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接管國家全部權力，調動蘇聯紅軍鎮壓莫斯科俄羅斯大廈前的示威民眾。這齣政變鬧劇，一度獲得中國共產黨專政派王震等人的喝采，以為莫斯科成了「天安門第二」。

然而，當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爬上一輛坦克演說，與民眾一道阻擋軍隊時，塔曼裝甲師的戰車調轉砲口保衛葉爾欽，堵住政變陰謀者的路，存在七十四年的蘇聯共產帝國隨之瓦解。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南歐初興之時，世界上只有四十個民主國家，絕大部分屬於富裕的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二十年後，全球超過半數的國家和人口進入民主國家行列。有人從而認為人類已走向「歷史的終點」，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我們可能正走向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並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作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型態。」（註56）

56 杭廷頓，〈民主的千秋大業〉，田弘茂、朱雲漢主編，《鞏固第三波民主》，台北：業強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四九。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共產奴役制度挑戰自由民主浪潮的歷史並沒有終結。天安門屠殺後，中國開放式共產奴役制度的迅速崛起，正在迫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退卻。人們迄今尚未認識到，這種新奴役制度的擴張，對人類自由的巨大威脅。

因為它是寄生在全球資本主義肌體之上的新共產奴役制度；它向全球自由國家和全球資本市場開放；它引進全球的資本、資源、資訊、人才、技術，與全球跨國資本共同榨取本國勞工，分享高額利潤，深受全球大企業的歡迎。

美國前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一篇題為「中國往何處去——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的演說中，把中國這種新共產奴役制度的崛起，定義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其根據是中國在他指出的下列各個方面，「與前蘇聯截然不同」：

——中國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識。

——中國雖然有時採行重商主義，但並不認為自己正與全球民主制度進行最後搏鬥。

——中國雖未實行民主，但也不認為自己正與資本主義進行殊死

鬥爭。

——最重要的是，中國不認為自己的前途取決於廢除現行國際體系的基本秩序。事實上情況正相反：中國領導人決定，他們的成功，依賴於與當代世界聯網。（註57）

所有這些，正是共產中國鑑於蘇聯共產制度崩潰的教訓而採取的新戰略，但沒有改變其共產奴役制度的本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把毛澤東的封閉式共產奴役制度改造為開放式共產奴役制度；改變的是這個奴役制度的經濟發展戰略，從「自力更生」的鎖國戰略變為「改革開放」的全球戰略。而共產奴役制度支配下不自由的巨大人力資源，一旦同全球自由資本與現代先進技術相結合，其增長的經濟、科技實力足以使中國迅速在軍事上霸權崛起。

西方自由國家對中國新奴役制度的霸權崛起有一種誤判，就是佐立克演說的結論中所說：「即使在我們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國而努力之際，我們也能與今日崛起的中國合作。」（註58）在佐立克看來，美國給今日中國開放的共產奴役制度輸血，扶

57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58 Ibid.

植它在經濟、軍事上崛起；等它更加強大起來，中國共產黨就會自動放棄權力壟斷，接受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和平演變」為「明日的民主中國」。

(註59)

這是天真的幻想。有人不是報導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重複出現四十一次「民主」嗎？不錯，他講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人民民主專政」的「民主」、「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也就是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反對黨、沒有司法獨立、沒有權力制衡、一切權力歸「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天安門屠殺正是這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產物。胡錦濤在他從江澤民手中接過軍權的中共十六大四中全會上早就說過：

國內媒體打著政治改革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針對這種錯誤絕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管理，不給錯誤思想觀點提供渠道。蘇聯就是在戈巴契夫提倡公開化、多元化，造成黨和人民思想混亂中解體的。(註60)

59 Ibid.

60 〈胡錦濤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講話〉（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九日），香港：開放雜誌，二〇〇四年十二月號。

中國新奴役制度軍事擴張的第一個戰略目標就是台灣。它一天吞併不了台灣，就一天沒有安全感。有人覺得奇怪：中國為什麼那麼害怕台灣入聯公投？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它的一票就能否決台灣入聯，怕什麼？

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的奴役制度中國，怕的不是台灣入聯，它自己就有二十二年沒有入聯。它怕的是台灣公投，怕的是台灣人民自由表達自己的意志！這是對中國被奴役人民的示範，是對中國共產奴役制度的最大威脅。它將使中國共產奴役制度永遠征服不了台灣人民，也將使中國人民效法台灣人民，從被奴役走向自由。

我們今天紀念二·二八，六·四就是中國的二·二八，二·二八就是台灣的六·四，都是奴役制度為鞏固恐怖統治，殺戮中國人民和台灣菁英。只要奴役制度挑戰自由的歷史沒有終結，六·四和二·二八的悲劇隨時可以重演。哪一天共產奴役制度開始用「一個中國」絞索套住台灣、遭到自由的台灣人民反抗之時，就是二·二八、六·四悲劇重演之日。

我們接受二·二八和六·四的歷史教訓，最重要的是自由人民不能對奴役制度妥協、退讓，放棄自由、民主、獨立的堅持。

台灣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新生的自由之國，他今天面對共產中國的軍事

和統戰雙重威脅。共產中國的軍事力量征服不了台灣人民，最危險的，是台灣內部被中國共產黨統戰的「一中」勢力，與中國國民黨舊黨國傳統勢力聯手在台灣「變天」，自願套進共產奴役制度的「一中」絞索。

自由國家如果選擇錯誤，可以倒退為不自由國家。一九三〇年代的德國，選擇希特勒，不但德國「變天」，變成納粹帝國，當時全球三十三個自由國家中的二十二個也變了天。

二〇〇八年總統大選，台灣就面對這樣的選擇。台灣如果「變天」，不但失去自由民主制度，連國家都會失去，台灣的天變成中國的天。

馬英九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國驕子，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他的經歷大家知道。今天他的背後，不僅有舊黨國體制留下的傳統舊勢力，還有胡錦濤中國這些年來經營的統戰勢力。馬英九主張「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主張同中國共產奴役制度簽訂「和平協議」。馬英九於選前訪問日本時說：

當選後先要把兩年前連戰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達成的共同願景落實，變成政策、計劃和協議。（註61）

什麼是連戰、胡錦濤的「共同願景」？就是共產中國絞刑架上準備絞殺民主台灣的那根絞索「一個中國」。你伸長脖子套了進去，唯一的前途就是一命嗚呼。「三十年至五十年和平協議」，不過是「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中國特色」，過去叫作「絞監候」。

這一點，毛澤東在一九七二年中美簽訂《上海公報》時就說得坦率：「一個中國」就是「一個吃掉一個」，蔣介石的「一個中國」要反攻大陸，吃掉「毛匪」；毛澤東的「一個中國」要解放台灣，吃掉「蔣幫」。那時毛澤東自知還沒有力量吃得下，才說「等一百年讓子孫後代去解決」。

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把台灣推進到自由、民主、獨立國家的今天，難道還要讓馬英九把這個新生之國虛擬為「一個中國」送上門去，讓胡錦濤那個實體的「一個中國」吃掉嗎？

紀念二·二八和六·四，就要記住歷史的教訓，拒絕奴役制度和向奴役制度妥協的舊勢力，不讓人民已經獲得的自由、民主、獨立得而復失。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美國